

巴林文史丛书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7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1-8册(全套)定价: 280.00元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韩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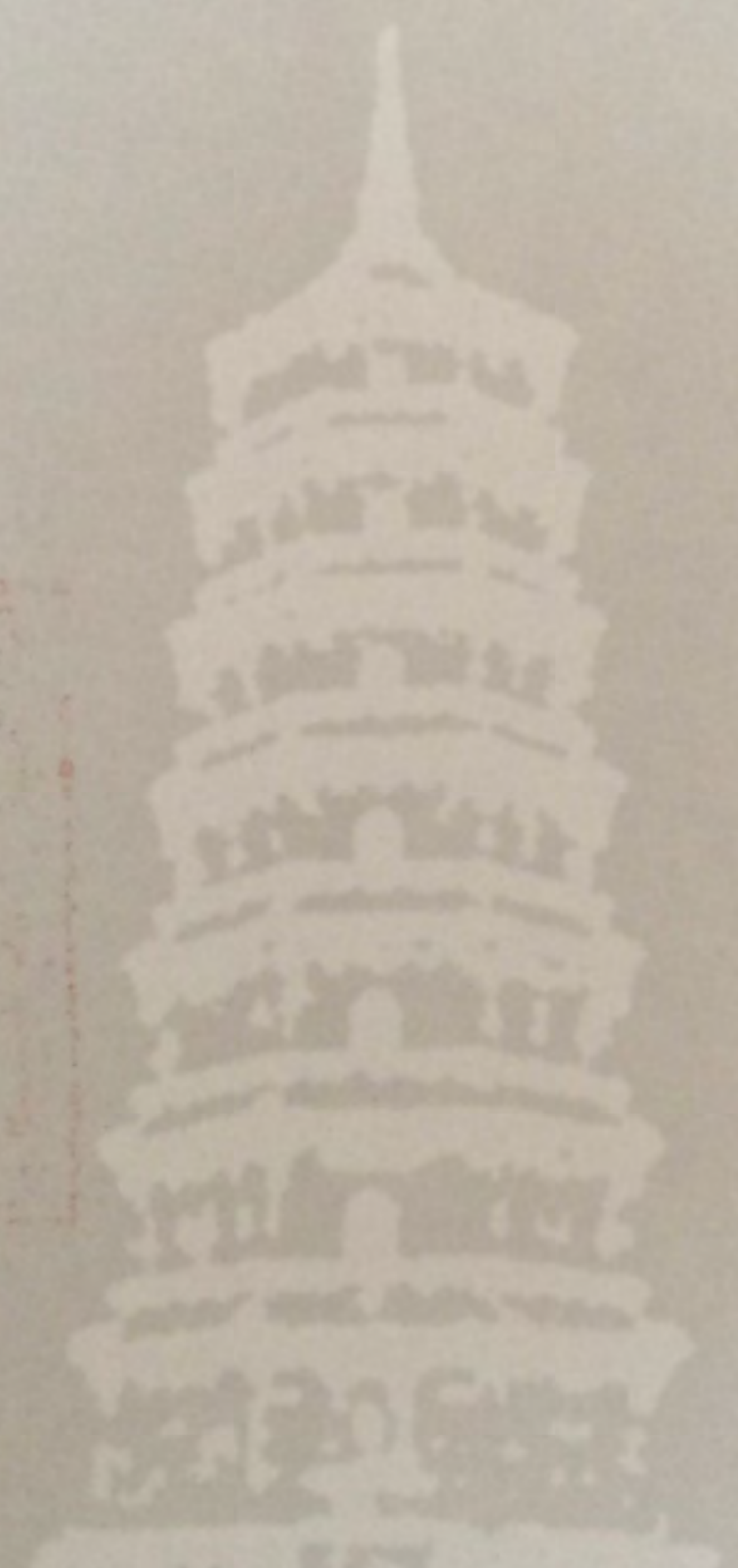
#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第七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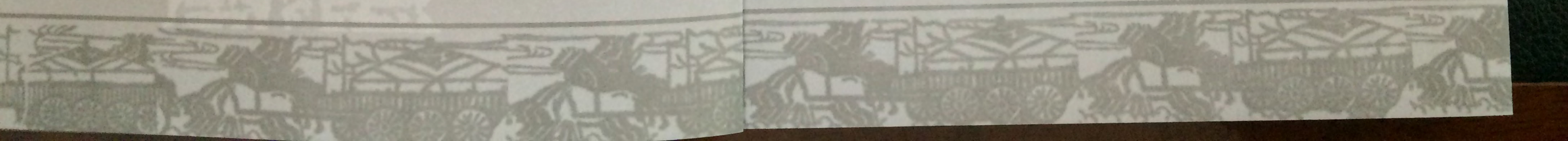
辽庆州白塔文物志略与纪闻(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林右旗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内蒙古学研究中心藏书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辽庆州白塔文物志略与纪闻》编委会成员

主任：崔义

副主任：岳金荣 怀枫忠 翟金柱 哈斯牧仁

杨旭东 阿拉坦苏和

成员：杨春 马金升 于凤国

责任编辑：杨旭东 阿拉坦苏和

责任校对：杨春 于凤国

装帧设计：杨春



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



凤衔珠银鎏金小塔



七佛贴金饰彩法舍利小塔



佩珠罗塔幡



联珠纹梅花蜂蝶刺绣鞋帕



联珠龙云纹刺绣鞋帕



悬鱼锦塔幡



联珠纹梅竹荷莲刺绣鞋帕



骑士人物绣帕袱



蜂蝶绶鸟翱花绫



贴金饰彩木雕释迦佛坐像



汉白玉饰彩卧佛



六字大明陀罗尼

## 说明

# 说 明

自 1985 年政协巴林右旗第二届委员会出版发行《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一辑以来,经过旗政协各届领导的一贯坚持和几代文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蒙汉两种版本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共 16 辑(蒙文版和汉文版各 8 辑),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旗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誉,得到了旗党政领导的肯定、关怀和支持。

今年 9 月,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文联《花的原野》杂志社联合主办《首届中国·巴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因此,根据会议需要和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旗政协决定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进行集中印制。《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二次校印过程中,我们在坚持“保留第一版原貌特征”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以及内容上的明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是,由于编者能力有限、

时间紧迫等原因,虽付出努力,仍不免会有瑕疵,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同时,在印制过程中由于受一些客观因素限制,对史料第四辑中的人物照片未能刊出。

在此,向始终关心支持巴林右旗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对文史工作倾注心血与汗水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9年9月

## 出版说明

《辽庆州白塔文物志略与纪闻》既是韩仁信先生在特定阶段从事特定工作的佐记,又是几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文博工作的实录,更是追踪塔上文物来龙去脉的有力求证。虽为“志略”与“纪闻”,但是,该书以维修辽庆州白塔之事件为统领,通过珍稀文物图考、维修工程琐录、珍闻趣事散记等不同角度,十分详细地记述了维修经过和以庆州白塔为轴心的文物群落。可以说,把如此严谨厚重的有关文物的话题放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娓娓道来,不失为著者的机智所在,也是本书最突出的特色。

人民政协历来重视通过亲闻、亲历、亲见所得的“三亲史料”,即使不属于纯学术的史料,也是弥足珍贵的。正如被称为“凉山好汉”、彝族“文史专家”的李仕安在2002年他的90华诞之际所赋诗那样:“采得三亲史料,灿然五彩缤纷,眼花缭乱难成文,漫道屠牛费劲。莫笑董狐憨直,应怜司马酸辛,谋篇布局苦经营,生动鲜明可信。”“三亲史料”的魅力与珍贵之处还在于,能够亲闻、亲历、亲见者少,能够幸得“三亲”且撰文成书者更少。韩仁信先生的这部《辽庆州白塔文物志略与纪闻》,就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三亲”史料,巴林右旗政协把她作为文史资料来出版,正是看中了本书

十分难得而又稍纵即逝的史学价值,这也为巴林右旗政协文史书丛增添了一位别具个性的新成员。

借此,我们也由衷地盼望年逾古稀的韩仁信先生继续挖掘其珍藏几十年的文史积淀,能够有新的力作不断问世,以飨读者且传与后人。

本书编委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

## 自序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1988年至1992年间,维修辽庆州白塔时,于塔刹中所发现的一批辽代的重要文物,在维修工程中所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珍闻趣事,辽庆州古城与辽庆州白塔营建的规格与特征等等。通过图考、琐录、散记等纪实性的资料和手法,加以阐明、考述和论证。又因这些文物不仅内容新鲜,而且品类丰富,数量繁多,本书图考时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定书名为《辽庆州白塔文物志略与纪闻》。

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项目,是我在博物馆工作岗位上时,有幸能主动争取,并始终参与的一项艰巨的工作。工程结束后不久,我们三位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委任的“施工指挥部”的“指挥”,用《简报》的形式,以《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为题,通过文字加图表的方式,将这批发现文物的有关情况,悉数而翔实地公开发表在国家级的刊物——《文物》1994年第12期上。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特地聘请了国家文物局古迹保护所、中国丝绸博物馆、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药检所等有关单位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这批文物进行了消毒灭菌和鉴定等工作后,已将这批文物交由巴林右旗博物馆入藏。

在施工期间,我本想在工程项目结束后,要写点辽庆州白塔以及维修白塔期间所发生的通俗易懂的逸闻逸事,或者说是维修辽庆州白塔工程故事的杂俎。特别是在塔刹中发现了一批前所未闻的辽代文物,以及在五变寒暑的岁月里,工程中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后,这一信念就更加执著。

当《简报》刊布后,由于《简报》本身的文字与篇幅有限,一份万数字的文章,根本不可能将珍稀文物件件说透,更不可能在文章中容纳施工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然而,当我年满花甲于1995年3月主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并准备能静谧地写这份杂俎时,想法并不如意。开始时是自感身心和体力都有些疲乏,后经赤峰市医院检查,主要问题是“心脏供血不足”,在一天24小时内“总共加在一起有28分钟不供血”。自此,我就离开大板住在红山区,每天过着吃药、打针、看大夫的无奈生活。这期间不要说想提笔伏案,就想坚持着多看一会书,也因为头痛难忍,有时脖颈都难以转动;再加上前胸的不适,有时还隐隐作痛。

我为什么会生这种病?或许是十年浩劫期间,经受了突如其来的,人间又是人为的一场严酷的霜冻为因;或许是在其后,为夺回十年浩劫期间耗费的光阴,为事业而不惜身心,超负荷强透支所致。反正这一病态,一直到2001年冬,才有所收敛。还好,天解人意。虽然当我能成此书稿时,距1992年大塔工程告竣,已有十多个年头,我也正是古稀有二之人。但是我仍希望,能通过此书,与新朋旧友和广大的读者来沟通,来共同求知考证辽庆州白塔这一砖木史书的

奥秘和史称“一代行国”的奉陵邑与捺钵城郭的与众不同,来共同分享,保护文物古迹和维修文物古建筑的美感与欢乐。



#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自序	1
一、志略·纪闻短引篇	1
1、城——奉陵邑与捺钵地的结合体	2
2、塔——宗教建筑与皇家寺庙的结合物	6
3、天宫——藏置文物与发现文物的地方	23
二、珍稀文物图考篇	37
1、兰叶状的不明物与《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39
2、《佛说摩利支天经》中国汉传佛教的梵夹经	44
3、《金刚经》与骑士人物绣帕袱	52
4、凤衔珠银鍍金小塔与帝后礼佛图及其他	60
5、七佛贴金饰彩法舍利大塔	71
6、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与法舍利塔座	77
7、既没贴金又无饰彩的法舍利塔	81
8、密檐式贴金法舍利塔	84
9、七佛法舍利小塔	88
10、贴金饰彩木雕释迦佛坐像	92
11、十方佛饰彩法舍利塔	97
12、联珠龙云纹刺绣鞠帔	102

13、联珠纹梅竹荷莲刺绣鞞帔 .....	106
14、联珠纹梅花蜂蝶刺绣鞞帔 .....	109
15、悬鱼锦塔幡 .....	112
16、佩珠罗塔幡 .....	115
17、夹纈莲花罗 .....	120
18、夹纈春兰罗 .....	122
19、夹纈云雁绢 .....	125
20、蜂蝶绶鸟翱花绫 .....	127
21、龟首鹤尾海棠花口水晶盏 .....	130
<b>三、维修工程琐录篇 .....</b>	<b>136</b>
1、巴根吐新建窑址 .....	142
2、石匠山与采石场 .....	144
3、水泉沟辽代砖窑群遗址 .....	147
4、密藏纪实 .....	150
5、小塔是否迁建 .....	154
6、表彰“贤内助”座谈会 .....	155
7、唯用行李当背景 .....	156
8、塔顶壶浆待友人 .....	158
9、守夜人住“怡神宫” .....	161
10、在文件背后因我而引发的故事 .....	163
11、丝织品文物鉴定工作侧记 .....	167
12、辽庆州与庆陵文管所的成立及其他 .....	174
<b>四、珍闻趣事散记篇 .....</b>	<b>177</b>
1、白灰中的秘密与赵江师傅的欢乐 .....	190
2、用牛粪烧窑引出来的故事 .....	193

3、漫话三则 .....	198
4、密藏日记 .....	202
5、小塔的故事 .....	205
6、三百件青铜器事件的调查始末 .....	211
7、塔顶神秘的烟云 .....	216
8、几多该知道的答问 .....	220
9、辽金钩沉访庆陵 .....	229
10、遇雪新开坝 .....	231
11、往事回眸扣仄平 .....	237
后记 .....	250
附录 .....	253

## 一、志略纪闻短引篇

在不久前,也就是 1989 年的 8 月间,在辽庆州白塔的塔刹里,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辽代文物,这已是无须争辩的事实。因为发现者们,已先后在自治区级和国家级的专刊,如《文物》等上,以《简报》的形式,利用文字和图表以及实物照片等等,加以公开地发表;同时又悉数地将这批重要文物,交由巴林右旗博物馆入藏。当然,真正能够及时地阅览到这一《简报》的人,应该说是很有限的,换句话说就是寥寥无几的,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至于有些人在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展厅里,亲眼目睹了这批重要文物中的东鳞西爪后,有的人说“感到眼前突然一亮”,有的人说“脑海中浮现出了百思难解的疑窦”,应该说这也是真实可信的事实。

本来文物从开始发现入藏,到研究和公开发表,再到展出与观众直接见面时,这些文物的情况,应该说虽不一定是了如指掌,也应该是大概情况应基本掌握,从逻辑推理似不应出现什么“疑窦”如“难解”等问题。当然事实上还是出现了,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为什么会这一现象,我以为迷津之所在,还是对辽庆州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其性质以及城中的白塔的级别与规格等,并不甚了解。

《简报》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内容较为简略的报道。再加上它所固有的和强调的专业性,不只是绝大多数的人看不到,就是业内人士,也并不一定人人都能看到《简报》。所以有些问题,已在《简报》里说清楚了,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有些问题很重要,但是《简报》中涵盖不下,当然也就谈不上可以说长道短了。看来要想了解塔刹中发现的这批文物的珍稀性,以及释解什么“疑窦”等问题,还是得要先了解城和塔的有关情况,尤其是塔的特殊性。

### 1、城——奉陵邑与捺钵地的结合体

辽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治所所在地的东北隅。地处北纬 $44^{\circ}12'07''$ 和东经 $118^{\circ}30'47''$ ,海拔910米。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庆陵与奉陵邑庆州”城址内,唯一幸存在地上的附属建筑物。

辽庆州城,是始建于辽景福元年(1031年),圣宗去世后,其子兴宗遵照父命“吾万岁后,当葬此”的遗训所建,这是圣宗在庆云山前发愿时已选定的吉地,故建“永庆陵”安葬圣宗。并命姚居信为上将,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州,充奉陵邑。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兴宗和道宗,也先后都安葬在庆陵区内。兴宗的陵寝名为“永兴陵”,道宗的陵寝名为“永福陵”。由于年代的久远,人们约定俗成的统称之为“庆陵”。庆州的城郭,也随之不断地兴建与发展。

庆州城不为国都与陪都,也不属边陲与要塞,只是一处“上节度·军”级别的奉陵邑。为什么当辽朝各地营建密檐

式塔已呈极盛之时,庆州则穷土木之功,殫造型之美,营建起了规格之高,级别无上的八面七极楼阁式的砖木之塔。

因为,这里并不只是有辽一代的第六、第七和第八代祖孙三代的皇帝与后妃们的奉陵邑,这里还是有辽一代“四时捺钵”时的夏秋捺钵,尤其是秋捺钵时,岁多必驻的要地所在之处。

这里所说的“秋捺钵”一词,除“秋”字容易理解外,“捺钵”是什么意思,应予简述。契丹族,是我国北方以游牧经济为主体的古老民族之一。自从立国后,因为辽国境内,也有可观的地域和占有相当比例的农耕经济和农耕民众。为此,建国初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神册六年(921年)时,就非常明智而又是创造性的制定了“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人,以汉制待汉人”,换句话说也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国两制”的治国方略。同时在国土上,先后也营建了五京、六府和州、军、城、县等等城郭。从形式与功能上来看,这是契丹民族在承袭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然而契丹民族的游牧文化并没有因为兴建起了城郭就有了多大的变化。辽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的统治者,如皇帝与皇后等等,并不像中原王朝的皇帝与皇后们,总是蛰居在京城里。而是“游畋之习,尚因其旧”,仍然是“四时捺钵”,罕幸京城。如《辽史·营卫志》中所载,“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有辽一代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辽国的最高权力与政

权机构所在之地。所以说皇帝游幸之处,便是辽国的朝廷所在之处。

辽国不仅有“四时捺钵制度”,而且还有严格的“斡鲁朵法”。每位皇帝自即位起一直到他死后,都要有他自己的“斡鲁朵”。“斡鲁朵”就是“行宫”,所以史称“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所有的“行宫”,一定要始终跟随和警卫着当朝皇帝的“行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不仅如此,当皇帝出行时,有关的官署也要随帐而行,所以辽国有时又被人们称之为“行国”。辽国的大事,皇帝多在捺钵处与南北大臣们会议国事。外国的各类遣辽使节,也只有到皇帝的行在之处,才能面见辽代皇帝。御试进士时,也多在秋捺钵所在地举行。到辽代兴宗朝时,兴宗不仅经常幸庆州,并到圣济寺等庆州诸寺里去焚香;还在庆州城里观市、看“击鞠”,就是看打马球。《辽史·本纪》中记载:重熙十六年(1047年)夏四月皇太后有感不适,兴宗自六月清暑永安山,七月幸庆州后,自七月至九月始终在庆州周边的诸山射猎。重熙十九年(1050年)六月,幸庆州,拜见大安殿,又在金銮殿御试进士。

由此似可窥见辽庆州城所具有的极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可窥见“行国”的一斑。(附:辽庆州城址地形图)

辽庆州城址地形图



此图是1991年9月至1992年4月,在大塔维修工程期间,“施工指挥部”责成内蒙古工学院建筑工程系,由孙德龙先生等测绘。

## 2、塔——宗教建筑与皇家寺庙的结合物

庆州白塔,名为“释迦佛舍利塔”,营建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为辽圣宗耶律隆绪即有辽一代的第六代皇帝的元妃——兴宗耶律宗真(第七代皇帝)的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

庆州白塔属寺塔一体的佛寺群落建筑,是在庆州城内城的西北隅,即在“乾位”上所营建的皇家寺庙“圣济寺”中的前置古刹。如今寺院的殿宇布局以及寺院的门廊与院墙等等的遗址,仍清晰可辨。若站在大塔正南面的山门遗址上认真去观看,整个圣济寺宏大的建筑规模,仍可尽收眼底。这种前塔后寺的平面布局,原来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佛寺建筑形式,到唐朝时已不再时兴。而辽代在此时此地营建前塔后寺的这种平面布局的佛寺,这是契丹民族在效仿先贤鲜卑族的一种具体表现。拓跋鲜卑建立政权后,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时,胡灵太后在洛阳营建的永宁寺,就是在寺门内首先建塔,塔后再接着营建各种佛殿的塔前殿后的佛寺布局形式。

庆州白塔,是有辽一代鼎盛时期所建古塔中的佳作与孤品,是辽朝皇家寺庙建筑和皇家崇佛的象征。如果从塔体本身而言,古塔不只是属于多学科,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且又是一个载体,它所承载着的文化艺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

庆州白塔,虽然在建筑艺术与风格上承袭了中华古建的优秀传统,然而也注意了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等特点和本民族的文化信仰;同时还展现了多处超凡脱俗,很有创见的

工艺与装饰等等。

做为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大塔,在通高为73.27米和第一层八面塔身的对边直径约为21米的大塔内,虽然在古刹的七级之中,均单独辟有覆钵式的塔心室,但是均呈互为封闭。彼此之间上下并不通达,当然也就没有梯道,根本不存在登临览圣的可能。

每层塔身的上下两端,均设有平座和塔檐。平座与塔檐均为承挑在砖作斗拱铺作之上。平座在始建时,有木作勾栏之饰。不过在平座的周边,根本就没有可供眺望,或者是可供从塔内出入而开启的门窗。

这一楼阁式的建筑,因此已失去了楼阁建筑应有的功能,几乎与密檐式塔的功能等同。当然在这里,要想极目远眺,根本无须登临高塔,城西北不远处就有高山。况且这里是辽朝的腹地,也不存在有了敌的问题。要义,是为点缀草原之丽,曲尽山川之美,是为标榜皇家的至高无上。

每层塔的东、南、西、北四个正面的当心间,均施有一个塔门,然而全塔共有28个塔门中,27个为假门真做。所谓“假门”,就是它根本不存在可以向内或者是向外开启的功能。拱券门口的砌筑与木门后塔体的砌筑,二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交结关系。门后的塔体中,既没有拱形门洞全为实体,同时塔门所对称的塔心室,其室内的地平面与塔门下槛的高度,也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谓“真做”,就是塔上这28个门口与塔门的规格、造型、材质、饰色等等,从外观看完全相一。拱券门口内的门框与门板,均为柏木制作,并饰以朱红之色。在对开的门扇之上,不但有铜鍍金高凸的

模铸金钉和金环铺首之饰,而且在门扇上下两端的近边处,即户枢处,还饰有铜鎏金的包护构件。唯一的,也就是可以开启闭合的塔门,设在一层塔身的正南面的当心间。门后有拱形门洞,可直达一层的塔心室。

在第一层塔身的西北和东南以及东北和西南四个对隅面的当心间,虽然均设有造型与规模相同的直棂窗,因为均是用砖高浮雕砌筑而成的装饰性设置,并不为实用之窗孔。

此外,如今存在于塔心室之间,通透而不规则的孔洞,应为金灭辽以后形成的盗凿之洞。

古塔建筑虽说多为崇佛的象征,然而也并非全然如是,因为在营建古塔时,就会有神化的色彩,就会有超人的现象,就会有自然标榜和自我炫耀等等意念。比如陕西省有名的“小雁塔”,就是唐中宗李显为追荐其父唐高宗李治所建。这里所说的“追荐”一词,也属佛教用语,意思是为死者在“冥间”幸福而举行的修善活动。再如浙江省有名的“六和塔”,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为镇钱塘江潮而建。还有北宋时期的真宗赵恒,为及时掌握辽兵南下的情况,下诏将河北定县开元寺内的“舍利塔”改建为“了敌塔”。

那么,辽庆州的白塔又是为何而建,我认为主要是为炫耀辽代皇家崇福而建。

契丹民族在立国之前,与中原民族互相交往与接触,约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辽代皇家的崇佛,是承袭了盛唐时期崇佛的绪余,进而又经历了自身的发展阶段。

辽太祖创业之初,也可以说是开始之时,辽代皇家崇佛是以安服中原民族为目的。如唐天复二年(902年)时,在

今西拉沐沦河南的龙化州,兴建了辽朝的第一座佛寺,名为“开教寺”。这是因为辽太祖破河东、伐代北后,徙民于此。真正的目的是为安服民众,进而广开教化所为。

到了太宗朝,辽国的版图中已包括有燕云地区时,辽朝的皇家崇佛,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与不断的发展。崇佛的目的,已从为安服他人,发展到以自身的政治文化需要为目的。首先是在契丹族崇敬的象征着“天神”的“木叶山”上营建了佛寺,名为“兴王寺”。其次是,寺中迎请到了“白衣观音像”,并从此将观音奉为“家神”,春秋祭告不绝,兴军必告不止。

辽代皇家崇佛高潮的出现,是在圣宗朝。当时圣宗皇帝与仁德皇后的名讳中的“小字”,均为佛教徒或是善男信女多用的称谓。如圣宗皇帝名为耶律隆绪,小字为“文殊奴”。圣宗皇帝的嫡后,仁德皇后的小字,为“菩萨哥”。这既是有辽一代的特殊之例,也是萧辽帝后中绝无仅有的一例。此外,在《辽史·后妃传》中,记载仁德皇后,奇巧才艺过人。她不仅用草木的莛杆,做成宫殿的小样,如清风、天祥、八方三殿,交由司执人员建造,而且还用“白金”制作成“浮图”。白金是银子,浮图是佛塔的别称。

到兴宗朝时期,辽代皇家崇佛的程度,较圣宗朝为甚。史志记载,兴宗“尤重浮屠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辽宁省海城市的觉花岛上,辽代时岛上有座佛寺名为“海云寺”。寺内的名僧,姓郎名思孝,法号为“海山大师”。兴宗“赏赐大师号曰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凡上章表,名而不臣。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诗合唱,交谊笃甚”。

辽庆州白塔营建的时代,正是在“尤重浮屠法”的兴宗朝。所以不仅这座大塔营建的高耸挺拔气势恢宏,气韵玲秀雍容华贵,而且在大塔塔刹内所发现的一百多座质地不同、造型有别、饰彩见异的“法舍利塔”,虽然个体较小,但它们既使人小中见大,又可从其布阵的庄严博大,个个气韵优雅,尤其是高超的技艺中感受到美的理念与皇家崇佛的氛围。由此可证,兴宗“尤重浮屠法”的记载不误。

前文已提到塔心室的一些情况,如七层间的塔心室互不相通,既不能攀登,又不具备可观光的功能。此外,每层塔心室的面积,就每层塔体的面积而言,它所占的比例很小,仅为百分之七。比如第一层塔体对边直径为20.68米,而第一层塔心室的圆底直径仅为5.62米。这要比第一层塔身墙体的厚度还要少1.91米。由此也可看出,营建该塔炫耀崇佛中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古刹的安泰稳固康而寿。

在各层的塔心室内,除第一层的塔心室进去便捷,在久远的年代里,不断地经受风风雨雨和荣辱兴衰,如今已成为空壳一座,要想稽考辽代时室内的陈设情况,已无从入手。

自第二层往上直到第七层,在所有的塔心室正北面的墙体上,均有用墨线单勾的白描壁画。壁画的内容、形式、画法等类同,只是大小有别。整幅的壁画为:上有枝繁叶茂的菩提树的荫护,释迦牟尼恬静地侧卧在树下成道图。

在塔心室的地上中间,均有一座用砖砌筑的八角形高台,其上为放置贴金饰彩的用汉白玉雕琢的释迦佛涅槃卧像。

不过自三层往上,因室内的潮湿和霉变等原因,白描壁画多有剥蚀或是已漫漶不清。而各室的八角形高台,也因开凿盗洞时,不仅将塔心室正中收顶处叠退的砖层与砖层上铺垫的厚柏木板凿通外,而且砌筑在其上的八角形高台,也几乎被破坏殆尽。高台之上的卧佛,均已不复存在。

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白塔子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还是将两件被造反派们从塔里扔下来,未被彻底破坏掉的贴金饰彩的汉白玉卧佛,搬回到公社院内的牛粪棚里存放,我于1978年下乡时,征得公社领导们的同意后,将这两件文物运回到大板。直到1992年时,这两件卧佛仍入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内。

当然为使古塔能达到安泰稳固和康而寿的目的,进而弥久地承载辽代皇家崇佛等文化,辽庆州白塔在营建过程中,并不只是采取了唯一的墙体偏厚的做法。它还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优良传统,在造型方面采取了下大上小,逐层微向里收进的做法,从而不仅使古塔稳重安谧,同时也使古塔的气韵分外玲秀恢宏。

此外,砌筑在大塔体表上,精致而疏密有序的砖雕和石刻浮雕等象征性的装饰品,并不是在大塔建好后,再在塔体上雕琢或镶饰而成,而是事先已雕琢好要镶饰的组件,紧跟在塔体的进展之后,在逐层地砌筑大塔的表体时,随之将每层应装饰的构件,加以砌筑或是镶嵌其上。这样,不只是使塔体的承重力加以分散,塔体表层受力要小,易于保护,而且使大塔的气势格外雍容华贵。

辽庆州白塔,建于高出地面3.8米的两层台明的中央



之上。重台明均为正方形,下边的台明面积较大,上边的台明面积较小,均是用素砖叠砌而成。两层台明顶面的四边,用花岗岩条石砌筑为周廓。下层台明的边长为42.54米,上层台明的边长为32.78米。

塔体的立面为八棱形,剪影呈近锥体,是由塔座、塔身、塔顶和塔刹四部分组成。

塔的基座为八面体,是由须弥座、平座和仰莲台三部分组成。须弥座上施以木质平座,平座之上施以用砖雕砌的仰莲台,仰莲台上承以塔身。此次维修工程中,在剥离清代维修大塔时贴护在须弥座上的乱砖泥灰层后,发现辽塔在须弥座的壶门里,始建时均镶嵌有石刻佛像,现尚可见有三处已被人为破坏的满目疮痍的用汉白玉雕刻的菩萨等像的残件遗迹。

八面体的七级楼阁式塔身,除平座、角梁和檐椽为木质的构件而外,其余如柱额、斗拱等等,完全是忠实地模仿木建筑的形式,用砖雕构件砌筑而成。

七级塔身之间,除第一层的下端以仰莲台为座而外,其余各层间均为下施平座上设层檐。八面的塔身,在每面两侧的转角之处,均施有漫圆体的角柱,并为相邻两面互有。面间又施有两根漫圆体的倚柱,从而使塔身面的面阔,一分为三,中间稍广两则见窄,又可称之为“当心间”和“稍间”。

塔身从上至下的各层,在设有门口的四个正面当心间的塔门券口之上,砌筑有精美的“二龙嬉珠”——象征着皇权神授的砖雕刻饰。在塔门两侧的稍间内,均砌筑有用砖雕刻的天王造像。天王身体魁梧,手执兵器,凝神注目,戎

装肃立,面向塔门,胜似唐时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神威。

塔身的四个对隅面,即塔身的东北、东南和西北与西南四面。在第一层塔身面两侧的稍间内,均镶嵌着通体砖雕,由底座、幢身和宝盖组成的六面体经幢。四面共为八座的经幢,无论是造型还是大小完全相同,且均为外露三面,光素无字之幢。

第二层的塔身面,在当心间镶嵌有经幢两座,两侧稍间各镶嵌有一座。这里的经幢,其底座与宝盖均为砖雕,幢身用白色大理石雕琢。幢体外露三面,其上的文字为汉字楷书,音译阴刻“陀罗尼经咒”。二层,共有经幢十六座。

第三层至第七层塔身面上所镶嵌的经幢,其形状、大小、质地以及经文刻字等等,与镶嵌在第二层塔身面上的经幢完全一样,只是镶嵌在当心间的幢数有所不同。自三层往上,一律由两座改为一座,每层镶嵌经幢数为十二座。

同此,在第三层和第四层四隅面当心间所饰经幢的两旁,每间内又各镶嵌有砖雕立姿的罗汉造像两身。全塔身上,只在此间有此造像,共有罗汉造像十六身。

除上述镶饰在塔身上的含有一定象征性的雕刻装饰品,或者可以说是精美的艺术品外,还有多种在塔身多处,仍嵌饰有精美的砖雕佳品。如在一层塔身“直棖窗”两旁稍间砖雕经幢宝盖之上的空间内,又镶饰有轻盈飘缈的两身飞天。一身头向上,一身头向下,在宝盖之上,作环绕状。在当心间直棖窗上的空间,正中镶饰一砖雕宝盘,盘中饰宝珠、火焰;宝盘的两旁,又各镶饰一只“伽陵频迦”。伽陵频迦形为人首、鸟身、鸟爪,头均朝向宝盘。伽陵频迦在佛教

界视为佛寺的守神之一,有时又被叫做“妙音鸟”或者是“好音鸟”。在当心间直棖窗下的空间,虽然均镶饰有精美的砖雕佳作,但其内容各不相同。东南面的直棖窗下砖雕镶饰为一狮三人图。三人分别在狮前、狮中和狮后,均为深目、高鼻、卷须、顶着帟头,足登高靴,似西域胡人,行进在猛狮身旁。西南面,也镶饰砖雕动物图案,也是由胡人牵引,不过是一只神兽麒麟。东北面仍是一只狮子的浮雕。西北面,则是雕刻着二人捧盘敬宝图,盘中满是珍宝。

在二层当心间镶饰有两经幢,幢顶的空间内雕饰有云龙图,在稍间的幢顶上的空间雕饰有飞天。三至四层罗汉造像的头顶上,又雕饰有祥云图。五至七层当心间雕饰经幢的两旁,也嵌饰有祥瑞云朵图饰。

此外,在各级层檐和平座的铺作及拱眼壁等处(这里所说的“拱眼壁”,是指在两朵斗拱铺作之间空出来的壁面),又有用砖雕刻的宝相花等花卉图案和人物生活的造形图案。如有,饮宴欢歌、伎乐舞蹈以及吹弹弄玉等等。

辽庆州白塔的塔顶,是接筑在第七层塔身顶端所施的层檐斗拱铺作之上。层檐铺作每面塔身之上共有五朵,可分为两转角铺作、两柱头铺作和一朵在当心间正上方的补间铺作。出檐的椽飞与角梁,除飞头为用砖制作外,余皆为柏木制作。而所有斗拱铺作的材质,均为仿木建筑结构的砖琢构件。

塔顶之上,最特殊的一种建筑艺术手法,或者说是最引人瞩目的视点,就是在塔顶八条瓦条脊的近前端,均有一尊坐骑姿势,身高约 1.2 米,模铸后又焊接的鎏金的铜人力士

造像。力士分开的两腿稳稳地骑坐在脊上,两臂曲伸至胸前,右手在上左手下靠近在一起,双手中握着刹链。刹链从力士的双手中,经胸前、肩上和耳旁,上下经过。力士膀宽体壮,虎背熊腰,二目圆睁凝视着远方。

塔刹建于塔顶的中央,通高为 14.92 米。自下而上由刹座、覆钵、华盖、露盘、相轮和火焰以及再上的四宝珠和三华盖组成。宝珠与华盖间的排序,自下而上为珠盖、珠盖珠。

辽代建塔时,刹杆为四棱体的熟铁经锻造而成。后因断折,清代维修塔刹时只减少了火焰以及其上的宝珠与华盖之数,并未更动刹杆。已断折的上半截刹杆,一直就弃置在塔顶上的瓦垅之间。

塔刹的基座,为砖砌的八面体须弥座,其正南面上,嵌饰着一座幢身为汉白玉刻饰的陀罗尼经幢。塔刹上的金属构件,多为铜鎏金的模铸体。

辽庆州白塔的塔顶之上,选用如此豪华和显贵的金属构件,是可见兴宗朝辽代皇家崇佛之威严和当时锻造工艺和铸铜工艺与水平的高超。

当然能说明辽代建此塔是为崇佛,或者说是为崇佛而建此塔的佐证,并不只是前面已谈到的建筑工艺、装饰艺术等等。在塔刹中发现的“建塔碑”,从碑文中也可发现辽代皇家至兴宗朝时,为崇佛而建塔的用心良苦。

如在“建塔碑”的碑铭中,启首就是“南阎浮提大契丹国”冠以佛国净土的定论,这是辽代皇家崇佛的自白之序。为什么要选用佛教在须弥山的咸海中本有四大部洲中的

“南”洲之地,辽国本来居于北方。我认为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或者是因为在中华的文化理念中,“南”有象征“阳”含意的缘故。碑铭在记述建塔日期时,明确记载“二月十五日启土开掘地宫”。

辽庆州白塔所在地,全年无霜期很短,年平均仅有 110 天。如果施工,每年中最佳的施工时期,在农历的四月初至八月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阳历的五月上旬到九月下旬。至于辽代重熙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是否能真正的启土动工,考证这一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皇家选定的建塔开工的日期。

农历二月十五日,是纪念释迦牟尼逝世的佛教节日,名为“涅槃节”。《百丈清规》一书在卷二中有如下的记载:“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入涅槃之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由此可知,辽代皇家确定这一日期为建塔开工之日,仍然是为了崇佛。

辽庆州白塔的塔体上,还嵌饰有数量可观的,并不是佛教惯用的法器铜镜。铜镜嵌饰之处有:券门口、斗拱处、经幢顶、额枋和塔刹等上。铜镜的形状为两类,也就是圆形和菱形。菱形者多嵌饰在大塔的单数的层位之上,圆形的多嵌饰在大塔的双数的层位之上。铜镜最大的直径是 50 厘米,为圆形的铜镜。最小的铜镜为菱形铜镜,其对角的直线只有 20—30 厘米。我们在施工期间经查证,大塔始建时应共嵌饰有铜镜为 1046 面。1992 年时,塔体上实有铜镜数为 412 面。可以想见,辽庆州白塔在始建之初,塔体上这千余面铜镜、塔顶上的铜人与铜塔刹,再与悬挂在角梁、檐椽

以及华盖上的数以千计的风铎,组合在一起,这里岂不是铃声传千里妙音不绝,金光洒草原佛光普照,好一派净土佛国的景象。

然而悬挂铜镜原本是中原民族的一种习惯,是道教常用的一种法器。那么辽兴宗朝建此佛塔,为什么要在塔上嵌饰如此众多的道教常用法器。其实,有辽一代信奉的宗教中,就有道教。应该说辽代的宗教信仰为儒、释、道和萨满教。辽兴宗皇帝,并不只是重视佛教,他对道教也很重视。如《契丹国志》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兴宗皇帝常在夜间的晚宴上,与道士刘瑞兄弟和王纲等人,加入演艺人员的乐队,并且命令后妃们改换服装,妆扮为女道士。因为兴宗这样做,曾受到了皇后的父亲萧磨只的责问。兴宗非但没听劝阻,还责打了萧磨只。当时凡是受到兴宗信任的道士,都受到了兴宗皇帝的封赐。由此看来,佛塔上嵌饰众多的铜镜,是在常理之中。这一现象,不仅可以说明辽代社会也崇信道教,进而还可证明,辽代社会的宗教文化,是多元一体四教并存。

此外,在“建塔碑”的铭文中,在记载建塔的日期时,最后另起一行的落款中,用的是“七月十五日”的日期。其实这也是皇家在建塔时,事先就已选定的日期,并非是大塔真正落成告竣的月日。因为我们在塔刹内,在相轮的近顶部正中刹杆的一侧立面上,发现了一块镌有汉字的长条形铁板,我们称其为“铁板铭文”。铁板长为 14 厘米,宽为 3.3 厘米,厚为 0.2 厘米。铁板的顶端平齐,底端微圆,两长边平直,只有一面有字。发现时,“铁板铭文”是有字的一面朝

向刹杆,且紧紧贴靠着刹杆。在它的外面,又用了较薄的铁板条,将它固定在刹杆上。当然这块铁板,绝不是随便而无故地被人固定在这个地方。在铁板的里面的刹杆上,有一深不足4厘米,口径面积小于铁板的长条形凹槽,铁板是用来做为凹槽的封口护盖所为。这一长条形凹槽,是在锻造刹杆时就已造就,我们又称它为“预留槽”。槽内藏置的文物,为厚约0.03厘米的上面篆刻有汉字的“陀罗尼咒”和“功能法”,为金箔和银箔各一件。对这两件文物,我在此不想加以赘述。我要说的是“铁板铭文”上篆刻的文字中,有“七月二十日”极其重要的记载。这就是说,到了重熙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时,大塔的工程并没有完工。这是工匠师傅们亲手篆刻的文字实录,也可以说是“铁证”。那么当时的辽代皇家,为什么要选定这个日期为竣工日期?

首先,“七月十五日”也是佛教的一个节日,名为“盂兰盆节”,又叫“盂兰盆会”。有时也叫“中元节”,后来还叫做“鬼节”。内容是为追荐死亡者的魂灵,求佛救度。按佛教的规定,七月十五日时,要用百位的饮食来供奉十方僧众,这样佛才能救度和解脱亡灵的痛苦。要是从契丹族本来就敬奉天神与地祇,就是也崇拜鬼神,以及辽代皇家建塔又是为了崇佛来考虑,选定七月十五日为竣工之日,这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次,该塔既然在“建塔碑”的铭文中,明确地彪炳为“章圣皇太后特建”。我认为选定“七月十五日”为大塔的完工日期,这里还应有章圣皇太后难于言表的另一层苦衷。

“章圣皇太后”姓萧名耨斤,原是景宗朝时“萧太后燕

燕”身边的一位宫女。后来由于圣宗皇后身边没有子女,她为圣宗生有二男二女,才被圣宗皇帝册封为“顺圣元妃”。直到圣宗去世时为止,她的封号一直就是“元妃”。

圣宗原有的萧氏皇后,还是在萧太后燕燕在世时,就因为为有罪被降为贵妃。后来在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时,圣宗皇帝才册封萧氏菩萨哥为皇后,名为“齐天皇后”。齐天皇后所生二子,皆因早亡,所以在开泰五年(1016年)时,当宫女耨斤生下兴宗时,齐天皇后就把孩子抱过去,当做自己的儿子养育。当然在耨斤看到慢慢长大的兴宗,服侍在养母的身边对齐天皇后又非常的小心谨慎时,她心里很不高兴。或许是圣宗皇帝早有感悟,所以当他临终前对儿子也就是兴宗皇帝亲口说过一段话。这段临终的话语,《契丹国志》中做如下的记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无子,故命汝为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杀之。”

然而圣宗一去世,元妃耨斤就不顾一切地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母随子贵当皇太后的夙愿。她不仅自封为法天皇后,并且还亲自摄政。所以在圣宗去世后不足一年里,前朝所立的法度,几乎被她更改殆尽。

在此期间,她干了许多伤天害理和乱伦败俗的事情。开始是唆使她的护卫冯家奴和喜孙等人,编造罪证诬陷驸马萧阻不里和萧匹敌蓄意谋反,要害之处是必须要连及齐天皇后。随即就将齐天皇后迁送到上京,不久就又派人去加害致太后以死。与此同时,还无端地杀害臣僚七人之多,不仅将被害者的尸体弃市不问,还抄没被害者的家产。紧接着就动用“鸡犬升天”的手法,凡是她的嫡系亲属,一律加

官封王,就是她的家奴,本身无寸箭之功,也是个飞黄腾达。因此史书中这样记述“汉五侯也无以过”。此外,她对于她的姐姐和妹妹,无论是孀居者还是婚配者,只要是她们看上的美男子,想另择新欢时,她都会为满足这种淫荡,为她们采取杀妃夺夫或者是杀妻霸夫的不仁做法。

兴宗皇帝,对他生母的结党营私,淫威横施等所做所为有所反对。因此她还萌生要改换皇帝的想法。当然这类问题,我不想在此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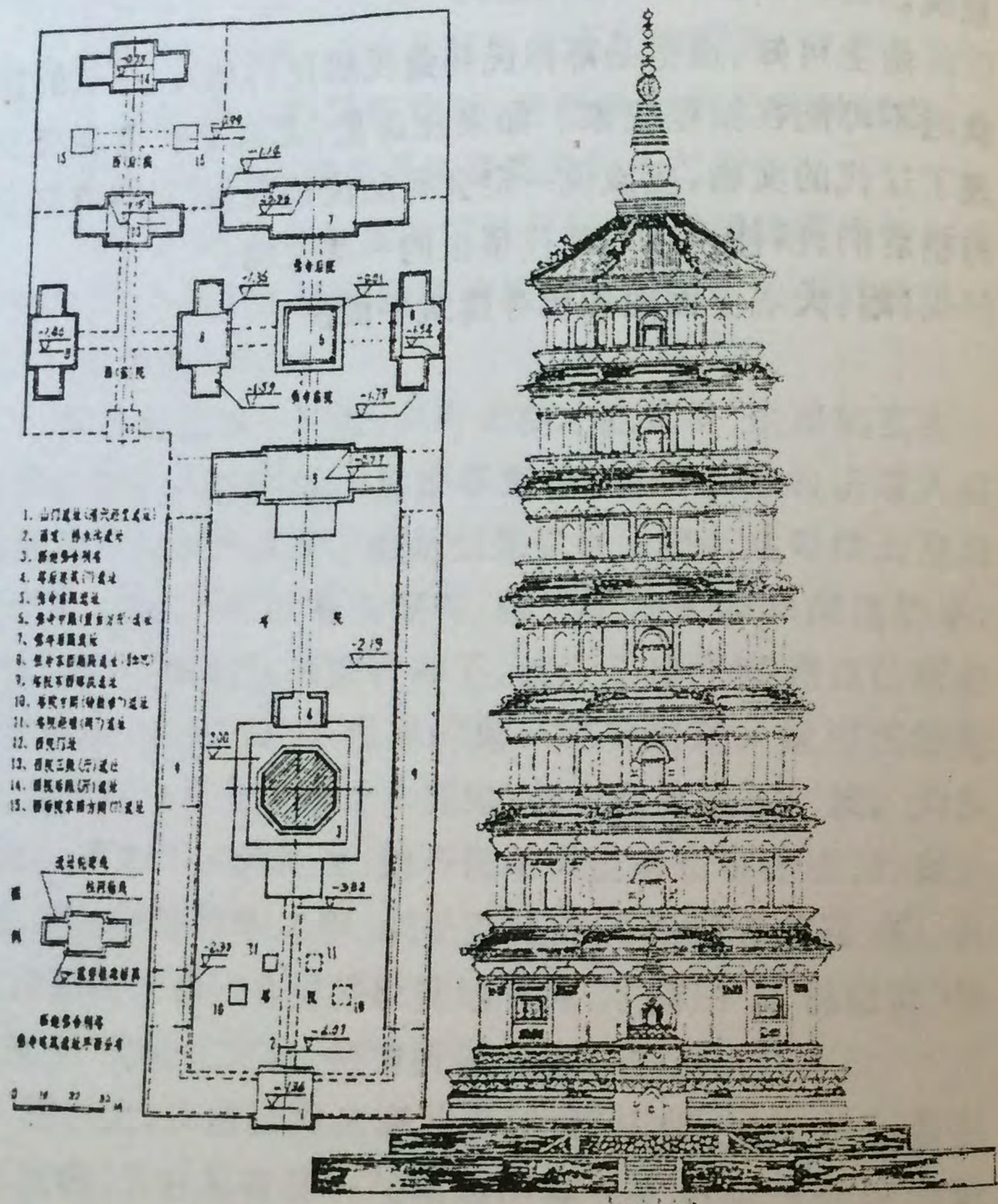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无私才能无畏,这里确实有一定的哲理。人世间应该是没有鬼的,当然活着的正常人根本也就不会怕什么鬼。但是如果是兴宗皇帝生母法天皇后这号人,当他一时握有大权时,就干了许多罪孽深重的事,后来自己所握的权柄被收回了,或许是也觉察到自己所犯的孽障后,我想她内心世界的鬼一定要出现。她应该能想到,甚至是一定会害怕什么冤鬼、苦鬼们找她来作祟。为摆脱这一挥之不去的窘境,她不惜用重金来修塔建庙,外观上她在竭力做着善举之事,似乎这是为追荐死者的冤魂。其实,这是由于她内心世界极度地恐慌,才借用“求佛救度”选定“鬼节”为竣工之日,实为所做的遮眼法。

简言之,从前面城和塔的表述,辽庆州古城,并不是皇都与陪都,但它是有辽一代鼎盛时期三个皇帝与后妃们的奉陵邑,它是有辽一代在夏秋捺钵时,岁多在此久居的要地。换句话说,这里是辽代朝廷常住的地方。庆州白塔,虽然也是宗教建筑,甚至可以说是容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为一体的,固体的史画名著。然而它又是辽兴宗朝,由章圣皇

太后特建的,皇家寺庙中主要的和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的建筑。

由上可知,这里是耶律氏和萧氏居住的地方,一般的民众绝不可能在城里安家。如果在这里,尤其是在塔刹里发现了辽代的文物,应该说一定会有品位很高,甚至会有皇帝与皇后们,所使用过的辽代顶极的一些文物。

(附:大塔立面图和佛寺建筑平面图)



此图是维修大塔副总指挥张汉君先生绘制,已刊布于1994年《文物》第12期。

### 3、天宫——藏置文物与发现文物的地方

“天宫”一词,在这里并不是指神仙所居住的地方。这里的“宫”字是“室”字的同意词,但也不是宫殿的专用词,它是特指塔顶之上,在塔刹内砌筑的洞室而言。

塔作为宗教建筑中特殊的象征性的建筑,一般在塔内都会留有洞室,业内称这类洞室为“塔宫”。因为塔宫在塔内的位置并不相同,所以,凡是在塔座以下砌筑在地里的塔宫,就称之为“地宫”。凡是处于塔顶之上砌筑在塔刹内的塔宫,就名为“天宫”。凡是建筑在塔身之内,无论是单室的还是多室的,或者说是纯属纪念性的没有梯道不可攀登的,还是观光性的有梯道供登临,有门栏可远眺的塔宫,就又称之为“塔心室”。

1989年秋,巴林右旗所发现的一批辽代的重要文物,就是在维修辽庆州白塔时,于大塔的天宫中发现的。为什么在这里会发现文物?对这一问题,就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出自预料之外,并非是在预料之中。

以往在所有的史志中,对于辽庆州白塔营建的始末等等,均为只字不存。“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是从塔内第五层的塔心室内,发现并取下一块两面刻有汉字的铭文大砖。不久就被一位姓李还是姓什么的军官拿去,他说是要研究研究。不过时至今日,不仅从未闻听有任何文章在什么报刊上加以刊布,就连这块还没真正与民众见面而难得一见的铭文大砖,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好在当时有人抄录了砖上的铭文,虽然后来已无法校核,然而这已是难能可贵和非常庆幸的事情。在这一抄录的文字中,有“重熙(十)八

年”的记载。“十”字,原抄录者可能因为铭文不清,未敢肯定。这是我知道辽庆州白塔,应建于辽兴宗朝重熙年间的唯一的一丝佐证。

至于辽庆州白塔其他的一些能够知道的情况,都是外表通过对塔的观感后得出的个人认识。比如在此次维修大塔以前,大塔到底应该有多高,这是应该有个定位。然而1979年前的定位,用的是49.48米。1990年时的定位,又改用为64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结果,因为这都是经有关人员目测的数据。这在当时来说,有这样一个数据,要比什么数据都没有会好,会给人以直观的印象。

如果说在此次修塔前,也还了解到了一些有关白塔的情况,然而大多数属于路言传说。其中有价值的或者说是较可靠的是,清代光绪年间,时任锡盟盟长的阿巴嘎旗王爷杨森,曾发动当地的蒙古王公等捐款,用一万两白银维修过庆州白塔。但是如何维修和主要是维修了什么部位,既无传说也没记载,仍然是一个使人猜测和尚待解决的问题。(附:大砖铭文抄录件)

辽庆州白塔之塔铭抄录  
 一、去宁年帝度使校尉...  
 二、咸平...  
 三、越外...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大砖铭文”抄录件

1988年初,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并拨专款,同时还决定将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委托内蒙古文物部门来具体完成。随即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做出了由呼市文物管理处和巴林右旗博物馆两个文博单位,以及从这两个单位的人员中指定并委任了专人,组成了“维修工程指挥部”等组织机构的决定。1988年5月,维修工程的有关人员相继到达塔下,一边主动地创造开展工作的环境和可长期生活的条

件,一边着手立杆搭架,开始了对大塔进行翔实地勘察工作。约11月末,“勘察报告”和“维修方案”已定稿,并报请自治区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审批。1989年春,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论证后,批准了维修施工方案。

直到此时,我们也只是在开工前,做了一些有可能发现文物的准备工作。至于在天宫中发现藏置有序、数量众多、鲜为人知的文物,这一重大的发现,仍然是预料之外。

既然是一直根本不知道塔刹中藏置有大量而重要的文物,那么为什么会在塔刹中发现这批文物?为什么又能知道在塔刹的那些部位藏置着文物?

首先,庆州白塔在报请维修前,就从外部看出多处坏损情况,有些地方较为严重,是应亟待维修加以保护和解决。

庆州白塔因年久失修,同时又不断遭受着大自然种种突如其来的侵害,如雷电的轰击、地震波的迫害、暴风的袭扰,以及长期而无耐又是无情的风剥雨蚀,再加上时不时地又要遭受一些人为的破坏,大塔的台明因遭到人畜无端的践踏,不仅损毁严重,而且在上面还滋生着野草和榆树。大塔的基座,因多种原因,腐蚀与破坏较为严重。如是夏秋之时,落爬在基座的墙壁上或是藏置于基座的砖缝中的苍蝇,能将白色的壁面遮成为灰黑色。当然1978年时,曾在其外表用白灰水泥加上旧砖碎块,贴附了一层。在大塔第一层平座的仰莲台下,有一显见的横向裂缝。在塔顶之上,微见塔刹倾斜,刹杆在大风中似有晃动的现象。塔刹上的构件火焰铜件,不知为什么要摆放在刹座之前。

其次,在批准立项维修后,在勘察工作中,又发现一些

情况。

在勘察工作开始之时,虽然大塔的营建始末,仍属未彻底开解之谜,不过从“大砖铭文”中已知庆州白塔应建于辽重熙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049年。到1988年立项维修时,其间的时空隧道,已历经近940年。在此间五次朝代更迭中,对大塔是否有过维修等等事宜,除清代光绪年间维修大塔之事略有传闻和点滴的散记而外,在任何的史志中再无只言片语可见。

不过我们在勘察工作中,倒是在大塔的一些不易被风雨侵蚀的部位和部件上,如在塔门券口内侧的墙壁上,在塔体上镶饰的铜镜上以及铜制覆钵的体表上,发现了不少仍可辨认的墨书或者是以刀代笔的题记。其内容,有人名,有纪年,还有极简短的记事。有关“题记”方面的翔实情况,可见《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中,张汉君、张晓东撰写的《释迦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一文。

因为发现了题记,我们才可知辽庆州白塔建成以后,曾先后有过三次的维修事宜。

第一次,是在辽道宗朝的大康六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大约是在大塔建成后的30多年时,这次是在塔的七层以上进行了一些维修。

第二次,也是在辽代,是在天祚帝的乾统五年,也就是公元1105年。此时距大康六年又过了25年。这次维修是在塔上进行一些小型的修葺工作。

第三次,是在清朝光绪25年—26年,也就是公元1899年—1900年。这次维修距辽代天祚帝乾统五年,也就是



1105 维修大塔的时间,将近有 800 年。

光绪年间的维修与辽代的两次维修,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维修的部位和多少有别。光绪年间所维修的部位,要比辽代两次维修的部位多出许许多多。可以说自下而上,从基座到塔刹,处处都可发现光绪年间维修的痕迹。二是维修的措施截然不同。光绪年间维修时,采用了因陋就简修堵补救的措施,并没有触动大塔原来的基本结构。比如对塔刹的维修,已断折的刹杆,不但没更换,而且断折的上段就弃置在塔顶之上。塔刹的高度变矮了,原来组装在刹杆上的有关部件,就出了一了位置的移换,或者是全然不用,就弃置在塔顶之上。所以就出现了火焰构件摆放在刹座之前的现象。

自清光绪年间维修到 1988 年开始勘察,其间又经历了近 90 年的时间。我们在登临塔顶时,眼前的刹座,砖筑的砌体上已出现多年的开裂现象,有些部位不仅仅是松动,而且早已解体,整座塔刹已呈岌岌可危的惨状。

从某种意义去讲,光绪年间的维修工程,有些不如人意。然而由于这次维修确实起到了保护古塔的作用。这次维修过程中,留下了一些辽代原建时的构件,为我们复修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这次维修时,工匠们刻写在塔上的题记,也为王爷杨森筹款修塔的善举,提供了毋庸置疑的佐证。

再次,遵照维修原则,在拆解塔刹的过程中,发现了文物。

此次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实为抢救性的维修,并非周期性的工程,所以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维修原则为“加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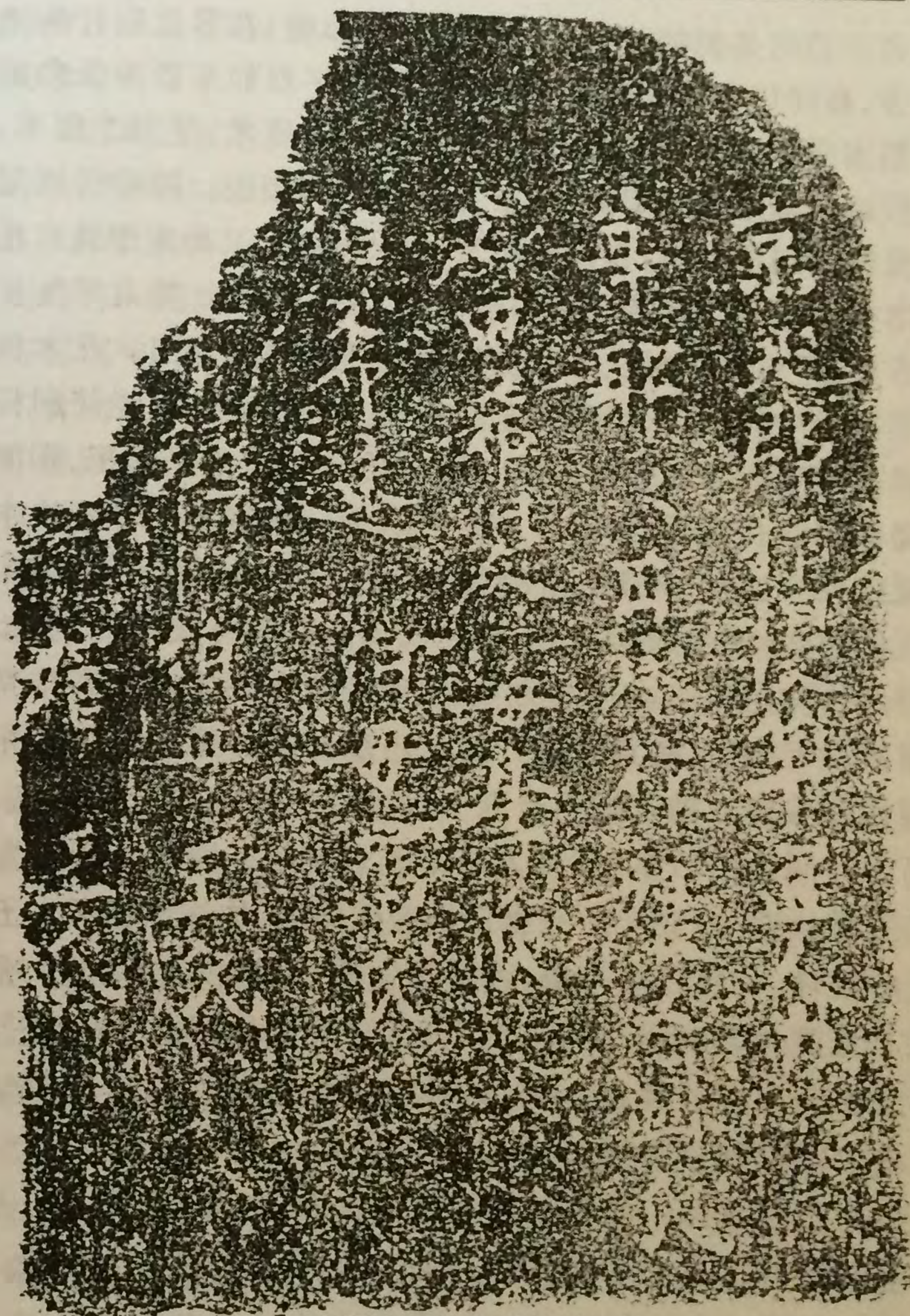
主,局部复修”。其中界定为复修范围内的项目,首要的就是要对塔刹进行复修。这里把复修塔刹排序在首要的位次,并不单纯是因为塔刹已残破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还因为塔刹,不但不防雷反而还落电,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其实还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复修时有物可证,有据可依,完全可以做到修旧如故。

当然要复修塔刹,就必须是先要拆解塔刹。塔刹既是古建筑又属文物,所以拆解塔刹,绝非是一项可随意拆毁或者是任意剔除即可的破坏性的工作。拆解是为了完好的复修,复修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在拆解塔刹的工作中,既要依照中国古建筑的有关规程,又要遵循文物考古的一些规定。比如在拆解时,要自上往下分层位有序次地进行。工作中要有详细的记录,构件上要有明确的标识。要实测,要照像,要做好原构件尤其是样板件的存管,还要做好置换件、补配件的组合归安等等筹划。

当拆解塔刹的工作,自上而下有序地拆卸到近覆钵体顶端的近口沿处时,我们预料中的可能会发现文物一事,终于出现了,时间是 1989 年的 8 月 8 日。先是在拆解覆钵的周边砌体时,在一处清代修补的砌体内侧的碎砖杂土中,发现了一块已有残缺的辽代砖碑。残碑为圆首,没有碑额,碑首与碑身为一整体。残碑残高 27.1 厘米、碑身宽 18 厘米、厚 6.7 厘米、高 1.6 厘米。砖碑的阴阳两面均阴刻有汉字,碑侧无任何刻饰,虽然砖碑面磨损严重,碑文多已漫漶不清,不过从碑阳的铭文中,仍可辨认该砖碑的铭文为“京北郡打柁竿匠人”的人名录,该砖碑为辽代建塔时的信物(附:

砖圆首残碑碑阳拓本)。8月9日在拆解覆钵一层正北面,辽代原砌筑的弧形砖砌体时,发现一用砖垒砌的简易小型穴室。室内藏置着完全用砖琢制的“涅槃砖函”。函为长方形盪顶式,分上盖下底可以开合为饰有子母口光素的砖函。砖函长19.8厘米、宽17.2厘米、高为14.6厘米。函内放置着用砖雕琢为一体的释迦佛侧卧于须弥座上的涅槃像。佛像贴金,须弥座饰彩,不过已多见斑剥。发现时卧佛身上遮盖着两层丝织物,因霉变严重,已经不成块,其颜色为褐中见绿。函与佛也多有开裂和破损的地方。随后,在刹杆一侧的立面体上,发现了“铁板铭文”和“预留槽”,以及在预留槽中所藏置的文物。

然而要说真正出自预料之外的发现,而且是令人惊喜而又惊奇的发现,那是1989年8月10日,在覆钵体内发现“密藏五室”文物。



砖圆首残碑碑阳拓本

当时是拆解覆钵体内砖筑的砌体时,在靠近刹杆的地方,在砖层中发现砌筑着一块长方形平展而东西为长向的柏木板。柏木板长为63厘米、宽为28厘米、厚为5厘米。将这块柏木板掀起后,其下方似为砖的砌层。随着砖砌层慢慢地向下拆解,在以刹杆为中心的地带,又出现砌筑有柏木板的现象。开始出现的柏木板,也是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不过刹杆是从木板的略微偏西的中间穿出。在木板窄面的中间,有一道不为垂直的锯口。这应是为能使刹杆从木板中间穿过时,依照刹杆的体位和刹杆的平面积,锯解出相同的孔洞后,再合并木板时所为。接着紧贴着这块木板的四个边幅,向下往外继续拆解和清理时,在低于这块木板约为20厘米的层位处,再一次出现砌筑有柏木的现象。不过这次是四块边长均为60厘米的正方形木板。其排列形式呈十字形,是紧贴着开始时出现的长方形木板的正东南西北方向。柏木板下是五个密室。中间的长方形密室,高于其周边的四室,室壁为砖木混合砌筑。四个方形密室的室壁,均为砖砌。所有密室里的壁面上,均抹以白灰。五室的壁体,均有开裂现象,藏置其中的文物也多有倾倒。尤其是东室,因室壁开裂较重,不仅“法舍利塔”均已倾倒,且有杂土与鸟粪的侵入。密室中藏置的文物顶上,均遮盖丝织物,文物底下均衬垫着丝织品。

由于覆钵体中的密藏五室处于高空,不仅空气干燥,大环境也较为安全。虽然发现时有些文物见有倾倒等现象,但从未遭受过人为的盗扰。加之五室中的文物数量之众,品类之多,尤其是贴金饰彩的百余座“法舍利塔”和五彩缤

纷的丝织品,以及琳琅满目的摆件、供器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思绪万千。

密藏五室的文物清理完后,往下又拆解了两砖的砌层时,在覆钵体的砌体中又出现了砌筑着木材的现象。不过这次所见并不是起遮盖和承重作用的板材,而是长条形宽度约为一砖的方体横木,水平地铺砌在砌体中。这是中国古建筑中所说的“木骨”,是起拉接和持平的作用。就是在木骨的这个层面,在靠近铜质覆钵体内壁处,发现了许多无序散藏着的纸质经卷;绝大多数为卷轴装。由于铜质覆钵的对接口,出现了错位现象,不仅可以渗水漏雨,蝙蝠等禽鸟,亦可在其间栖息。所以这些散藏的纸质经卷,多因潮湿霉变,满身粘满了污浊的泥土,一律呈黑褐色的装束。

当拆解工作进行到刹座时,刹座外部偏上的砖灰砌体,全是清代维修时所补砌的砌层。除在这些砌筑层中,发现有用残碎砖块砌筑的现象外,还发现用木桩或是木棍支顶辽代原建时砌体中的木骨的端头的现象。

在拆解刹座的砌体进行到将近一半时,在紧贴着刹杆的砌体中,发现砌体中砌筑着两通大砖碑。刹杆的南面为“建塔碑”,北面为“工匠碑”。两通碑均有开裂的现象。也就是在发现两通砖碑的水平层面上,在距刹杆等距的正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刹座的砌体内,均发现上面以砌筑的柏木板为盖,下面为砖砌的单体筒式穴室。穴室内均各藏置一座“十方佛法舍利塔”。

塔刹的拆解工作,最后在刹杆底座的铸铁垫板下,除发现有一件铜座柏木雕刻的莲花灯饰而外,再没往下拆解,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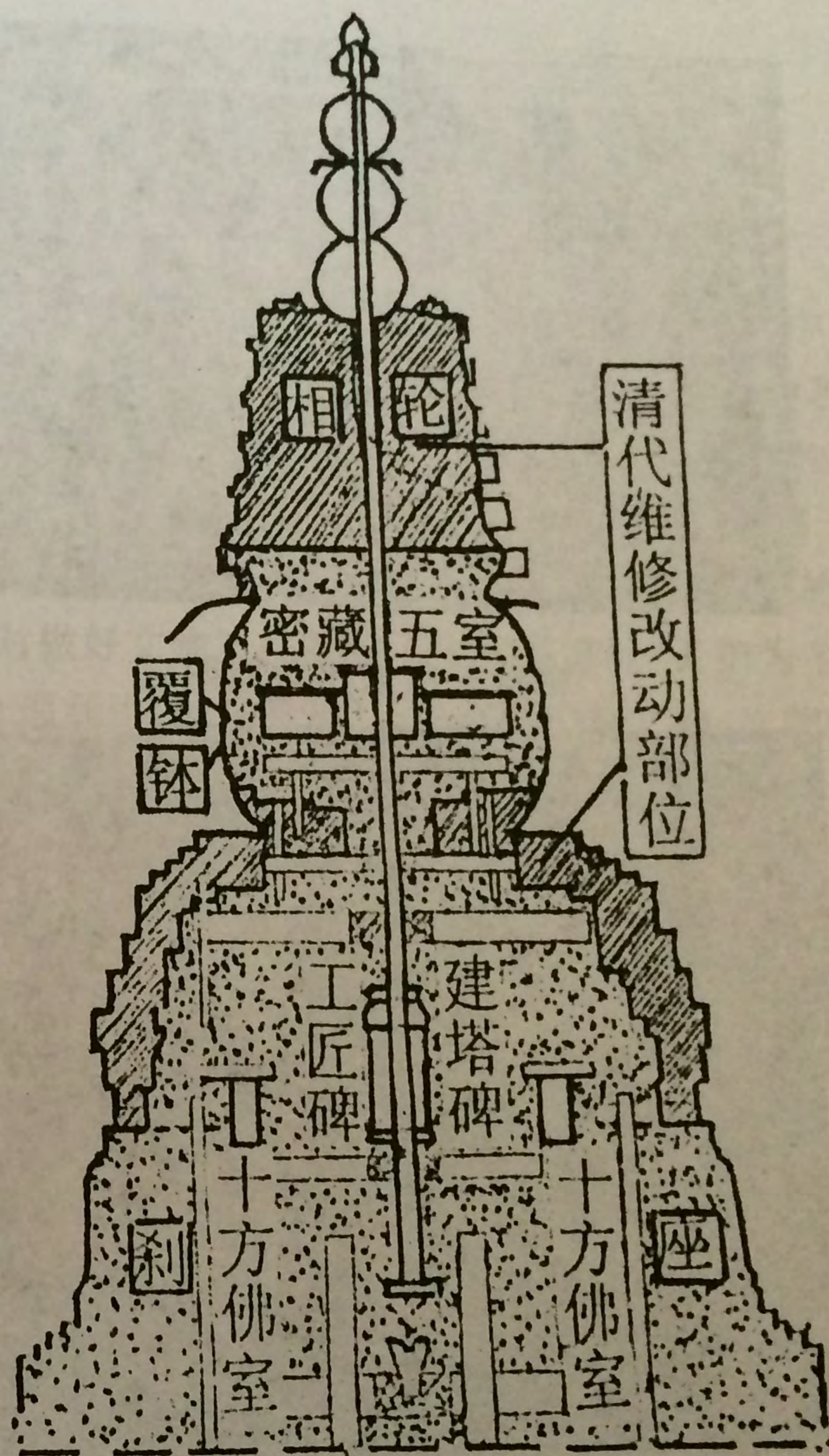
也就没发现什么文物。

如要进一步了解在塔刹中所发现文物的种类、数量等情况时,请查阅 1994 年第 12 期《文物》专刊中所刊载的,题为《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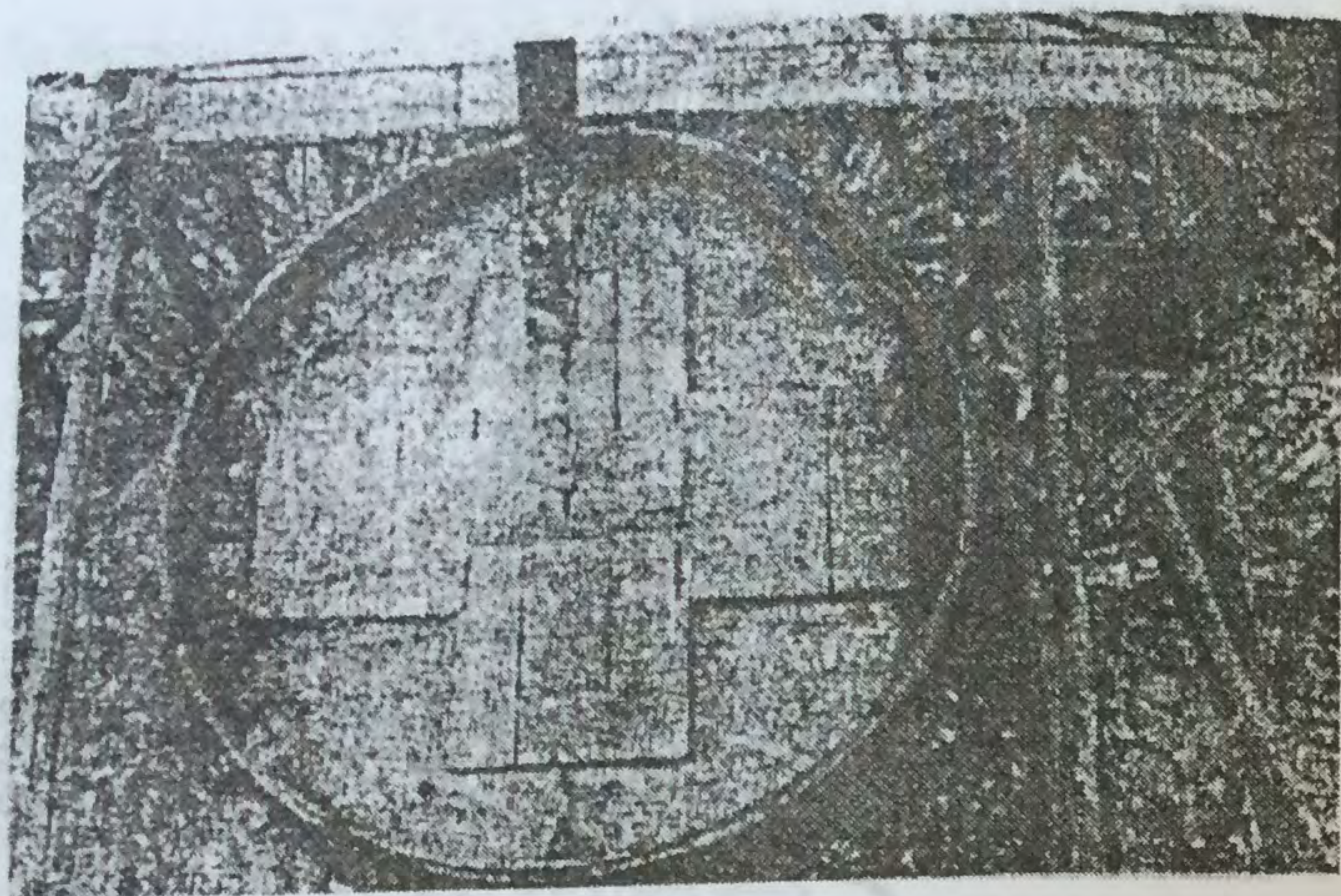
附:1、塔刹内发现文物示意图

2、密藏五室未揭盖前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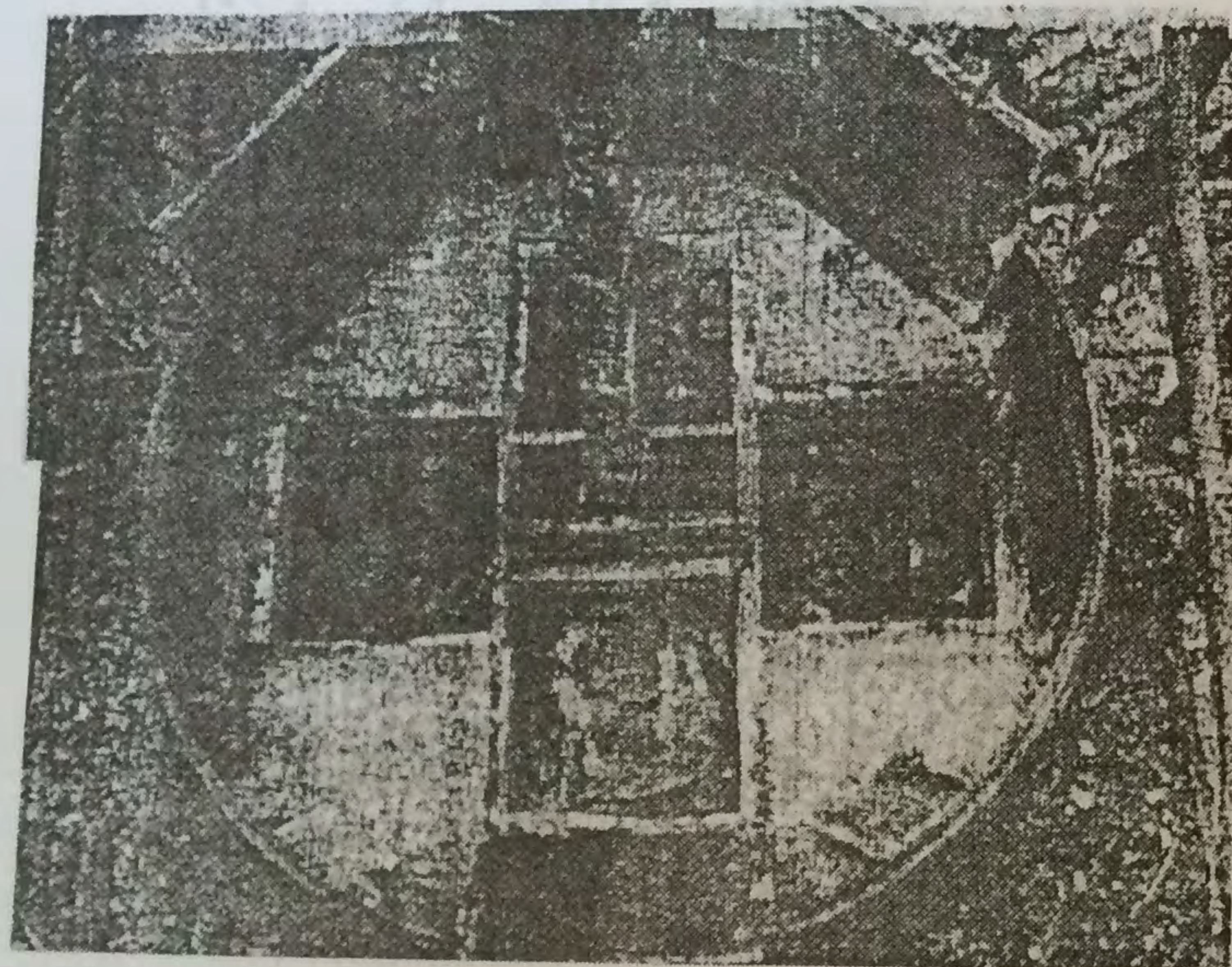
3、密藏五室掀开盖后图版



塔刹内发现文物示意图



密藏五室未揭盖前图版



密藏五室揭开盖后图版

## 二、珍稀文物图考篇

我们常说的文物,其实就是指人类在社会的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虽然文物又可分为出土文物、传世文物、革命文物、民族和民俗等文物,但是无论是属于哪一种,只要是能属于文物,那就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所以国家颁布的《文物法》中,对做好文物工作制定了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只有保护好文物,文物做为实实在在的基础,才可谈得上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才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而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如果没有文物这个基础,其他如什么继承、什么研究、什么发扬等等,根本就都不存在。

1988年至1992年间,在维修辽庆州释迦佛塔时,发现了一批辽代的重要文物。这批文物,并不只是原藏置在塔刹中,在为了复修塔刹时才被发现的那一批文物,还包括砌筑在或者是镶饰在塔体上的一批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点的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金属铸件和装饰部件、诸多的雕刻或者是艺术作品,以及塔心室里的壁画等。

这批主要文物的发现,一是在尘封千年的角落里,发现

了辽代社会鲜为人知的一些秘密；一是在凋敝的古塔上，读到了契丹族凝固的一段历史和看到了契丹族高超文化艺术的再现。这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序言》中的一段精辟的话语：“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契丹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辽代社会或者说是辽国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绵亘千古内容之一，契丹族所创建的国家辽国，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就向中国而雄居北土，在保卫和建设边疆国土方面，大有作为的中国宋辽时代的方国之一。辽国的所在地，并非蛮荒之地，也绝非是化外之邦。这里的土地历来就是龙兴之地。这里的人民自古就是龙的传人。这里地灵人杰，这里有过的称谓“克大宜”，被东欧许多的国家当做“中国”的代称。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是任何人也涂改不掉的。

对于这批重要文物，要做到件件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并不是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也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到的易事。因为有一些文物如纸质经卷等，还需经过科学地装裱加固等后，才能展出供观众一饱眼福。有一些文物，仍需采取一些科学的保护措施后，才能与观众见面。

然而直面广大民众的求知欲望和知情心绪，如今有不少的人，有时似乎是如饥似渴地对文物在关爱，甚至有的人还想能如数家珍般地了解这批文物情况。

为此，我在本篇章中，着重就塔刹内发现的文物中，而且是可以察验和进一步查考的文物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

的，或者是又不可能经常在展厅里与观众见面的珍稀文物加以考述。至于诸多精美绝伦、不同材质的建筑构件、雕刻和装饰品，因为可以在塔上随时看到，所以不在此加以图考。

### 1、兰叶状的不明物与《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这一是件用麻纸雕版印刷的，单页(幅)汉字佛经，是历来的史书地志中均不曾记载的，是考古工作中此前从未发现的，是迄今为止已知的辽代佛经中唯一珍稀孤品。

发现的日期是1989年的8月10日。发现的地点，是在贴近覆钵坍塌的内壁，与散藏在覆钵内壁四周的其他29件卷轴式经卷等一起发现的。

当时的工程进度，是在继续剖析和拆卸残损塔刹的覆钵。因为大塔上锻铁打造的刹杆早已断折，折断的上部，一直就倒置在塔顶的瓦垄之中。而用青铜铸制的圆箍形的数圈覆钵构件，其外表已在多处出现错位。覆钵内壁，原建筑时为起加固作用，用砖砌筑的墙壁，也已多有坍塌。所以覆钵中，早已成为飞禽常年的栖息之地。加之雨雪可以渗漏，尘土可以落入，再加上飞禽粪便的沉积，以及其它寄生物的滋生，这批散藏在覆钵中的辽代经文卷书得以发现，实是从腥臭污浊的粪土中抢救出来的。

当时发现时，因见其与大塔上的基本构件砖、木以及金属件迥然不同，其外表挂满的污垢，色泽十分酷似草原上深褐色的牛粪，尤其是形状的怪异，比如这件《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发现时，只是一条兰叶状的不明物。所

以不论是呈卷状的还是块状的以及一些残碎的小块,当时全都筛捡了出来。随后就在工地上,也称之为工作室里搞了化污解垢的工作。先是用温水慢慢地喷洒其上,待已吸附在经卷文书上的污垢化解时,再用软笔和宣纸,渐渐地粘吸已化解下来的污泥浊水。当时我们也曾说过,这是又一种“扫黄打黑”的工作。

当兰叶状的不明物和一些残渣碎块等,经过化污解垢,再用竹木小刀轻轻地将其展开摊平,显露出本来的面目时,当即就做了简易的飞裱处理。

这里有个问题,看来我还是应稍加解释上几句。塔的什么地方叫塔刹?塔刹的什么部位称覆钵?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安置在塔顶上的又在其正中高高耸立着的那部分包括有金属构件在内的建筑物,应称为刹。其次又因为它是在塔顶上建筑的,又是塔本身必不可少的建筑物,所以就叫做塔刹。“刹”字古印度的佛经中,其意思是“佛国、佛土”,或者是“清静的地方”。后来随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西域以后,“刹”字就又有新意。它代表“柱子”或者说是“住处”。所以前文中提到的“刹杆”,就是塔刹中的柱子。当然塔刹并不只是一根刹杆,它是由许多不同名称和不同形状的部件,并分别在各自的部位组建而成的。如塔刹的最底层,也就是直接建筑在塔顶上的,高出塔顶的那部分台座式的建筑物。这是塔刹的基座,也叫刹座。紧接其上的,近乎球形又似深腹碗,口朝上下相扣置的,一般均为金属件构筑而成的,这就是覆钵。再往上还有什么露盘、相轮、华盖、火焰、宝珠等等。

塔刹不仅起着装饰作用,还可以避雷。另外,依其高空、干燥、安全等先决的条件,还可在覆钵内营建出穴室,做为藏储之用,这便是塔上的“天宫”。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经文的上下两端,因霉变腐烂严重残损,经文幅面的残高约为23厘米,已不见上下的版框。经文的首尾,尚较完整。经文的幅面,左右宽为31.5厘米。整幅经文的版面,为前图后书的格式。是否应该这样说,如今我们可以脱口而出的“图书”一词,就是因为在中國印刷术的发展史上,以及印刷物的转型期间,曾有过文图并茂或者说是前图后书的这一格式的存在,所以才约定俗成的形成和出现了“图书”这一词汇。

经文的行距间,没有行格。每行的字数不等,分别为27—30字。经文的左右两端,尚有版框且为双边,版框的双边内饰有在佛教的教意中表示坚利之智,可断烦恼,可伏恶魔的法器——金刚杵图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文末尾的文字中,有辽“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施”的字句。

这是以往已知有辽一代印刷的经卷文书中,从未见有的记载。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雕版印刷经文的发现,是在昭示人们,应拓宽或者说是更新认识。以往只要一提及辽代的雕版印刷的经卷文书时,总是停滞在无须商讨的一种认识的层面上。简言之,这是南京的版本。换句话说,只有辽朝的陪都——南京析津府,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地区,才有辽代的雕版印刷品。对于这一认识和说法,如是

说辽代的雕版印刷佛经文书,发端于南京,或者说是多出南京,我以为无可非议。但是有辽一代印刷的佛学经文,并非是都出自于南京;换句话说,绝不是只有南京一个版本。我们在辽庆州白塔的天宫内,发现的雕版印刷的佛经中,就我已知的还有一些实证。

### 1、小字雕版《妙法莲花经》

这是明确为雕刻于南京的版本。是取材于圣寿寺所藏,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由樊承遵雕版于燕京。是辽圣宗朝“开泰二年(1013年)始雕”,五年“方始了毕”,六年“增补续记”的辽代佛经。

### 2、《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

这件雕版印刷的经文,是辽圣宗朝开泰十年(1021年)春二月,辽上京的福先寺讲经论比丘志渊,依燕京本雕印散施。

### 3、《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杂集)

这件雕版印刷的经文,其后记为,庆州僧录宣演大师散施。曲舜卿雕。虽然该经文中,未有确切的年代和大师的名讳。不过其印刷年代,不会晚于辽兴宗的重熙十八年(1049年)。大师其人,应与蕴珪有关。

上述2和3两件经文的版本,绝非是雕印于南京,而应是辽上京的版本。

(附:图版一)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影印件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影印件



## 2、《佛说摩利支天经》中国汉传佛教的梵夹经

我们在1994年《文物》第12期的《简报》中，曾以“辽代写经中罕见的袖珍经书”刊布了发现这件经书的地点、经书的名称以及版本的大小等一些最基本的情况。至于这册经书应是一册什么样的经文，由于《简报》的文字和篇幅有限，当时并未能从版本学、文献学等不同的角度，阐述它的珍稀性和特殊性。

要说这册经书为“袖珍本”或者说是“巾箱本”，并没有错。因为这册经书高为5.2厘米，宽为3厘米，厚为1.5厘米。这两名称虽然称谓有所不同，其实是纯属同一个类型，并没有本质方面的区别。它们都是在版本学中根据装订或者是版框的大小而区分出来的名称。如“袖珍本”，是指书的版型极小，可珍藏在袖筒之中。而“巾箱本”，是指书的版型特小，可装入古时人们用来放置头巾的小匣之中。我想它们完全可以置换位置，加以珍藏。

其实版型极小，并不是这册经书的唯一的和最重要的特征。如果再从经书的装帧形式，封护经文的特殊手法等方面去探究，经书的封皮，采用的是木制的“梵夹”，这才是它极其珍稀和最为重要的特征。

我认为这册袖珍型手抄本经书，就是中国汉传佛教中，迄今为止从未见诸报导的“梵夹经”。

看来，我们还是要先说说“梵夹经”的来历。汉字中的“梵”字，原为古印度宗教名词的意译，意思为“清静”。如果说“梵夹”一词，当然也与古印度的宗教有关，但这又是另一层意思。“梵夹”一词是佛教的用语，是专指用来夹固佛经

的封绳和护板。如果说是“梵夹经”，这是确指用梵夹封护着的经卷文书的名称。

当佛教在古印度盛行时，一些写有经、律、论三藏的佛学经文，并非是用纸张来书写的，而多见的是用一种名叫贝多罗树的叶子，用铁笔刻写在叶面上。这些刻写有经文的树叶，就又叫做贝叶经。为使这类经叶，不易散失，又便于保护和随身携带，就在贝叶经的上下两侧，用木板加以夹护，而后再用绳带结系封固。这就是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之初时“梵夹经”的特征。

既然这册《佛说摩利支天经》是中国汉传佛教的梵夹经，那么它又有哪些特殊的象征呢？

其一，它是用没有经过入潢的麻纸，做为经书版面的册页。书面是用两张单层纸，经裱糊后成为一张的双层纸。版面上没有什么版框与行格。经文为墨书、竖写、手抄的楷体汉字。字体结构严谨，笔锋遒劲有力。不过当发现文物，我在做造册登记工作时，曾在该经书的文字中，粗略地发现并记录下了数个相似简化了的汉字；但又不属简化汉字，也不为契丹文的大小字。为释读这点字，我翻遍了我能找到的新旧版的字书和词典，一直不得其解。所以也曾猜疑过，这是不是抄书者的讹文造字。后来在翻阅《龙龕手鑑新编》一书时，这一字谜才迎刃而解。

为什么在《龙龕手鑑》一书中可以释解呢？《龙龕手鑑》一书，是辽圣宗朝统和十年（992年）时，由一位名叫行均的辽僧，依据敦煌所藏经文为底本，为佛门弟子等能很好地研学汉字佛学经文，而编撰的音韵齐备的工具书。由此可知，

虽然抄写该书者当为何人仍不可知,但是可为佐证,抄此书者确实是遵照底本在原原本本地抄写。这些汉字中极为鲜见的俗字,就是汉文的佛经文书中,有着明确的音韵,为特定的一种书写形式。

其二,它是一种蝴蝶装的经书,并且在装帧方面,又有其显示尊贵的手法。经书版面册页的纸张,在经书的顶端、根部和翻口,这三处的边沿,均经过裁切成为齐边单页,且翻口处的上下书角亦稍加微抹。唯独经书的脊背处,未经裁切,而是由整张纸对折压平后,成为联页的折叠背口。经书册页的背口边端,未见有用纸捻或者丝棉等线连缀的现象,而是用黏合剂粘糊在一起。因为我尚不知该书是使用了面粉所制浆糊为之,还是用骨胶等来粘固,所以就用了“黏合剂”一词。

经书在封面后,留有三页未着笔墨的空白之页。封面后的第一页,为我们常说的“扉页”。封面后的第二页和第三页,也就是扉页后的那两页,这应称为“衬页”,有时也称之为“补页”。这种在封面后留置空白页的做法,在中国书籍史的发展过程中亦已形成。这是表明书籍本身庄重和气派的一种尊贵的表现形式。

其三,它的封面和封底的设计和封护经书的手法,以及其粘固书背、系结梵夹所选用丝绫色泽等做法,绝非随意之举又为鲜见之例。

经书的封面和封底,均用了厚约0.4厘米、长和宽约等于或微大于经书版面规格的硬质木板为之。封面与封底的封皮上,并未做任何的装裱等修饰,仍为光素而微泛红的木

板。

经书的封背,采用了浅黄色的绫锦,不仅将经书的脊背粘固其上,浅黄色的绫锦成为书背的封皮,而且还将木板所做的封面和封底朝向书背一侧通长的边端,也粘连其下并加以固定其位。

封面的内面,也称之为封二或封内,封底的里面,也称之为封三或者是封底里。均是直接与经书版面纸的册页,粘贴为之。

在封面和封底的上下两端,也可以说是在其四个角的近端处,距离外沿周边约0.7厘米的部位,各钻刻有位置相同的,直径约为0.2厘米的四个孔洞,用以穿系绳带之用。

绳带选用了青白色的丝线。先用数条线搓捻成单绳,然后再用三股单绳捻合而就。丝绳的长短,应为事先就已安排妥当。

丝绳在木板封面和封底上的穿系以及固定,并不是用黏合剂来固定。先是在整根丝绳的近中段,留下一段可容下一个手指粗的一段丝绳,用以留做环套之用。而后在这一段丝绳的两端各打好一个绳结。此后,即可将丝绳的两个端头,分别从封面翻口处的上下两个孔洞,由外向内穿入。因为绳上,在穿入前已打好了绳结,所以丝绳穿入封内后,留在封面外的环套已经固定。丝绳在经过封内时,将丝绳排解为三股互不扭结的扁平丝带,而后再从书背处的上下两个孔洞,平行地由内向外穿出,穿出后又在封面外的孔洞口,再各打一个绳结,使经过封内的丝绳也加以固定。接着丝绳绕过书背后,两个绳头如同封面的穿法,从里面经

过,在外面打结。最后在封底的近翻口处,将两个绳头在孔洞外各打好绳结后,再将两股绳合在一起,系成一个同封面所留环套大小相同的绳套,其余所剩的,长约等于经书宽四倍的丝绳,就用结系和封固经书之用。

这册梵夹经,是在1989年8月11日发现的。发现的地点,是在覆钵中所设密藏五室南室中的南侧。同室共发现文物19种计42件,除此经书外,还有木雕饰彩的释迦佛座像一尊、用琥珀雕琢的菩萨立像一尊,用柏木旋刻并加以饰彩的法舍利小塔三种,此外皆为供器或是用以放置丁香、乳香、沉香等药材的杯、盘、碟、壶等等。

辽庆州白塔的天宫中,发现的这册梵夹经,除去其外在的包装手法,仍承袭着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对经文采用木板夹护和再以绳带封固的形式而外,整册经书内在的载体,已全然不见一丝梵经的踪影,完全是中国汉文化中的纸墨抄缮,具有时代属性的物证。

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境内并非是只形成汉传佛教一支,还有另一支就是藏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形成的时代较晚,且经卷文书的文字,均使用藏文,所以我只提及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恕在此未加谈论。

我们已知,自从中国发明了造纸业以后,书籍的用材以及型体,就开始由笨重的“简策型”,向使用轻便的纸张转化。

从三国到唐末时期,社会上盛行的书籍形式为,近似帛书的纸质长卷。多幅纸裱接起来形成长卷,在长卷一端,设置一根略高于纸面的木条,做为卷轴,以便阅览时舒展,这

便是“卷轴装”。

到辽宋时期,书籍的形式由卷轴装又向册页型转化。先是将长卷纸,一反一正的折叠成长方形面积相等的相连册页,再在其前后加饰封页,这便是“经折装”。其时还出现有“蝴蝶装”、“旋风装”等。

到元朝时,册页型的书籍,又进化为“包背装”。在书籍的背口处,先用纸捻等加以连缀,再选用青白色和浅黄色的绫锦,对书籍的封面、封底以及书背加以包装。

再后来,又演化为“线装”、“平装”和“精装”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进化,册页型的书籍,从未出现过用绳带来捆扎包装的现象,有的只有卷帙的签挂等有别。

当然由于古代包装书籍时,选用的绫锦,青白色又称为缥,浅黄色又称之为緗,所以“缥緗”一词,就又成为书籍的代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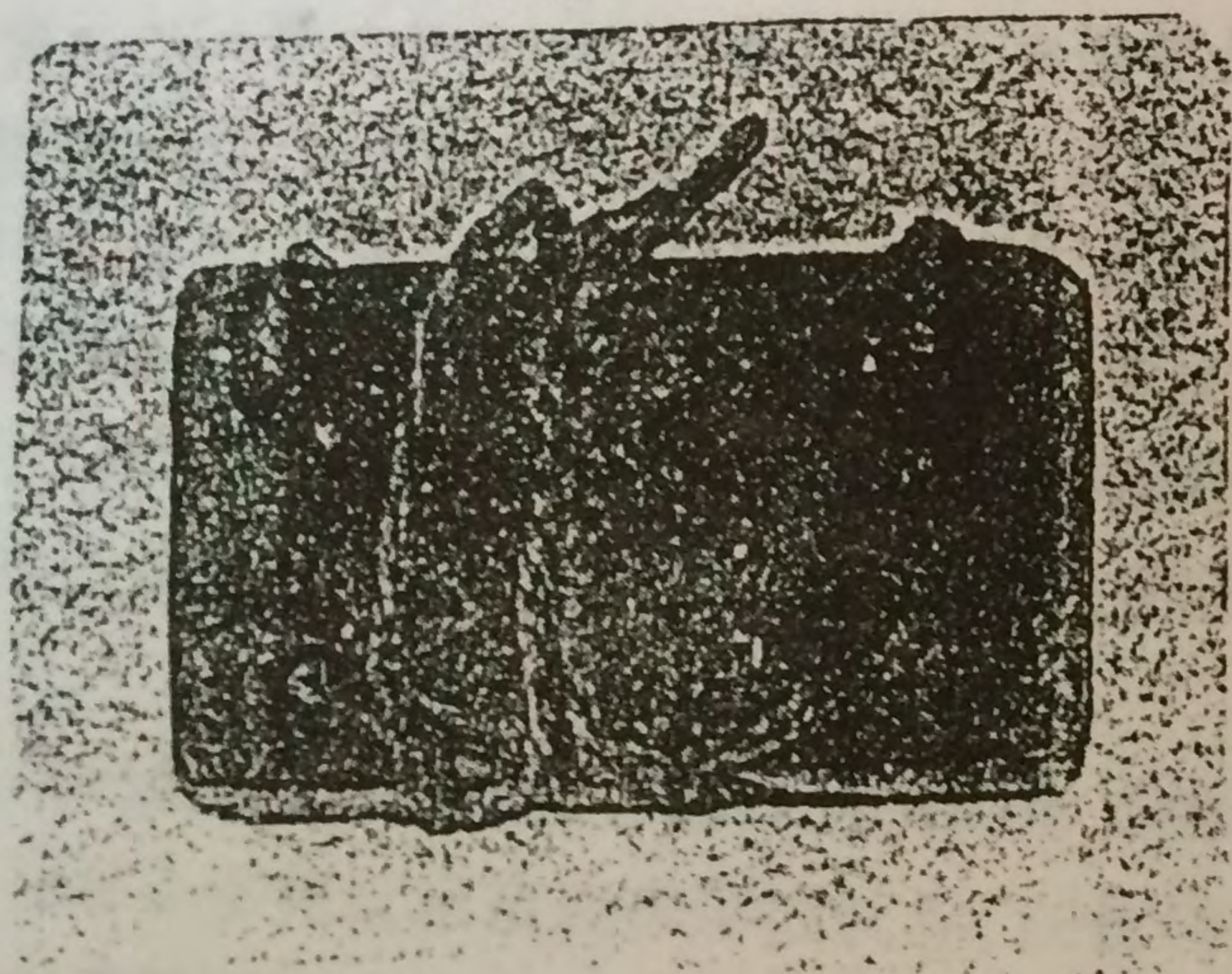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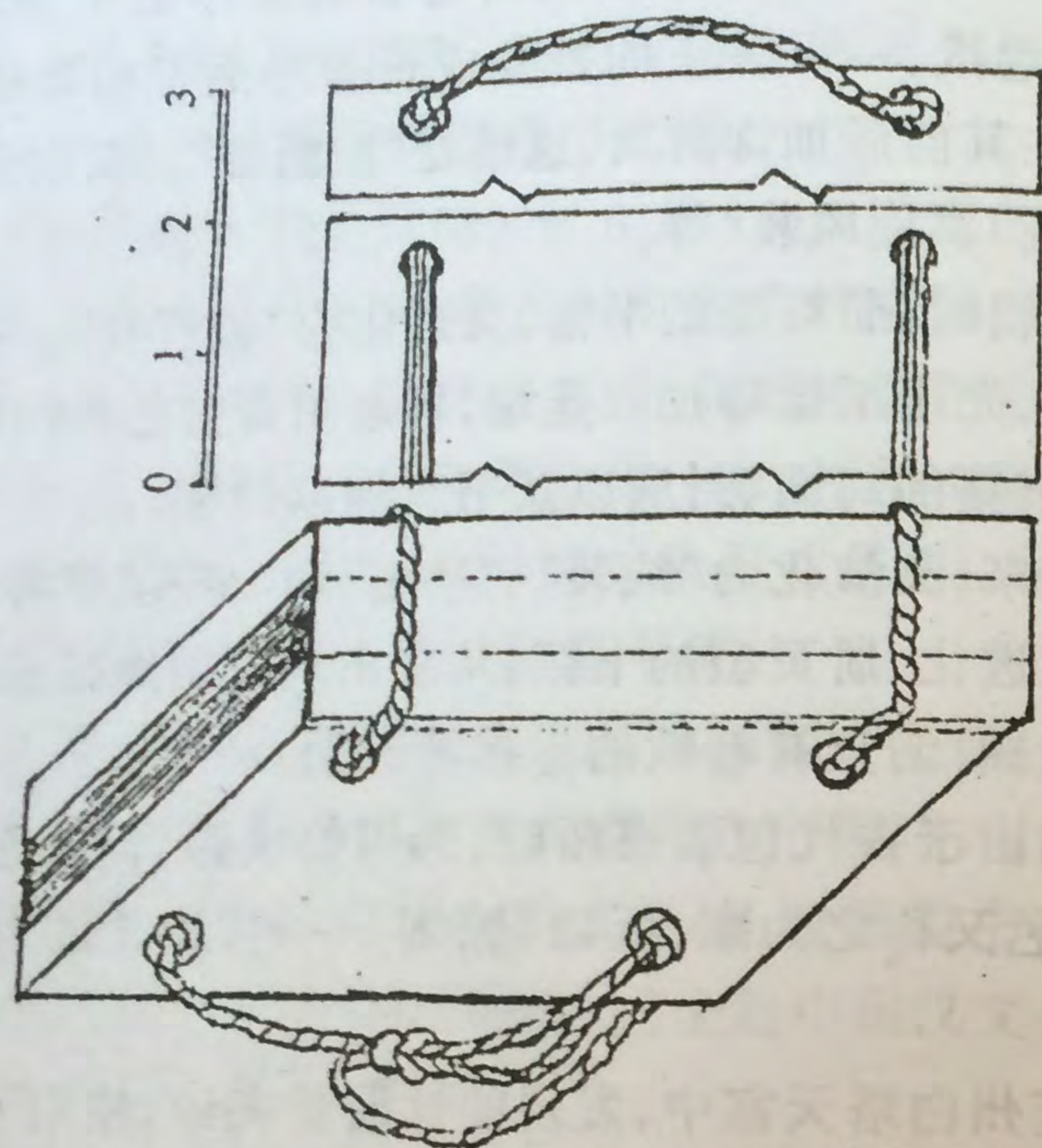
辽庆州白塔天宫中,发现的这册梵夹经,使用了浅黄色绫锦来联络梵夹经和为书背之皮,用青白色的丝绳加以封固和系结经文。这一举措,应为元朝以后“缥緗”代称书籍由来之滥觞。

附:图两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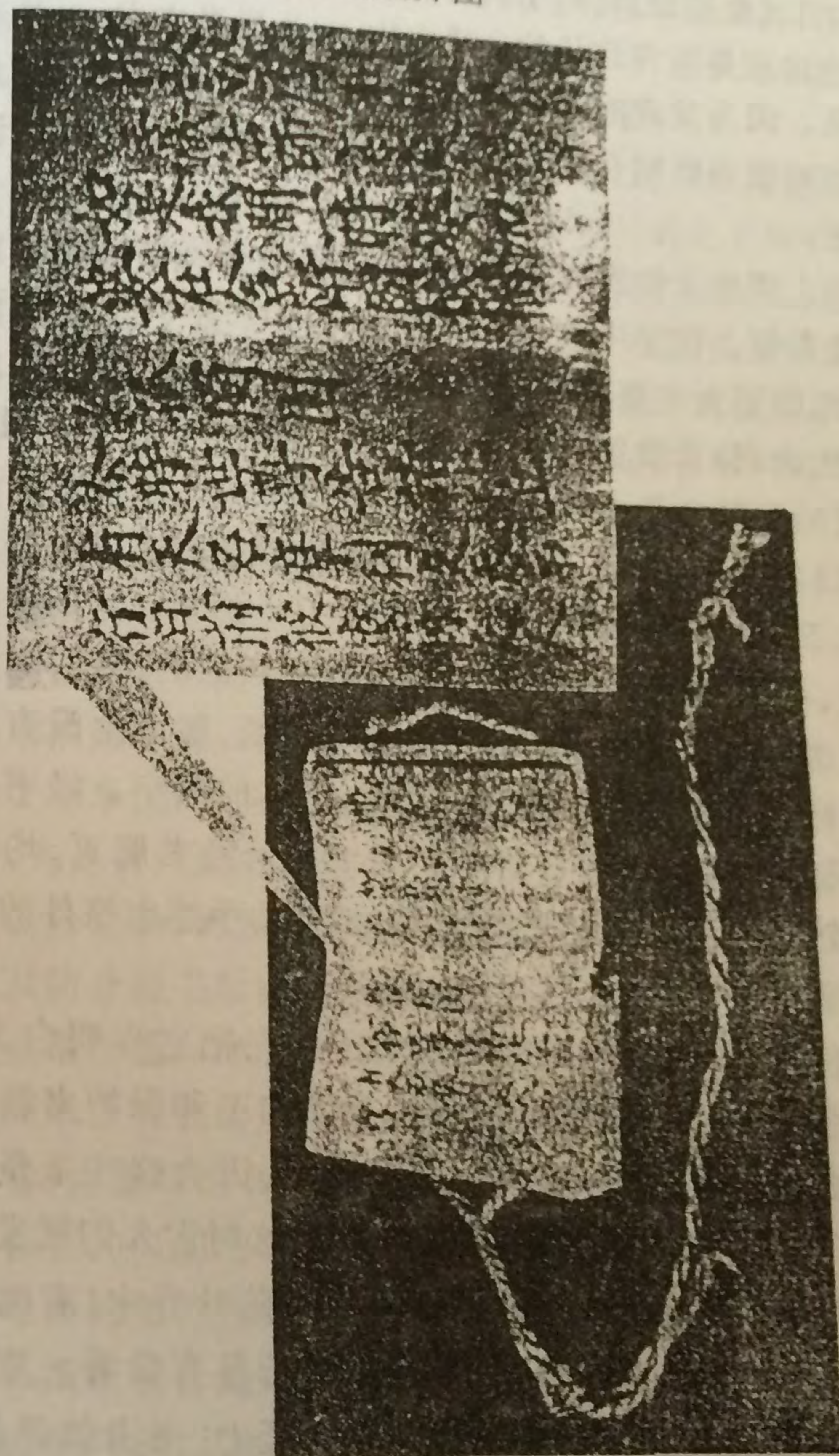
1、《佛法摩利支天经》梵夹经结系图

2、《佛法摩利支天经》梵夹经展开图

《佛法摩利支天经》梵夹经结系图



《佛法摩利支天经》梵夹经展开图



## 3、《金刚经》与骑士人物绣帕袱

这应是两件辽代的珍稀文物，一为经卷文书，一是刺绣作品。因为发现时它们是在一起，《金刚经》外用骑士人物绣方帕做为帙袱包裹着。所以，我也就在此一并加以说长道短。

这两件文物发现的地点，是在覆钵中所设密藏五室东室北东侧。该室内共发现文物为9种计35件。除这两件文物，因原为包裹在一起就算一件文物外，还有3种柏木小塔（法舍利）和放置药材的莲口小白瓷蝶以及莲口小银碟，发现的时间也是1989年的8月11日。

1、这册《金刚经》是蝴蝶装的袖珍型手抄本。经书通高为5.5厘米，满外宽4厘米，厚仅为0.5厘米。这册经书的用纸，不是麻纸，而是皮纸。整册经书版面的册页，也是采用了由两张单层纸裱糊为一张的双层纸，版面上没有版框与行格。文字为墨书、手抄、竖写、楷体的汉字。经书的封皮，采用了数层纸裱糊为厚实的纸板。经书册页，均经过“入潢”处理，所以不仅纸色微黄，纸质的手感也格外的坚韧而光滑。

什么叫“入潢”，在这儿我们还是先把它弄明白为好。古代称染书为入潢，这是我国特有的加工和保护书籍的一种方法。古代时用纸作为写书的材料，因为这些纸是用植物的纤维制造的，容易霉变和被虫蛀，这时古人们就发明了防治书虫的方法。有一种名叫黄檗的落叶乔木（有时也叫黄柏），它的树皮不只是内黄，而且味苦且有微香。取其皮捣烂再煮出汁液后，将这种汁液染在纸上，书虫就是蠹鱼，

就不再蛀书了，这便是“入潢”。古时写书者和染纸者，各有分工。染书者又叫“装潢匠”或是“装潢手”。至于后来把装裱等工作也称之为装潢，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该经书版面册页的顶端、根部和翻口，这三处的边沿均经过裁切，为齐直的单页边口。唯在翻口处的上下两个角，有稍加裁去尖角的现象。经书背口的册页，为对折后形成的联页边，经书的脊背处未经裁切加工。在联页边的册页之间，也未见有纸捻等连缀之物。经书是依册页的顺序，先粘糊为比较薄层的若干组次，然后再将这些有序的薄层组次粘糊为一体。

该经书的封皮，即封面、封底和封背，同为一整张厚纸板所为。

封面的宽和高与经书版面册页尺寸的大小等同，只是在经书的翻口处，封面又多出与版面册页等高，比版面册页宽出2厘米，拆叠向封底的一条厚纸板，这条连着封面的厚纸板，先是折向经书的翻口，在折叠到封底处时，顺着封底封皮的外边，再向封底折叠，使其形成保护经书翻口不受磨损以及防止经书版面册页脱落的遮盖。

这条折叠向封底的厚纸板，最后遮盖在封底表面的宽为1厘米。在它的上段略小于全长的四分之一处，有《金刚经一卷》为墨写楷书汉字的经书题名。

在它的高向的净边端，有一条直径约为0.3厘米，长与纸板等高的藤竹丝条，用纸等牢固地卷附在边上。在此藤竹条和纸板接合处边端的近中部，在藤竹丝条后又留置有一小扁平孔洞，其间结系着一条用数条丝线编织而成的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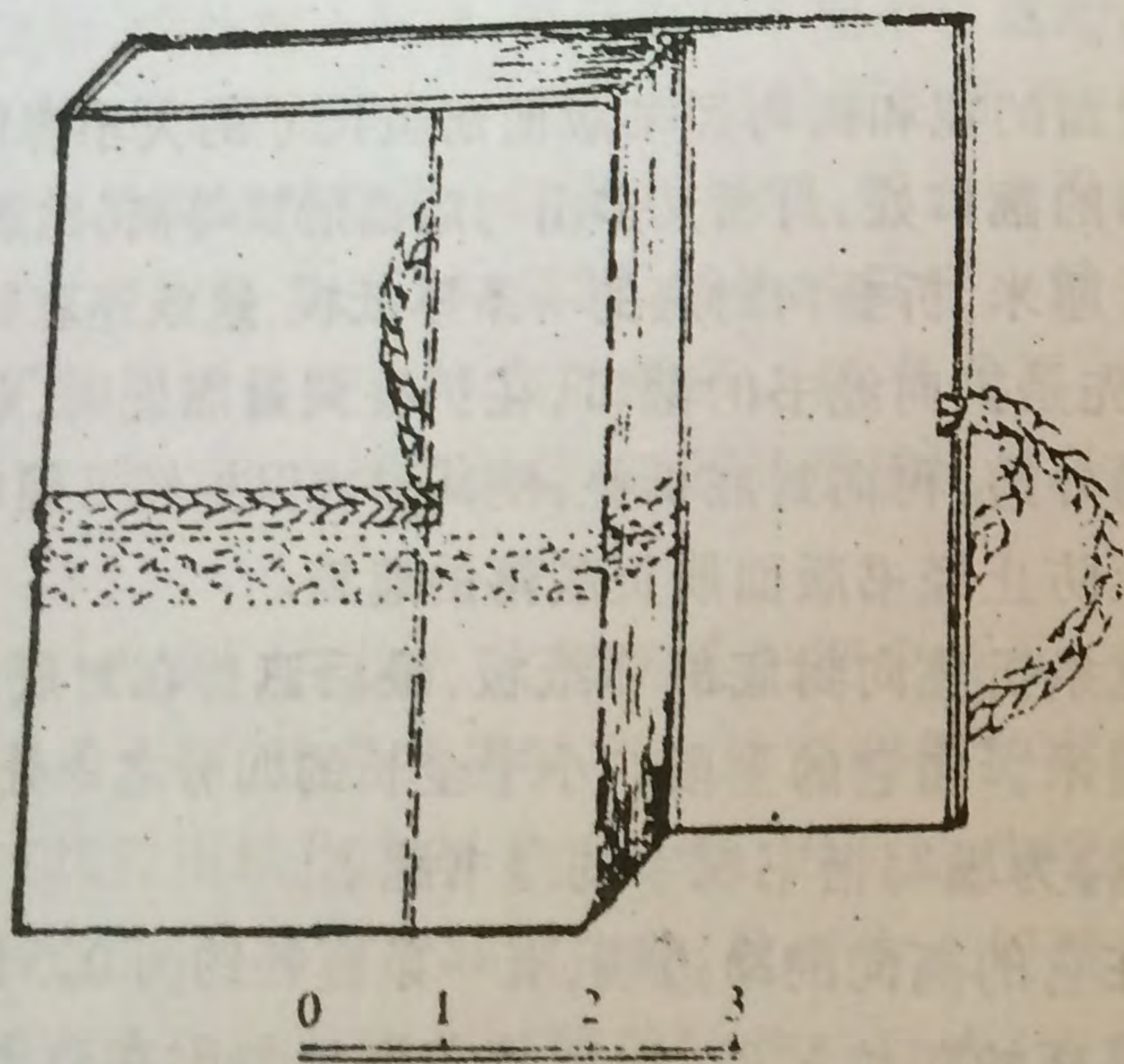
平形的丝带,丝带长约 17 厘米。丝带的颜色,原似为天青色,今已泛灰。

封底的面积,与经书版面册页的面积相同。封背的高度,与封面和封底同一。封背的宽窄度,是依照经书版面册页的厚度,再加上封面与封底的共同厚度而为度,折叠而成为宽度。

经书的封面和封底,是利用经书的两侧空白的册页,分别加以粘糊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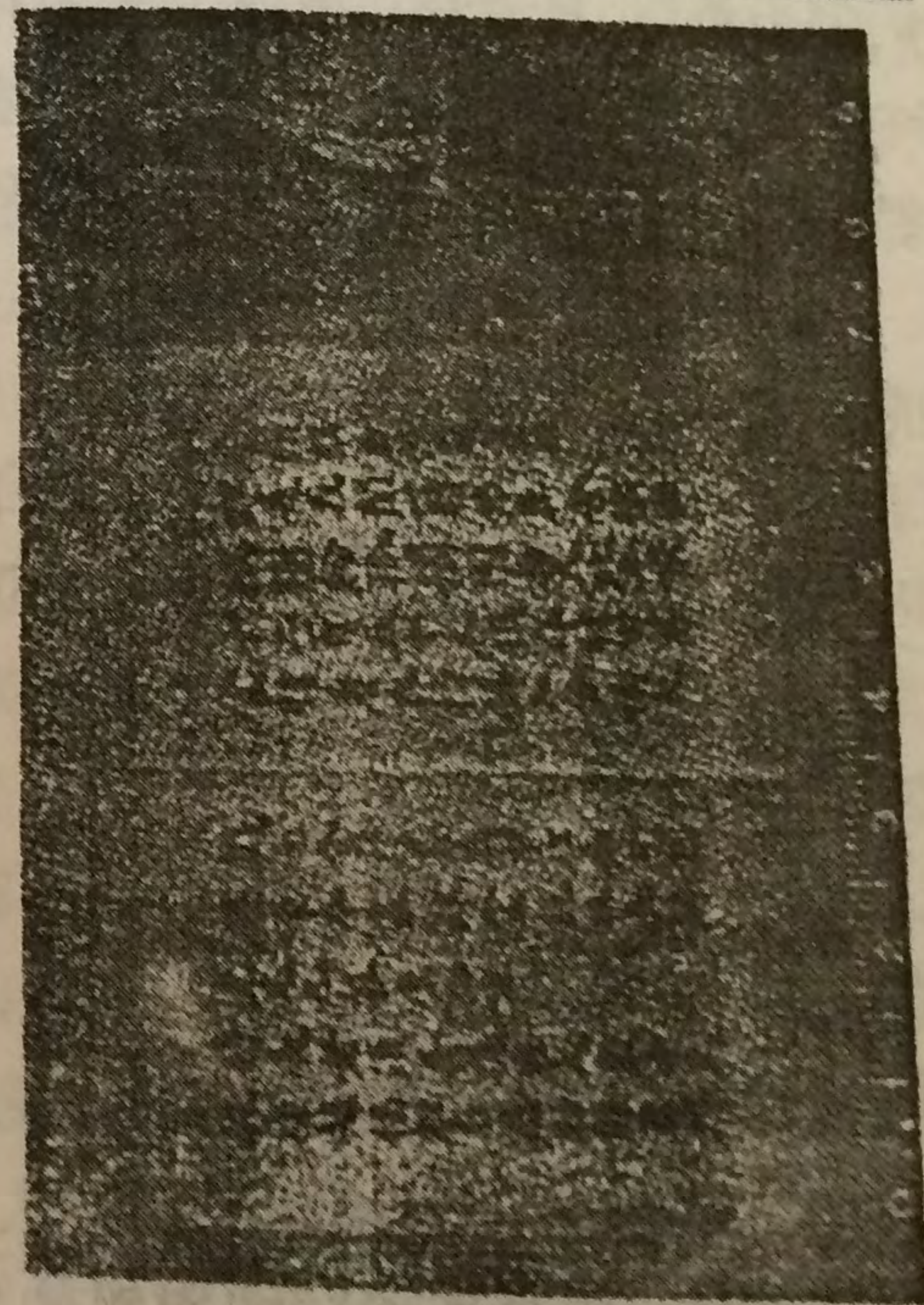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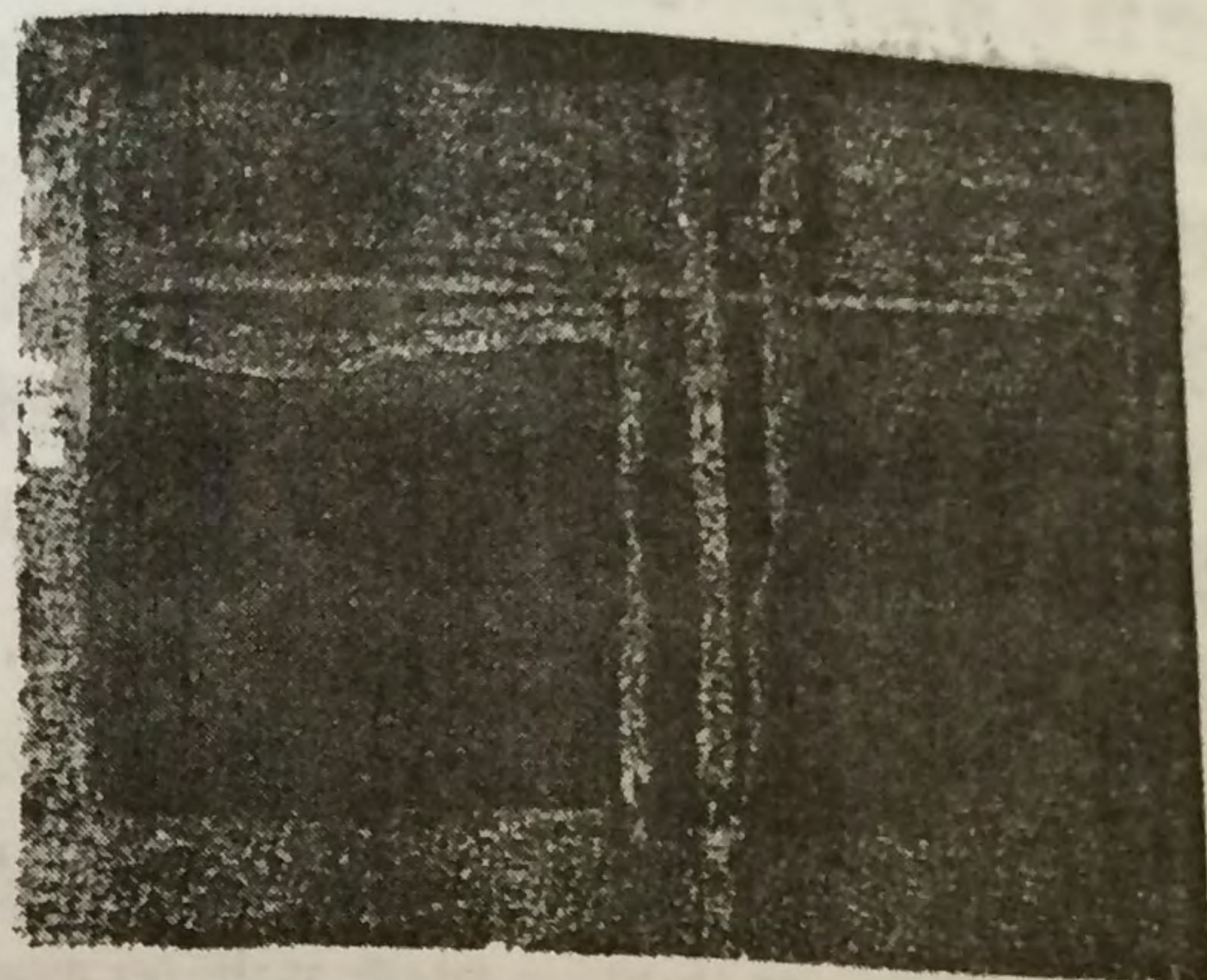
经书的封皮,完全用皮纸裱糊,平滑无饰。原来是什么颜色,尚不可知,今微偏褐色。

(附:图版)



蝴蝶装《金刚经》展示图

《金刚经图版》



## 2、骑士人物绣帕袱

这是一件有着契丹族浓郁文化内涵的丝织刺绣工艺品,以往的史料中未曾记载,是历来的考古工作中从未发现的一件辽代文物孤品。

它原来是专为萧辽后妃制做的一件珍稀的巾帕,后来营建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时,为炫耀虔诚,就当做帙袱包裹着经书密藏于天宫之内。所以,我才名其为帕袱。

在辽庆州白塔密藏五室内,所发现的帙袱,除此“骑士人物绣帕袱”外,其余基本类同。其一,都是在小柏木塔的塔身内,做为包裹佛经的帙袱而用,除丝织物的质地有绫和绢的不同外,同为单层,且均没有刺绣工艺的存在。有的只是有墨书字迹,如“法花经一部全身舍利在此塔中”。其二,这些帙袱(经帙)的面积,均为长方形,不同于巾帕近正方形。

这件巾帕为夹层,其状近正方形,边长为  $27.5 \times 27.7$  厘米,是用白色素绢作里,刺绣红罗为面,缝合而成。为当做经袱,在巾帕的左下角,有用素白绢折合为双层后缝坠有绢带一条。绢带是先将两端平齐后再对折,然后再将对折的外边,缝坠在巾帕的角上,为结系之用。

红罗面上,所绣饰的骑士人物图案,繁简有序,匠心独运。由于是在突出主纹的前提下又衬以辅纹,所以使得骑士人物的形象与特征格外的鲜活,使此刺绣佳品更加旖旎奇美。

这件绣品,先是在正方形的四经纹素罗的红底上,在上下两方近边端处,各绣饰一条宽约 1.4 厘米,平直地横贯于

帕袱的两个边端的联珠带边饰。这一带状辅纹图案,为整幅绣品的花边栏饰,联珠带以蓝为底色,珠为白色。白珠在蓝色的带上,又以上下两珠相联排序,形成等距的二方连续图案。联珠又分外环与内珠,外环似玉璫,环中套的内珠为圆珠。

在红罗底的正中,在两条联珠纹花边饰的中间,绣饰一外径为 15.5 厘米的团圆形骑士人物图案,这便是整幅绣品的主纹。

骑士人物图案的绣饰,先是在人物像外,也就是在团圆图案的周边,绣饰环状带的圆轮周郭。圆轮周郭用白色绣饰,并为平行而有间距的双线重郭。在双白线重郭间的环状带上,铺绣以黑色为地,在黑地上,又绣饰有大小相等,间距相同的白色圆珠,为单方连续的联珠纹图案。骑士人物像,就绣饰在其间。

骑士,顺向正跨坐骑,转身侧视前方。面孔端庄,体态矫健,悠然自得。头戴皮裘风帽,两侧帽耳上的系带迎风舞起,身着棉皮衣袍,腰间束有带饰,袍服的后衿被风掀起至马背。足蹬革制的高筒皮靴,足尖纫至镫内。双臂的袖筒为紧口,臂膀向身体的两侧平举,两手中各擎托着一只头均向内,二目圆睁的鹰鹞“海东青”。

坐骑的马头与身躯,均似蒙古马的特征,唯马尾卷扎后又结系以绫罗的花朵。四蹄前后摆动,形在驰骋之中。

在骑士人物像的前后左右,特别是还在其身上,又绣饰有单环、双连环、单环外联三圆珠以及单圆珠和三联珠等等辅纹图案,极似满天的星斗祥云和遍地的芳菲鲜花,摇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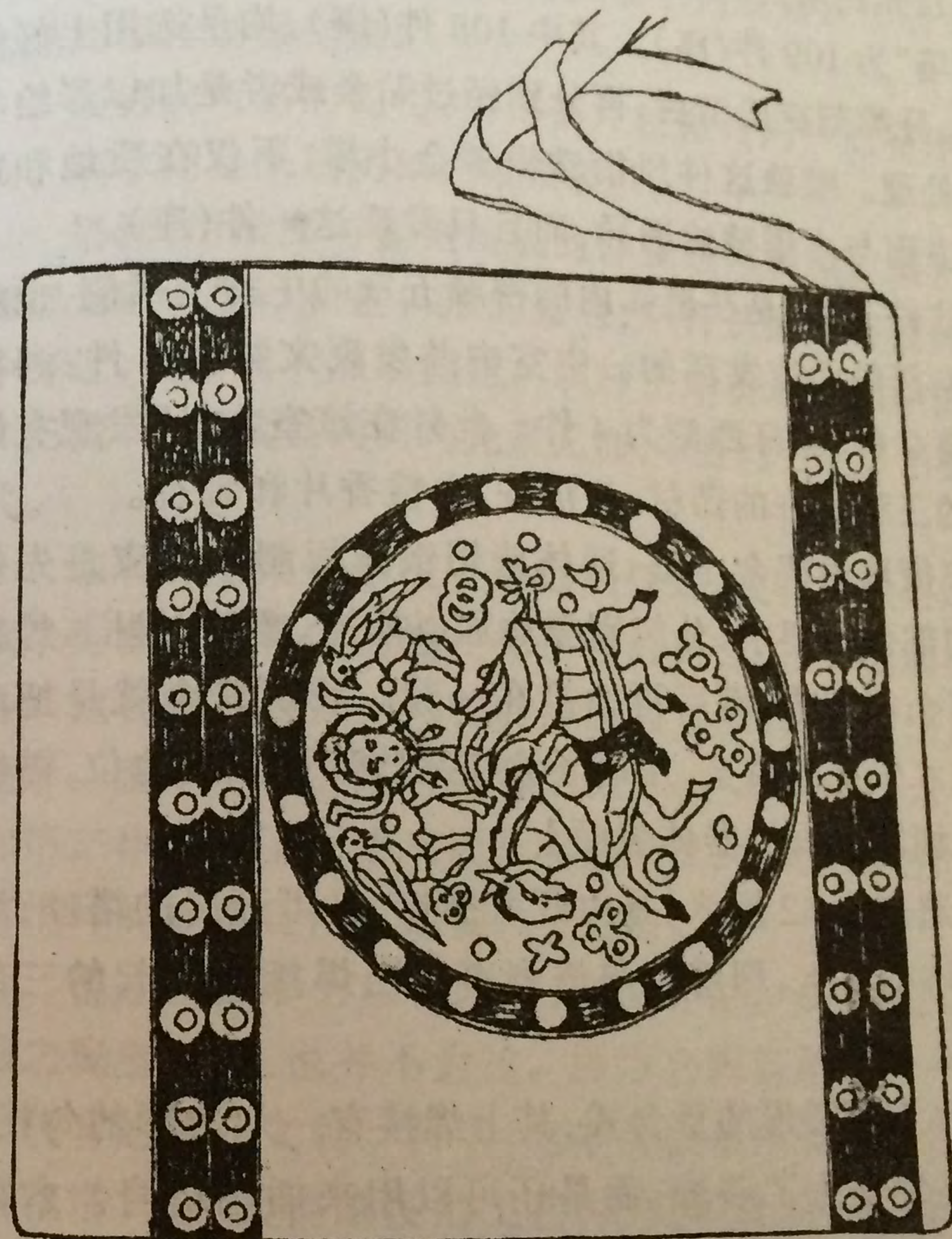
骑士身边。

整幅骑士人物绣饰的用色,多为橙色、黄色和白色块饰为主,并兼有少量的浅棕色,气韵与色调显得明快而和谐。

骑士人物绣帕袱,是一件地地道道的辽代刺绣珍品。它不仅活脱脱地描绘了辽代社会契丹民族“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是天经地义的“四时捺钵”制度。而且还在我中华文化“天道为圆”的基础上,又吸纳并采用了西域民族也盛行联珠纹文化表现圆的手法,进一步弘扬了“圆而神”和“其运无穷”的中华文明。

(附图)

骑士人物绣帕袱





## 4、凤衔珠银鍍金小塔与帝后礼佛图及其他

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又是能令人瞩目的珍奇孤品。在辽庆州白塔的天宫中，一共发现了各类小塔，又称为“法舍利塔”为109件(座)。其中108件(座)，均是选用上好的柏木，分类刻旋成型后，再分别经过贴金或者是加以彩绘等油饰处理。唯独这件凤衔珠银鍍金小塔，不仅在质地和造型等方面与木塔截然迥异，而且只发现这一件(座)。

这件文物，是在覆钵内的密藏五室的中室内西侧，也就是在刹杆的西边发现的。中室内共发现文物为6件：刹杆东侧有2件，刹杆西侧为4件。此外在该室内，还发现有散放着的三种少许的药材，为沉香、白檀香片和乳香。

凤衔珠银鍍金小塔，通体皆用银薄板制做。应是先依照不同部件的要求，分门别类地加以捶揲、鍍刻、铆固、焊接以及鍍金等工艺，而后再插接在一起。所谓鍍金就是把已溶解在水银里的黄金，用刷子涂在某些部件或是地位，需用黄金来加以装饰的器体表面上。

塔通高为42厘米，是由既可插接，又可开启的塔座，塔身和自塔檐以上，即塔顶与塔刹事先已焊接在一起的三部分组成。

塔座为漫圆形的重台式，其上焊接有一六边形的勾栏，这并非是完全为了装饰，而是还可以用来插固塔身。六面体筒形式塔身，每面的面宽为2.6厘米，其塔身的直径为6.2厘米。塔顶与塔刹，自塔檐起就在覆钵处，将覆钵与刹杆焊接和铆固为一体，并在伞式的塔檐底下，又焊接有一六边形的栏框，用以套固在塔身上。

在塔顶和塔刹，这一部分构件的设计与组合中，采用了许多的银丝工艺。如塔顶上的瓦垅和脊饰，是用银丝来加以显示；华盖下的刹链，风铃与风摆上用来悬挂的链条，也都是用银丝制做完成。

塔檐前所出的瓦当，用薄银片制做为同一而有序的排列。滴水则是采用阴刻线条来表示。

塔刹，用捶揲与鍍刻而成的仰覆莲为刹座。座上置以圆型光素的覆钵和莲口形的露盘；刹杆从露盘与覆钵的正中穿过，并在其下加以固定。刹杆上串贯着有间距的三珠和三盖，珠形微显椭圆均光素无饰，华盖均为莲口形的盘状式。

在刹杆上第一华盖下的近刹杆处，设有六根与塔顶上六条垂脊在塔檐前的端点相连接的刹链，在每根刹链上又各系挂着两只风铃。风铃的外型为方形，其铃内的风摆为菱形。整个塔刹上悬挂风铃的地方，还有塔檐的六个转角和第二华盖之下。小巧而真实的风铎，在微风吹过时，似乎有悦耳的妙音正向着四面八方传播。

说这座银塔为珍稀之品，绝没有错。如果说这座塔是国之瑰宝之一，也并不为过。因为它确实是有辽一代的绝无仅有的孤品文物。再者，它本身就是用贵金属白金制成的银塔，又经过高难度的工艺，把更名贵的金属黄金，鍍饰在银塔上，从而显得更加珍稀和绚丽。

当然要说银塔的珍稀之处，也并非只有上述两则。比如塔的造型，是既规范又典雅，既玲珑又优美。再如塔的设计与制做，是既奇巧又精湛。其实这座银塔分外的珍稀

之处,是其以刀代笔的银板绘图艺术及其内涵,是对不同人和物的具体定位与刻塑有别的造型等奇绝之处。

在此,我不准备单独地描述该塔上十分精美的装饰性辅纹、花卉的刻画艺术。只就塔上的两幅银板图画、一尊鎏金人物的塑像,一只衔珠的凤鸟,做如下的记述。

### ① 阿弥陀佛塑像

在银塔的正前方,也就是在漫圆型重台式塔座的前沿处,矗立着一位慈眉善目的男性站像。站像背后,映衬着壮美的艺术化了的荷莲花朵、宝相花等花卉刻饰图案。站像身着袈裟,头顶未戴宝冠,颈上不见璎珞。右手小臂向前,手中持握着禅杖,竖在肩前体旁。左手小臂微向胸前弯曲,手中端托着形似钵盂亦或是莲朵。

这是一尊佛像,是阿弥陀佛有时也称之为接引佛的塑像。为什么在该塔前,要矗立这样的一尊佛像。我以为这就是该塔的珍稀和无上显贵之所在。这就是该塔的设计者和礼佛人内心的意愿所在。因为在佛教的教规中,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接引念佛者,往生西天的净土也就是“极乐世界”。佛学中所谓的净土,可以这样来说,只要内心觉悟,所居之地即为净土。当然还可以这样来理解,要想得净土,先当净其心,随着心净,则佛土可净。

### ② 礼佛图与钟馗像

在六面体筒形式银塔的塔身上,除在正面,也就是在接引佛像身后直对着的这一面,刻画着塔门的图案外,其余的五个面,每个面上都是刻画着一位人物图像。

这些人物图像与塔门图案,虽然彼此之间距离很小,但

是从它们各自不同的外在表象和内在的寓意来分析,这些图像应属于两幅内容完全不同的银板图画。

第一幅,应名为辽代帝后礼佛图。

这幅画面的高度,上至塔檐下达勾栏。幅宽共为塔身的五个面,即占塔身面宽的六分之五。画以塔门的寓意为中心,以帝后的行为传神为主体,再附以侍从进行构图。

塔门为券顶式如意形,券顶的正中又兼有西域民俗中习用的尖拱状结构。门口用三条平行线以远小近大的视角,显现出门洞有相当的深度。门框、门槛、门楣以及门板,均采用了横平竖直的线条加以表示。门扇上下的户枢处,刻画有用金属包护着的装饰。门板上,刻饰有一对铺首衔环和三道五行金钉。门前的台阶,似有莲状的踏步。在券门顶上,虽然塔门尚未开启,但是从塔内向外已升腾出祥云朵朵,瑞气条条,由此可见塔内佛的灵感之所在。

塔门左侧的第一位人物,为一男性图像,浓眉大眼,体魄端庄,身高健壮。头上戴着一顶极少见的冠帽,身着宽袍大袖的丝织品服饰,足下似穿筒靴。双手在胸前,左右合掌,十指并拢,身体向右稍侧朝向塔门,似有行进之感。一派衷心敬意恭虔安然的神态。此人应是礼佛者中的男性主人。

塔门右侧的第一位人物,为一女性图像,眉清目秀,面容丰润而体态修长。头上戴着凤冠,身着宽袖的丝织品衣裳,且似裙长曳地,肩上亦有披巾。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置于身前,双手擎着一朵花、叶、茎俱全的折枝荷莲。身体向左微侧朝向塔门,似有前进之动感。全然是一种严净香妙和

虔诚而自然的举止。此人当为礼佛者的女主人。

在上述男女主人的身后,还各有一位女性侍从。

这两位侍从的身高基本等同,只是低于男主人。头上均未见有巾帽之饰,发式为大同小异。前额有短发均为中分,脑后与两侧的头发向上梳拢,并在头顶的两侧微偏脑后之处,结扎为左右对称的一双短辫,但是两人并不相同。左侧的短辫,为短而下垂可摆动状的发髻。右侧的短辫,为直立而微向外撇的短椎状的发髻。两位侍从的颜貌,虽然都显见恬静而稚气,但在脸形上,左侧者为圆脸,右侧者为下尖额脸。衣着均为丝织品的上衣下裳宽袖衣裙。双手均置于胸前,两手平稳地捧托着礼物,目不转睛地紧紧跟随着身前的主人。

这幅辽代帝后礼佛图,图中的帝后是哪位,我以为图中礼佛的帝后,决不是泛指有辽一代的帝后们,而应是某一当朝时期的帝后。

辽代信奉佛教由来已久,又是唐代崇佛的绪余,但是有辽一代由信佛达到崇佛的高潮时期,是在圣宗朝才出现。其时,在圣宗皇帝和圣宗仁德皇后的名字中的“小字”,都用的是佛教徒中善男信女的称谓。如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的“小字”为“文殊奴”,圣宗仁德皇后的“小字”为“菩萨哥”。这既是非常特殊之例,也是一代萧辽帝后中绝无仅有之例。

此外,辽圣宗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盛主,辽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在圣宗朝。当时辽代的腹地,即辽上京地区早已是今非昔比,完全有实力、有人才、有技术,制做出此类绝伦的珍品。

再者,圣宗皇帝与仁德皇后是姑表兄妹结亲。圣宗耶律隆绪,是景宗皇帝与睿智皇后的长子。睿智皇后,就是戏曲节目中统称的“萧太后”,名为萧燕燕。圣宗仁德皇后是萧太后燕燕的弟弟之女,也就是她的侄女;又是圣宗皇帝舅舅的女儿,俩人的情感笃深。而《辽史》在《后妃传》中,对圣宗仁德皇后因有奇巧的才艺,受到圣宗皇帝更加的宠爱时,有如下的记载。她试着用草木的莛杆做成宫殿的样式,不声不响地交给有关的司执人员,指令建造清风、天祥、八方三殿。宫殿建成,更加受到皇帝特别的宠爱……又以白金为浮图,“浮图”就是塔的别称。

我认为,这幅银板辽代帝后礼佛图,就是辽圣宗皇帝与其嫡后仁德皇后礼佛的真实写照。

第二幅,画像钟馗图。

这幅画的高度与礼佛图等同,幅宽则只有塔身面宽的六分之一,即为一个塔身面,位置在塔体的正后方。画面上未见有任何边框等装饰,只是一幅单人的画像。

人像为男性,头顶上在略偏前的部位,把头发挽成一个漫圆形的发髻,似乎是为顶戴巾帽时方便。二目似窥视状且龇牙咧嘴。一双赤脚裸露在外,两袖高高挽起,双手向胸前弯曲,手中似在握着什么衣帽。衣衫披挂在身,双腿微微弯曲,而两脚前后不一,有行动之感。这幅画像,应是钟馗的像。

钟馗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在这里出现他的画像。看来还是得回顾一下玄妙而惊骇的钟馗捉鬼的故事。

钟馗,是中国古代被神化了的一位人物。相传在唐朝

的玄宗时期,也就是又被称之为唐明皇的李隆基在位时期。有一次他患了恶性疟疾,久医未愈,朝中许多人不但知道,而且也十分焦急。有一天唐明皇正在睡梦中,梦见有一小鬼,身上穿着红色的衣服,一只脚上穿着靴子,一只脚赤裸在外,偷了他的玉笛和杨贵妃的紫香囊后,正围绕着宫殿不停地奔跑。这时来了一个头戴毡帽,赤脚挽袖的大鬼,跑过去不仅捉住了小鬼,而且还把小鬼给吃了。唐明皇向大鬼问话,大鬼自报家门名叫钟馗。生前曾参加过武举考试,因未能考中,所以就触阶自杀身亡了。但是他要消除天下的妖孽的决心并没有改变,所以才来此捉鬼并托梦于皇帝。唐明皇梦醒后,发现身体渐有好转,随就命画家吴道子绘钟馗的图像,并颁发诏书于天下。

为什么在该塔后,刻饰钟馗的画像。首先,悬挂钟馗画像的做法,这是辽承唐制的佐证之一。既然唐代的皇帝能够借助钟馗打鬼,来为自己去邪求吉,那么辽代的皇家把这一做法拿来照用,于情于理都是成章之举。其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辽代帝后礼佛服务并有着主要的衬托意境。辽代皇家崇佛,前有阿弥陀佛在度人善化,后有钟馗在消灭妖孽。如此神像人化,人神合一,善恶有报,文武张弛,岂不是世道太平,国泰民安,真可谓神来之笔,善哉。

上述礼佛图和钟馗像两幅画图,均是以刀代笔,用阴线的表现手法,在平薄的银板上篆刻而成的。线条流畅,圆折自如,意境深远,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神奇的联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绝品。

### ③ 衔珠的风鸟

在塔顶刹杆的最上端,即第三华盖往上,又有一形似华盖式的盘状物。盘上有一只银鎏金的衔珠风鸟固定其上,同时也成为该银塔的至高点。

风鸟昂首伸颈,头顶上饰有华美的头冠。身体上刻饰为斑斓的毛羽,双翅上展,长长的尾翼已下落。整只风鸟呈飞来时的着落状。两条长腿,从盘状物正中刹杆的两侧自上往下经过,一双鸟爪稳稳地站在盘状物上。风鸟的尖喙中,衔着用24颗洁白的米状珍珠编缀成的瓔珞,且又用红色绦罗为穗。

这只风鸟,就是传说中的神鸟凤凰。相传凤凰生性高洁,饮必择食,栖必择枝,且能歌善舞。只要有凤凰出现,天下就会太平吉祥。比如有一次,孔子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动乱无奈时,感叹道:“凤鸟不至”。

该塔刹杆的顶端,为什么要用一只飞来的凤凰为顶,我以为这似是该塔的设计者,即辽代圣宗朝帝后的良苦用心。

当辽代帝后礼佛时,不仅仅是前有接引佛祖在指引,后有打鬼钟馗在照应,塔刹顶端这只衔珠的风鸟,就是辽代帝后礼佛时,从天而降的神鸟。凤凰飞来时还带来了崇佛之宝。这是向世人昭示,天下将更加太平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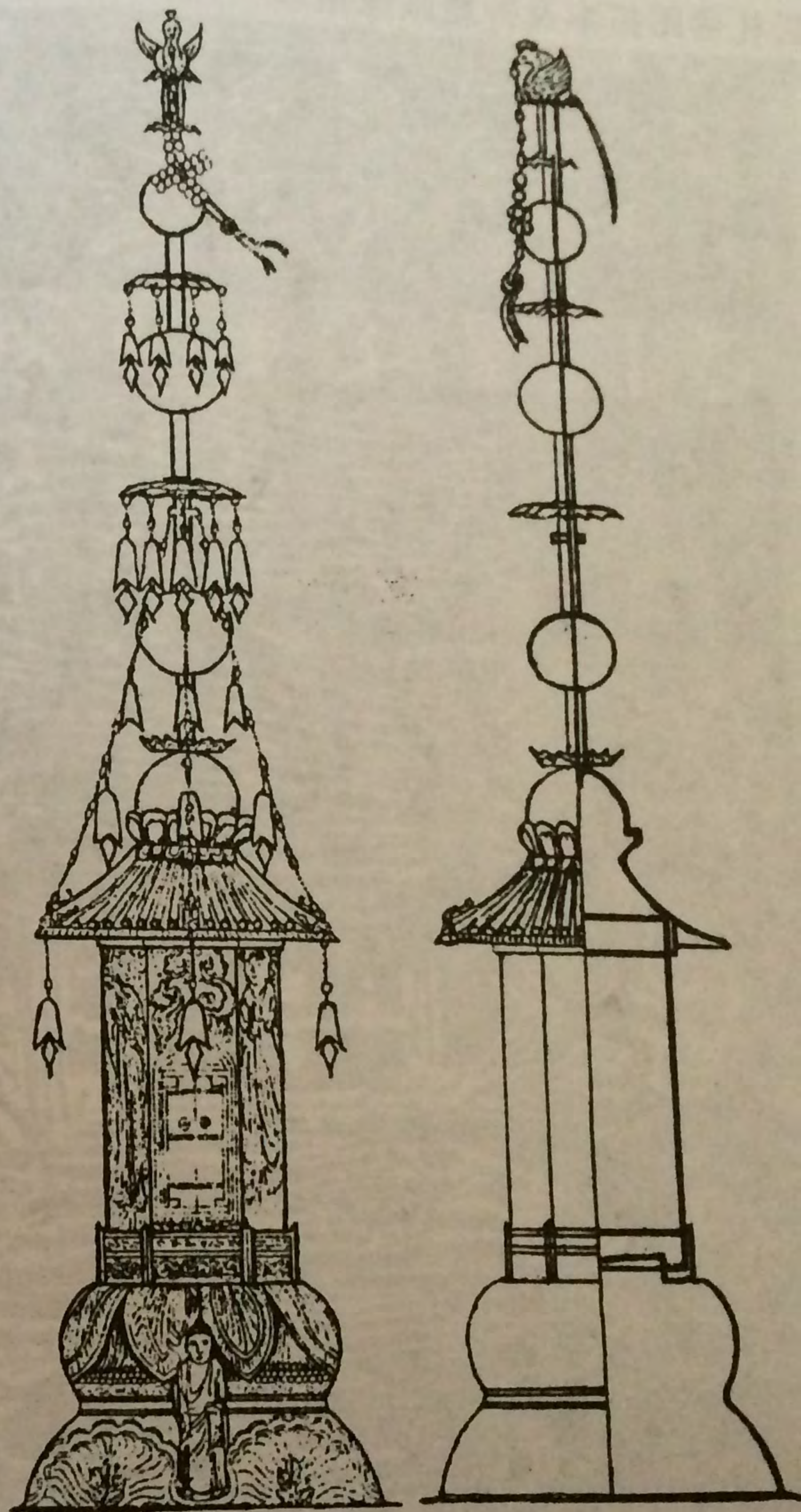
这座凤衔珠银鎏金小塔,既是辽代皇家在政治上的需要和思想理念的主导下设计和制作出来的艺术珍品,又是辽代社会岁以为常的四时捺钵制度下,可随时移动,可随地摆放的皇家崇拜宗教的供奉之品。该塔不仅把雕塑与绘画,金银制做与建筑规划,做了奇妙的艺术处理,还把历史、文化、神话传说以及儒、释、道等宗教教义融合在一起。该

塔无论从设计思想还是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可给人以灵感,给人以冲动,可使人遐思翩翩。

它是有辽一代皇家制做的文物绝品,它无愧中华国之瑰宝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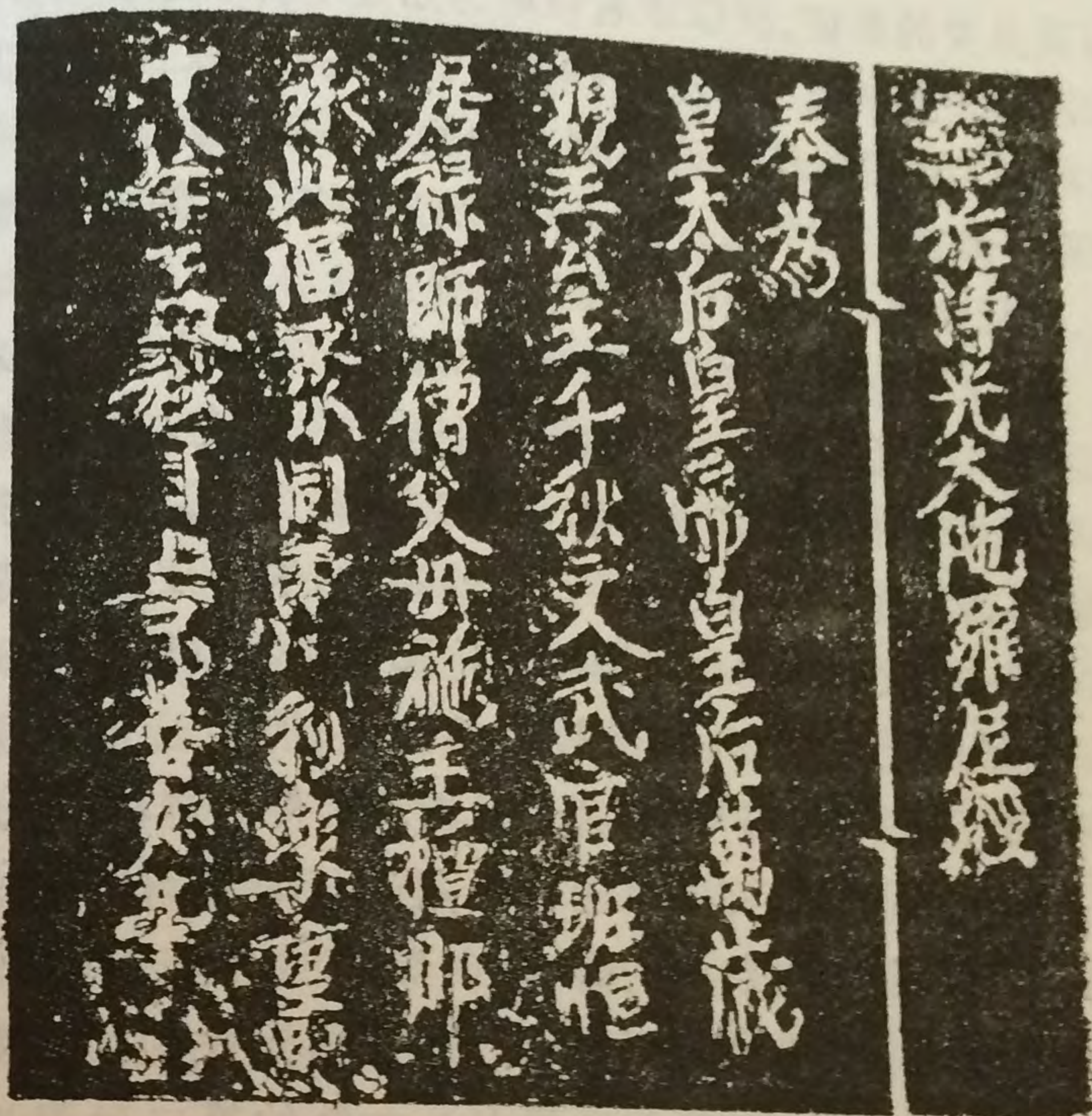
这里,还应再少说几句。在发现该塔时,筒形的塔身内,卷置着一整张长为112厘米,宽为9厘米和厚只有0.32厘米的银薄板,其上有鎏金现象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汉字为篆刻成的经文一卷。

附:线图1张,拓本2张。



凤衔珠银鎏金小塔正侧面线图

帝后礼佛图拓本及钟馗画像拓本



银版《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文拓片

5、七佛贴金饰彩法舍利大塔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塔,听起来怎么这样拗口。这和我们常说的木塔、砖塔、铁塔等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座发现于辽庆州白塔天宫密藏五室中的 108 座用上好柏木制做的小塔,其中最高大的一座(件)。这批数量可观发现于天宫的小塔,一律称之为“法舍利塔”。因这批小塔,显见有大小不一,造型有别,彩绘各异,旋刻不同等

可供分类的参证,所以才名该塔为贴金七佛彩绘法舍利塔。又因其为这一批小塔中唯一的较高大者,所以又冠以其大的称谓。要说这座塔的名称有些拗口,其实就是在塔字前的两个修饰名词所致。其一,七佛是指些什么佛为七佛;其二,舍利和法舍利是什么意思。

什么佛为七佛,佛教界对于佛,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释迦牟尼为现在佛,也就是说过去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已经有修行成佛者为六位,这过去的六位佛加上现在的释迦佛,就是佛教界的七佛。这些过去的六佛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舍佛、迦叶佛。

舍利是什么,舍利是佛教中的名词,有时音译又译成“设利罗”,意思本为尸体或者是身骨。相传释迦牟尼死后,火化遗体时,结成了许多晶莹明亮,击之不碎的珠状物。据传说有三种颜色,白色的为骨舍利,黑色的为发舍利,赤色的为肉舍利。通常将释迦牟尼的遗骨,称为舍利。如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再如北京西山八大处的第二处灵光寺旧址上,1964年重建的佛牙塔中所藏的佛牙舍利。当然再后来,有些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火化时所剩的骨头,也称之为舍利。

佛教名词中,除了把尸骨统称之为舍利,这其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全身舍利、碎身舍利、生身舍利以及法身舍利。法身舍利,又多指佛教大小乘的全部经卷。那么“法舍利”是什么,至此已昭然若揭了,它是指佛教的经卷文书而言。在塔字前用一个法舍利加以修饰,这就是标明这类小塔,是专门用来装置佛教经文卷书的小塔,所以取名为

“法舍利塔”。

这种法舍利塔,除了与我们常说的木塔、砖塔、铁塔等,都是叫做塔,在外型方面也有许多可以类比的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不只是在型体方面有大与小的不同,特别是在塔的功能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塔,这一建筑物名词,是自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塔在古印度时的名称为“窣堵波”和“浮图”,是用来珍藏舍利或是佛经的,其形状是覆钵式的大土冢。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前,也就是秦代和西汉时期,当朝者尊崇的宗教文化,是中国本土形成的道教文化。每当要迎候仙人时,总是要在高楼台阁之处进行。佛教传入后,迎候的形式与格局也渐渐地与道教相同。但是由于佛教自身的需求与道教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原有的楼阁建筑,只要是为佛教活动而建筑,开始就向着要有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的塔的形式而转型。中国古代称塔为佛塔或者是宝塔。

塔一般有地宫,地宫营建在地面以下,形似陵墓的墓室,用来珍藏舍利与佛经等。地宫之上覆盖的建筑物,名叫塔基,它既是地宫的保护层,主要还是用来起承载作用。塔基上先要建筑塔身,塔身有实心的也有空心的,塔身中的塔心室既用来密藏经文法物,有的还可用来登高远眺。塔身之上为塔顶,塔顶之上又接筑有塔刹。塔刹又分为刹座、刹身和刹顶,这也似一座小塔,在刹座和刹身中,又可营建出穴室的形式,这便是“天宫”的由来。

这座柏木塔,也是在密藏五室的中室内发现的,只是发

现时它在刹杆的东侧,与其共在一处的还有一单只,用丝竹编缀成形的纯白色的凤钗,发现时已有多处断裂和残损。

该塔通体选用上好的柏木,经旋削雕刻而成。小塔的高度,通高为44.7厘米,为分段插对而接。塔座为两段对接,底段为实心,上段为覆盆或空腹。塔身为一整段,身内旋削为筒腹式,塔身壁厚约1厘米。塔顶包括塔檐和刹座为一段。塔刹刹身自覆钵往上有五相轮一露盘和五宝珠,为一段实心整体。所有的对接口,均很精准,插对后纹丝不动。

整座塔的彩饰以红兰绿三色为主,施法采用平涂手法,这一做法使浮雕贴金七佛等更加绚丽。塔座分饰三色,最底层以蓝色为底,其上用淡白色勾画出仰覆莲,中层用绿色饰两道线形弦纹,周围的壁面饰以竖向的褐色间有土黄色条形纹。上层满饰红色为底,其上用黄色勾画出单方连续图案为云纹又似宝相花纹。塔身在中稍偏上的部位,一周共浮雕有七佛。佛像均为男性,头上未戴宝冠,身披袈裟。一双赤足踏在云端,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七佛遍体贴金,只在眉眼和发髻处涂以蓝色。这七佛还绘有蓝色的蝌蚪胡。塔身的地纹以大红色为主,在七佛的脚下,在红地上饰以蓝色的瑞云朵朵。在七佛的头顶处,每位佛顶的塔身上,各雕饰一朵贴金而饰以蓝色花心的盛开的花朵。塔檐下的椽望用褐色间以黄色加以勾画,塔顶的瓦垅脊背等饰则用绿色间以黄色来描绘。刹座贴金,在它和塔顶的结合处又用蓝色饰以一道弦纹。覆钵遍体为蓝色,其上用贴金的手法共贴饰有24块菱形块状饰,这当代表铜镜之装饰。从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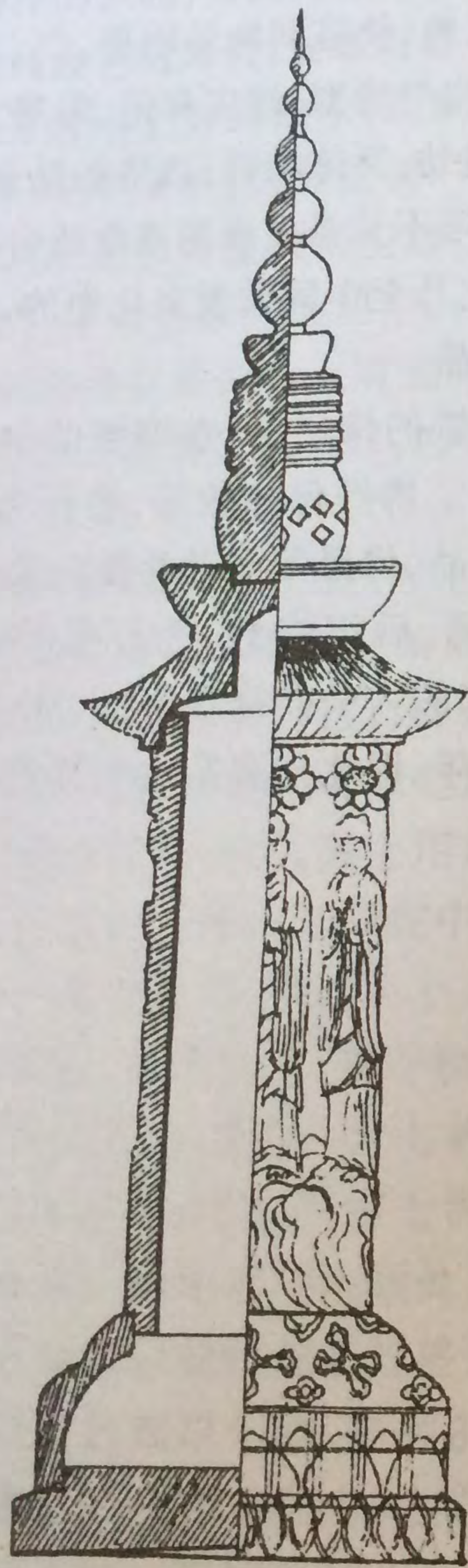
轮往上至宝珠,直到刹顶,全都用金箔贴饰。只在五层相轮间的槽隔内,填饰以红色,使塔刹格外明亮。

该柏木小塔的结构与造型,端庄和谐,舒展大方。该塔的旋削与雕刻,娴熟遒劲,简练精确;该塔的贴金与彩绘,考究典雅,亮丽沉稳,该塔不只是发现的这批法舍利塔中的精品,也是辽代佛教文化乃至中国佛教文化中的,迄今首次发现的唯一的孤品和珍品。

在该塔身内所藏置的佛经是,卷轴装的小字雕版印刷的《妙法莲华经一卷》。佛经保存较好,卷长为2054厘米,全卷共为七卷二十八品,佛经翻译者卷首有载,为后秦的鸠摩罗什。雕印的时间,后记有载,为辽圣宗朝开泰二年(1013年,即北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一日樊承遵雕版。开泰五年(1016年,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方始了毕。

附:线图一张。





七佛贴金饰彩法舍利大塔线图

### 6、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与法舍利塔座

这件珍稀的文物，在天宫中仅发现此一件，发现的地点在密藏五中南室的北侧。它是由法舍利塔塔座、塔身以及既是筒式塔身顶口的封塞，又为菩萨脚的插座，组成为底座。其上矗立着用琥珀雕琢的观世音菩萨立像。

观世音菩萨像，通高 7.1 厘米，用红中见紫的琥珀雕琢而成。菩萨像的身体比例协调，体形微见丰盈而修长。头顶的发髻为高髻似有花冠，其上再顶戴披风，风帽下边过颈达肩。额前的正中，用纯白色米珠，嵌饰为圆形白毫。前胸稍露颈上似原有璎珞点缀。双手在腹前捧托着一莲蕾或是莲蕾式的净瓶。褒衣博带飘然而下，衣裙落地，一双赤足前端外露。

观世音菩萨像下的法舍利塔座，座通高为 11.15 厘米，是用上好的柏木旋削雕饰而成。

座底为垂直边、广平足、漫圆体、内斜面，极似倒扣过来的大碗形。在这座底的外斜面上，用双阴线，刻饰出共为十三瓣近乎完整的覆莲花瓣，其下也就是在花瓣之间用减地的手法雕刻出下一层外露的莲瓣的前端。底座部分，雕刻后未做任何粉饰。

座身为圆柱体，内为筒式空腹形，这与其他柏木旋制的法舍利塔的塔身完全相一。只是外表的雕刻图案与表现手法截然不同。该座身的外表，是雕刻一条行龙周之。龙头抬起，张口露齿，鬣作逆向飘动，龙爪为三爪，龙尾显见圆秃。整条龙体采取减地浮雕的手法加以表现，刀法遒劲娴熟，行龙盘旋舞动。座身的上下两端各留出一定的空地。

下端满饰以蓝色,似水又似云。上端留下的空地、在其上端又旋饰出一敛口,这与其他法舍利塔塔身的上端完全一致。整条行龙未做粉饰,座身的底色饰以红色,包括座身顶端的敛口,在行龙的体空之间,除红地以外又饰以三朵蓝色的祥云。

插座也可说是座身顶口的封塞,呈倒“凸”字形(即“卐”)。座顶平面上刻饰六瓣莲花形,并用红、白、绿三色加以粉饰。在此面顶的正中贯穿着一根约为0.25厘米直径的圆竹棍,竹棍的上端用以固定菩萨立像。插座的周侧亦彩绘仰莲纹,插接后不外露。

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发现时见有断裂的现象,或因高空干燥脱水过甚所致。

观世音菩萨像座下的筒腹式座身中,卷藏着两种佛教经文:

①《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杂集)。经卷总长为191厘米,宽约8.8厘米,是用四幅宽约为48厘米,未入潢的白麻纸雕版印刷后粘接在一起。经文的后记有:庆州僧录宣演大师散施和曲舜卿雕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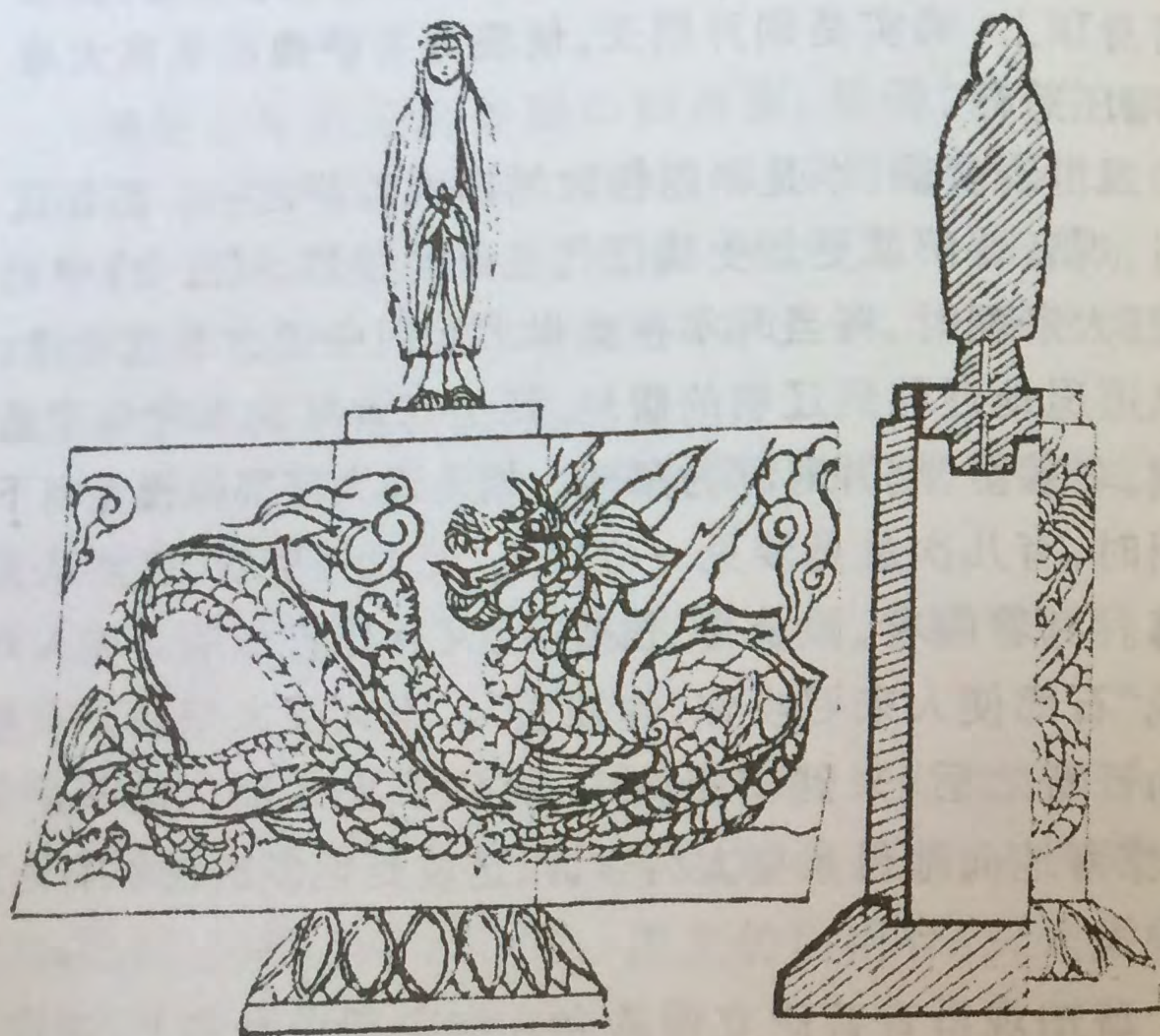
②《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幅长约90厘米。这一经文虽为一体,但是没有后记,发现时它是与①经文,同卷为一体,共藏在一起。

其实《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在这里发现的法舍利塔中多有发现,卷幅长短不一,后记有载和无载均有,且后记中亦有年代的区别。这卷发现的没有后记的,当为另一个版本。

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与法舍利塔座这一组合,实可谓匠心独运。如果单独的把观世音立像摆放在某个地方,让人崇拜,事必显得有些渺小。如果把这一观音立像,放置在塔顶和塔刹之中,这又似有亵渎之嫌。今将观音立像,矗立在塔身顶上,确实是别开洞天,使观音菩萨像显见高大雄伟,端庄慈祥。

观世音菩萨,本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而在辽代时,观音菩萨就更加受到辽代皇家的崇敬。《辽史》中记载:辽太宗朝时,将当时本在幽州大悲阁中的白衣观音像,千里迢迢地迁移到辽朝的腹地,辽上京地区的木叶山建庙立祠,名菩萨堂,并尊称为家神。相传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幽州时,有几次总是梦见一位神人,花冠美姿容,忽然从天而降。身着白衣,佩金带,执骨朵,又有异兽从后。神人对他说“石郎使人来召唤你,你须去”。不久辽太宗在立石敬瑭为晋帝之后,来到幽州城中,见到了大悲阁中的菩萨像时,惊喜地向他母亲皇太后告诉,这就是他多次在梦中见到的神人。

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矗立在法舍利塔身之上,这样一件文物,不仅仅是辽代佛教文化中的珍品孤品,也是中华佛教文化中,前所未闻的珍宝之一。



琥珀观世音菩萨立像与法舍利塔座线图

### 7、既没贴金又无饰彩的法舍利塔

这座法舍利塔，是在辽庆州白塔天宫密藏五室的南室中发现的，发现时它排列在南室的东南隅。

如果从天宫密藏五室中一共发现的 108 座(件)木制法舍利塔来比较和分析，这座小塔独具三个方面的绝无和仅有，是任何一座塔都无可比拟的。

其一，在整座小塔上，既不贴金又无饰彩，不加任何粉饰，保留着木质的本来色香。只有此塔是如此，可谓绝无仅有。

其二，该小塔也是选用上好的柏木来制做的，但是整座小塔的内外，完全是利用车床上的刀具旋削工艺来完成的，再未做任何的一雕一刻。只有此塔是如此，亦可谓绝无仅有。

其三，在 108 座(件)的木制法舍利小塔的塔身中，有 107 座(件)均藏置着略有异同的佛学经文，只有该小塔没藏置经文，而是在塔身内，藏置着一件用琥珀雕琢成果形的小瓶，这更可谓是绝无和仅有。

该塔总高为 30 厘米，底座的直径为 8.4 厘米，通体为圆柱形。塔仍由塔座、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塔座由须弥座和其上的仰莲台组成。须弥座是自下而上，开始是从外向内叠涩为四层平台，平台上为束腰建筑；从束腰往上，仍是自下而上，但这里是从内向外叠涩为三层平台。在这一中间凹两边凸的须弥座上，有一较塔身略显广大的光素仰莲台，台内的平面上旋削出一直壁平底深圆槽形的榫窝，用以套接塔身。塔身为圆柱、筒腹、薄壁的光素体，在其上下

的两端,均旋削为可插接塔座和塔顶的环形卯榫,且在塔身的上下两端,可见有微向内收的现象。塔顶与塔刹,旋削时就已做为一个整体,可扣接在塔身上。塔顶下的平面上,也旋削出一直壁平底与塔座上相同的一榫窝,用以扣接塔身。塔檐的下面向上起翘,塔檐的上面,向下向外做45度斜出。塔刹自下而上的为光素的仰莲台刹座,椭圆形覆钵,相轮五道泾渭分明,再上有微显漫圆的三层叠退为椎形体的宝顶,为刹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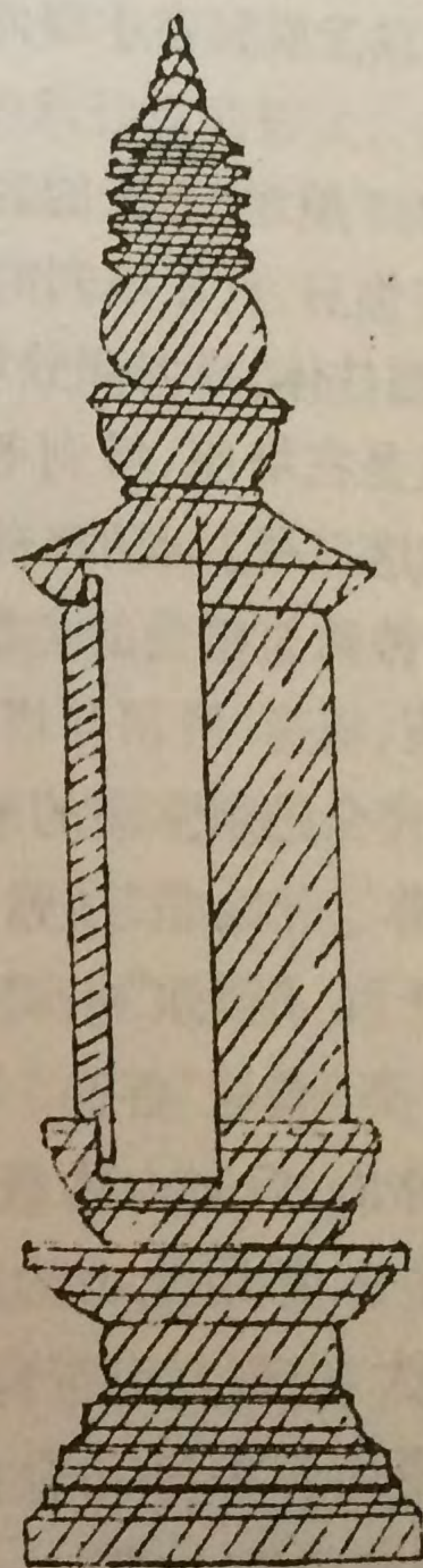
该塔身内所藏置的琥珀瓶,通高为9厘米,腹径为4厘米,其颜色与前面已提到的琥珀观音完全一样,为红中见紫。那么琥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东西,可以用来做精美的装饰品?

琥珀,是一种矿物的名称,它是由古代松柏树的树脂,形成的一种固体的化石。它有黄色、黄褐色和红褐色等等,一般情况下统称为琥珀。但是有一种称谓叫“蜜蜡”,这是专指黄色的琥珀而言。琥珀体轻,质地较脆,且透亮润滑,它不仅可用来做为精美的装饰品,还可用来入药或者作为染色中的原料。

塔身内所藏置的琥珀小瓶,为小圆口,圆肩、深腹、卵圆底。瓶口肩部,雕琢有垂挂着的五片重错叶饰;肩部上钻刻有两个不足小米颗粒大的圆孔。瓶身也琢饰为五瓣形体,直到瓶底。瓶盖,发现时已残裂,不过仍可清晰地看出,盖顶上雕饰为蒂纽,瓶盖整体为瓶塞型。该琥珀瓶,应为某种果瓶型。瓶内装有不规则的半透明的似石质的颗粒,共为28粒,其中最大的直径为0.35厘米,最小为0.1厘米。这

些不规划的颗粒物,其质地与色泽,绝似玛瑙石的颗粒。

该塔为什么要特地保留着木质的本来色香,或许就是为了突出其塔身内所藏置之物。果形琥珀瓶内的不规则颗粒物,是真身舍利子还是法身舍利子,我说不清楚。不过果形琥珀是专门用来盛装舍利子的,这应毋庸置疑。



既没贴金又无饰彩的法舍利塔线图

## 8、密檐式贴金舍利塔

这种密檐式的贴金塔,在辽庆州白塔天宫密藏五室中,总共发现2座(件)。1座发现于东室的东北隅,1座是在西室的西南隅发现。在西室中,同时发现的文物除该塔外,还有七佛法舍利小塔23座(件),四瓣莲口小白瓷碟2件,六瓣莲口小银碟2件以及散置在小碟内的一些公丁香、肉桂、乳香、槟榔等药材。

该塔总高为28.5厘米,塔座的底径为8厘米。该塔通体贴金,并无繁复的饰彩,只在塔刹的相轮间用红色加以彩饰。虽然塔体也为圆柱体,绝大部分塔体的结构与外型,均由刀具旋削完成,只是在塔座、塔刹等部位略施雕刻工艺,但是该塔的造型,在这里所发现的一百多座(件)木制的法舍利塔中,确属一种特殊而精美的类型。

该塔也是由塔座、塔身、塔顶与塔刹组合而成。塔座应为须弥座式,但又不完全是须弥座的形式。

那么什么叫“须弥”,什么是“须弥座”。看来这一问题,在这里是该说上几句了。“须弥”一词,是梵文的汉语音译,如果是意译时,为“妙高”或是“善高”等等。在古印度的神话中,有座山名为须弥山,后来为佛教所利用,所以在许多的佛造像或者是绘画中,都用此山为题材,表示天上的景观。相传须弥山很高大,山顶上为帝释天所在,四面的山腰有四大天王守护,周围还有香海和金山,再外还有咸海围绕,咸海外才是东西南北的四大部洲。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的须弥山渐渐地成了中国化的形式。开始是用做佛像的基座,有时也叫坛座。后来这种基座已不只是用在佛座,而

在一些建筑级别较高的建筑物上,如宫殿、庙宇、塔幢等等也都用来做为基座。不过它已是一种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基座结合后,形成的上下两端均有凹凸的嵌线,中间为束腰形基座,这便是须弥座的基本形式。它既可为建筑的高大典雅而增色,又可为建筑物起到安固的保护作用。

该塔的塔座,在须弥座的束腰处往下,共为五层叠涩的平台,这是地地道道的须弥座的形式。而在束腰处往上,则是一圆腹向外向上而斜出的,雕刻有两层仰莲重错的台座,并在台座的顶端周边饰以一凸弦纹边沿,这一做法在须弥座中极其罕见。仰莲台座的平面上,旋削有直口、平底、圆形的榫窝。

塔身为圆柱体,筒腹薄壁,除在塔身的两端均旋削为环形的卯榫外,塔身光素,仅在近塔身的上端处,刻饰有一道阴线弦纹。

塔顶与塔刹,旋削时就已做为一个整体,在塔檐下的平面上,亦旋有与塔座上共同的榫窝。

该塔的塔顶及塔檐极其特殊,塔檐下,刻饰有一周似为椽飞的点状凸棱线。第一层塔檐的外径与塔座仰莲台的外径等同,下檐向上反卷,上檐向下向外斜出。从第二层塔檐起,塔檐的外径,就陡然缩减为较塔身还要微细,并逐层的加以递减,一直到第十三层塔檐时,塔檐的外径宽度,仅为塔身直径的三分之二。从第二层至第十三层的塔檐之间,不仅层距较小,间距相一,而且排列整齐,塔檐均呈向上反曲的现象。

塔檐顶上的刹座,为一雕刻成向外反卷的仰莲刹座。

其上为五道相轮,相轮之上为刻饰有莲瓣型的覆莲一层和光素的仰莲一层,再上为三宝珠等距地贯穿于刹杆之上,刹杆尖出为刹顶。

中国的古塔,是古印度的佛塔“浮图”中国化后的产物。中国古塔发展的主流又是楼阁式的古塔,古塔的每层上下不仅均有门与窗等设施,而且在每层间还有腰檐平座和栏杆围绕,塔体也多为多面体和攒尖顶。当然也有一种塔,在中国的北方发展很快。这类塔一般是塔的底层较高,接着就在其上密而不乱地排列有九乃至十多层的塔檐。塔檐的层数无论多少,一定是为奇数。这类塔一般都是用砖料或者石材来建造,塔檐是从塔体的壁面,向外叠涩悬挑,反曲向上。因塔檐之间的距离较小,出檐处既没平座也没栏杆,当然就更少有门窗,这便是密檐式古塔。

这两座(件)密檐式贴金法舍利塔中均藏置着同样名称的经文,但版本等并不相同。

西室塔中的经文,名为“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卷长为327厘米,卷宽为9.5厘米,经卷为六幅纸对接而成,卷纸均已入潢。文字为汉字雕版印刷。该塔中除藏有经文外,塔内还藏放有少许的丁香、安息香等药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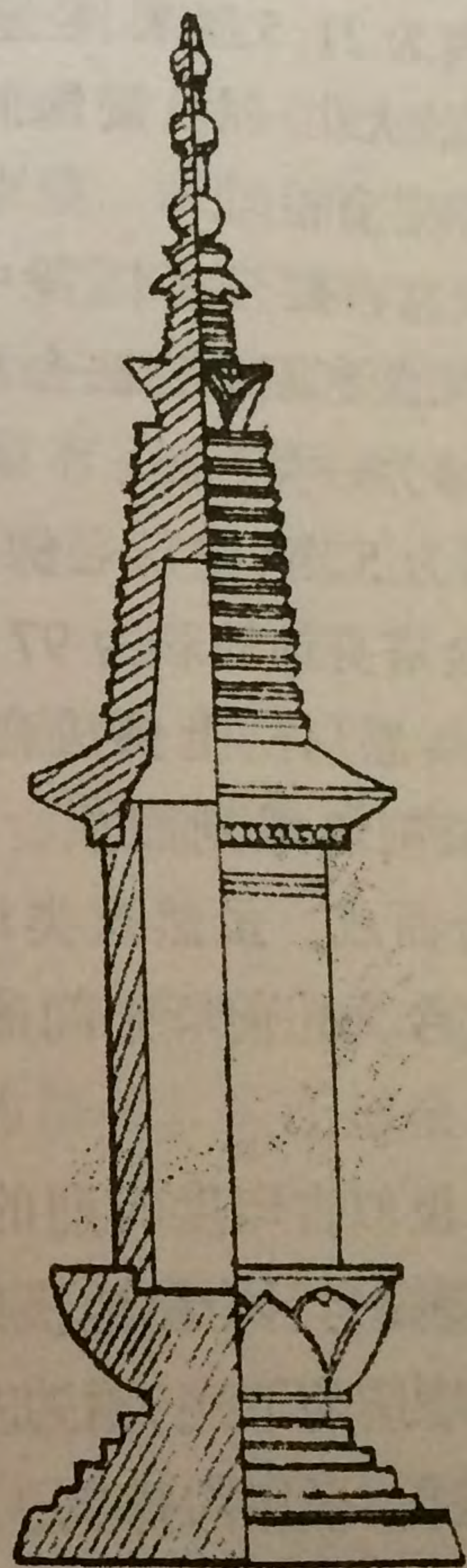
经文卷首有“燕京悯忠寺抄主无碍大师门人苾刍智光集”。卷尾有“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岁次丁未五月十五日记樊遵雕始平庞可昇书”。

东室塔中的经文,名亦为“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卷长为334厘米,卷宽为9.5厘米,经卷亦为对接而成,卷

纸为麻纸,只在卷首有人潢现象。文字为汉字雕版印刷。塔内除经文外,也藏放着少许丁香、安息香等药材。

经文卷首的文字,与西室经文卷首的文字一样,唯卷尾的后记不同:“开泰十年(1021年)春二月,福先寺讲经论比丘志渊,依燕京本雕印散施。”

附:线图



密檐式贴金法舍利塔线图

## 9、七佛法舍利小塔

这里的“七佛法舍利小塔”，是与“七佛贴金彩绘法舍利大塔”区别而言。因为这两个类型的塔身上，均采用浮雕的手法，刻饰有形态完全相同的七佛立像，所以冠名七佛。然而除此之外，塔体的大小有别，造型截然不同，贴金与彩绘也有差异，二者并不能归为一个类型。

就是这种通高为 21.5 厘米、径座为 9 厘米的七佛法舍利小塔，虽然塔体的大小一样，旋饰的工艺相同，但是贴金和饰彩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

辽庆州白塔天宫密藏五室中，除中室没藏置该塔外，其余东西南北四室中，共密藏七佛法舍利小塔为 104 座(件)。这 104 座塔，又可分为一类三种。

七佛贴金饰彩为 5 座(件)；七佛贴金塔身不饰彩为 2 座(件)；七佛未贴金塔身饰淡彩为 97 座(件)。

这一类三种 104 座(件)七佛法舍利小塔，也完全是选用上好的柏木，经旋削与雕刻而成。该塔也是由塔座、塔身、塔顶与塔刹组合而成。虽然这类塔在这里发现的数量较多，但它仍然是迄今为止前所未闻的，是极其珍稀的辽代佛教文物。

塔座的覆钵式，极似古印度时期的浮图，为圆秃的大土冢，只是在覆钵的外表，上下均衡地横向旋削有三道阴线弦纹，似寓意为阶台。塔座的下底，周边高于中心。塔座的顶端，旋削出一圆形、直壁、平底的榫窝。

塔身为圆柱体，筒腹、壁薄。塔身的上下两端，旋削为环形的卯榫。塔身的外壁，浮雕以七佛与祥云。七佛均为

男性，身着袈裟，不戴宝冠，也不见有璎珞。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一双赤脚踏在祥云之上。七佛的顶部，在每尊佛像的头顶之上，均刻饰以弧线型的重叠而外凸的装饰，似为伞盖。

塔顶为单檐，檐下的正中亦旋削有与塔座上完全等同的榫窝。塔檐下檐，呈向上反卷式，塔檐上檐的顶坡，向上朝塔顶的中心斜出一直到刹座。

刹座为一圆形平台，平台的立面正中刻饰一阴纹凹线弦纹，意为须弥座的束腰。刹座上的塔刹，由三宝珠和刹杆组成。自下而上的第一宝珠直径稍大，并与第二宝珠相连在一起；第二宝珠与第三宝珠的直径相同，只是在第二宝珠与第三宝珠之间，预留有一定的间距，此处刹杆显露在外，是为悬挂“塔幡”而设；第三宝珠之上，刹杆尖出为塔刹之顶。

这类小塔的彩饰基调，仍是以红、绿、兰三色。饰彩手法均为平涂。在极个别的脊饰等处，有用墨线勾勒的现象，但为数甚少。

七佛法舍利小塔，在塔刹的第二宝珠和第三宝珠之间，均悬挂有丝织品制的塔幡。关于塔幡一事，后面将以专题叙述。

七佛法舍利小塔的塔身内，均藏置有内容相同的，由金属薄板，即紫铜板卷曲为内轴，其外又卷裹有两种字体大小不同的雕版印刷的《根本陀罗尼》和《法舍利安置记》。这种以三式组成一卷的“柁竿陀罗尼”，在它的外面，又用白色的丝绢做为帙袱，将经咒包裹并加以粘封后，又在其外表用墨

书汉字“舍利”二字。

紫铜板的长宽为 16.3 厘米和 9.5 厘米；其中只有两块上面有贴金痕迹的铜板，宽为 18 厘米。金属板的左边，用汉字竖着篆刻为“相轮槿中陀罗尼咒”的经咒名称；经咒内容，均为梵文，文字为横排，共分五行。“梵文”均篆刻为双勾似中国画中的白描。“汉字”在篆刻时也是从字的外边，开始篆刻，双勾现象，只在“尼咒”二字上可以见到。

包卷在金属板为轴的外面的两件雕版印刷经文，均为单独的麻纸制品，文字为汉字，其中《根本陀罗尼》为汉文音译。

辽庆州白塔的天宫中，藏置有如此精美而数量又极为可观的“法舍利塔”群，这是历来的辽代考古工作中，从未发现的一大奇观，也是有史以来，史志中从未见载的一大奇闻。虽然该塔是属于辽代皇家寺院建筑中的前置之塔，又是辽兴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然而对于规模如此宏大，藏置如此井然有序，这其中必定有其特定的要意。“安置记”中，虽有如下的记述“若有依法书写此咒，九十九本置于塔中或塔四周，有人礼拜及以赞叹或以香花涂香、灯烛供养此塔，彼善男女于现生中灭一切罪，除一切障，满一切愿”等等，但是上述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方家，加以深究为是。

至于什么是“陀罗尼”，它与“陀罗尼咒”是否有区别。其实这一词语，是纯属佛教中的专用名词。“陀罗尼”就是佛教经文中的一种咒语。这是梵语的音译，可用来念诵，为除灾或降灾的语句。它与“陀罗尼咒”完全是一回事。《佛教小辞典》中，对“陀罗尼”做如下的注释：可译作“能持、能

遮；亦作咒。能持者，集种种善法，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也。能遮者，恶不善心生，能止之不令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也”。

附：线图



七佛法舍利小塔线图



## 10、贴金饰彩木雕释迦佛坐像

这件佛像文物，是在密藏五室的南室中发现的。发现时它的位置在南室的正中近前方。在供具之后，在三排法舍利塔之前。琥珀观音像与其直对，但是在最北边，也就是在它的最后端。

这尊坐佛像，是用柏木雕刻好后，又在其上贴金和饰彩而成。

佛像通高为25厘米，又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最下层为须弥座，座高为6.6厘米；其上为佛像落坐的莲台，台高为3厘米；再上为佛坐像，像高为15.4厘米。

坐佛为男性像，头顶未戴宝冠，头上整齐而排列有序的螺发，均饰为蓝色，只在头顶正中略偏前的螺发上，有用红色饰以一点的现象。头部的轮廓与身体的比例略显见大，不过面容很福相。方额广颐，慈眉善目，大耳一双，耳垂微向外坠，鼻梁的高度适中，嘴上留有胡须。尤其是嘴唇之上，是极为罕见的两撇蝌蚪胡。佛像的眉与胡须，均用蓝色勾画。眼珠饰以黑色。嘴唇饰以朱红。

项间与项前，未见有璎珞等装饰。身着开领的袈裟，前胸袒露，腰缠百衲衣。右手在胸前肩下，随小臂向上举起，掌心朝左，施无畏印。左手在怀前，小臂向右平伸，手心向上并置于腹前。右脚赤足，向左盘并压在左腿之上，成为单盘腿。在佛教用语中，称盘腿的坐姿为“结跏趺坐”；又称这种右脚压在左腿之上的单盘腿的坐法，叫做“吉祥坐”。

就上述这尊坐佛的性别、衣着、手势、印契、神形坐姿等等来确认，这是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坐像。

坐佛落坐的莲台，为一重错的仰莲台座。

莲台下面的须弥座，台分两种，彩饰两样。自束腰往下，两层退台的大小差距较大，且无论是两层叠涩的退台还是束腰部段，均为八角形。在其上又分别用红、绿、蓝三色间以白色，采用平涂的手法，加以彩绘。纹式以云纹图案为主，又似有退晕的寓意。自束腰往上，虽然须弥座的顶部，仍是叠涩出两层平台，但这里的平台已不再为八角形而已改变为七角形，且两层间的大小差距很小。同时在这两层平台上，也再未饰彩，而是自此往上，直到坐佛，完全是采用贴饰金箔。

这尊坐佛贴金和饰彩的手法，以及所选用颜料的色泽，与柏木法舍利塔的特征，完全相同，应是同时绘制的作品。但是在发现时，坐佛上又有一些与法舍利塔迥异的现象。

原来为便于饰彩和贴金，而在木像表面作为底层涂饰的白粉，多处出现粘不牢，而导致彩绘和贴金出现开裂和脱落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一百多座(件)的法舍利塔中，极为少见。尤其是佛像的须弥座的底层平台，不仅出现了开口的裂痕，而且在坐佛身后的仰莲台上，还发现有竖插在台座上的两根高低不一的铁钉。这种木质开裂，甚至还有着莫名其妙地竖插着铁钉等现象，这在众多的法舍利塔上，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难道这尊坐佛像，并不是与法舍利塔在同一时期刻制的，或许是在旋刻法舍利塔之前，这尊坐佛就早已刻好；并在一定的法会上，供善男信女们敬仰过，只是建塔时必须而又为了见新，才与法舍利塔一起饰彩贴金后，密藏天宫。

《辽史》在《礼志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每年在纪念悉达太子的生日时,五京六府以及诸州,都要雕木为像,用仪仗做为前导,后面各种文娱活动群体紧紧随从,前护后拥地敬护着木像。顺着州城的道路行进,与民同乐。只是这里记载的木像,名悉达太子,并不是释迦牟尼。看来我们还是要对“悉达太子”和“释迦牟尼”的名称和关系,稍加说一道二。

“悉达太子”和“释迦牟尼”,是一个人,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称谓不同的名称。

“释迦牟尼”一名,是佛教徒们对佛教创始人“悉达太子”的尊称。“释迦”是种族名称,意思是“能”,“牟尼”意思是“仁”,含在一起意思是“能仁”;或者说“释迦牟尼”一词,也可称为“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又是佛的代称,所以有时又简称为“释迦佛”。佛教界中所说的三世佛,其中“现在佛”,就是专指释迦牟尼。

“悉达太子”一名,是他出生时的真实名称。他出生在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他的父亲姓“乔答摩”,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名为“净饭王”。净饭王,共有两个儿子。长子,也就是太子,名叫悉达。次子名叫难陀。

《辽史》中所记载的悉达太子木雕像,其实就是释迦牟尼木雕像。只是为纪念其诞辰而取名。据有关的史料记载,在中国汉传佛教的地区,把纪念释迦佛诞生的节日,称为“浴佛节”。其时所供奉的佛像,均名悉达太子像。每年的四月初八,佛寺都要举行法会。传说“佛出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所以凡是举行“浴佛节”法会时,也都要用香汤

盥洗悉达太子像。

这里记载的这尊释迦牟尼坐像,为什么会出现木质开裂,彩饰脱落等现象,它是否也曾享受过香汤盥洗的礼遇,在建塔入藏时并未完全脱水所致。佛像身后,莲台上竖插的两根铁钉,可否这样认为,这是为了佛像的稳固起见,在循城行进与民同乐时的一处种佐证。

至于这尊佛像在某些部位的比例不够协调,须弥座的上下平台又出现异同等现象,这好理解,刻造佛像,历来被认为是积善积德的善举。古代人对佛形像的理解,只是佛教徒或者是民间雕塑家们,心中的形象,其时他们在造像时,并没有什么“法式”。所以历来在造像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异同现象,就被说成是“佛有千万化身”。换句话说,这是因为佛的法力而为,并不是造像者手拙眼笨所致。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可以用来自圆其说的手法。(附图)



贴金饰彩木雕释迦佛坐像图

### 11、十方佛饰彩法舍利塔

十方佛饰彩法舍利塔的发现,也是在1989年8月。因为自8月10日到8月11日,从施工中发现覆钵中有组合式的宝藏文物,直至精心清理完这密藏五室的文物后,维修大塔的工程仍要有序地进展。当时是在继续卸荷和剖析覆钵下的刹座。因为刹座不剖解,就无法更换早已折断为两截的,辽代重熙十八年(1049年)建塔时,用锻铁打造的通长为14.92米的刹杆,就无法在此次维修工程中安置避雷设施,从而解决古塔寿而康的问题。

覆钵往下刹座的砌筑,基本上是用砖与白灰垒砌成的建筑实体。当然在这一实体内的一些层位中,也用有少量坚实的木板做为木骨,在以刹杆为中心有的是水平地横放,有的是垂直地竖立,起着平衡、支撑以及牵拉等作用,但是主体还是一个以砖砌为实的砖垛。

当刹座从上往下剖解到三分之一时,也就是8月15日到8月16日时,首先在刹杆的南北两侧,发现了紧贴着刹杆的,用砖制造的“建塔碑”和“工匠碑”。这两通碑是采用了直接砌入式的方法加以藏置,并未砌筑任何穴室。

就在与这两通碑的下端平齐的层位之上,在刹杆的四面,也可说是在距离两通碑等距的、在刹座体表距刹杆的近中间部位的,正东南西北,均发现砌筑层中有砌筑方形木板的现象。原来方形木板为盖,木板下面是用砖砌筑的,形体不大且为单体式的竖向穴室。这四个穴室中,均各藏置着一座完全相同的十方佛饰彩法舍利塔。

十方佛法舍利塔,通高为45.4厘米,由塔座、塔身、塔

顶及塔刹分三段式插接成形,也是选用柏木经旋削、雕刻、饰彩而成。

塔座高为 8.4 厘米,为一覆斗式近似圆柱形的大台墩。塔座的上下两端为平面,只有底面向中心微上倾。塔座不仅从下往上渐见收退,底径为 13 厘米,到上顶直径已缩减为 10.6 厘米,而且在塔座的外壁上,又旋刻出四道间距不一、深浅不等的平行的阴线弦纹,使塔座呈现为五层。塔座的外表未加彩饰,保留柏木本色。塔座的上端平面上,仍是旋削出圆形、直壁、平底,直径恰如塔身环形榫的榫窝。

塔身为圆柱体筒形式,外露部分的高度为 18 厘米。塔身除在上下的两端,旋削出小于塔身外径的环形榫头外,在塔身的外壁上,又采取浮雕的手法,雕刻有十尊坐佛。为使这十尊坐佛像,在塔身外壁周长 26.8 厘米的表体上,能密而不乱和疏而不露,又将佛像分做上下两排,各为五尊错落而置。上排佛像的头顶之上,也就是在塔顶的出檐之下,用剔地的方法,刻饰出五处弧形的龕檐还是属伞盖的装饰。下排在一处两坐佛的肩空处,有一与坐佛层面同高的长方形名签,其上有白文“十方佛”三个字。

十尊坐佛,坐姿相一,造型舒展,比例适度,刀法洗练。造像者为回避雕刻手足的难度,坐佛的手足,均采取用衣服遮盖着的手法,概不外露。坐佛为男性,头上的螺发饰以蓝色,头顶正中在偏前的螺发上点以红色。坐佛头后刻饰的圆光、坐佛本身和坐佛下的莲台以及“十方佛”名签,均未经彩饰,保留柏木的原色。

红色为塔身的底色,蓝色平涂为祥瑞的云朵。只有上

排坐佛头上弧形的装饰,涂为金色。

塔顶与塔刹这一段的总高为 19 厘米。塔顶的出檐,下檐的檐面为向上挑卷。在檐下的塔顶平面上,也施削有如同塔座上一样的榫窝。上檐为四十五度向下斜出,下檐未经彩饰,上檐所饰的蓝色,发现时已退变为灰褐色。

塔刹是圆钵形刹座、圆鼓形覆钵、五相轮、三宝珠贯串于正中的刹杆上组合而成。

刹座饰以红色,覆钵用蓝色彩饰。五相轮满涂金后,又用红色在轮与轮之间以及其上下的两侧加以彩饰,贯串在刹杆之上的三宝珠,最下面的宝珠以及此宝珠上下段的刹杆,均满饰以蓝色。自第二宝珠往上,直至刹杆尖出为宝顶,无论是宝珠还是刹杆,一律用涂金来彩饰。

十方佛塔的塔身内,藏置的经卷为卷轴装雕版小字“法华经”一部。藏置前,经卷外用四层帙袱加以包裹。最里面的两层帙袱,用的是白色丝绢,其中一层上有“法华经一部全身法舍利在此经中”的汉字墨书题记。外面的两层帙袱,一层为罗,一层为绫,并且在最外,有用丝带缠绕的残迹。

发现十方佛的四处有单体穴室的刹座层位,刹座内密不透风,湿度较大。发现时,不仅十方佛舍利塔塔体外涂饰的色彩,多有退变的现象,而且小塔的外表木质上,也因霉变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裂缝。

塔身内藏置的经卷与帙袱,受到霉变的程度更加严重。丝带已残朽,帙袱也多有残损,卷轴装的雕版印刷经卷,已不能展读。

什么是十方佛?为什么同为木制的,又是在同一时间

刻制的,又同为法舍利塔,为什么没有在宽绰的覆钵中建置的,组合式的五室内藏置,而是藏置在刹座实体内砌筑的单体穴室中?对于这一问题,在“建塔碑”的碑文中,在这里发现的诸多经咒文书中,尚无从稽考。不过该塔用自身的“名签”,已醒目地标明“十方佛”是有别于五室中的木制法舍利塔。只所以没藏置在一起,而是另建穴室,肯定是与“十方佛”的涵义有关。

佛教界对佛的确指,一般多是指释迦牟尼为佛,当然也还有什么“三世佛”和“十方佛”。三世佛,是指过去的佛、现在的佛和未来的佛。“十方佛”,本来是有一定的界定才能称为十方。所谓的“十方”,一般是指四方、四隅和上下。四方,就是东南西北。四隅,就是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角。但是在佛学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语:“一切觉行圆满者,都可以成佛。佛的数量之多,犹如恒河里的沙子。”这段话语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四周围,包括上下左右到处都会有佛的存在,所以才概括为“十方”。

我以为,将这四座同为木制又为同时制作的法舍利塔,名为十方佛后,另建穴室藏置在刹座的实体内,显见就是为宣扬佛教界的到处有佛的理念。(附图)



十方佛饰彩法舍利塔线图

## 12、联珠龙云纹刺绣鞞帔

这件辽代的刺绣珍品，发现于密藏五室的南室之中，发现时是遮盖在该室所藏的文物之上。保存状况良好，色泽鲜明，地为单层的四经纹罗。

罗地呈长方形，长为80厘米，宽为59厘米，且保存有幅边。在这块罗地的边端上，可见有针眼和线孔的痕迹，看来原先并非是单层使用。

联珠龙云纹刺绣，是在橙红色的罗地上，选用了鲜亮明快的黄白二色做为基调，并辅以浅豆沙等色，通过平针的刺绣手法，来表现绣品的主题和寓意。

绣品的主纹是龙纹，辅纹为云纹且衬以联珠纹。

绣品在左右两侧的垂直边和底边的平直边以及交角处，采用了圆角方形的构图手法，用纯白色规整的单方连续图案的联珠纹，绣饰为围绕绣品三方的边框。

绣品在大面，刺绣有四条造型完全相同，色调完全相一的团龙。龙的布局分东、西、南、北，且为上与下和左与右的对称。每条团龙的外围，仍用纯白色绣饰为单方联珠纹的周郭，只是珠形略小于边框的珠形。

绣品在边框内的两个圆角处，各刺绣有一条行龙，色调与团龙类同。行龙的头，均朝向正中，四足前后奔腾，龙身与龙尾，沿着圆角的弧形，伸展舞动。二行龙完全对称。

绣品为突出主题，在团龙和行龙的上下左右，错落有致地绣饰有五组朵数不一的，且可分为灵芝状和如意状的祥瑞云纹。

在四团龙的中间地带和四团龙的上方正中，用黄白二

色，绣饰出一黄一白两朵为一组、二黄一白三朵为一组的两组灵芝状祥云纹。这两组灵芝状祥云纹下，又绣饰有数条纤细而狭长的平行线，显得天空格外的深邃，祥云分外的沉稳。在四团龙的左右两侧的近上方，也是用黄白二色，各绣饰出一黄一白两朵为一组，如意状的瑞云纹。这两组云纹，在一望无际的天空徐徐上升。

在两条行龙的胸前，各刺绣有一朵，向前向上滚动着的如意状云纹。在行龙的尾下和尾后，又各刺绣有两朵，因行龙的奔腾和不断的拨动，而紧随行龙向前翻滚的如意状云纹。

在两条行龙龙头前方的正中，刺绣着一朵由于受两条龙的冲动，来自不同方向的云朵只好在此聚合并扭结在一起，形成向上直升的如意状云纹。在行龙头顶的上方与龙尾的上方，又各刺绣着两朵，呈朝向上空升腾的如意状云纹。

这一组意在受行龙的冲动，而有序地滚动着的如意状云纹，使拨云弄雾的行龙更加活灵活现。

绣品中的龙纹，除团龙的尾巴绕过一条后腿而伸出，且身躯蟠曲外，所有的造型与构图完全相同。

龙头较扁曲颈仰起，头上长有带丫似的双角。长脸大口，翘起的上唇下，露有整齐的牙齿，长舌向上弹卷且露在口外，颌下有醒目的胡须。龙体较长，由颈部至腹部渐渐变粗，由腹部到尾端微微变细，且满饰鳞纹。颈上的鬣鬃，带状的飞翼，腿上的肘毛，无不是随着龙体的飞舞，而飘忽不定。龙爪为三，爪尖长且似鹰爪内勾。

龙头近前,绣有带着烈焰的宝珠。龙身的上下空隙处,又绣饰有微小的星点与云纹。龙身与龙头上,稀疏地绣饰以黑色。在龙头的额之上,黑色绣饰为“王”字。

这是件作什么用的绣品?什么样人物才可配使用?

首先,从绣品的形状与规模,以及在其上面留有针孔线眼的痕迹来判断,这应是一件鞞帔,或者说是鞞鞞上的垫褥被拆开后的上面。

什么是鞞鞞,鞞鞞就是指马鞍子和垫在马鞍子下面以及马鞍子左右两侧的帔挂物。其实鞞,应该叫做马鞞,它是专指垫在马鞍子下面以及连接在马鞍左右,用以遮盖马身,以便保护马匹的皮肤,进而便于系挂马镫与肚带。

因为骑者的身世不同,为了爱护骑者的衣服,或者为了炫耀骑者的身份,再在鞞鞞上加上垫褥或是帔衬。我认为这件绣品,就是辽代皇族的一件鞞帔。

其次,从绣品上龙纹之数为六,以及龙额上刺绣着“王”字来推断,这应是代表皇帝的位次之数。也可以说,这是确指这件绣品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世时,御用的鞞帔之一。

这件绣品,是辽代文物中的顶级之品,是史志中未载,以往的考古工作中从未见诸报导,是迄今为止唯一收藏进博物馆的珍稀文物之孤品。

附图:联珠龙云纹刺绣图



联珠龙云纹刺绣鞞帔线图

### 13、联珠纹梅竹荷莲刺绣韞帔

这件辽代的刺绣珍品,发现于密藏五室的南室之中,发现时是铺衬在该室所藏文物之下。保存尚好,色块鲜明亮丽。绣品为双层,正面刺绣地为四经纹罗,背面用绢缝合成夹层。

绣品呈长方形,长为67厘米,宽为53.5厘米,皆为缝合后的尺寸。上下两面的幅边完好,绣品上微存有因放置柏木法舍利塔而遗留下的油污印痕。

联珠纹梅竹荷莲刺绣,是在大红色的罗地上,刺绣以带叶的梅花和摇曳的修竹以及绽开的荷莲,且均根植于湖石与大地之中为主图,又辅以远山小树,飘逸的云朵和遨游的蜂蝶。整幅绣品,远近有别,密而又繁,疏而不漏;尤其是绣品中所用蓝与深蓝的色块来装饰湖石、山花、小树、远山以及云朵。这不仅仅是匠心独具使绣品格外的亮丽,更显见这件绣品是在为夏季而放歌。

绣品左右两侧的垂直边和底端的平行边以及两个交角,均在距离边端约1厘米处,用白色绣饰为规整的联珠纹边框,只是珠形较“龙云纹绣品”略显稀疏,形也见大。

绣品正中的中下部,刺绣一山石叠嶂、玲珑奇秀、蓝白相间、凸立地面的带状湖石山。山石上缀饰着深蓝色的朵朵山花,山石后还衬以两组、四棵墨绿色的小树。高大的梅花与修竹根植于山中,这两树的枝干前后映衬,且弯曲摇曳。修竹叶片的反正,用黄绿二色来表现。朵朵绽开的梅花,陪以含苞待放串串互生的花蕾,绣满树枝。梅树的枝头,均已长出了硕大的绿叶。

湖石山的左侧,绣有一株分二茎的荷莲。粉色的荷花,浅蓝色的三叶,黄绿相参舒展而显见叶脉的荷叶,荷莲生长在绿色的深草丛中。

在梅竹湖石与荷莲偏上的两侧,也可以说是稍远的地方,各绣饰三棵一组和两棵一组,大小不一的梅树。树枝上不仅有花朵和花蕾,枝头上也已长出了树叶,花树均生长在草地里。

在上述梅竹湖石和荷莲下方,又稀疏地刺绣有四簇绿色的草丛,寓意无垠的草地。

在绣品的上部,也可以说是在梅竹荷莲、草地湖石的主图之上,在左右上三角形的三个部位,刺绣有三组为双峰并排的,蓝白相参的很远的小山,小山的峰顶上又各绣有一颗墨绿色的小树。在所绣小山的空隙,分左右下倒三角形的三个部位,刺绣有三组,每组又为三个云头为一朵与两朵错位排列,且为蓝白有别的灵芝状的祥瑞云朵。

在远山和灵芝状云图的空隙处,也为三角形的构图,刺绣有三组每组为两朵,色块为蓝白或绿白色的,相互连动的如意状云朵。

此外,绣品在繁花似锦的草野上空,在寂寂的远山之巅和悠悠而空旷的云朵之间,又刺绣有三黄、三蓝、三紫共九只飘飘游游的蜂蝶。

这件绣品,是辽代圣宗朝帝后们的韞帔之一。其所绣内容,是反映“四时捺钵”中夏捺钵的景色。

附:线图(联珠纹梅竹荷莲刺绣图)





联珠纹梅竹荷莲刺绣鞞帔线图

#### 14、联珠纹梅花蜂蝶刺绣鞞帔

这件辽代的丝织刺绣品，发现于密藏五室的东室之中。发现时是铺衬在该室所藏的文物之下，保存情况尚好。绣品为两层，正面的丝织物仍为四经绞罗，背面的丝织物为绢，缝合为夹层。

绣品亦为长方形，长为 65.6 厘米，宽为 49.2 厘米，两面的幅边尚在。绣品在正面上，显见有多处圆形而已退色的油污印痕，此为柏木法舍利塔塔座之压印。正面的罗地为蓝色，背面的绢里为草绿色。

联珠纹梅花蜂蝶刺绣，在绣品的正中偏下部，刺绣着一株树，树冠的宽度占整幅绣品幅宽的五分之三。整株树高，占绣品长度的十分之六的梅杏大树。繁茂的树枝上，满布成串而大小有别的花蕾，其中只有十四朵花初放已绽开，而尚有一朵正要开，又尚未全开。花形五瓣，花色为粉色，用浅红色来装点花蕊。树干的饰色为下白上红，整株树的主干做微弯曲的摆动状，旁枝与侧枝也见有动感，全树未见有叶芽。

绣品在梅杏大树树根的左右两侧，在近根处，各绣有一丛，在草地之上，生长着仅有两朵红色花朵的野花与小草。在稍远处，即靠近绣品边框的圆角处，又各绣饰一组，生长在一起，由两支形状相近，一为挂满呈串状的粉色花蕾，一为长满呈瓣状的绿色叶片，二者之间宽松有度地盘绕在一起，形成一鲜丽而修长的花草对称图纹。

绣品在梅杏树冠的两侧，又均衡对称地刺绣有两组共四朵云图。中部近边框线的两侧，为一组白色的灵芝状云

朵。上部在树尖与边框的中间，为黄色的如意头云朵。

绣品在围绕着树冠，刺绣着十六只色块为粉白或是黄白相间，一律飞向花朵的蜂蝶。对对双双、翩翩起舞，是花戏蝶还是蝶恋花，已浑然成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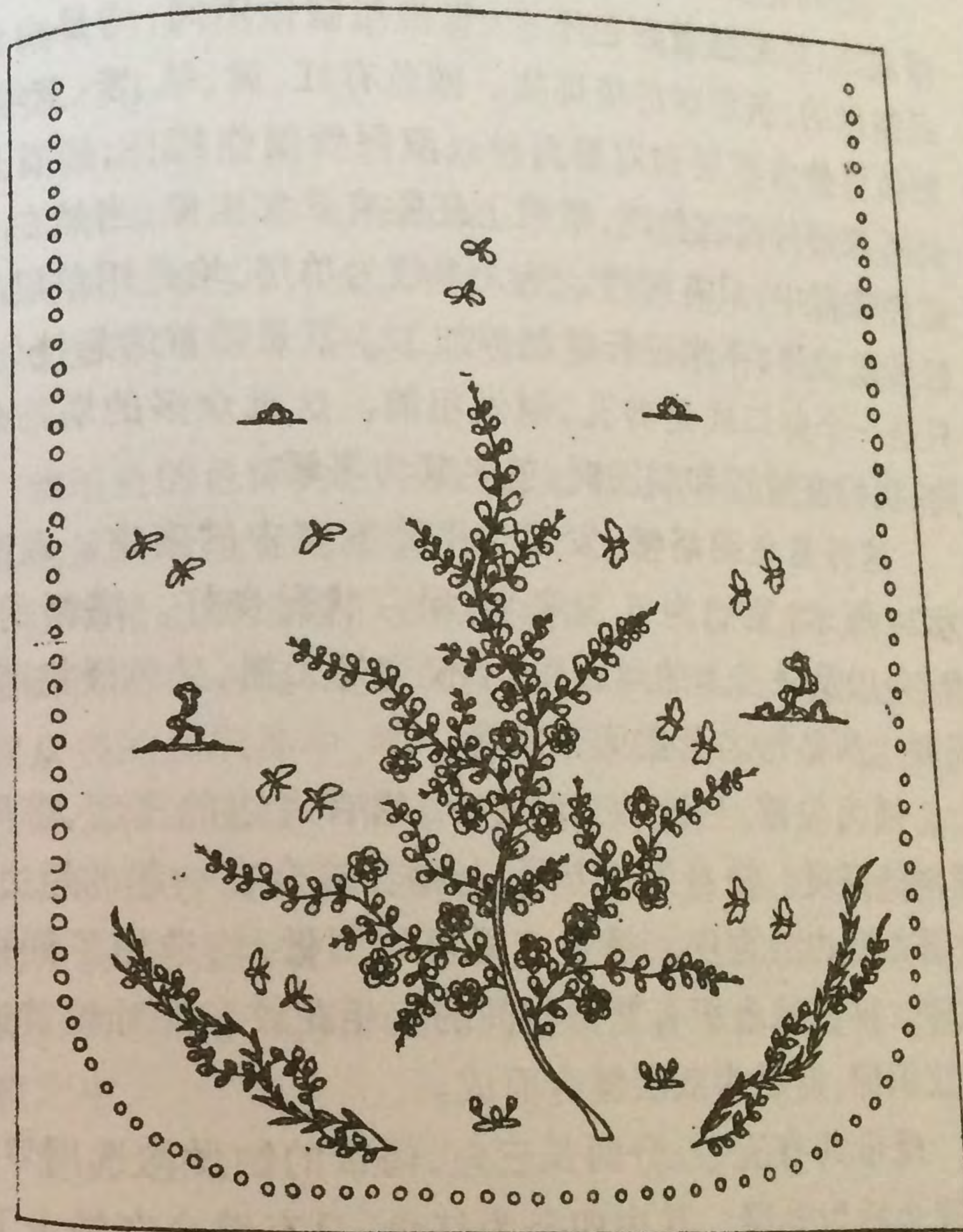
绣品左右两侧的直边和底端的平行边以及两个交角处，仍是在距边端约1厘米处，用白色绣饰为规整的联珠纹边框。

这件绣品的纹图，是一幅写实性的春意盎然的景色。

这件绣品，是辽代圣宗朝，帝后们用做鞞帔之用。是一件张扬身世的佳作珍品。

这里有两个词语，应加以赘谈几句。“罗”是丝织品中一种半透明，斜织的质地较稀疏的丝织物，可以用以印染和进行装饰加工。关于“联珠纹”的名称，这是一种纹样的称谓。因为一般是在图案的周边，所饰一圈圆点或是圆圈，如同联珠所以名之。其实这一纹样，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后来在青铜器上也有表现，它是中国发展久远的一种纹样。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域的波斯等国，也同时盛行这一纹样，因而到盛唐以后，这一纹样就更加发展。辽承袭唐制，同时辽代时草原丝绸之路仍然通行，所以辽代的绣品中，多有联珠纹并不为奇。

附：梅花蜂蝶图



联珠纹梅花蜂蝶刺绣鞞帔线图

### 15、悬鱼锦塔幡

在相轮堂密藏五室中发现文物时,在每座法舍利塔的塔刹上,均悬挂着颜色不一、规格与制做不同,均是由丝织品制做的,条形状的塔饰物。颜色有红、黄、绿、紫、蓝等等,制做可分为单层和双层两种。双层者制作精良,幡首悬挂处不仅另外设有丝绳,幡带上还坠有珠宝玉佩;当然在一百多件塔幡中,只有两件。绝大多数为单层,均是用单层的罗经剪裁成形,再来进行缝制等加工。就是幡首的悬挂处,也只是一个剪口或是剪孔,制做粗简。这批众多的塔饰丝织物,我们在清理和制图时,就名其为塔幡。

这件悬鱼锦塔幡,发现于密藏五室中的南室。通高约为24厘米,宽约为6.3厘米,保存状况良好。塔幡的首、身、带以及幡首上的丝线绳,不仅完好无损,且色泽艳丽,只是幡上所坠饰之悬鱼见有残损。

幡为尖首,呈钝角三角形状,幡首底边的宽度,等同于塔幡的宽度。幡身为长方形,与幡首缝合在一起的短边,不及幡首底边的宽度。幡首与幡身的制做,均选用了同样的织锦。即红地上织有蓝白相间的宝相花纹和绿叶镶黄边的辅纹织锦,前后为双层缝合而成。

幡带共有五条,分两长三短,幡带的制做均选用罗,折叠缝合后为夹层。其中四条为红色,只有缝合在幡身下边正中的一条为紫色。幡带的顶端为齐头,幡带的尾端为倒三角形式的尖端。两条长带缝缀在幡首的两侧,长带的外侧垂直边,与幡首底边的宽度相一。三条短带,缝缀在幡身的下端。如从正面看,塔幡两边的长带和正中的一条短带,

有重叠在幡身和幡带上的现象。如从背面看,幡身和幡下端两边短带,有重叠在两条长带和正中一短带上的现象。

幡首的顶尖处,有用红色丝线捻合而成的细丝线绳,用以系挂之用。

塔幡之上,应坠有琥珀悬鱼九条。其中坠于幡首的下端,即两角加正中应坠有四条。发现时已有两条残损过甚,尚有两条鱼尾也已不全。在幡带的尾端,应共坠有五条,发现时也有两条大大残损,其余三条中,有两条的鱼尾亦已不存。

琥珀鱼的色泽为红中透紫,鱼嘴处有一通透的小圆孔,用红色丝线缝坠在塔幡上。

该塔幡上所选用的宝相花纹锦,虽然没有多大的一块,前后两面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10平方厘米。然而这是在发现众多的丝织品中,唯一的一个品种中的唯一一块。

那么什么是锦?锦是丝绸中最为鲜艳华美的产品之一。花纹精致,色彩绚丽,质地紧密厚重,表面平整光泽。人们常说“锦上添花”,一般是用来赞美好上加好,或者是美中更美的事物。其实这个词,就是派生于锦的出现和生产过程之中。

附:1、图版

2、线图

往下缝制一垂直向下的幡带。此幡带在尖首的顶端,对折并在正背两面缝合在幡首之上时,其对折点留有一细微的带套。套中贯穿着用紫色丝线捻合成的一段丝线绳,用以系挂塔刹。这一在幡首中垂直向下的幡带缝合到幡首的底边为止。再往下该幡带一直沿伸到约占幡身的五分之二处,这一段幡带未再与塔幡缝合,可以摆动。

幡身为长方形,幡身的顶端与幡首的底边的连结处,外用横向的带饰加以缝合。幡身在中段,仍用带饰横着缝合固定。幡身的下段。即自中段横带饰往下,幡身为两条竖向带状,两条之间留有窄隙。幡身的末端,仍采用横向带饰连结固定;但此带饰为一梯形状。

幡身上缝合着幡带共为五条,也是两长三短。长幡带,缝合在幡首底边的两个外侧。短幡带,其中两条缝合在塔幡正面,也是在幡首的底边,可见有叠压幡身和长幡带的现象。另一条,则缝缀在幡身中间带饰的下边,也是在塔幡的正面。

该塔幡之上,共坠有水晶珠为九颗。水晶洁白、透明、无瑕。珠体小巧玲珑,近圆锥形,顶端细而不尖,且有小穿孔,珠体表面呈六面体,上小下大,末端六边形向外微凸。佩珠,均是用紫色丝线缝缀在幡带的下端。

这里有个问题,有必要加以讨论和分析。如塔幡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的又制做的那么精美?

首先,从“幡”字来说起,幡是一种旗子,是特指垂直悬挂着的窄长条形的旗子。比如在汉族聚居的地区,人死了以后,一般在灵前或者是墓旁,能看到一种用白纸剪成窄长

条形垂直悬挂着的纸旗,人们称之为“引魂幡”,或是“招魂幡”。还有,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农民要用五色纸剪成长条形的纸旗,到自己家的田间地头,把五色纸旗垂直悬挂在长势最好的庄稼上。一为驱赶鸟类,二有告慰神灵之意。人们称它为“田幡”等等。

其次从“塔幡”一词来分析,它是垂直悬挂在塔刹上的长条形旗子,它还是崇信宗教的产物之一。

佛教把幡、盖、幢一起,用来供奉和装饰佛和菩萨像。其用意是,表示佛统率众生,制伏魔众之意。比如宗教石刻之一的经幢,它的总体作柱状,是用数块石刻叠建而成。柱顶之上有盘盖,且大于柱径,并刻饰有垂幡和幡带的图纹。柱身上,刻有经文咒语或是佛像。同时幡又是佛教的一种用具,它可以有青黄赤白等多种颜色的不同,但要用丝品来制做。如“荐亡幡”也可称为“命过幡”,就是僧人死后,制作丝织品幡,挂到寺塔(表刹)之上,意在为死者修福。换句话说,是为死者在冥间能幸福。

再次,从“悬鱼”和“坠珠”二塔幡来讨论,如果说这两条塔幡与众多的单层塔幡,同样是具有“制伏魔众”和“为死者修福”的意义,那为什么又要制做的那样超凡脱俗?又为什么只有这两件?而且又均为孤品?

中国古代的朝廷,也就是君主为首的中央统治机构,他们穿戴的衣服非常讲究,所用的颜色中,定为以朱紫为贵。到后来,皇帝在赏赐有功德的僧人衣服时,也一定要用紫色的袈裟,所以又称为“赐紫”或者是“赐紫沙门”,以此来炫耀权贵。这两件塔幡的颜色正是一朱一紫,这在众多的塔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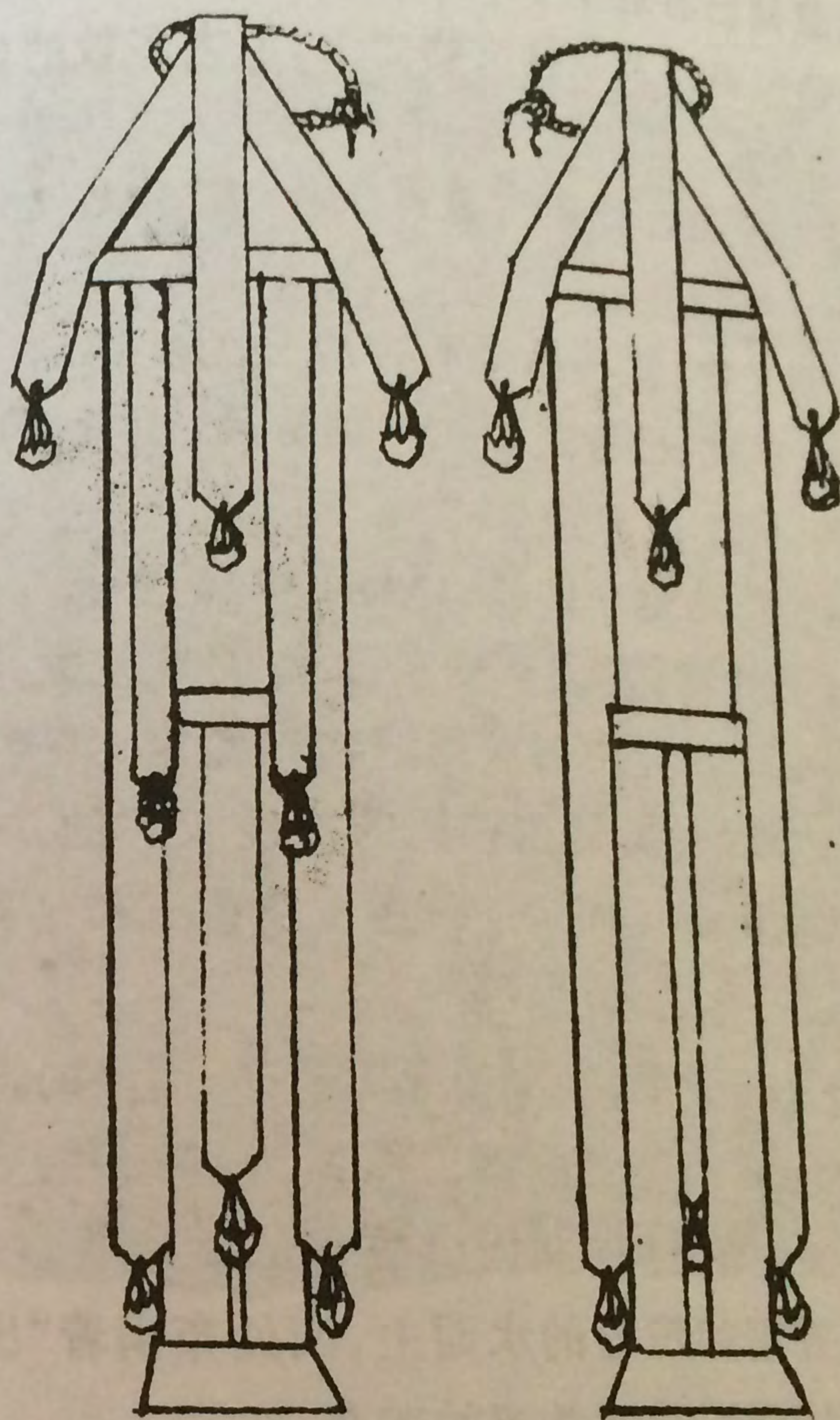
中,不只是非常耀眼,而且也是显示特殊的荣贵。

辽代的社会礼仪活动很多,其中尤以祭木叶山为大礼。《辽史》在《礼志》中记载祭祀木叶山时,除辽代君臣们的言行举止而外,对帝后们的鞍马服饰也有记载。比如在皇帝服饰中有“绛带、悬鱼”;皇后则有“红袍、悬玉佩”。这两件塔幡,一为悬鱼,一为佩珠,佩珠可以说是玉佩。这一现象是与众多的单层塔幡迥然有别之处,同时也是只有它们自身才可独有的一种标识。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早已把南和北,天和地甚至皇帝和皇后的取位,形成了一种理念。比如南代表天,北代表地,所以就又说成天南地北。皇帝代表天,皇后代表地,所以又说是天皇地后。这两件塔幡,是密藏在一南一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一种具体反映,绝不是什么人可以向壁虚构的随意所为。

这两件塔幡,是辽代兴宗朝帝后们,托物寄情的一种象征。

附:线图



佩珠罗塔幡线图

## 17、夹纈莲花罗

辽庆州白塔天宫密藏五室中,发现的百余件(块)丝绸文物,虽然藏储已有近千年的岁月,又多是用做衬垫和遮盖文物,或者是包裹以及系挂文物之上,但大多数的保存状况尚好。色泽鲜明,工艺精湛,其中还不乏辽代丝绸文物的极品。这是以往在辽代的文物考古工作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重要的发现。

这批丝绸文物,就其品类而言应分为丝织品、染纈品、刺绣品三类。前此,已考述了数件刺绣品,现考述几件(块)染纈品及丝织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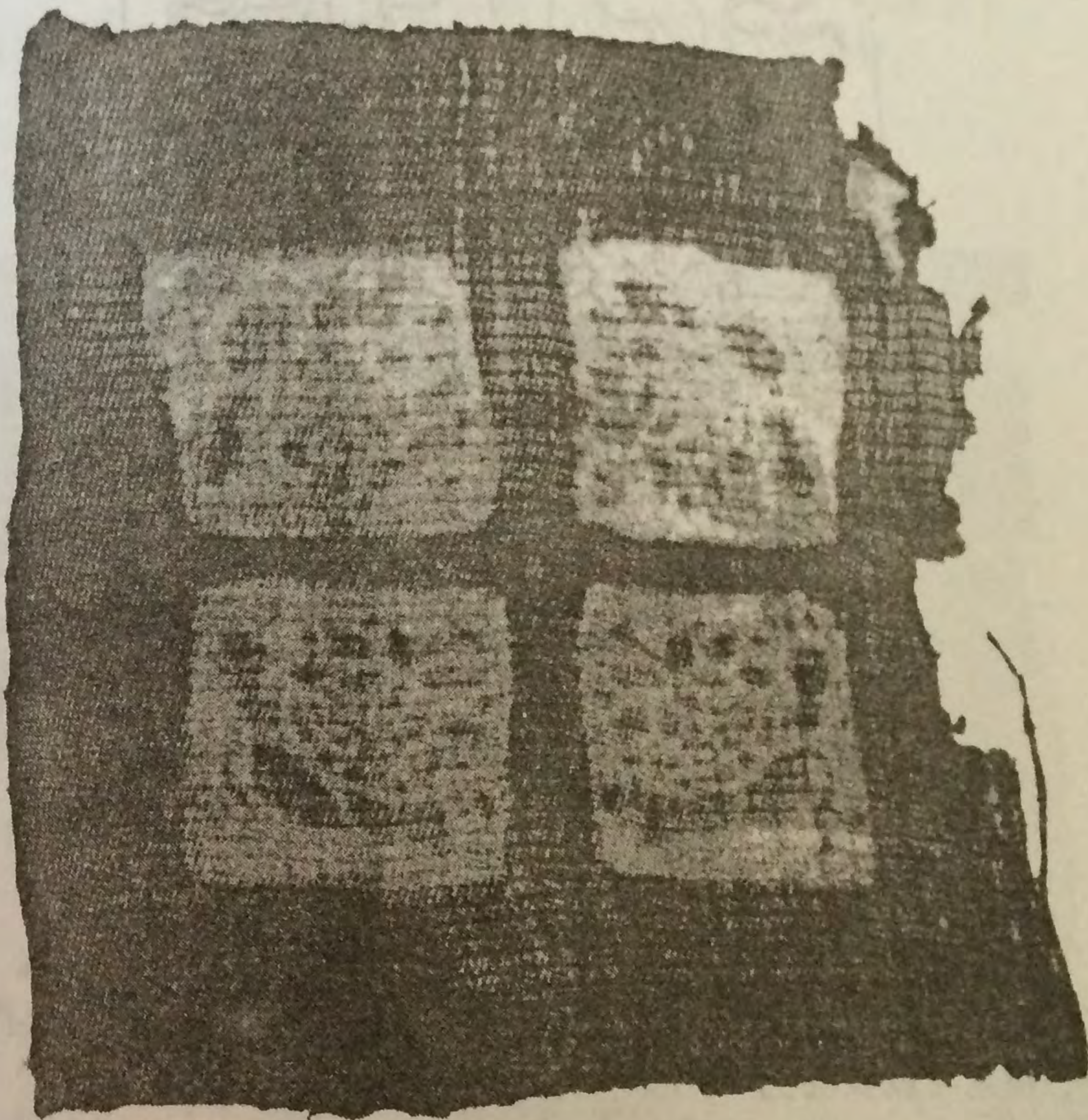
夹纈莲花罗,这是一件(块)幅度为46厘米,裁长为44厘米,近乎方形的罗,发现于密藏五室的东室之中。1992年4月6日—21日,经中国丝绸博物馆鉴定,其为“四经绞三梭横罗”。也就是说,是在普通的四经绞罗的基础上,又插织三梭平纹而形成无固定的绞组罗。因三梭平纹形成较密的横路,所以又称之为横罗。

这件(块)罗的中部,印染有似汉字“田”字的形式而构图排列的四方连续的花纹图案。图案为盛开的莲花,且莲蓬在花中亦可见。在整件罗为沉香灰的底色上,图案为白地红花。恰似方塘如镜般的水面上,四处布满着“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的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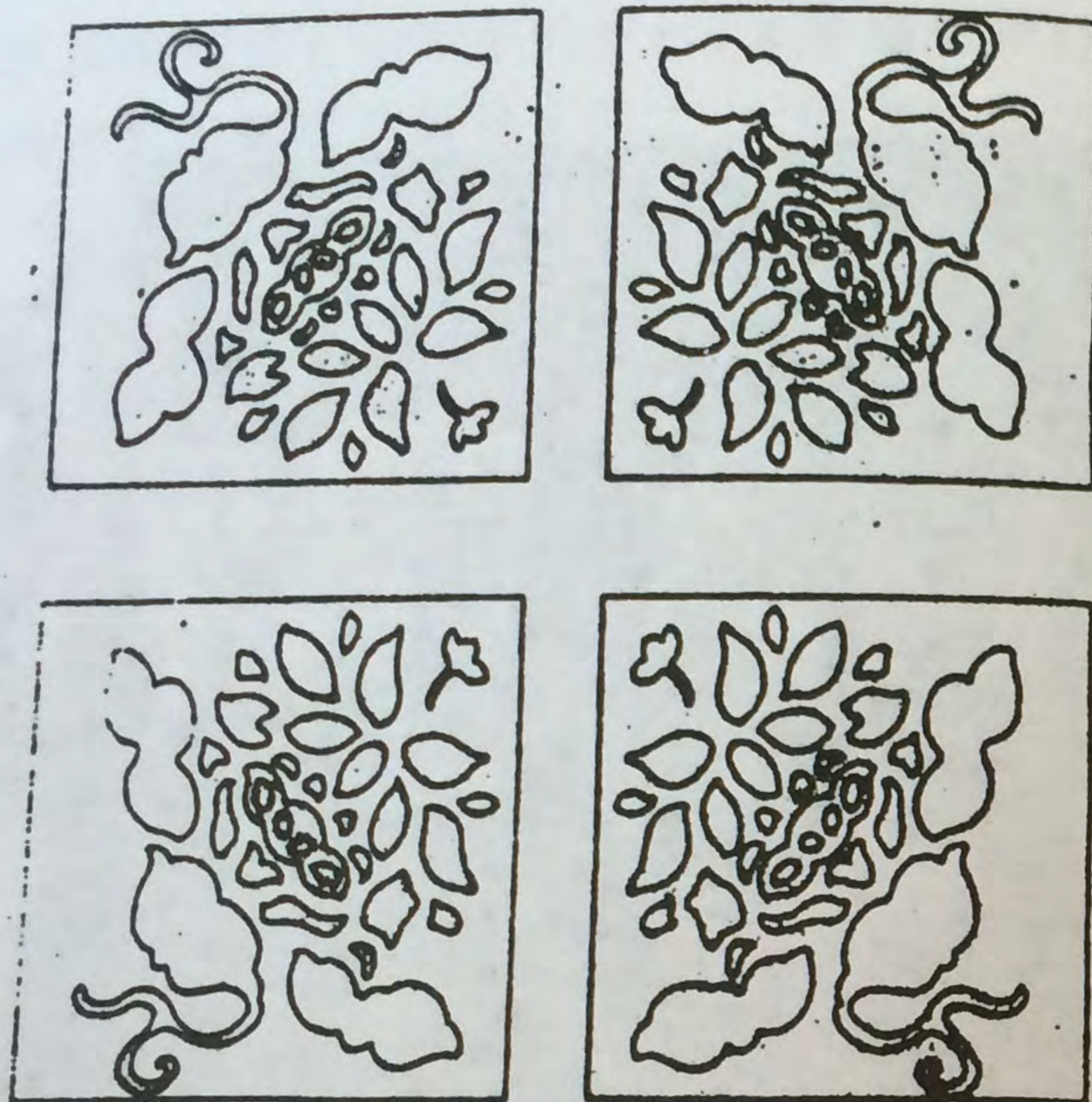
莲花图案,经夹纈印染而成,所以无论是四方或是四隅,图案皆为均衡对称。丝绸文物,保存不够完整。

附:1、夹纈莲花罗 图版

2、夹纈莲花罗 线图



夹纈莲花罗图版



夹缬莲花罗线图

18、夹缬春兰罗

夹缬春兰罗，发现于密藏五室中的西室。它是一件(块)幅宽与裁长均为45厘米方形的四经纹三梭横罗。

罗的底色为枣紫色。在方形罗的中部，采用对角排列的手法，印染有四方连续的花纹图案。图案为白地红花，花应为春兰。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萱草”，又名“忘忧草”或者是“宜男花”；还有人认为是“车前草”，其寓意为多子多福。

春兰的构图，五片显见叶脉而较大的花叶，仰覆在下。连理的花茎中部之上，各生长着一小片花叶在呼应着向上

生起。绽开而丰满的花朵，沉甸甸地坠弯了花梢之茎。这是以花寄情，馥郁芬芳的写实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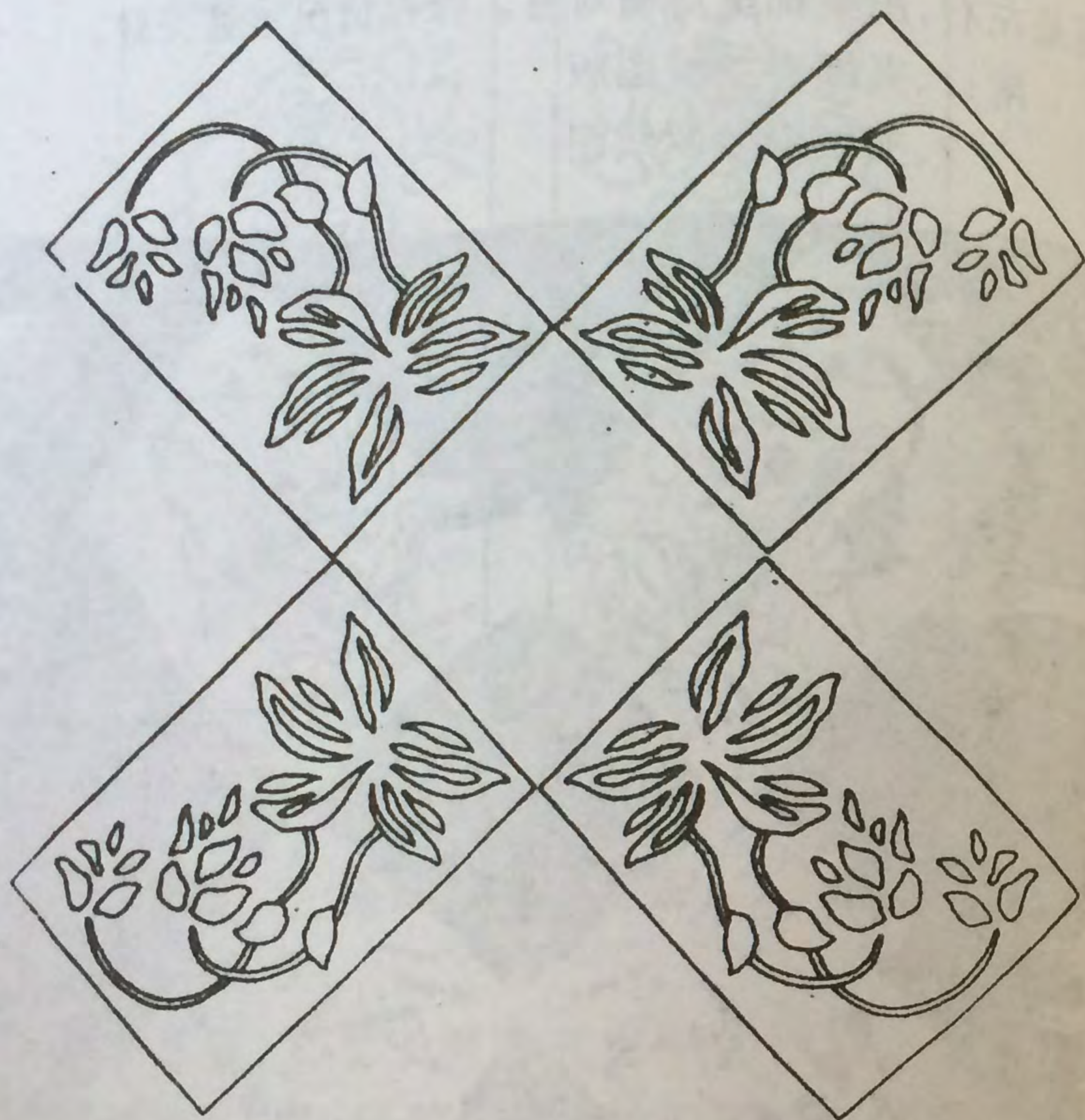
该春兰图案，也是经过夹缬印染而成，所以无论是上下还是左右，图案都呈均衡对称。保存情况不甚完好。

附：1、夹缬春兰罗图版

2、夹缬春兰罗线图



夹缬春兰罗图版



夹缬春兰罗线图

### 19、夹缬云雁绢

夹缬云雁绢，是一件(块)在平纹绢的质地上，经过夹缬印染工艺而成的染缬品。绢为单色即棕色，幅宽为44.3厘米，裁长为44厘米，发现于密藏五室的东室。

这里还是先说说什么是绢。绢是丝织品中，平织而质地薄且坚韧的一个种属；有时也指用生丝织造的丝织品。它不但可以用来印染，而且还可用来做画，以及用做其他的装饰加工等等。

这件(块)夹缬云雁绢，其构图的主题为云朵和行雁，且呈左右对称的二连方。在44朵灵芝状布满云天的祥瑞云朵中，有12只矫健而排列成伍的行雁，在云霄里飞行。此云雁图，应为崇佛的产物。

该夹缬云雁绢，保存状况尚好，只在夹板处见有破损现象。

那么，什么是染缬，夹缬与染缬有什么不同？染缬一词，就是用染色的手法，使染织品形成花纹的一种工艺的总称。中国的染织工艺历史悠久，然而它的出现与形成，要比画花、绣花以及提花等都晚。史志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已开始有了染缬工艺，当时这种工艺为“绞缬”。夹缬工艺开始流行于盛唐时期。

绞缬工艺也有发展过程，开始是先把谷粒均匀地包放在染织物上，然后用线分别将谷粒加以扎紧。经染色晾干后，把线开解，就形成菱形圈大小相等的花纹。到后来是先把染织物折叠成连皱，再用针线穿过并把线穿紧缝牢，经染色晾干后，拆去缝线，就形成花瓣形组成的散点花纹。这种



绞缬,往往会留下针线之眼。

夹缬工艺,则是用两块雕镂相同的图案花板,入染前先将染织品夹在其中,并涂以防染剂,然后才入染。这样就成为色地白花的印染品,如“云雁绢”。如果先在花板上涂以所要的染色,再将染织品夹在其中入染,即可成为多色的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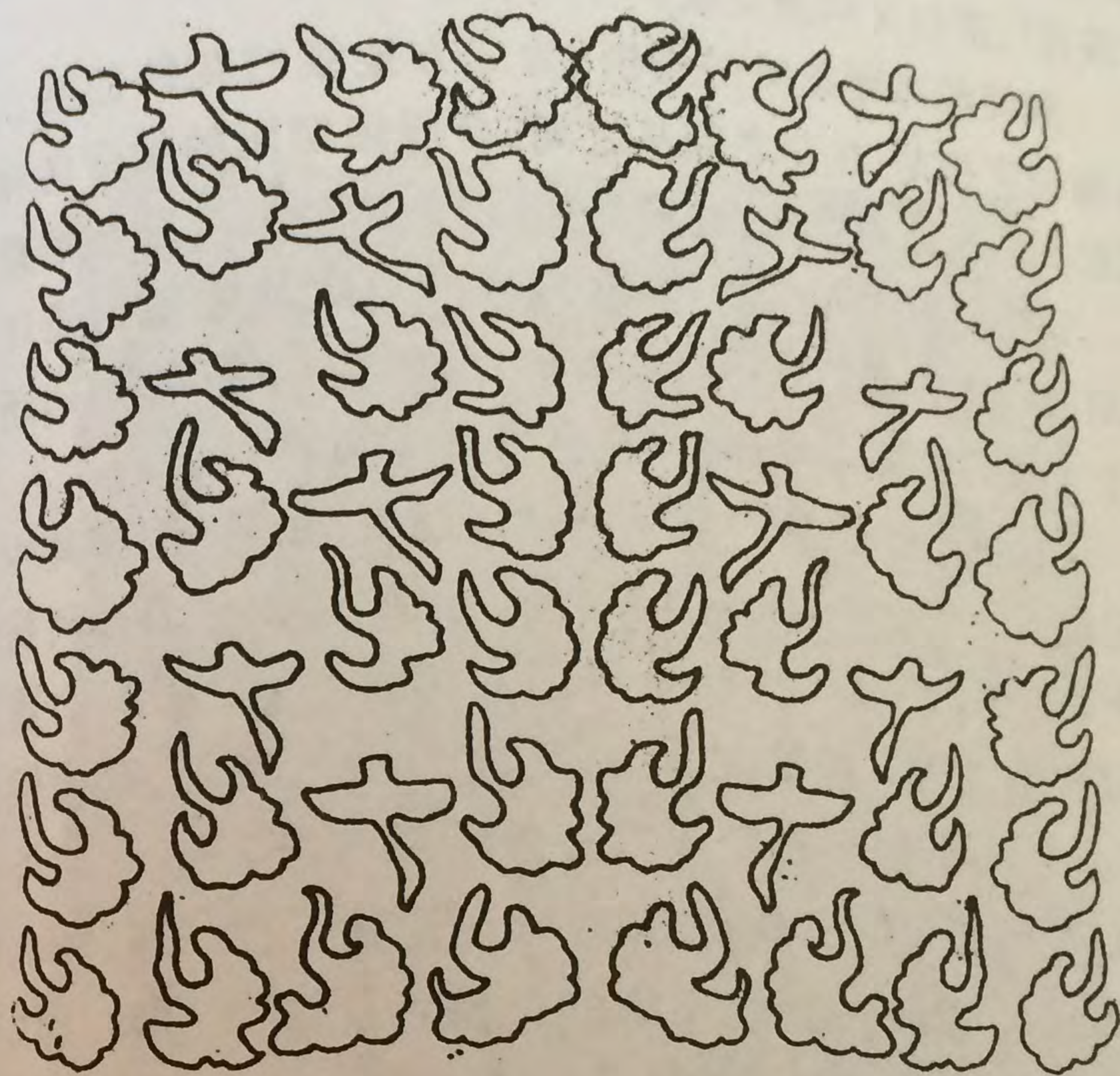
染缬工艺中包括有夹缬,而夹缬只是染缬工艺中的一种染印方法。

附:夹缬云雁图版

夹缬云雁绢线图



夹缬云雁图版



夹缬云雁绢线图

### 20、蜂蝶绶鸟翱花绫

这是一件(块)红色的蜂蝶绶鸟翱花绫丝织品,长为29厘米,宽为28厘米,尚有一侧的幅边存在。除这件(块)红色的提花绫发现于东室外,在其他各室还发现有颜色为蓝、黄、棕等色,提花为小花和折枝梅花绫的丝织品。

这里还是先说说什么是绫。绫是一种有花纹的丝织品。是斜纹织造单色之品,其面上的本色花纹,是因为经纬

线组织的不同,而形成的效果。这种花纹,一般又称之为“提花”,所以又叫提花绫。

蜂蝶绶鸟翱花绫的构图,为二方连续的花纹图案。花为缠枝宝相花,在花之颠丛之间,有展翅摆尾的绶带鸟和翩跹起舞的粉蝶与蜜蜂,翱翔其间,使人格外的神往与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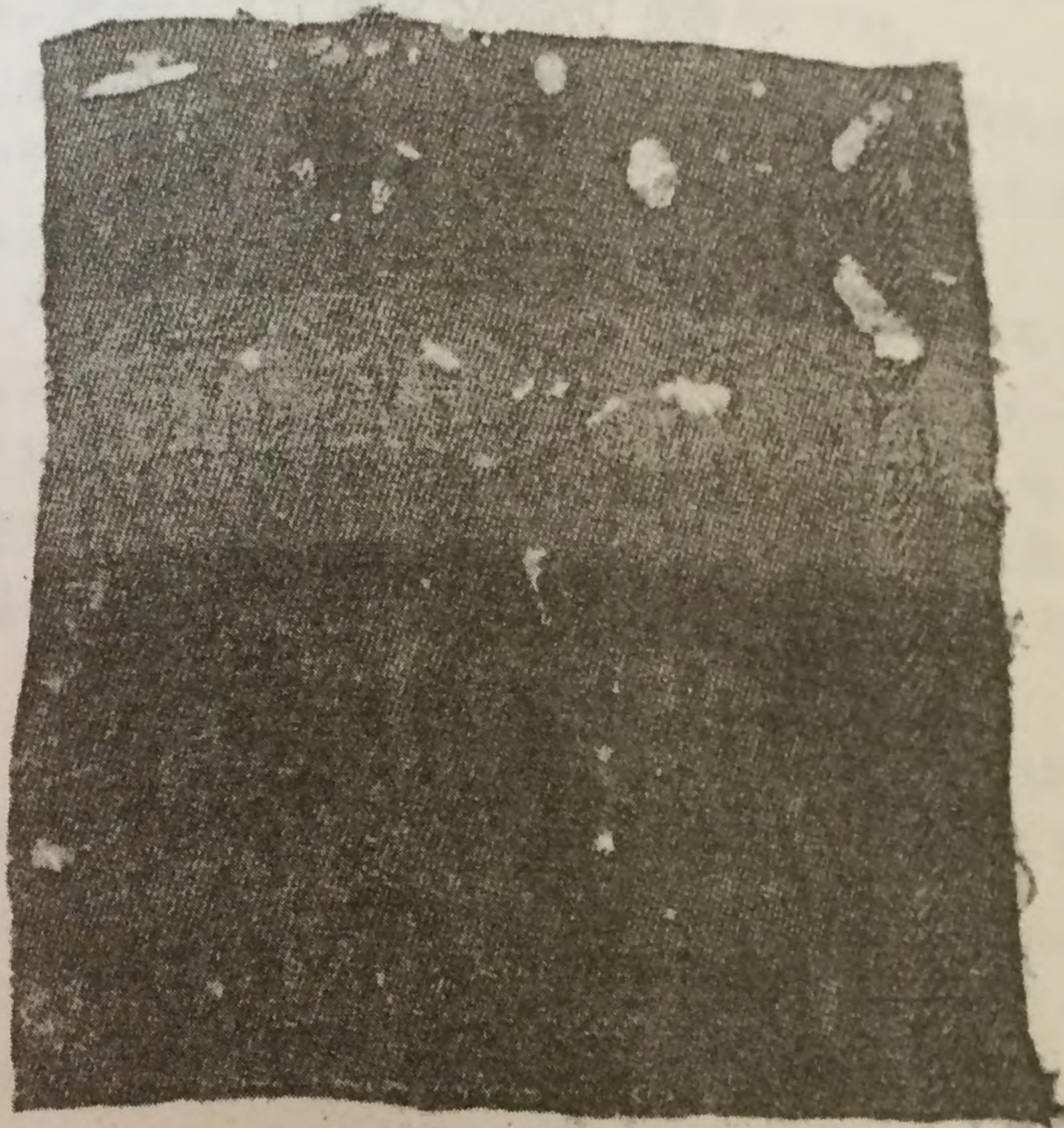
这里发现的众多的丝绸文物,应肯定地说他们是辽宋时期的产物。至于其中哪些应为辽产,哪些又是宋造,还有待于方家们来加以考证,好在已发现了可观物证。

辽代生产丝织品的情况,虽然《辽史》粗简,但是其中还是记载了一些生产丝织品的端倪。比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仲父述澜为于越时,就号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建国后,辽上京城内有绫锦院,上京所辖的祖州城内,有绫锦诸工作。圣宗朝时,还将显州岁贡的绫锦分赐左右。此外在《全辽文》一书中的王泽墓志铭里,还记载了他的祖父让、他的父亲英,都曾先后为辽南京的染院使。由此可知辽代不但生产丝织品,而且还设置有相关的机构。

再者辽代社会上的丝织品中,还有一部分是宋辽“澶渊之盟”和好后,宋向辽输送的丝织品。如北宋景德元年即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时,北宋向辽每岁要输送绢为二十万匹。到后来北宋庆历二年即辽重熙十一年(1042年)时,每岁又增输绢一十万匹。由此可知在这批丝绸文物中,肯定会有宋造的产品。

附:1、蜂蝶绶鸟翱花绫图版

2、蜂蝶绶鸟翱花绫线图



蜂蝶绶鸟翱花绫图版



蜂蝶绶鸟翱花绫线图

### 21、龟首鹤尾海棠花口水晶盏

这件文物，发现于密藏五室的南室之中，与其他做为贡器或为礼器的银碗瓷碟等，一同摆放在该室的南侧近正中。该龟首鹤尾海棠花口水晶盏，发现时是摆放在紧靠贴金饰彩木雕释迦佛座像的西侧，盏内置放乳香，保存状况良好。

水晶盏，通高为 2.2 厘米。盏口为平圆唇。盏腹为敞口敛底斜深腹。盏壁厚为 0.15—0.2 厘米，且为 35 度向外

向上微漫圆斜出。整个盏口的形状，近椭圆形为四瓣海棠花口。盏口长为 5 厘米，宽为 3.7 厘米。腹下饰有随盏体成形的椭圆形的小圈足。圈足的长为 1.9 厘米，宽为 1.4 厘米。圈足外为直边圆唇，内为一卵圆形的凹坑。

水晶盏在海棠花口上，两个长边对称的花瓣下，即口面窄小的口沿处，一侧雕饰有一龟首为耳，一侧雕饰有一鹤尾为耳。

龟首雕饰在水晶盏的腹部，即在口沿稍下至圈足略上之处。采用圆雕的手法，自盏腹的下部沿着盏壁的形体，以圆柱状向上朝外雕琢，为一昂首伸颈活脱脱的龟首。龟首在脖颈处低于盏沿，额顶的高度与盏口平齐。龟首上的喙和眼等的雕琢，均采用阴刻而隆起的技法，喙显见短小而圆凸。

鹤尾雕饰在水晶盏上刻饰有龟首的对应侧，在口沿稍下之处。也是采用圆雕的手法，在盏腹的上部，以一扁平的柄状体雕琢为一禽尾，由于在我中华文化的理念中，用自然物象来寓意或者是表达愿望等时，常常是把龟鹤连在一起组成词语，如用以祝寿时有：龟鹤同春、龟龄鹤寿、龟鹤遐寿等等。所以我在为该水晶盏定名时，也就将这一禽尾定名为鹤尾。

鹤尾略低于盏口，而水平与盏口保持一致。鹤尾在盏壁处较窄，外端显见宽展，且端边的弧度与海棠花口沿的弧度为平行，鹤尾的边角处，均做漫圆处理。

龟首鹤尾海棠花口盏，是用无色透明的水晶雕琢而成，无瑕无疵，冰清玉洁，晶莹滋润。它不仅仅是用如玉般的水

晶制成,而身价名贵,而且造型独特,别具匠心,实为酒具中的珍品,又是至今唯一发现的辽代社会皇家饮宴时,以盞为尚的首件实证孤品。

人类社会的饮宴风俗,古往今来久已有之。辽代社会的饮酒习俗,虽然在可见的史志中并不多见,但是通过这些载录,仍可窥见有辽一代时的饮宴风俗的一斑。

如辽代的开国皇帝辽太祖,经常不忘吃用鹿肉做成的肉酱可以解酒。所以就以一种谦辞的口气,问下属臣僚,山林中有鹿,能不能猎获。由此可知,辽太祖不只是怕喝多了酒,而是常喝多了酒以后总不忘解酒。《辽史·列传第四十二》中的原文为:“太祖常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有,问能取者”。

再如辽穆宗,也就是辽太祖的孙子,辽太宗的长子,也是有辽一代的第四位皇帝。《辽史》在《穆宗本记》中,对于这位皇帝饮酒时的记载,格外的多,主要的用语有:宴于宫中,宴饮达旦。饮于野次,终夕乃罢。饮于虞人之家,凡四日。立马饮至哺。重九饮宴,夜以继日。正月,昼夜酣饮者九日……

后来,有人送给这位皇帝一个雅号,叫“睡王”。也有人说他的好话,说穆宗从不主张出兵打仗。其实在有辽一代的皇帝中,唯有辽穆宗嗜酒成癖后,又发展到酗酒成疯地步。由于他经常是酒后动辄就乱杀侍从和臣僚,所以他身边的侍从们都害怕不知何时就会遭遇不测,所以后来辽穆宗是在喝多酒后,被身边的侍从所杀害。

到了辽圣宗朝,也就是辽一代的第六位皇帝时,辽宋两

国已结盟友好,称兄道弟,国泰民安一派升平盛世。两国的使节往来不断,辽国的礼仪活动也空前活跃。比如《辽史·礼志》在《嘉仪篇》中记载,凡是朝贺皇帝或者是皇后的寿辰时,相关的国家,也都要派使节来祝贺。虽然在志文中,并没见到有什么设寿堂、燃寿烛、结寿彩、摆寿宴等场面的记述,也没见到有什么寿礼、寿幛、寿联、寿桃之类的记载。其间无论是本国的臣僚们,还是外来的特使们,所用的祝辞用语,均为“臣等谨进千万岁寿酒”。这里与平日三呼“万岁”所不同点,是“寿酒”。此时的皇帝还是皇后,无论是饮献酒还是饮敬酒,都是用盞来做为帝后的酒具。我想用盞来饮酒,应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身份的不同,用盞其中含有“千万寿酒”的寓意,同时酒要斟满为敬。二是盞的容量很小,饮者不易超量也不至于出现失态等现象。

当然,辽代时祝贺帝后寿辰时,用“千万岁”来祝贺,并不仅仅是如《嘉仪篇》中唯有记载。在《辽东行部志》一书中,还有一种异曲同工的祝贺形式。辽代时觉华岛(如今为辽宁省兴城市管辖)上海云寺中菊花岛的僧人海山大师,名为郎思孝,与辽兴宗交往笃深。一次恰逢“天安节”,也就是辽兴宗的生日时,大师特题《松鹤图》进贺。“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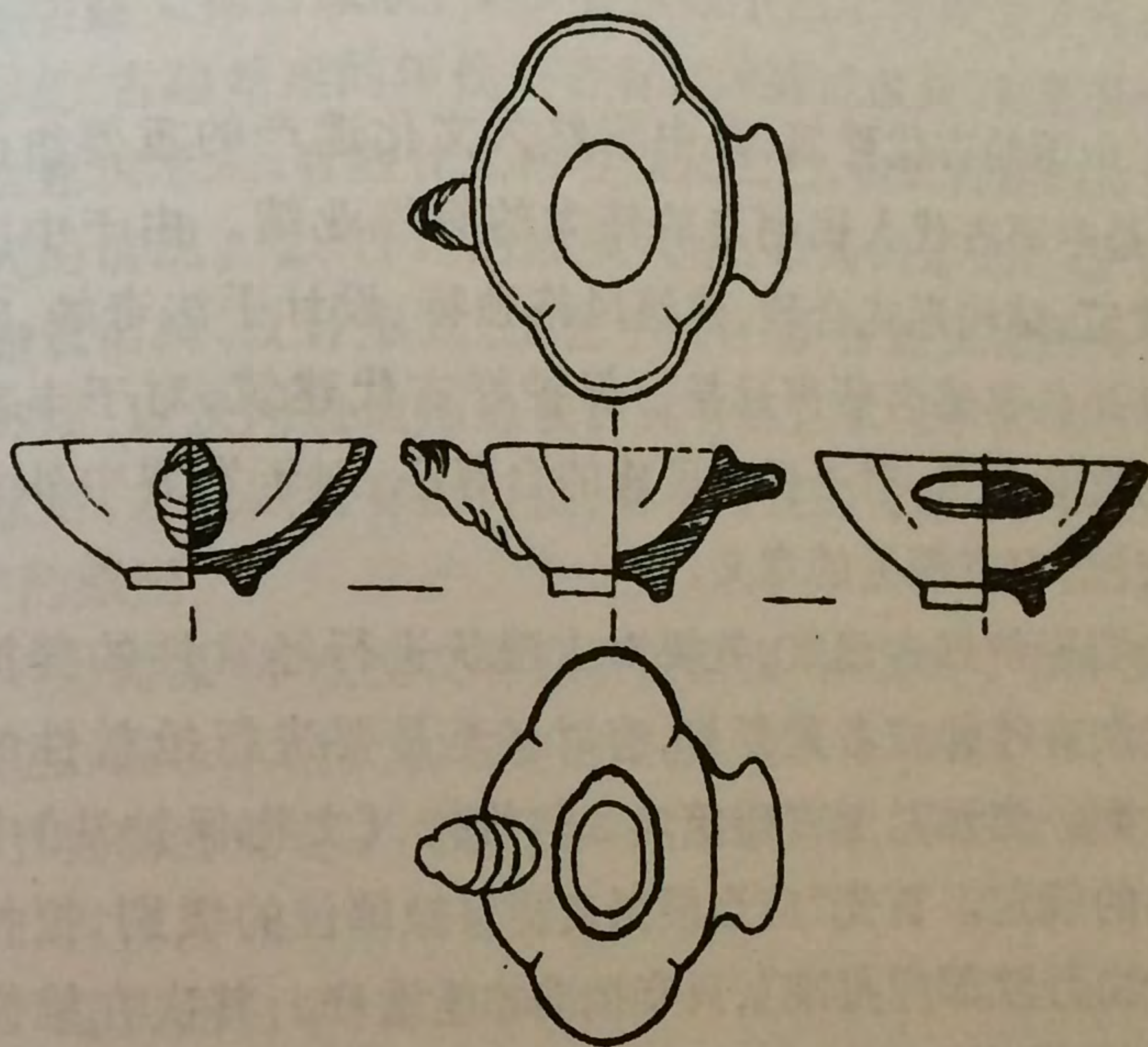
有辽一代用来饮酒的酒具,以往在史志中对此的记述极为少见。除上述在《辽史》中记载盞为帝后祝寿活动时的酒具而外,在《契丹国志》一书的“奉使语诗”中,还有为欢送使者敬酒时“钱行三匹裂”句的记载。原作者将“匹裂”注释为,是一种木制的外表加黄色漆的酒具。我以为“匹裂”一

词,当为契丹语,是指口径较大的木碗的名称。“三匹裂”,就是我们现在还常说的“仨仨的喝”。木制的酒具携带方便,且较瓷器而言不易破损,所以在捺钵地或者是行走的途中,为客人饮上马酒来饯行,真实可信。

近些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一大批不同质地、不同器型的辽代时的饮酒用具。有用贵金属金、银制做的执壶和温碗,有单耳杯,有玉杯和玻璃器等等。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陶瓷制品。然而,龟首鹤尾海棠花口水晶盏的发现,至今仍是只此一件。

这件水晶盏的发现,既有明确的年代,而且又是在辽代帝后们所使用的物件中同时发现。虽然如这件盏,尚不能断定它应属那位帝后使用之物,但是它是辽代皇家帝后们的用品,应不会有错。

附:龟首鹤尾海棠花口水晶盏线图



龟首鹤尾海棠花口水晶盏线图

### 三、维修工程琐录篇

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中华悠久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的辉煌业绩。由于中国的古建筑,结构形式合理,建筑风格独特,设计手法奇妙,所以早已是久享盛名蜚声远扬。保护好古代建筑,对于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对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对于发展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有深远的意义。

要保护好古建筑,就要对古建筑进行经常性的养护和不定期的维修或者是复修,有时甚至是要进行抢救性的维修加固。当然对于古建筑应如何维修,《文物保护法》中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只有批准才能维修。其次在维修工程中“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如何理解“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这一原则,对于保护好古建筑至关重要。简要的说,就是必须做到修旧如故。绝不要修葺一新,更不得随意添建和改建,致使文物以及文物的历史风貌和地理环境遭受扰动和破坏。

要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关键的问题,是要从两个方面去落实。首先是要弄清什么是“原状”,其次才能按“不改变”去做。“原状”一词,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就是

“原来的样子”。其实文物古建的原状,并不是从字面上的几个字就可以说清的问题。做为文物它又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具有特定的历史时代,以及与此同步的科学水平和艺术境界。

古建文物的原状,至少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分析和了解。① 古建始建的年代是否有过维修或改建,古建是一种什么建筑形式、有些什么内容以及工艺,构成古建的材料与形式的情况。② 古建的规模大小,布局的形式。③ 古建的建筑结构、设计形式、工艺手法。④ 古建文物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地形地貌。只有真正掌握了文物古建的原状后,才能做到有据可依,有物可证的去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

为确保“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得以遵守和落实,对于应由谁来承担文物古建的维修工程,文物保护法中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要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来承担”。

辽庆州白塔,自1964年10月22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开始被确定为省(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于1988年1月13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又晋升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的附属建筑物,是唯一幸存于地面上的砖木结构楼阁式的古刹建筑。

1988年—1992年间,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无论是从报请维修,还是到工程告竣,都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的法规,以及文化部制定并颁发的《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规定的精神等进行。

为能尽早地争取立项和维修辽庆州白塔,自1985年以来,我们巴林右旗的文化文物部门,一直在不懈地逐级向上呈请维修报告。我也曾多次借外出开会等机会,特地跑到有维修大塔的工地,或者是有修塔的文博单位,如林东、宁城、朝阳和呼市,进行学习 and 了解,做过一些考察。直到1987年底,在自治区文化厅召开的全区文博工作会议上,才得知维修辽庆州白塔的事宜,国家文物局已列入了日程和定为重点维修项目。

1988年4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以“内文物字(88)14号”的文件,下达了“关于维修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的通知”。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指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为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古建筑维修队伍,将此工程的设计、维修业务委托内蒙古文物部门予以完成”。为此,于1988年7月12日,又下达了“内文物字(88)21号”文件,关于组建“辽庆州白塔维修领导小组”及“维修工程指挥部”的通知。文件对“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的各自任务和相互关系,以及组成人员等的分工与职责,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因为此次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是国家文物局为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古建筑维修队伍,而特地委托内蒙古文物单位来完成的项目,所以事实上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承担形式。

就是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专款,再由专家组论证和定期进行督审。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组织施工班子(维

修工程指挥部),并负责检查和督办等工作。施工班子是由呼市文物管理处原维修辽万部华严经塔(也称为白塔)的有关人员,和巴林右旗博物馆的馆长等人组成,具体负责维修工程的实施,并对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负责。“维修领导小组”即地方有关单位,主要是做好协助工作。这一新的承担维修文物保护单位的组织形式,纯属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的领导下,由文博单位的相关人员,为这一任务而组成的特殊的工作单位。

在自治区文化厅下达“维修通知”不久,于1988年5月的上旬,我等有关数人在大板聚合后,自带行李奔赴塔下,创办最少可容纳10多人吃住的场所,以便开展工作和在此生活。还好,不久就在距大塔并不远的地方,辽庆州古城的内城墙外和外城墙内的西北角,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军的营地,借到了已有许久无人居住的房舍。室内不设间隔,三间为一筒形房屋。房屋外的门窗尚全,室内的四壁空空,四角荡荡。尤其是通风效果甚好,天空中的光亮,有时能从房顶上的大瓦间,闪现到房中。1988年6月23日,从呼市辽万部华严经塔下,装车运出的机具、杉杆等等数十吨的维修工程急需的物资,以及有关的技工人员,抵达了塔下。

于1988年6月26日,开始立杆搭架,鸣放爆竹,正式对大塔进行勘查等工作。不过因杉杆不足,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坚持在单排架上工作。

整个工程,自1988年5月先期维修人员到达塔下,6月26日正式开始立杆搭架启动维修工程,直到1992年8

月6日验收揭匾剪彩维修工程告竣；再到年底维修人员等撤离塔下为止，前后共经历了5个年段的时间。由于这里四季的气温为寒多暖少，所以一年中能在野外和灰用水等的工程，很有时限。尤其是在属于高空作业，又无任何遮挡的塔上施工，一年中最多也只有5个月的时间。虽然这期间，有不少的工作，甚至是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要在塔下来完成，或者说可以在室内甚至是要在外地完成。但是无论这些工作再多、数量再大，绝不等同于在塔体上施工，这只是为在塔体上施工应做好的工作准备。

在这五个年段间的维修工程，如果说要划分一下段落，大体可分为三个大段。

1988年—1989年段，为进入工地和准备阶段。这一段的工作重点主要有勘查、实测、草拟计划与方案。请专家组视察指导、论证审核与批准。进而认真剖析和拆解、备料加工等等。

1990年—1991年段，为转入正式施工的阶段。这一时段里的工作中心，主要是始终要遵守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加固为主、局部复修”的原则，做抢救性的保护文物古建的维修工作。当然还欢迎专家组的定期下来巡察监审。

1992年段，为撤出工地和善后事宜的阶段。主要的工作内容有：清理工地、查点与封存各种机具和器材、做好“庆州与庆陵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建设工作以及在所内要布展的“维修工程展览”工作，还有“第二届古塔研讨会”的准备工作。

也许由于此次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从批准委托到

组织承担，都有着不同的创意，所以国家文物局在下拨的款项中，就有一笔标明为出版“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报告”等专著。这一鲜明而阳光的举措，既是国家文物局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古建筑维修队伍初衷的继续，也是为研究国保单位中的附属建筑物辽庆州白塔的价值，为更好地保护古刹的推进剂。

“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报告”等专著如何出版又何时出版，专款早已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的账内落户，我想自会有定论。

在维修工程的启动到告竣期间，我一直力主凡属维修工程的资料，定要统一归档。无论工作者的身份是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还是属呼市文管处的，只要是经手过并且在手头有维修工程的资料时，首先必须确保统一档案中要有你这份资料。

其实我坚持这一想法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想等到工程结束后，能有一份完整的资料，好供后人咨考。避免社会上早已存在的那种卑劣狡诈的行为垄断资料、剽窃成果等的破坏和干扰。同时我自感身体欠佳，年龄我和德新同志都比汉君同志稍大几岁，且汉君同志又是具体负责设计和施工者，所以归档后的责任，就由汉君同志负责。

再说这一篇章中的内容，其实“篇目”已标明，它只是维修工程的一些细小而琐碎的事件。虽然与维修工程密不可分，不过充其量也只能是当做“工程报告”背后的故事，大多数内容写不进“工程报告”之中。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工程报告”是在台前上镜后制成的拷贝，可以通过银屏或银幕连



续和随时播放的画面,而“琐录篇”是在幕后,是导演在说戏或者是演职人员做着开机上镜前的准备活动。可以说“琐录篇”的内容,是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的杂俎,是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的花萼。

### 1、巴根吐新建窑址

在巴根吐新建的烧制仿辽青砖的窑址,西南距辽庆州古塔直线约为16公里。南临巴根吐村不足1公里。马蹄形窑址,就位于一处南北走向的小山梁的南端,偏西的坡地之上。西北距金界壕约为3公里。窑址的西面,为一平坦而略见北高南低的大簸箕形的山间洼地,开阔的敞口朝向东南,当地的老乡称此地为“死葫芦头”。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建窑,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一是,要在草原上兴工动土建窑烧砖,一定要征得苏木政府的同意。这里很长时间以来,就有烧制小青砖的砖窑和制砖人,同时苏木也准备在这里建窑烧砖。其二是,这里的土质与水泉沟的土质完全一致,且有可跑汽车的沙石公路,此外水源也不缺。

在准备建窑和要烧制仿辽青砖之初,本来想与当地的制砖等人员合作。这样不仅干活的人员好找,吃住也不成问题,同时还能给当地的老乡们增加一些收入。然而,当具体商谈到如何签合同,以及所烧制的仿辽青砖必须达到的规格和要求时,就都婉言谢绝了。有的说是家里农活忙,顾不过来,有的说自己身体欠佳,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由于此路不通,只好另请高明。这样在此建窑和烧砖的事宜,就

与山西省原平市陶瓷厂的一些技工签订了合同。因为这个单位和这些人员,在呼和浩特维修万部华严经塔时,曾有过不错的合作。

制砖所使用的泥土,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制砖者对待十分认真。首先是要做到黄土与红土的比例均匀搭配,把土拌好后再用水浇透,并用镫铲铤和过来起堆闷着。其次,把泥土摊开一些用直径8或10毫米的圆钢,密密实地抽打一遍后,把泥土再堆起来扬好,以使用模压脱成砖坯。

砖坯自脱模平置在坯场上,还未上垛阴干以前,中午时分不能让阳光暴晒。所以坯场常见有用白布搭苫成的矮棚。同时这时的砖坯,也要防止受到雨水的浇打。如果在烧制好的砖面上,出现有雨点状的麻面时,不得验收为合格产品。

当砖窑建好后砖坯已干好,技工人员也都到位时,然而烧砖的燃料又成了一大问题。本来用煤做燃料来烧砖,这在各地是普遍的做法,但是在当时我们做不到。如果使用距巴根吐村北约40公里的坝后(锡盟西乌旗)哈拉根台的煤,价格便宜,但是这种煤火焰起不来,大卡上不去。如果到距巴根吐西南直线约200公里的锡盟煤矿或者是距巴根吐南直线约300公里的平庄去拉煤。这两地煤倒是可以,然而造价太高。当时我们施工指挥部虽然有一辆大汽车,但是汽油指标一直解决不了,这两地的煤实在是用不起。此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问题,辽代水泉沟烧砖时用柴草。此时白塔子地区什么做燃料,可能不是用煤,应该是柴草。此时白塔子地区

没有薪炭林,山上的草木又不准乱动。当地群众生活中的主要燃料是牛粪,用牛粪烧砖行不行,在老师傅们的精心试烧和看管之下,试烧第一窑砖就完全成功。这实可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凡事只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地统一,许多看起来很难办到的事情,实际办起来并不太难。

1988年至1992年维修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在巴根吐建窑烧制仿辽青砖时,烧砖的燃料完全使用的是牛粪。这一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的情况下的创举,有可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次举措,特琐录于此。

## 2、石匠山与采石场

大塔在台明等处,必须添配和补修的已残损和缺失的条石构件,约为380延长米。

首先是大塔基座下的两层台明,这里所说的台明,就是台基露出地面的部分的称谓。辽庆州白塔初建时,两层台明的周边,都用花岗岩条石围砌成边郭。由于岁月的久远这些条石遭受自然的损毁和人畜的践踏等破坏,或者是有的又被盗做他用,维修前已显见残缺严重。其次是在大塔前所建小塔后,不仅破坏了大塔原有的台明、垂带等建筑结构,同时又因砌筑了一个包台,致使雨水不易从塔边流走,反而产生了向塔基渗水的隐患。再次是台明之间,台明与塔前的广场地面之间的石条阶梯,也可以叫做垂带踏步,早已不见。这一切都需要在维修工程中进行加固和按原状恢复。

庆州白塔所缺失的花岗岩条石构件,其颜色并不是在巴林右旗许多地方常见的灰白色或者是灰白色中带有小黑点的花岗岩石,而是一种可见微显淡黄色其间又夹杂有小黑点的花岗岩石。由此推想这种花岗岩的产地,应该在距庆州古城不太远的某一地方。再者而今在巴林右旗辖境之内,冠有“石匠山”名称的地名,或者是在地图上标注为“石匠山”的山名有许多处。究其名称“石匠山”的由来,主要原因是这座山自身所具备的条件。这座山可供石匠们开采料石,或者是曾有过石匠在山上不仅开采料石,而且还用这座山上的料石加工成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如石磨、石碾、石臼等,以及石质的建筑构件,如柱础、条石等等而得名。当然也还有的是因为石匠们的住址,距某山很近因以为名。

在辽庆州古城址的西北,直线距离约为8公里的一座山峰,今地图上标名为“石匠山”。此山是否也是因曾经有过石匠们在此采石而得名,当地的多数人对这座山峰的名称的由来并不熟悉。在距此山较近的民居村落,也并没冠挂“石匠山”名称的现象。这里的居民,在定居游牧后或者是半农半牧后,所搭建的居址房屋,都是就地使土的板打墙的土房,也就是有人说的“干打垒”房屋,墙根之下并不使用石料。随着生活的好转,如今差不多都已改建为砖瓦房。这时建筑房屋的基础,都要砌筑高约40至60公分的石质墙基,但是所用的石料,一概使用从山上崩炸下来的自然形不规则的山石。只用坐浆灰摆砌,或者是摆放好石料后,再用灰浆或泥浆灌注,并不特意地要使用鑿制成型的料石或者是必须使用花岗岩,因而这座“石匠山”因何得名,众说纷

纭。

为了找到塔上所用的那种花岗岩和该“石匠山”名称的由来,我们按照地图上所标注的地理位置和方向,赴实地做了考察。从庆州古城东北角的沙石公路出城后,往北走便道约4.5公里到达“浩勒包吉村”。从村中经过后再往前走的方向为北小西,走到快要到“必图村”时约为4公里的地方,改道折向西小南前进,大约前行8公里时,进入了一处北西南三面环山的沟谷地带。南面的山峰名叫“毕图乌拉”,西面和北面的山峰均为“石匠山”。在“石匠山”标高为1531米的山峰东侧,即紧靠金界壕北边的标高为1121米的山峰下,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人工采石场。在被开采的山峰下,有很早以前石匠们采石时,弃置的碎石和六面体的条块状,大小不等的许多的荒料堆积。在这些石料上除可见有雨锈斑迹外,个别的石面上还生长有石花,可见其已被开采的岁月久远。同时这些石料的颜色和石质与庆州白塔所使用的花岗岩相比完全相一。看来这座“石匠山”的得名,应是自辽兴宗朝建庆州城时石匠们在此山采石料因以为名。

因为当地没有像样的可以刻石的制石工匠,所以维修工程中的采石、制石以及石活归安等等项目,就与河北省曲阳县的石匠工人签订了合同。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些石匠在呼市维修万部华严经塔时有过不错的合作。同时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告竣时,在大塔前台明上所立的两通分别镌刻为蒙汉文的石碑,碑身所用汉白玉石材和碑座所用的雪花岩石材,以及蒙汉文的碑文阴刻,一是从千里以外的曲阳运

来的,一是由曲阳的石匠师傅篆刻的。

由于辽代开采料石时,弃置荒料的堆积很多,所以我们并没在山体上重新开采,只在堆积中选取,就足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用车从山下往工地运石料时,石匠师傅们亲临现场,一是要看二是要听。看就是要相荒料的规格是否适用,听就是用小锤敲击荒料,听有无劈裂之声是否可用。

料石运入工地后,石匠师傅们先要依据料石的形状与规格,在荒料上放好墨线,将料石放稳垫平后,又根据工序的先后而选用大小不同的凿子、花锤和剁斧,对石料进行加工。在阶条石、垂带石等石构件的加工过程中,有时还要经过再挂线来抄平。或者用尺来卡靠,有时还要用细凿刷道后再剁以细斧。这些石匠们,不但工作认真,态度勤奋,而且非常爱护自己十分齐全的工具。这很符合我们常用的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换句话说这些石匠们,完全理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要理。

### 3、水泉沟辽代砖窑群遗址

当维修方案和维修原则批准后,在已掌握塔上不同构件残缺的情况下,到实际施工时必须要有有一定数量的、材质不同、形状不一,尺码各异的相关构件,足可用以添配和补修才可进行。

然而塔上的各类原有构件,并不只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构件又是沧桑历史的见证,是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载体。所以在维修工程中用以添配和修补的相关构件,无论是材质、规格、纹样、做法等等,都要做到力争与

原构件相符或者是相一,既不可随意的标新立异,也不应任意的加以改变原状。

比如在维修工程中,塔刹已确定为必须复修的项目,只此工程就需要使用近十数万块的辽代青砖。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要想依靠找些旧辽砖或者是能发现辽代建塔时,已经烧制好而未曾使用一直保存至今的辽砖来解决,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实。只有自己动手,通过建窑烧制仿辽大砖,这才是万无一失的解决办法。但所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塔上的青砖构件,其规格,纹样都有实物可以比定,但是烧制辽砖的土质情况如何,全然不了解。只有找到建塔时辽代的砖窑,弄清辽砖的土质情况后,再行烧制仿辽青砖,才能说是坚持了“材质不变”的原则。

为了能了解和掌握一些维修辽塔时使用仿辽青砖的知识与情况。我在申报维修辽庆州白塔期间,就借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特地跑到有维修辽塔的工地上去考察和学习,如林东辽上京北塔工地,宁城辽中京大塔工地,呼市辽丰州白塔工地。对三地的仿辽青砖,我都执意的用双手进行了抚摩和敲击,还用手进行颠弄与搬动,当然还要向有关的同志进行请教。应该说此行当然不虚,自有份量不轻而只可意会的心得。

在此期间,为了找到辽兴宗朝建塔时所使用的砖窑遗址,一来由于自己心切,再者旗里决定博物馆要限期从荟福寺内搬出。馆藏文物的安全存放,一时未得到妥善解决,非常地分心。所以在好一阵时间里,为找窑址我一直是在舍近求远的弯路上奔波。那一段时间里,只要是得知有人说

在靠近白塔子苏木的某某地方有窑址,就要想方设法地奔赴实地去调查。比如曾到过河南山前的“银洞子沟”,那里只是建筑址并不是窑址。还到毕图的西山坡以及塔西村西北的“庙台子沟”等地。不过这也好,已摸清了距辽庆州古城稍远的地方,并没有辽代烧砖的窑址。

虽然以往的史志中,对辽庆州营建时所用的青砖黛瓦和石料木材以及金属构件等,均为只字不记,但是该城自景福元年(1031年)始建,到释迦佛塔落成时的重熙十八年(1049年),已历经了18个春秋。且不说城内众多的屋宇殿堂建筑上的用砖数量,就大塔一项的用砖,也已应极为可观,所以砖窑遗址的规模一定不小,同时距离也应在庆州古城的不远处。

我们在庆州古城址的西略偏南的6公里处,发现了大型的辽代砖窑群遗址。该窑群遗址,位在塔西村的西北4公里处。地形为西北东南走向的沟谷山坡地带,西北的沟脑处,为“毕图乌拉”的东山腿。沟谷的沟底,在3公里长的距离内,有两处泉眼,今仍可见有泉水从地中向上渗出。由于此沟谷中有泉水,故名为水泉沟。这里的土质上面为黄土层,黄土层下为含有一定黏结性的红土层。只是水泉沟有这样原生土层的坡地,几乎已被破坏或者说是已被利用殆尽。砖窑群多集中在沟谷的上方,并且是马蹄形的窑口建造在沟谷两边的崖壁之处。

这一窑址的规模与面积共有多大,其中是否有饰釉的窑址?因为我一直未能拨冗分身,所以在弄清了土质和确认这里已再不可能建窑烧砖后,以后再没去调查过。

#### 4、密藏纪实

当我知悉,时任中共巴林右旗委第一书记布仁乌力吉同志,提出在维修大塔的过程中,要想藏置一些有纪念意义物品等的问题时,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地与长期吃住在工地上,负责工程技术和执掌施工的副总指挥张汉君同志取得联系。

汉君同志虽然没有完全参与这一密藏活动,比如文字材料的草拟等等,但是有他为我支招和把度,我仍妥帖地完成了布书记所提出的问题。

##### 一、密藏文字与内容

###### 1、汉文“密藏记事”

今逢盛世,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组建领导和施工班子,维修辽庆州白塔。今工程已进入后期,为此壮举,特选巴林石雕马一件,石章三方及大板白酒三瓶等不怕腐朽之特产,密藏四层西侧,聊表全旗十五万九千各族人民喜庆之意。

中共巴林右旗委员会  
巴林右旗人民政府  
1991年8月15日

###### 2、蒙文附:(翻译稿缩印件)

##### 二、密藏地点与方位

在布书记提出想法时,大塔的维修工程,自上而下从塔

剥到塔顶以及第七层和第六层均已维修告竣,并已蜕进到第五层,此时选择密藏的地点,只可在塔体的五层以下。

我们在对辽庆州白塔进行勘查时,就已在塔体外的某些部位,如在斗拱铺作间的拱眼壁处和腰檐平座下的塔体身上,发现了一些辽代建塔时所形成的孔洞痕迹。虽然当时已采用了砖堵和使灰抹的措施,并在其外表又涂刷以灰浆。无奈年深日久,几经沧桑,不少孔洞外的抹灰已见开裂,有的甚至已出现了剥落的现象。

在大塔第四层西北面的塔体上,有一平直的、深约1米,孔径约28厘米,呈方形的洞穴。因洞口处的抹灰完全剥落,用来封堵洞口的砖块也已不全,所在洞口处,可见洞穴中还留存有排列着的木料小件。这些木料显见已有朽损,我们从洞穴往外抽取时,并没费力。洞中的木料为三件块,排在洞穴两边的为内小外大类同的木楔。木楔的外端为平头方形,木楔的里端,一面为直面,一面为斜面呈垂直的刃形。排在两件木楔中间的,为一方形体粗短的木棍。此当为辽代营建该塔时,在往外抽取不便时,就已断折在洞中。这一现象说明辽代在营建该塔时,采用了外搭脚手架施工的工艺;留存在洞穴中的木楔和粗木棍,应与紧固脚手架上的横木有关。

辽庆州释迦佛塔的第四层西北面塔体上的这一洞穴,就是密藏时选定的地点与方位。

##### 三、参加密藏活动的人员。

参加密藏活动的人员,共有14人。

从旗里来的人员有7人:旗委书记布仁乌力吉同志,旗

委宣传部部长吴秀英同志,旗委办公室的小蔡同志,旗博物馆党支部书记格日勒同志,两位司机曹师傅和革命师傅,还有我、旗博物馆馆长、大塔工程副总指挥。

从大塔工地上指定的人员也有7人:大塔工程副总指挥张汉君同志(呼市文管处人员)、大塔工程工作人员青格勒同志(旗博物馆人员)、大塔工程后勤人员魏国强同志(旗博物馆人员)、大塔工程瓦工组负责人王廷客师傅(呼市人)、大塔工程木工组负责人靳福善师傅(呼市人)、大塔工程油工组负责人小安师傅(山西人)、大塔工程架子工组负责人王福贵师傅(呼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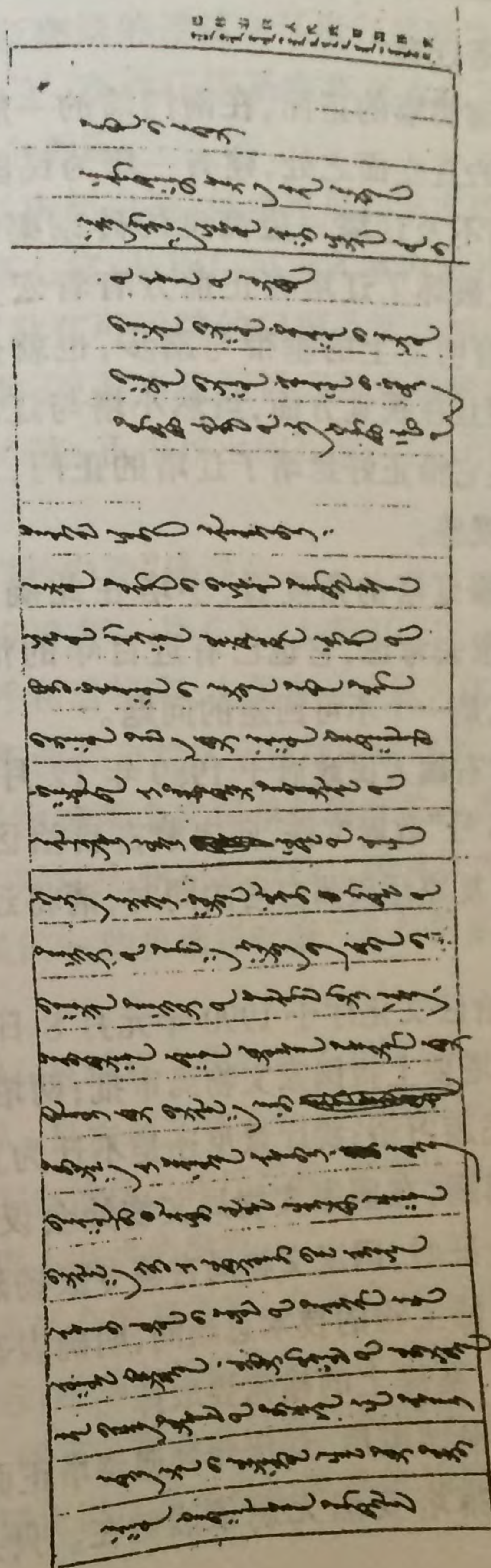
当布书记等有关人员以及密藏纪念品到达大塔工地后,密藏活动即刻就开始了有序地进行。

此前,凡在大塔上做工的人员已全部撤了下来,同时要求除指挥部已指定的人员外,其他人等一律不得造近大塔。

站在架杆上,靠近大塔第四层西北面洞室最前面的人是青格勒同志。站在距存放密藏纪念品汽车最近的人是布书记。书记从车里双手捧出纪念品后,经过一些参与人员的双手传递后,最后由青格勒同志放置在洞室之中。

墨书“记事”文字的大砖,在密藏前已在有关文字的两个面上,刷了一遍桐油。密藏活动中,当布书记说到“纪念品已全部捧出”后,紧接着就由瓦工王廷客师傅上前,使用掺有桐油的泼灰,用砖层层封堵洞口,当洞口已砌筑严实后,再由油工小安师傅上前,用灰浆加以涂刷,至此,密藏活动已示了毕。

附:蒙文影印材料



密藏记事蒙文手稿影印件

### 5、小塔是否迁建

辽庆州释迦佛塔的正面,在南门前的一层台明之上,在紧靠二层台明的直立面之处,建有一座为民国年间,由当地牧民修建的,高不及辽塔一层高度的砖砌喇嘛塔。这一小塔的修建,不仅破坏了辽塔在正前方有着宏大而直通二层台明之下一层台明之上的垂带与踏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砌的阶梯,而且在视觉方面,虽然小塔与辽塔之间确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恰好封堵了辽塔的正门,从而也破坏了对雄伟辽塔的观感。

如要从维修辽塔的角度看,小塔在此确属不伦不类。如要从民情民意去考虑,它也已有近百年的情感。要对辽塔进行维修,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此,巴林右旗人民政府于1989年12月18日,以“右政发(1989)126号”政府文件,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报告“维修工程中在复原辽庆州白塔的同时,请将辽塔下的喇嘛塔迁建”。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于1990年元月8日复文的主要内容为:是否迁塔要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两塔相连的现实已成为多年的民族习俗;我厅意见还是不迁为宜。

就小塔的问题,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会议室召开的工程问题汇报与论证时,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杨烈工程师,也是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的技术总顾问,明确表态“大塔与小塔之间可以分离,基座上的榆树要取掉”。

此次维修工程结束后,辽庆州释迦佛塔正面南门前,民国时期所建的喇嘛塔安然无恙依然健在。只是喇嘛塔北

侧,建该塔时所砌筑的连接在辽塔和喇嘛塔之间,可以从东西两侧自由上下,直达辽塔基座和进入辽塔一层塔心室的台阶,今已完全拆除。

又因为辽庆州白塔,虽然每层均辟有塔心室,但该塔只有第一层的塔心室,从南门可进入室内而外,其余各层间并没有梯道,更没有可远眺的门窗孔洞。如今存在于塔心室各层间的孔洞,应是金灭辽后多年来形成的盗洞。所以如今第一层塔心室,正中顶上的孔洞,也做了封护。

### 6、表彰“贤内助”座谈会

时间:1990年5月5日,上午10时

地点: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二楼会议室。

内容:座谈在自治区文化厅的领导下,由呼市文管处和巴林右旗博物馆两个文博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的“维修工程指挥部”,对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具体施工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施工人员的家属额外付出的表彰。

召集人:自治区文物处王大方同志。

主持人:自治区文物处处长王晓华同志。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宝音达来同志致开幕词,并即席做了催人奋进的发言。

出席座谈会的嘉宾有: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塔拉同志,呼市文化局局长杜遼同志,呼市博物馆馆长卜杨武同志,呼市文管处处长董文秀同志。此外,还有自治区文化厅调研室以及呼市报社等单位的同志。

“维修工程指挥部”中，家在呼市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贤内助”中绝大多数人，都出席了座谈会。因为此刻本年度的维修工程，由于气候所限尚不能开工。

“维修工程指挥部”中，家在巴林右旗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贤内助”，出席座谈会的代表只我一人。因为辽庆州白塔就座落在巴林右旗境内，建议自治区文物处举办这一座谈会的举措者，是我们巴林右旗。况且这一座谈会，是我们“维修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要向自治区文物处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汇报工作并请专家论证等工作进行中的一朵花絮。

表彰的形式：为贤内助们佩带红花，颁发证书，清茶一盏和棉毯一块。

受表彰贤内助的名单如下：

云瑞芳(德新夫人)、王秀英(张汉君夫人)、程秋燕(刘贵恒妻子)、翟秋花(于荣妻子)、吕凤英(孟西岐妻子)、李素卿(李宝珍夫人)、孙乐琴(韩仁信夫人)、李岩(青格勒妻子)、王玉蓉(魏国强妻子)、宝音图(雷凤丈夫)。

### 7、唯用行李当背景

当在塔刹的覆钵处发现文物时，整个大塔的维修和备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从多方面展开。

其时，我同朝克巴图同志，要乘坐着苏木个体户温振海师傅的解放牌汽车，奔赴河南省安阳市，急待往回拉运桐油而上路。青格勒同志，正在赤峰木材公司和火车站的货运站之间，为商讨由国家调拨的木材指标其中分材种和材质，

与给我们工程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事宜。此刻，登上塔顶清理文物的工作，就由张汉君与苗润华二同志，具体来完成。工地的后勤工作，仍由魏国强同志掌管，只是当时在工地上，已在无声无息如常工作的氛围之中，强化了保密和安全工作。

在所发现的文物先后进入室内的同时，我们随即就制作了可分类存放文物的木箱，也买了铁皮保险柜。当时虽然是居住和存放在军营里，然而我们还是安排了固定的人员和房舍来保管。在此同时，我与汉君同志，也开始了夜以继日地对文物的整理和清点工作。编分号、填卡片、写记录、绘线图以及抓照片等等。我虽然在大塔维修工程立项前就已学习了1986年7月12日，文化部关于颁布《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其中“第九条”中就有发现文物后如何管属的明文规定。如“其中的艺术品、碑碣、匾额、建筑构件等，须交博物馆或文物保管机构保存；其他木、砖、瓦、石等材料，由文物保管机构备作文物修缮之用”。但是，我并没造次，而是用最快的速度于1989年10月4日，就以辽庆州白塔维修指挥部之名，向各级主管部门，反映发现文物的情况与请示报告的形式，如实地用文字材料加以汇报。主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抄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朱处长、赤峰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科、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巴林右旗文化局。

由于这批文物的质地，多为纸制品、丝织品以及木制品，所以在未请到相关的专家经科学处理前，实不宜翻动。然而如果是向有关的领导们汇报时，单凭泛泛的口头与文



字汇报时,见不到文物,如是这样的场面,那一定会令人尴尬。

因为事先有些想法,所以在草拟报告的同时,和即将要把文物装箱后封存进旗博物馆的库房之前。我特地到旗广播电视局,向斯尔吉局长和石如函书记,提出了求助,请他们指派录像人员,赴大塔工地给予录像支持。他们很果断又慷慨,当即就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人员。

张伟东同志等录像人员,扛着录像器材进入我们准备录像的房间后,发现这里只是一处无任何装修和摆设的筒子屋。开始时似乎还想提出一些条件上的要求,当得知地上的实际情况后,只保留了一个要求,想法解决一下背景和衬景的材料。

就是这一要求,后来还是在我等自用的行李中,只找到两床颜色相同,均为浅蓝色的被罩和一块草绿色混纺的毛毯,不知可否算是达到了要求。我们住在工地上的所有人员,无论是从呼市等地远道而来的,还是在近处从大板来的,行李一律自理,且均睡在木板搭就的板铺上。张伟东同志理解到我们的处境后,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一录像资料时,固然认为出发点没错,然而始终会有一种酸甜苦辣多味之感。

### 8、塔顶壶浆待友人

做好正式施工前的勘察工作,是草拟和上报维修方案的依据和基础。因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任何一项维修工程与项目,一定要通过国家文物局有关专家组对施

工方案的论证,进而批准维修原则后,才可以进行施工。我们施工指挥部,也是由国家文物局的古建专家组的专家杨烈先生为顾问,但是这一专家组是要面向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施工项目,根本不可能每年都来到这里进行检查和督导工作。所以对勘察工作不但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去争取时间,以便及早将“方案”报请专家组来论证和批审。

为此,在大塔立杆绑架的同时,对大塔的勘察工作也已展开。不过在开始立架时,因缺少“杉杆”不可能一次就搭成双排的塔架,只好先搭起单层。也没有可供工程人员在塔架上行走和踩踏的“脚手板”,只好就在单排的架杆上攀登着进行勘察工作。

随着塔架升高到塔顶时,勘察工作也已是自下而上和从上往下的,从逐层到逐面和再在局部和整体方面反反复复地经过了若干遍。我们的勘察工作和维修方案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特别是具体负责施工指挥任务的张汉君同志,在这种艰险的条件下,更是一丝不苟地工作,做到了情况明、数据准,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和部位处,又都拍摄了黑白照片。然而他仍然认为,截止此时的勘察工作,并不能说已是尽善尽美。八十年代勘察国家级的古建维修,录像资料一点没有,恐怕这要成为终身的一件憾事。当时我们两个文博单位都没有这套设备,工程上是囊中羞涩,根本就没有这笔开支。如果说要请电视台的人员来录像,那时我们又做不到确保录像人员的安全。

正当我们踌躇无助自律自责时,有一天工地上来了一

位,前些年我是在辽金史学会上相识的朋友。赤峰地区驻军某师参谋处的处长吴振强大校,由旗武装部的参谋达来同志陪同,刚刚到达驻苏木的军营后就来到工地。经我介绍后,因为是老朋友,工程上的一些话似乎就无所不聊了。当谈到没有录像资料这一憾事时,吴振强处长二话没说,命令达来到军营里从专车上把他随身带来的录像设备取过来,随即就开始了录像工作。

吴振强处长讲:他是行武出身,爬杆向上不在话下。录像时身姿多变而稳定,攀登时身姿矫健而敏捷,当然录像时汉君同志一直在他身边相伴和不断地提示,工地上也特地安排了架子工的组长王福贵师傅,在左右护卫和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吴振强处长录像非常专注。时间快到用午饭的时候,需要录像的部位只完成三分之二。为了争取进度,少耽误一点处长的时间,我们只好在高空 60 余米的塔顶上,用暖壶里的水泡方便面款待友人,请大校在此小憩片刻,涸涸嗓子暖暖胃,接着把像录完。此时军营里的刘春华连长来到塔下,请吴处长回军营用餐,塔顶上的吴处长挥手致意。

像录完后,我们本准备“朋友来了有好酒”,好好地款待。吴处长还是婉言话别后走进连部。不久,就驱车离开了这里。

这就叫军民情,这就是朋友交。



与吴振强处长和达来参谋在塔上留影

### 9、守夜入住“怡神宫”

工程开始,对于工地的管护,对于各种材料的入场和出库等等的管理,都是事在必行和与日俱增,都是务必尽心和不可懈怠的重要事情。

由于开工时工地上房舍奇缺,是经过旗民政局和武装部出面与驻军商谈后,大多数的工程人员,才住在西距大塔工地约 1000 米的驻军部队的营房院落里。看护人员,就住在搭建在工地上的布帐之内。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

零星的材料与器件,只好存放在第一层的塔心室内,将塔心室当做库房来利用。

开工时,在靠近寺庙遗址外的东南隅,有一处建有五间土房的院落。据说这里原是公社武装部长嘎力布的住宅。后来才成为年近花甲的孀居者,杨氏妇女的房屋。

首先,这处院落座落于此,不仅有碍对大塔的观瞻而且还跌杀着大塔的风韵。这是在维修工程期间,非拆除不可的近期的违章土建。其次,为加强对工程的管理和强化工地安全起见,实属必须征用以便暂且用作看护人员渡过严冬的居所。再次,这处院落靠近辽代寺庙遗址,但并没有叠压在遗址之上,是用来修建辽庆州与庆陵文物保管所最佳的用地选择。

为了能尽早地做好征用事宜,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里的民众保护文物的工作,我与苏木的领导们为此而多次地加以讨论和沟通,并由苏木的领导们,如徐贵龙书记和周信经理等同志,出面做杨女士的工作;同时还于1989年6月8日,将此情况向旗政府的主管旗长昭日格图同志,也是施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用书面材料加以汇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总是用哀伤的情感讲述她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以此来搪塞并不断地提高房价,以及换房的条件等等。

在征房事宜迟迟得不到解决,工地的管理问题,有些令人揪心和堪忧。严冬日复一日地逼近,这是无人可以抗争和无庸置疑的现实。偌大的工地上尚没有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可供守卫人员过冬。如要守夜人员在工地上的布帐

中过冬守夜,这里冬季夜晚的最低温度几乎是在零下35度左右,这是根本不可行的事情,面对上述无情而严酷的现实,我们几位负责人,当时确实有感弱智低能似乎是一筹莫展,但并未因此而心灰意冷。

有一天鬼使神差地再见到塔前的小塔时,眼前一亮,突然有了新的发现。喇嘛塔座下的可供游人东西向穿过的,券顶式塔门廊洞,不正是可供守夜人入住的好地方。于是在塔门廊洞的西侧安窗,东侧装门,其间靠西一侧搭上火炕,炕前的地上再安置一铁制火炉。这里已成为一处房暖炕热,室雅人和的好地方。

守护工地过冬人员的住处落实后,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所为,是捉襟见肘之作,但在其时,我的心情自感空前的开阔,随即就脱口而出,戏称此用做守夜人的住处,名为“怡神宫”。

#### 10、在文件背后因我而引发的故事

辽庆州白塔的维修工程,自批准立项到竣工典礼,其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下达的有关维修辽庆州白塔工程的文件有许多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下达到政府部门和文化文博单位。

如:“内文物字(88)14号”(关于维修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白塔的通知),“内文物字(88)21号”(关于组建“辽庆州白塔维修领导小组”及“维修工程指挥部”的通知)等等,都是下达到部门和单位

只有“内文物字(89)39号”(关于保护好庆州白塔维修

时清理出的文物的通知)一文,是直接下发给“辽庆州白塔维修指挥部”,并抄报国家文物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抄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文化局、巴林右旗文化局,而且还是责任直接落实到人的文件。这一“通知”中的“三和四”,行文如下:“三、这些文物均需要进行科学保养,学术上的研究,在没有进行上述工作之前,任何人不得随意开箱看文物,不得向报刊发表消息,违者以法纪处理。四、庆州白塔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工程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进行,这些文物均属国家所有,应集中保护、集中管理,目前仍由维修白塔指挥部德新、韩仁信同志统一负责安排好一切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于1989年10月22日下达的“内文物字(89)39号”这一文件,是针对我们“辽庆州白塔维修指挥部”,于1989年10月14日报请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关于在塔刹(覆钵)相轮檠中发现文物的情况反映与请示报告”后,及时批复的具有政策性和指导性的文件。我们“指挥部”上报的“情况反映与请示报告”一文,同时也抄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朱处长、赤峰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科、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巴林右旗文化局。

当我整理以往的个人随笔和个人收藏的“记忆”时,这一重要文件的下达时间,已有十五个年头之久。在这时过境迁的情况下,文件的时效性早已完成使命。“辽庆州白塔维修指挥部”,也早已成为历史。在此期间,遵照这一文件的精神,虽然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请国家文物局、文保所的两位专家冯耀川先生和郭竹云女士,从北京带上用具和

有关的药剂制品等等,抵达巴林右旗,在巴林右旗博物馆内亲自动手,并以传帮代的形式培养基层的工作人员,对所发现的文物,进行了消毒与灭菌工作。请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所,对发现文物时的共出物,即所发现的六种药材做检验。检验的结果分别为:檀香、乳香、公丁香、母丁香(鸡舌香)、肉豆蔻、槟榔。还指派专人携带部分丝织品文物,赴杭州请中国丝绸博物馆做鉴定。与此同时,开始撰写调查报告和一些准备在赤峰市召开古塔研讨会时的学术性的文稿,并且还将发现的文物和基本情况录了像等等。然而,由于这一文件下达的范围极为有限,可知晓的层面也就局限在“范围”之内。再加之我本人实在是笨拙得出奇,其时个人又无权去揭示文件内容。所以在执行这一文件精神时,还引发出了一些言不由衷和使人尴尬的故事。

有一天,赤峰市委宣传部的于建设副部长等人,来到巴林右旗博物馆,当时我恰好在馆内。待寒暄过后,于部长提出要进库房看塔上发现的文物,我当时语无伦次地回答,将部长等人拒之库房门外。

还有一次,我是在赤峰市里开会,上午会议结束后,市文化局的副局长予舒同志,提出一个动议,下午就辽庆州白塔发现的文物一事,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为此,我于中午就买好了车票,下午坐汽车返回大板,马上给予局长拨打电话道歉,说我实在是忘了,到大板才想起来。

确有其事发生过,岂有此理难通融。

附:影缩件

#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件

内文物字(89)39号

## 关于保护好庆州塔维修时清理出的文物的通知

辽庆州白塔维修指挥部:

你们的情况反映收悉,关于在维修辽庆州白塔时拆除倾斜的塔刹中,于塔体下发现五个窟,清理出的法舍利塔、轴式经卷、佛像、银、金版、器皿和纺织品等文物的保护问题,经研究通知如下:

一、在此项维修中发现文物之事,系重大考古发现,必须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补报审批手续。

二、凡在维修庆州白塔出露的文物,都应做好资料工作,登记注册,建立文物卡片,进行妥善保管,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

三、这些文物均需要进行科学保养、学术上的研究,在没有进行上述工作之前,任何人不得随意开拆看文物,不得向报刊发表消息,违者依法纪处理。

四、庆州白塔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工程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进行,这些文物均属国家所有,应集中保护、集中管理,目前仍由维修白塔指挥部德新、韩仁信同志统一负责安排好一切工作。

特此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抄报:国家文物局、自治区人民政府

抄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文化局、巴林右旗文化局

编发:宝音达来 打印:刘秀芳 校对:王晓华

## 11、丝织品文物鉴定工作侧记

此项鉴定工作,是经一番周折后,分三个步骤,在双方工作单位和有关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才得以顺利完成。

对丝织品文物进行鉴定,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应该找谁来做或者是到什么地方去做,才能做到最好。我们指挥部为此而开展了有目的的多方咨询工作。首先是通过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向内蒙古博物馆和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咨询。其次又向国家文物局的有关单位和专家们咨询请教。最后确定请中国丝绸博物馆来做此项鉴定工作。

经过咨询并认同定向后,如何尽早地去落实到位,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对方能否同意,有没有时间来做,大约得多长时间等等,我们并不了解,单凭我们“指挥部”一方的积极性,还是搞不成鉴定。

1991年11月中旬,我们从大塔维修工地上撤下来以后,就准备去中国丝绸博物馆,争取能达成草签委托鉴定书或鉴定意向协议等等。1991年11月25日,我从大板出发,27日到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报到。由于赵芳志厅长当时正在内蒙古党校学习,所以28日时,我们三位指挥随同文物处的苏俊和王大方两位处长,去赵厅长在党校的住所开会。会议结束时,赵厅长指示,从现在起至明年开工前,要做好三件事。①要尽快去中国丝绸博物馆落实鉴定事宜;②要筹集资金为明年大塔工程验收做准备;③要做好在大塔竣工的同时,在赤峰市和大塔下召开的中国古塔研讨会的准备工作。

赴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争取草签委托鉴定和鉴定意

向等手续时,德新、张汉君和我,我们三人受命同行。

1991年12月6日,上午10时30分我们抵达杭州。先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名为“秋涛宾馆”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着手联系工作。

12月7日(星期六),上午我们先到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与张汉君的学友黄滋同志取得联系。交谈了我们来此的重要目的,并请他代为联系和引见。当然也谈了古塔研讨会的事宜,因为他也是负责搞古建的。下午由黄滋同志陪同并引见,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长办公室,与两位馆长和一位顾问见了面,并开了个良好的碰头与正式接洽会。当天,我们也换了住宿地方,迁至距丝绸博物馆和省考古研究所较近的“华侨招待所”。

1991年12月12日,仍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长室,正式办理了委托鉴定与鉴定意向协议;商定了下一步派人护送文物来此鉴定的时间,以及鉴定专家等赴大塔进行实地考察的时间等问题。

丝织品文物的送鉴工作,虽然是安排在大塔工地可动工前的季节,但是所用时间仍觉漫长。

1992年4月1日,我与魏国强同志,携带好要鉴定的文物从大板出发,先是乘坐客运汽车到达赤峰。从赤峰出发改乘普客硬卧,到达北京。在北京时到国家文物局,经郭旃处长的帮助办理了携带文物的证明后,改乘特快火车软卧,于2月4日傍晚到达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派人接站,当日即安全地住进了博物馆内的住所里。

4月6日(星期一)下午,在博物馆的待客室里,由博物

馆的馆长傅传仁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了为鉴定辽庆州白塔发现丝绸文物的工作会议。看来事先已做好了准备,所以会议开得不但紧凑简练,而且任务分工、工作进程、鉴定方案、办公地点、人员安排等等,都井然有序。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员,除了我和国强而外,都是“鉴定工作小组”的有关成员。有名为顾问的蒋猷龙和汤池二位先生。组长由博物馆的副馆长赵丰先生具体负责。成员有:张敬华、陈迎、薛雁、王训恩、程勤等五人。

4月7日鉴定工作正式开始,工作地点就设在我俩住宿的房间隔壁。鉴定工作一直到4月20日为止,我们所携带的要鉴定的共26件(类)丝织文物,已全部鉴定完毕。其中包括划归为1件(类)进行鉴定的,无首幡4块、平首幡2块。这类丝织物在送鉴时就已残破过甚,所以鉴定时,2块平首幡未能测定出参数。

在此同时,鉴定小组也出具了鉴定报告:“中国丝绸博物馆鉴定报告第11号、辽庆州白塔发现丝绸文物鉴定报告,1992.4”。

当然这次委托鉴定丝绸文物的工作,至此只是完成了“意向协议”中的第一个题目,也就是对丝织物的名称、纤维原料、丝织结构、印染工艺、刺绣技法等等,进行鉴定。至于这批丝织品是属辽还是姓宋等产地问题、保护问题、科学评估等问题,需要专家们赴实地进一步探讨。这第二个题目何时启动,有待商定。为此在内蒙时,原定当鉴定文物的工作结束前四、五天时,要往文化厅文物处去电话。文化厅文物处要率员来杭州,落实下一步的工作和何时启动第二题

目等问题。然而直到4月19日时,只是汉君同志只身到来,4月20日,还是在馆长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会上将汉君同志从呼市带来的上面镶饰有蒙汉两种文字的一面旗帜,庄重而深情地赠中国丝绸博物馆。旗帜上的大字为“精湛鉴定正物华,无私援助暖北疆”,落款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旁缀文辽庆州白塔维修工程指挥部。

鉴定工作实属无偿的鉴定和无私的援助。整个鉴定过程中,不但没收任何一次鉴定的哪怕是工本费或者劳务费;就连我们送鉴定文物的人员,长时间的住在馆里的住宿费,也分文没取。馆内虽然也有食堂,不过这是特为馆内职工,中午回家用饭不便而设。我们在此,也享受到了同等的关怀和待遇。虽然每天的早餐和晚饭还是要自我办理,不过去附近的小食店里买点方便面和面包之类的食品,每天过着不生火不冒烟清闲的早晚,吃得也很不错。可以说这是我平生做梦都没梦见过的仙人般的生活。鉴定工作期间唯独一直压在心头放不下的要事,就是所带文物的安全。因为这些文物,一直就没离开过我们俩人的身边。鉴定时,要一件一件的往外拿,也必须是再一件一件的往回放,根本不可能存放在馆内的库房之中。人们常把苏杭二州的自然景观比做天堂,我们在此也曾分别地去过西湖走走看看,根本再无暇去观景览圣。倒是经常在馆里转转瞅瞅。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建设别具匠心,馆内陈设的展品有古有今。所有建筑均呈蚕白色,座落在一处溪水潺潺、绿草茵茵、山峦叠翠的幽静而开阔地带。慈云岭在博物馆的东南,南屏山在博物馆的西北,玉皇山位在博物馆的西南。三山之间极似

一翘起边端的大桑叶,中间承托着蚕白色的天虫——中国丝绸博物馆。4月20日鉴定工作告一段落后,在即将告别时,凑了白描四句以志这段记忆的收藏不该忘怀。螺祖浣纱迎客宾,织机楚楚架序厅,夏县古茧现代绣,慈屏桑翠托天虫。

1992年8月7日,随着大塔维修工程验收与竣工典礼活动的结束,出席中国古塔研讨会的全体人员以及有关的领导们,已从大塔工地返回到赤峰市宾馆,继续开展研讨活动。此时赤峰市文化局的书记兼局长于雅舟同志,手持赵丰馆长的电报,内容主要是一行4人,2男2女8日到,请接站等等。找我们三位指挥商讨如何安排等事项。因为研讨会还得两天后才告结束,所以就要我先陪同赵馆长等人进行考察活动。当时将有关事宜,于局长就书写在电报纸上并签名落款,让我手持电报以便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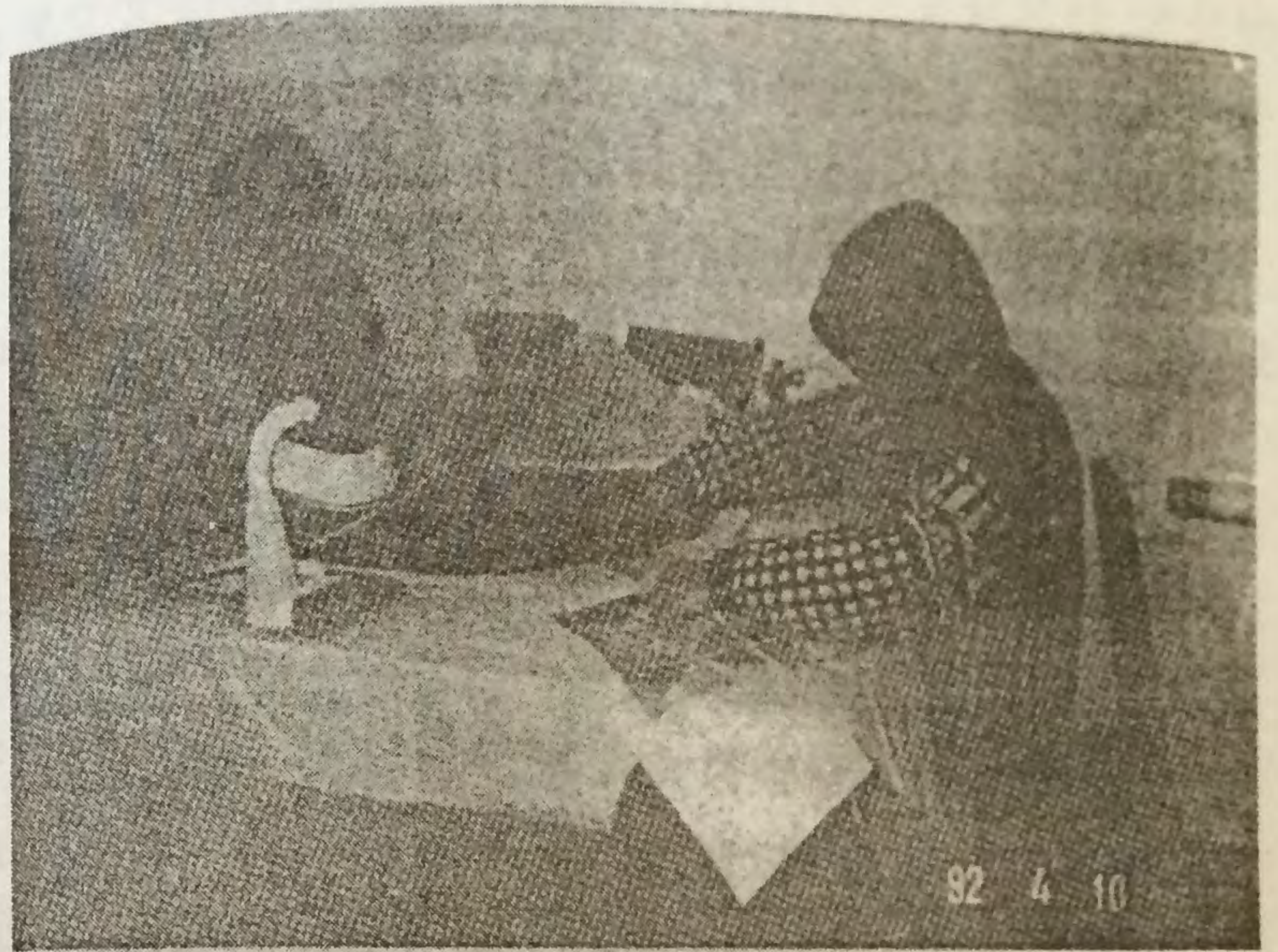
8月8日,由德新同志去接站,安排在宾馆住宿。9日,去市博物馆考察,由高晓白同志具体安排。10日住大板,去馆里参观。11日往大塔工地,12日傍晚从塔下返回大板。这两天的活动用车均是工地上的解放牌大敞车。13日我陪同去林东博物馆考察,坐的是长途客运汽车,下午在上京古城考察,晚间住在林东。14日清晨坐班车,很快就到达阿旗的天山镇,随即去旗文管所考察。不期而遇的是,赵耶律羽之墓被盗后的丝织物堆放在文管所展室的地上。赵馆长等人在丛颜双所长的陪同下,聚精会神地查看丝织物,赵馆长要我为他看墓志铭。因为赵馆长等人,当天一定要赶到通辽,我还有事不便再陪同前行,只好用电话与通辽市

博物馆的书记杜宝山同志取得联系,请他接站和具体安排。  
至此,中国丝绸博物馆派出的以赵丰馆长为首的四人  
赴实地考察组,在赤峰地区的活动,已划上了一个句号。

附:图版 4 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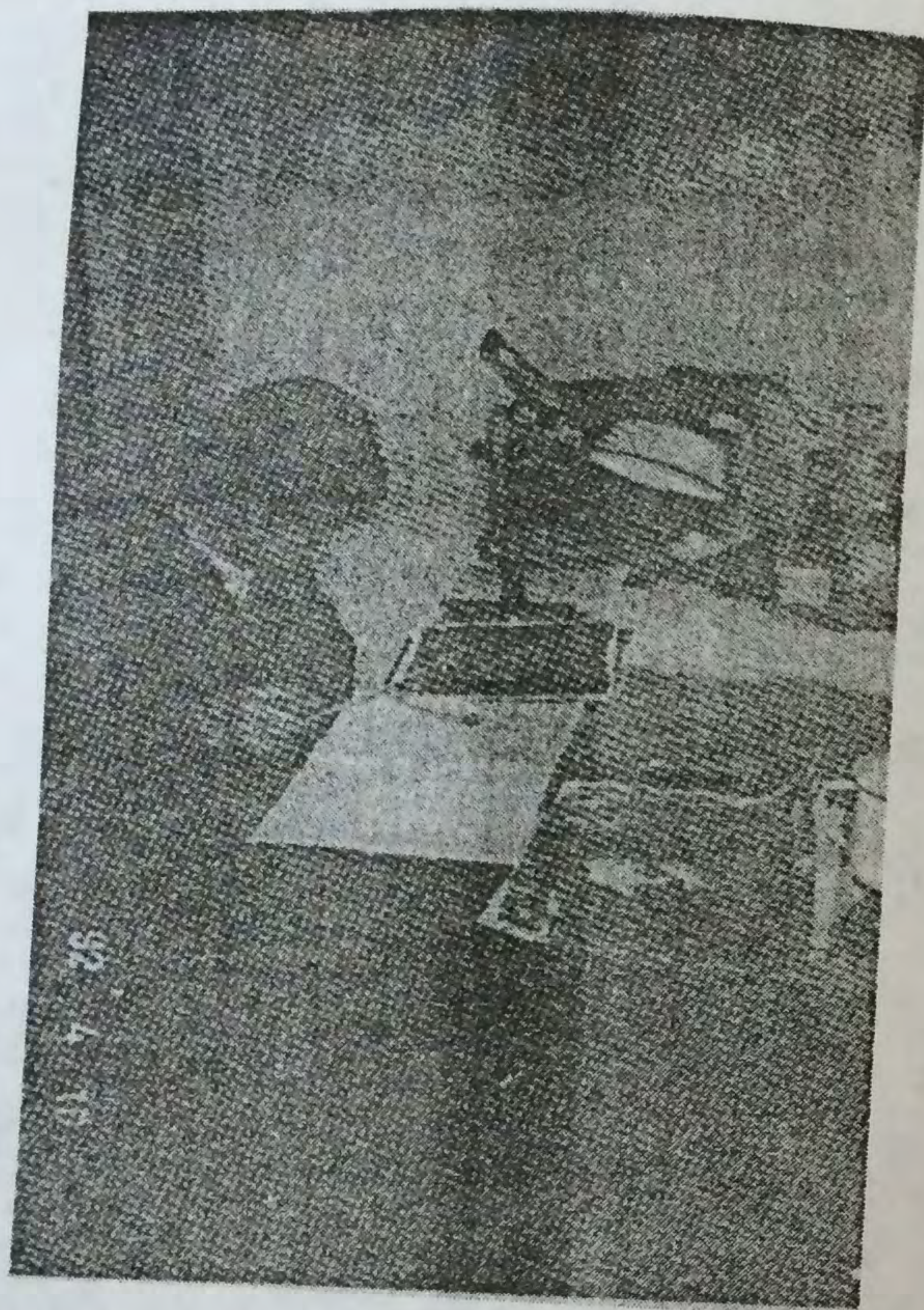
答谢中国丝绸博物馆留影



↓ 专家们在鉴定丝绸文物







专家们在鉴定丝绸文物

### 12、辽庆州与庆陵文管所的成立及其他

辽庆州与庆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以下简称“文管所”,这一专门机构的成立和管所的设置,随着大塔维修工程的立项和维修工程的进展而提上日程和应运而生。

此前,1964年10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将“辽庆州遗址”公布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保护单位。然而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设置专门的机构,或者是安排有关的专人来负责管理。直到1981年初,旗里决定在荟福寺

内成立文物馆和在各苏木乡镇开始设立文化站时,才开始断断续续地从当地雇用兼职人员,看护古塔,名为“看塔员”。费用由旗文物馆支付。

由于大塔在两年内,接连遭受了风暴和雷电的破坏,1981年5月9日深夜,特大的风暴在索博日嘎地区突然发生。事后经有关部门测算风力为12级,且持续约12个小时。因暴风中还夹杂有雪,所以当晚在当地不仅冻死或者是连冻和被窒息而死,一共为12人,冻死或者被风暴刮死大小牲畜1700多头只。而且在暴风的袭击中,塔刹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塔刹上的青铜铸件,有一块火焰被暴风刮落地下。这一风暴经过大板街时,东大庙前后两座大殿歇山顶西北一侧的垂脊,均被刮坏。前大殿此垂脊下的搏风方砖,全部被刮落下来。

1982年6月1日,中午12点,雷电轰击大塔,我是在接到苏木反映情况的电话时,因没交通工具,只好第二天坐班车才赶到现场调查。据目击者所讲,当时学校正要放学,只见在塔顶上聚集了一大块乌云。突然一声巨响时,一团火蛋早已直接落向塔顶,似乎不在正中,有些偏在塔的东北。我借用了当地驻军的望远镜,经与军人和有关人员认真观察后,发现在大塔东北第五层的塔门处,木门板有裂开的新的损毁痕迹。一层塔心室券顶门洞的东墙壁上,有一道垂直的泥灰皮已被击损成沟状的槽痕。塔门的栏下的一道垂直的泥灰皮已被击损成沟状的槽痕。塔门的栏下的石条被击毁为两段。塔身下的砖砌须弥座上出现一道横向长约5米以上,宽约一指的裂缝。塔身外近东南侧,从上到下,似有一道纵向,当时没法看清,是否呈连贯的裂缝。

至此,几乎是每年都向上呈文申请维修大塔,当然有时还硬着头皮,手持文件,直接面见有关部门和领导。

直到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庆陵与奉陵邑庆州”也公布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下达了“维修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的文件时,文管所的设立才真正提到日程之上。

依据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第二章《文物保护单位》第九条的规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所以,此时成立文管所,是依法行事。

维修工程开工以后,对于文管所的建设,已列入了工程之中,当时已想到如果此时能有文管所的人员,在工地边建设、边学习、边完善,这应该是难得的机遇,也确属事在必行之事。

后经旗博物馆和旗文化局与旗编委商谈后,报旗政府批准于1990年成立“文管所”。文管所为股站级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定为2—3人,工作人员从当地的教师队伍中调配,经费开支由旗博物馆统一办理。

文管所的成立,是在文物保护单位设置的专门机构,是文物工作中的要事之一。

## 四、珍闻趣事散记篇

辽庆州白塔所在地区的文明史,并不是自契丹民族的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创建辽国时才开始,更不是到辽兴宗朝的景福元年(1031年)时,在这里始建庆州城时才出现。这一地区的文明发端,与我中华悠久而绵亘的文明为同步,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有些不同而已。

这里我们姑且不谈什么农耕文明与畋渔文明的不同,只就中华文明本来就是多元一体而言。如果这一整体,可有台前幕后之分,可有场上场下之别,可有前庭后院之异,那么在西拉沐沦河南北和大兴安岭内外地区的文明,在许多的时段里主要是扮演或是充当着后者的角色,当然也有到前台登场的时候。

在此我们首先概略地回顾和追溯,契丹族在此创建辽国前的情况。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时,我们在搞文物普查工作时,就辽庆州周围广袤的大地上,在许多处的地表上,已发现并已采集到,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五千年至一万年前的遗存。其中距辽庆州城较近的,暴露在地表上较多的遗址有:在庆州古城南10公里的青根沟后大山,大山前的“青格勒沟遗址”。北距庆州古城址14公里的毛日根胡图鲁大

山,大山前的“胡都格绍荣上营子村后遗址”。因为工作做的不多,有一些必须做的工作,如搞一点试掘工作,我在负责本旗的文博工作时,从未曾做过。所以还不能肯定地说,它们属于哪种类型的文化,且调查报告也没发表。不过这并不妨碍此地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们在这里生活繁衍的历史。

如果有史料的记载中去回顾,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部族大联盟的,史称“东胡”的领地。东胡族称的最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史志中很难考证,史学界也说法不一,并常常与戎狄混在一起,直到其强盛时期才有单独记载。其时匈奴自称为“胡”,又因为当时东胡地处燕赵两国的北边,恰好又位在匈奴的东边,因而就有“东胡”名称的由来。那时的东胡不但经常要与燕赵两国进行交往和接触,势力也很强大,可能曾战胜过燕国,要不怎么能把燕国的一名贤将名叫秦开的人,留在东胡做人质一事。后来秦开回到燕国,因秦开熟知东胡的情况,带兵把东胡打败,史称“却胡千里”。东胡战败后,向北退却了一千多里。具体的地理位置,考古工作者们已探明了一段燕长城,就是西边起自造阳(河北省赤城县北的独石口),长城走向沿燕山山脉由西向东,经河北的围场境内,进入赤峰市所辖的喀喇沁旗,向东越过老哈河进入辽宁省建平县的北境,再进入赤峰市的敖汉旗新惠南,后进入哲里木盟的奈曼旗后,往东直到东端的襄平(辽宁省的辽阳市)。这一段燕国的长城地带,应是当时东胡北退后的物证。不过这并没影响东胡势力的壮大,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东胡已是一个极强盛的部族联盟。

比如在秦二世皇帝元年时(公元前 209 年),匈奴冒顿杀死他的父亲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东胡王就借机行事依势压人,派人去向冒顿索取他父亲生前的坐骑千里马。冒顿单于以“奈何与人邻国而爱惜一匹马”的姿态,遂将千里马送给东胡王。

东胡王自恃强大,以为送来千里马是匈奴单于冒顿怕他,不久又派人去向冒顿索要冒顿的爱妻。史书载“单于的阏氏”,“阏氏”一词,是汉代时的匈奴用语中专称君主的正妻。这两个字的发音,史书中标注为(烟支)。对此,冒顿单于仍以怯懦的姿态“奈何与人邻国而爱惜一女子”,遂把爱妻也送给了东胡王。

东胡王越来越骄横,原来东胡与匈奴两大部族之间早有约定。在两部族的领地之间,留出一块相距约一千多里的缓冲地带。各方只可在靠近本方的这一地带的边缘放牧,任何一方不得入内。史书中称这一地带为“弃地”,匈奴语叫“欧脱”。东胡王不但擅自撕毁这一约定,在入侵弃地的同时,又派人向冒顿单于索要这块土地,意思是匈奴顾不过来关照这块土地,不如东胡独有。这时匈奴单于冒顿,则以“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的强势姿态,非但没答应这一要求,而且于西汉初年汉高祖元年时(公元前 206 年),乘东胡王骄横无度又无任何戒备的时候,出兵打败了东胡。东胡这一族称,自此以后的史志中,再不见踪影。

当时被匈奴冒顿击败的东胡部族中,败退时又分为了两支,一支退到如今赤峰市的北部,即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三旗北端的大兴安岭山脉中的一段相连

的山脉,史书上称为“退保乌桓山”,其实就是如今称为的“乌兰坝”或“乌兰岭”。从此就以这一大山为退居地区的代称,落住在这一地区,后来这支部族就称为乌桓族。另一支退的较乌桓族更要远一些,就是如今哲里木盟西北部的,今霍林河市一带,也是大兴安岭山脉中的一段山脉,名叫鲜卑山的大山,史称“退保鲜卑山”,也以大山为退居地区的代称,落住在这一地区,后来这支部族就称为鲜卑族或者叫做东部鲜卑。

《后汉书·鲜卑传》中载,鲜卑与乌桓相接,只是鲜卑较靠北,其时并不经常与中原交往。

乌桓最初北退,以乌桓山为居住地的指代后,驻牧在今西拉沐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所,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地宜青稞与东墙。能作白酒,不知作曲。妇人能用皮革缝制衣服和幕帐(笔者:稞就是糜子,东墙就是荞麦)。”《后汉书·乌桓传》还记载:由于当时乌桓势力孤弱,常常要臣服于匈奴。每年要向匈奴输送牛、马、羊皮。如果是到时候没准备好,动不动妻子就要被抓走。

到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时,汉将霍去病打败匈奴左贤王。汉武帝为了分化匈奴的实力,允许乌桓南迁到今华北的北部,即塞外五郡。这里所谓的“塞”,实际上是指长城附近的障塞。当时的分布中心,在今赤峰市的老哈河流域,以及西南边的河北省的滦河流域,以及东南边的辽宁省的大小凌河流域一带,所以历史上又有“赤山乌桓”一说。后来,随着匈奴的西遁南附,乌桓也随之西迁南进。

在乌桓向塞外五郡南迁的同时,驻牧在乌桓东北与乌桓相接的鲜卑,随之就占据了西拉沐沦河流域地带。《魏书》中有如下的记载:“其语言、习俗与乌丸同。……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这里的“作乐水”就是《后汉书》中所记的“饶乐水”,实际就是辽代的“潢水”和而今的西拉沐沦。

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和好,后东汉政权采取了联络鲜卑,打击北匈奴的策略。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时,打败了北匈奴,北单于只好率领残兵败将西迁中亚,离开了蒙古草原,鲜卑趁势占领了匈奴故地。当时残留在草原上并未西迁的匈奴仍有十多万落(户),都降顺了鲜卑,有的还向东迁徙与鲜卑杂处,且皆自称为鲜卑,并逐步完全鲜卑化。

东汉桓帝时(公元147年—167年),鲜卑出现了一位主要人物:名叫檀石槐。他把鲜卑各部联合在一起,成为空前统一的鲜卑军事大联盟。当时加入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其中就有原来驻牧在阴山东部的,属匈奴部族的宇文部。宇文部不仅东迁加入了鲜卑檀石槐军事大联盟成为了“东部大人”,而且还居住并统领着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鲜卑部落,并且同时名为“宇文鲜卑”。此外,居住在今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的阿里镇西北10公里的,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一带的秃发鲜卑,也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

三国时期,鲜卑军事大联盟已完全瓦解。东部兴起的宇文鲜卑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于公元344年,也就是史

称前燕的慕容皝称为燕王后的第七年,被前燕战败。宇文鲜卑首领乞得归,逃往漠北后死在漠北,宇文鲜卑部为前燕所并。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源于东胡族系,原来与宇文、库莫奚三部落在一起游牧,自乞得归逃遁后,遂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到北魏登国三年(388年),库莫奚又被道武帝拓跋珪击败,部众逃散。契丹只得单独游牧于潢水(西拉沐沦)和土河(老哈河)流域一带,从此自号“契丹”。

由上可知,这里自西汉起,经东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到北朝和隋唐直至契丹建立辽国,历经一千二百余年。这里始终是我国北方民族活跃的舞台。这里始终是以东胡族为主系的游牧民族,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生息繁衍的地方。

现在,我们再走马看花般地浏览一下,自契丹族在西拉沐沦以北的沙里河畔,营建国都上京临潢府,以及在此地营建庆陵与庆州,直到现在为公元二十一世纪初,这段也已历经了一千余年的情况。

契丹族,自公元907年起创立国号,不久就在本民族的先民们亘古游牧的草原上,营建了塞北的第一座国家级的皇都。从此,中国的游牧民族,不仅吸收与继承了中华文明中的城居文化,并且在其国地的领地上加以发扬光大,先后营建了五京、六府,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的泱泱大国。在此同时,契丹族仍然保留了中华文明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并且还将这一文明形式,发展为治理国家

的“四时捺钵”制度,因而契丹族所创建的辽国,又被世人誉为“一代行国”。

辽国的民众,是由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女真人、室韦人和萌古人等等的民众所构成。这些民众或是自有居地而接触交往,或是迁徙流动而错居杂处,简言之总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碰撞而融合。辽国的当权者,面对这一众多而又不同的种族,且又有生活习惯的不同,居住区位的差别等等纷繁复杂的问题,如何应对时,采取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又是极为鲜活的“因俗而制”策略。这是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史中,出现“一国两制”的先河。

契丹族创立辽国后,将位在长城以南的幽州,升为辽国的都城五京中的南京。至此“长城内外是一家”,已不再是一句空话。以往的长城,是横亘在中华民族间的一种障塞。而今的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雄伟壮丽的风景。辽国将幽州升为南京的这一举措,也为日后统一的中国,将国都从长安到洛阳而转向北京,奠定了基础。

辽国的文化理念中,契丹族也秉承着中华的传统文化思想,坚持“皇权神授”和“天人合一”。契丹族十分崇信“天神地祇”。辽国在其故土大草原上祭天时,有天山,名为“木叶山”。礼地时,有地山,名为“黑山”。这里的文化形态,仍然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理念。“白”为天,“黑”为地。我以为“木叶”一词,应是契丹语汉字的直译。“木叶”的契丹语,当为白色的意思。

契丹民族立国后不久,就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契丹字。史志中记载,先创制的是契丹大字,后来经过不断地

完善和发展,又创制出了契丹小字。从历年来出土的志石和已发现的一些物证材料来看,契丹字无论是大字还是小字,都是依照汉字方块的形体,对汉字的横撇竖捺点弯勾挑等笔划的结构,进行添加或是删减,或者是选取汉字上的某些部位,经过增减后,做为契丹字中的声韵定式,然后再加以组合。由于契丹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所以乍一看似乎是汉字,认真地去看,全然不是汉字。当然契丹字中也有直接借用汉字的现象,特别是在大字中这种现象较为多见。比如在契丹字中,用来代表“天”和“日”的文字,契丹大字写作“𡗗”和“日”;而契丹小字则写作“𡗗”和“𡗗”。如今学术界对契丹字的研究,因为资料少,虽然有些突破,但仍处在进展不大的地步;尤其是对大字的研究,仍有些一筹莫展。虽然如此,然而契丹字的创制,曾为西夏和女真等北方民族的文字创制,起到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借鉴。这是契丹族对祖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又一贡献。

辽国自公元907年太祖立国后,共传九帝。到辽保大五年(1125年),天祚帝被金国所俘,辽国亡,共历经218年。

生活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中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的生女真,于辽天庆五年(1115年)时,完颜部的首领阿骨打,率领生女真军事部族联盟,不仅摆脱了受辽国约二百年的统治,而且阿骨打即帝位,立国号为大金。

辽天庆十年即金国天辅四年(1120年)时,金国攻占了辽上京地区。起初,辽上京临潢府,被名为金国的“北京临潢府”,庆州仍名为庆州。后来,随着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

辽代的中京大定府,改为金国的北京大定路,临潢府并入大定,庆州也改称为“奉州”,下设一县,名为“朔平”。金承安二年(1197年)时,金国将辽代时设在西拉沐沦河以南,今乌丹镇的丰州改称为“全州”。将辽代时的保和馆,开始时改称为“黑河铺”,1197年时升为“卢川县”归“全州”管辖。

金国统治时期,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游牧部族,渐渐地强大兴起。特别是居地在今呼伦贝尔盟一带的鞑靼部。该部中居地在克鲁伦河下游、呼伦贝尔一带的阻卜,在阻卜之南,居地在今“哈拉哈河”,有时也叫“喀尔喀河”以北的翁吉刺惕,此二部经常侵扰金国。金国为了防御鞑靼等部族的人侵,至金章宗明昌时期,筑边堡,修壕堑。今穿越巴林右旗北部朝阳乡和索博日嘎苏木北部的“金界壕”,以及位置在今索博日嘎苏木的“白石头沟”东南,阿日山河河流北岸的“多尔博金和仑”古城址,就是金明昌时期所修筑的界壕边堡。

金国自1120年攻占辽上京地区,到1216年时这一地区又被蒙古军占领,其间共历经96年。

蒙古族是东胡族的后裔,早期分布在大兴安岭的北端,今呼伦贝尔盟的额尔古纳河之东,为室韦诸部中的“蒙兀室韦”部。辽金时期隶属二国,曾用名有蒙兀、萌古、蒙瓦等等。直到“明代”撰修“元史”时,采用“蒙古”二字。

元朝是由北方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王朝和统一的国家。

金国泰和六年时(1206年),铁木真即帝位,被尊为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

此前,金国熙宗皇统七年(1147年)时,金国曾与蒙古构和,割让今克鲁伦河以北的二十七寨给蒙古。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时,蒙古也曾助金国击败过鞑靼。

金国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时,蒙古军大举进攻金国并占领金国的中都,即辽代的南京,如今的北京时,蒙古军早已占领了辽上京地区。其时在金国为北边军官,号为“千户”的契丹人耶律留哥,率领六十余万户起义反金后降顺蒙古。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时,赐其金虎符,封为辽王。后来又准其迁居临潢。

到1297年元成宗元贞三年时,南宋亡,至此北方民族之一的蒙古族,统一了全中国。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时,元朝亡。在中华大地上登台亮相的蒙元帝国,共传18代帝后,其中有16代皇帝和2代皇后(太宗后,乃马其氏和定宗后,海迷失)先后执掌国政。如果从成吉思汗立国算起,蒙古族建立的蒙元帝国,共历经163年。如果从忽必烈于1271年即至元八年时,将国都迁至今北京,改国号为元算起,元朝共经历98年。

元朝的建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唐朝后期,已开始形成的宋、辽、金、西夏等政权相互抵牾祖国不统一的分裂局面,而且为分布在北方草原和内外大兴安岭广大地区的民众,开创了安定的环境,为各民族间的交流、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家和万事兴的促进。

由于多年来的争战,民族间的不断交流和杂处,还有元朝的民族政策,将全国的民众分为四种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其中蒙古人为一等人也是处在统治阶层的

人,所以在元朝时期,分布在中国北方的许多非蒙古族人,主动地自称其为蒙古族,或者是融合为蒙古族。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率领明朝军队攻入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走塞外,到达今克什克腾旗境内的应昌府,仍称元朝,历史上称之为北元。

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将国都迁至元大都,即如今的北京。其时虽然明朝在其东北设有“三卫”,然而均在今辽宁与内蒙古交界的“努鲁儿虎山”以南一带,如朵颜卫在今辽宁的凌源,泰宁卫在今辽宁的阜新,福余卫在今辽宁的彰武。明朝势力并未抵达西拉沐沦河地区。

北元政权,也可以说是故元势力,以应昌府为据点,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方面维持旧日的统治,在草原上实行封建割据,一方面不时地犯扰内地和抵抗明军的来犯。从元朝末年起至北元灭亡时,故元势力在此与明朝抗争二十多年。应昌府事实上是蒙元的又一都城。

公元1214年时,成吉思汗将得自金朝漠南的土地,即老哈河与西拉沐沦河流域,封赐给特薛禅之子,按陈兄弟。从此弘吉剌部就徙到这两河流域。巴林右旗的地域,当时已成为特薛禅的后裔,以及弘吉剌部所拥有,其实也就是成了鲁王的封地。

特薛禅,蒙古弘吉剌部人。孛思忽儿氏,名特。成吉思汗赐号“薛禅”,意为贤者。其女,孛儿台,为成吉思汗正妻。“鲁王”,为元朝时的王爵封号,弘吉剌部驸马蛮子台,为始受封之人。元至元七年(1270年)在今克什克腾旗的达里诺尔西畔,营建应昌府城邑,为“驻夏之地”。元贞元年

(1295年),以应昌府东700里,在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门外,营建全宁府城邑,为“驻冬之地”。这两地,有时均称为鲁王城。

明朝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时,随着北元势力的衰败和草原上蒙古地方势力的分裂和兴起,鞑靼部首领鬼力赤,杀死北元的坤帖木儿汗,废去“元”朝的称号,自称为汗。从此,蒙古各部的首领们,开始争雄称霸且各自称汗,掀起了不断的内讧。

自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兀良哈万户驻牧在昭乌达地区。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开始分裂,不久察哈尔万户就迁至西拉沐沦一带驻牧。此后原分布在呼伦贝尔盟的喀尔喀万户,已发展为十二鄂拓克。喀尔喀河西边为七鄂拓克,河东为五鄂拓克。不久河东的五鄂拓克,也南迁到辽河流域驻牧。当然原先在达延汗时期,分为右三万户中的一些牧户,有的也迁徙到西辽河一带驻牧。这里“鄂拓克”一词,原来是基本军事单位的名称,为蒙语用汉字直译。后来又改称为“和硕”,到十七世纪以后,这一军事单位的名称,从鄂拓克到和硕,后来就完全变为封建领地的名称“旗”,所以旗又取代了鄂拓克。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生活在东北的又一古老民族,史称熟女真,明朝称为建州女真,后来自改称为“满族”。当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后,称汗并建立了金国。为了与12世纪至13世纪时生女真所建的金国加以区别,史称努尔哈赤所建金国为“后金”。

明崇祯九年即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

(今沈阳)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并定都在北京。

从后金到清朝,前后共传十二代皇帝,历经329年。清朝也是由北方民族满族,建立的全国大统一的朝代。

后金政权时期,为使中国北方在草原上游牧的蒙古各部,能各自有一处可安宁的驻牧之地。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时,开始为蒙古各部,界定驻牧之地。当时的巴林部,界定的驻牧之地,就是辽代时的上京临潢府所辖的区域。从此,这块土地就约定俗成地被称之为“巴林草原”。这里的人民也就告别了时不时地总要远走他乡的迁徙生活。

综上所述,在我中华这一大段的文明史上,这一地区并不仅仅是中国北方民族交流、接触、融合和生息繁衍的地方,而且正是因为这些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不断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由后院来到前庭,自场下进到场上,孜孜以求的传承和弘扬我中华文明,为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中国的边疆地区,并非是化外之邦和蛮夷之地。中国的边疆民族,并非是只要在族名前加一个犬字“犴”字旁的符号,就是二等公民,就得任人宰割,就只能为中原的统治者效犬马之劳。中国的边疆地区,也都是地灵人杰,也都是龙兴之地。中国的边疆民族,也都是龙的传人。

中国历史考古界的先贤苏秉琦老先生,在他生前于1983年7月的一次讲话时,讲了如下一段话语,令人茅塞顿开。“朝阳、昭盟、京津和张家口地区。这一地区文化发



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汉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本篇的内容,我原想是能顺着这里历史文化的长河,选择一些史志失载或者是史载不全的珍闻趣事,散记成篇。然而事与愿违,因为世数久远,史志不载或史志缺失,如果说是有的话也应早已湮没。虽然有一些传说的记载,但多有不实,且众说纷纭。所以只好更改初衷,以此次维修辽庆州白塔工程的前后这段时间为主段落,把在这一时段里发生或发现的,一些称得上珍闻或是够得成趣事的边角史料、花边故事、遗闻轶事、往事谜团等散记成文。

散记在这里的珍闻趣事,犹如散落在巴林草原上辽庆州地区的一些五彩缤纷的玃珠。在此把它们串缀起来,成为一束璎珞,或是成为一条项链,或是成为一串数珠,愿它为这里积淀丰厚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增光添彩。

### 1、白灰中的秘密与赵江师傅的欢乐

在大塔的维修工程开始后不久,许多常来工地观看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近花甲但神情矍铄的老人,主动来到“指挥部”,自我举荐,并提出想法,想在工程中或是工地上找点他们父子,能干得了的工作干干。

这位老人名叫赵江,原是巴林右旗农机具修造厂里锻造车间的一名工人。七十年代时,为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

职工下乡的政策,举家离开了大板镇,迁移至今距大塔工地东北约7公里的阿山河落户。老人自己讲,他们家是既工、又农、也牧,还买了一台小四轮拖拉机想再跑点运输。一年四季里虽然烘炉上的活不很多,但是时不时地还是要开炉点火,为农牧民们锻打一些急用的铁件零活,这也算是没把手艺丢了。

为了不冷落赵江师傅的这种积极的热情,当然当时的工地上也确实有一些杂乱的车活,急需雇车来处置。所以就先商谈好了雇用他们家的小拖拉机的事宜。用了一些天以后还不错,他们很遵守时间,可以说是言而有信。虽然在车价方面也要讲价,但并不是那种让人恶心的斤斤计较的人。后来有一些铁活等等零活,也就都让他们去做了。

在工地上干长了,慢慢地与不少的人也混熟了。有一次与他谈起,这里除了朝阳乡的楚鲁图锡热村,也就是距大塔西南8公里的地方,烧石灰而外,哪儿还能烧白灰时,当时的赵江师傅脱口而出,说他就会烧很好的白灰。当然那时我们既不能不信,因为这话是出自一老工人之口,但又似乎不能全信,因为从来还没听说过赵江师傅烧过石灰。因为工程上一定要使用当地的白灰,同时又不能使朝阳楚鲁图锡热所烧制的粉状袋白灰。为了稳妥起见,先让赵江师傅烧好一拖拉机送来试验,结果完全符合要求,这样二百多吨的白灰合同就签定了。从此,尚好的生石灰块石,就如期地送到了工地。

因为人熟了以后,有些好逗着玩的人也就真的与赵江师傅开起玩笑。有人装的似乎是怕被别人听见而低声慢语

的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烧的白灰很好，就洋洋得意。因为韩老师是你们老乡，你俩又很早就认识，所以连张工都不好开口。你想，你烧的灰好，为什么张工要在白灰里掺上黏大米粥后才可使用。这不是明明摆着的事，你烧的白灰有问题嘛？有几天赵江师傅的脸上，真有些不大舒展。有一天，他还真的跑到和灰的场地去看，那次正好赶上煮黏大米粥和灰的现场，他什么都没说。其实，我与张汉君同志并不知道有这一逗笑的事情。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据说，还是老工人们对他解释后，他才似乎是云开雾散，仍然是那样的积极和欢乐。用他的话说：我老赵江对修大塔没做什么贡献，但这次维修塔上所用的白灰，是我赵江家烧的。

白灰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是自古以来就一直沿续必用且不衰的一种灰浆。由于工程的做法不同，建筑物的部位有别，再加上古建筑物自身的等级差异，所以在使用灰浆方面，就派生出了许许多多的类别和不同的名称。比如有：生石灰和熟石灰；有白灰、青灰、色灰、油灰；有麻刀灰、烟子灰、月白灰等等。还分什么泼灰、泼浆灰、煮浆灰以及糯米浆灰等。如果是极考究的建筑物，在对建筑体灌浆时，就一定要使用掺有黏大米粥的煮浆灰，绝不可敷衍了事。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是辽代皇家寺庙中的典型建筑物，又为“章圣皇太后特建”。所以早在九百多年前建塔时，就已使用了糯米浆灰。我们在工程维修中，一贯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塔刹砌筑灌浆时，坚持使用了糯米粥灰浆。这并不是老赵师傅烧的白灰不好，这是对待维修工程的一种态度，绝不塞责。

## 2、用牛粪烧窑引出来的故事

牛粪做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燃料，对于生活在牧区的居民来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不说是人人都会使用，也可说是妇孺皆知怎样拾取。这里的民众，自逐水草居野次，四时迁移，过着岁以为常的游牧生活以来，就一直是用牛粪为居家的主要燃料。然而对于从来没有在牧区居住过或者是生活过的人来说，则不然，诚然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自河北省曲阳县的石匠们，来自山西省平原市的瓦匠和窑匠们，开始是听说工地食堂烧火做饭时主要用的燃料是牛粪，曾有过不解的疑惑。这能卫生吗？牛粪那股粪臭味能不影响饭菜的味道吗？尤其是听说做饭的师傅们，有时还是用手抓把拿牛粪块来添火，似乎出现了要倒胃口的伤神之感。他们以往生活中的那种牛粪的臭味，似悠然而股股地袭来。此时，他们之中便有人特地到饭房的炉膛前和屋外的牛粪堆，认真地赏视一番，疑惑慢慢消释了。

为了保证质量又不要降低成本，随着用牛粪试烧仿辽大砖第一窑就成功时，我们指挥部和工人们都很高兴。但是此时这些外省来的师傅们，又产生了想法，眉宇间并没完全舒展。他们以为烧一窑大砖就需要近百十麻袋牛粪，如果烧上一窑两窑应该说没问题，要说仍然要接着烧，砖坯不经干好了，或者说是已经装好窑点火后，到这时没牛粪供不上，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果一定很严峻，当然随着我们与当地的老乡签定的协议，什么时间要多少袋，他们就用牛

车、驴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的现实景观，他们的眉宇展开了。然而随着他们脸上的笑容出现，他们不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还要追根问底的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并且说“此生中能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如果不在这里弄清楚，会是一辈子的憾事。”比如牛粪为什么能攒这么多？为什么牛粪块不一样，有的外表的颜色为赭褐色，有的为茶褐色，有的似乎是霜白色。为什么有的牛粪块像砖块，有的又似大瓦片，好象是经过人工的加工，这又是为什么等等。

牛粪多和牛养得多，固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把牛粪做为燃料而积攒起来的多与少，笼统的认为这就是牛养得多少的结果，这样的认识显见有些陈旧和不正确。如今畜牧业经济正在高速度、多渠道迈向强势发展的情况下，有不少的地方已先后建起了“育肥牛基地”。这些“基地”里不但牛养的头数不少，而且是育肥一批就出栏一批，接着就再引进一批，一年四季里从不间断始终是旺季，有谁能说这里的牛养得少。这里的牛是养了不少，不过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没有人看见过，某某“基地”曾经积攒过成垛的牛粪当做燃料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牛是由人工用饲料来喂养催肥，所以这里的牛再多，又因牛粪的臭味原因，不宜做为人们生活中所用燃料而利用。此外，牛又是固定在某一槽头柱前来喂养。牛粪再多也早已被牛蹄踏为粪泥，只可由工人定期连土带粪清理出去，做为农家肥的原料来利用。

草原上的牧户自己家养护的牛，虽然就一家一户而言，多数牧户一家的牛数，只有十几头或几十头，如果是一处村

落每家每户的牛，都散聚在草原上时，那可就是成百上千的牛群了。这里的牛，一年四季里都是采野草为食，只是到了冬春季节大地上的百草枯萎后，也就是草原上牲畜采食的“苦情期”时，或者是遇到草原被大雪封盖的“白灾”时，牧主们才把牛留在棚圈里，用立秋后打贮的饲草，或者是用玉米等秸秆青贮的饲草来喂养。

牛群无论在定居游牧后，还是划区轮牧时，或者是逐水草的“出夏场”期间，每当清晨太阳爬上山头后，牛群就自动地离开了主人的住地，走至相对固定的草场上和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食草和饮水。每到傍晚太阳将要落山前，牛群就成帮结伙、成侣成行地返回到各自主人的住地。有时要进入棚圈或围栏，有时就在牧主人的毡包布帐附近或者房前屋后，就地而趴卧着反刍倒嚼恬静地度夜。在牧区的草原上，常常可以见到，宽窄度约40公分，不为笔直也并不弯曲，而是随着草地山野的起伏而起伏的无任何的人工修饰痕迹，显得低于地表且寸草不生，裸露着土地的蜿蜒似的小道。小道的一端连接着河湖或泉泽，一端深入到草场或者村落，这便是草原上的“牛道”。牛道很少有交插或者是重错的现象，可见草原上的牛们，过着多么自由而有序的生活。

这里的牛似乎是有条件来讲卫生，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自由散撒着时，都很少有踩压或者践踏自己粪便的现象。每天的早上牛群出走后，牧民们就要清理棚圈和围栏里的地面，以及夜间牛群趴卧着过夜的地方。把这里的牛粪拾捡起来，晾晒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以便日后用以垒

垛堆放。至于牛道上和草场上的牛粪,牧民们一般是要等到冬春季节到来时,再开始拾捡。当然有时也有例外,比如有时牧民只是步行去草场看望牛群或羊群时,一不骑马二不驾车,就顺便拾捡一些牛粪,临时在草原山野上堆放成小堆,以便冬春季节出车时,再往回拉运。

这里的人们,拾捡牛粪的工具主要有二。一是可以用手攥握着的柄把长约1米的粪叉,一是可以挎至肩后或者是背在背后的篓与筐。粪叉,有用树木的枝杈经修剪锯磨等工序后,再用皮条绑缚连缀成多股叉头的全木质叉;也有用镀锌的粗铁丝,一般叫做铅丝,通过在木质的柄把上的穿插、连结以及在叉齿上的定位后,成为多股的铁丝叉头。篓有时也称做花篓,多用单肩来背挎。篓的形体,口呈圆环形,从篓口经篓腹再到篓底呈一半球形,且为一整体。篓的用料,均采用手指般粗细的树木的枝条,弯折成半圆形后,将两边的端头,等距、平齐、有序地固定在也是用枝条弯成的环形圆圈上。篓身的枝条,一般有横竖上下两排,枝条间的空隙多为小方孔,多用皮条或是牛毛绳来固定。筐又叫做编筐,其形状为长方形平底,深腹,口大于底且微向外撇,呈圆角长方体平口。编筐,多用双肩背在背后。编筐的用料,一般使用生长在湿地或者是沙丘地带灌木柳丛中的柳条来编制。当然也有的是选用生长在山坡上的一种灌木,当地人叫它“山黄榆”的枝条来编制。

用畜力车往住地拉运牛粪时,一定要在车上装置可装粪的器具后才可行。一般情况下也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车囤”,一种称“车排”。无论其名称是什么,都是用灌木

的枝条编制而成,只是形状各异,因以得名。“车囤”为一整体,朝向车的前后的两端均为圆弧状,朝向车身的左右两边为平直状,且正好能装放在车箱之中。“车囤”的高度约为80公分,有时要想再多装拉一些牛粪时,就要在“车囤”之上,再加上一圈苕折或者是添加些麻袋来装粪。“车排”,为两长两短的四块编笆。其长宽以车身的为度,高度约1米左右。四块编笆,立起来装置在车上后,“车排”的四个角就要用绳索加以固定。

牛粪堆放的地方与形式,一般均选择在住所前相距不很远的,显见高于周围地面的地方。堆放的形式,以往也可见有两种。一种是把牛粪倒进用灌木条早已编制好的大囤内存放。也可以说是牛粪堆外,另有包装。圆圈形大囤,直径在3米左右,圈壁高约1.5米,编制时,就在其上的某处编制出一口可以开启闭合的门。另一种是将牛粪垒成圆角长方体,顶部为漫圆形的粪垛。宽约1.5—2米,长约3—4米,高约2.5米。为使垛中的牛粪少受和不受雨水的浸湿,有时就用粪叉,将鲜湿牛粪拍置在粪垛的外表,然后再用铁锹等工具加以压抹成为一体。

这里的牛粪,除了春末夏初的牛粪均为稀粪,人们并不拾捡而外,其他季节的牛粪多自成饼块状,且颜色为赭褐色,均可拾捡。牛粪如果是被雨水浇打过,就会变成茶褐色,如果是数次或者是数年被雨水浇打过,就要变为霜白色。至于有的牛粪块如同残砖碎瓦,那就是人工压抹在牛粪垛外面的牛粪。

产自草原上牧区的牛粪,牛粪开始落地时,粪的臭味就

与众不同,很淡并不浓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长期暴露在旷野上,再经风吹、被日晒、遭雨淋后,牛粪就只剩下它特有的那股不香的草粪味。这是它被人们认可的,第一个可以做燃料的条件。这里牛粪的结构密实,就是多年在野外,如不是遭到特意地破坏,它几乎是从不自我解体且火力不减,这是它让人认可的第二个条件。第三,这里的牛粪可以说是随时随地伸手可得,根本不用花钱从外地来买,自然就成了绝佳的生火取暖和煮饭烧茶的燃料。

不要忘了,牧区还有一样盛牛粪的用具,那就是在以往每当牧人要驾车出远门,或者是要更换出场的营地时,车上总有一条用牲畜皮缝制的皮口袋。皮口袋里,除了有极少的一些小块的桦树皮外,全都装的是干牛粪。这是牧民们预防遭受大雨时的不测,从生活的百味瓶中,多年来才提炼出来的既可自救又可救急的一种实用良方。这一点,不只是从河北和山西来的师傅们根本不知道,就是生活在当地已多年的人,也即将淡忘或是早已忘却。

### 3、漫话三则

#### (一)蕨菜与绝雌

蕨菜与绝雌是否有关,史志均无记载。我以为吃蕨菜与放绝雌,本无因果关系。辽代的庆州地区出产蕨菜,这里的人们也都喜欢食用蕨菜,只是因为蕨菜的产量有限,采收蕨菜的日期又很短,再加上蕨菜又属闻名遐迩的山珍,所以当地的人们舍不得常吃而已。

以往,并未听说当地人因食用蕨菜,有过什么放绝雌的

传说。近来,就在当地又不知从什么洞穴里放出一股绝雌,“修白塔的人员把辽代修塔的图纸偷走卖了……”。个别的人,似乎是被这股绝雌,雌晕了头脑,也帮腔唱曲地胡雌了一些还不能算绝的东西。所以,有人就提出了蕨菜与绝雌是否有关系的问题。

辽代修此塔时,是否有过图纸,至今仍属无从可考无人可知的问题。试问,如此宏伟秀丽的辽塔,又是辽代皇家寺庙中唯一的前塔后庙,由皇太后特建的塔,要说有图纸的话该有多少?这些图纸存放在什么地方才能千年不朽?

本来当地的民众希望维修白塔,是由来已久的事,尤其是1981年5月9日夜晩,袭卷当地刮死1700头(只)牲畜和冻死12人的特大风暴,和1982年6月1日中午,雷击大塔致使塔体上纵向裂缝更加醒目,塔座下不仅出现横向裂缝,而且一层塔门下的阶石完全断裂的灾害后,这种渴望更为迫切。

而今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并拨专款,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组建领导与维修班子,负责实施维修工程,应该说这不仅仅是盛世修塔,而且对当地的民众来说,这是喜从天降是大快人心之事。

然而当修塔人员进入工地后,冒严寒战酷暑为解决如何维修好白塔,以及要认真落实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制定和批准的“加固为主,局部复修”保护和抢救性的维修原则时,当地便冒出了这股绝雌。

虽然这股绝雌,可谓是空前绝后之雌,但它在损害着当地纯朴的民风,它在亵渎着当地热忱的民情,它也正诋毁着

蕨菜的声音。

我奉劝编造绝雌的诸君,为维护好当地民风民情的整体形象,为维护好蕨菜山珍的品牌,要吃好蕨菜,少放绝雌。

## (二) 辽城与聊侃

所谓辽城,确切地说就是指辽代所营建的京、州、府、县等城郭。辽庆州古城,就是有辽一代的辽城中,较为显赫的城郭之一,它又是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三个皇帝及其后妃的,史称“庆陵”的奉陵邑。自三十年代辽庆陵出土契丹小字的刻石哀册以后,辽城庆州更是蜚声中外。

不过自公元1120年5月,女真人攻陷辽上京城始,庆州城与庆陵随之就遭受到了彻底的破坏和肆行的劫掠。城内的殿堂等建筑物被大火焚毁,财物被抢掠殆尽。庆陵的陵寝被破坏,被盗掘,珍宝被洗劫一空。

此后,又数次地遭受国外列强如日寇等的强取豪夺,以及一些别立名目的不法之徒的盗毁。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辽城与辽陵再一次遭受了罕见而愚昧地破坏。就是城内的大塔也险些被人用炸药爆毁。

然而近年来,有人是出自内心的妄图不规想发不义之财,还是居心叵测企图诱惑他人入圈上套,总是在胡聊乱侃辽墓里有什么宝物等等。结果真有个别的人,不是银铛入狱收监受审,就是被课以罚金。这种胡聊乱侃,有时甚至到了海侃神聊的地步。说什么“庆州白塔当时在修塔时,是用土堆起来修的”,好像此君不愧学富五车,其实都不及鹦鹉学舌。有时聊侃到显见有诬陷他人之嫌时,都全然不顾。

比如说“辽塔上本来有一棵翡翠蝈蝈玉白菜,被中央某位大官的儿子给拿走了。”由此更可见,此君不只是知识惨白,而是在头上也只是一张大于脸的油嘴滑舌了。试问,晚于辽塔700多年以后,才在清代中期出现的翡翠,何以能在辽塔中出现?

我以为,有此种胡聊乱侃习惯的人,不要以为上不了税罚不了款,其实后果并不会轻松。一害自己,身败名裂,世人耻笑,二害他人,上当受骗,后患无穷。

辽城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物证,是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应加以保护。聊侃则多是一种荒诞的邪说,应受到批评和遣责。

## (三) 白塔与摆划

白塔为何白,因为塔的外表通体抹灰后又刷以白色灰浆,故俗称其为白塔。世间各种颜色众多,且并不缺乏,塔体上为什么多选用白色?其因有白色的纯洁,有民族的习俗和崇尚,更有中华悠久文化向来以白色象征天的理念。白色的塔并不只是在这里才有,如云南有大理白塔,北京有北海白塔,似乎在全国各地均有。塔白并不为奇,只是在修塔的过程中这时出现了无可稽考的黠摆划,道可算为一奇。

庆州白塔的维修开工,这里的各族民众无不欢欣称快。1989年入春以来,巴林右旗辖境内的19个苏木乡镇,普遍遭受了严重的干旱。有的地区在入伏前,已是树枯草死,唯独这里也就是索博日嘎苏木比较风调雨顺。此时就有人借故出来摆划:“我们修塔感动了上天”。然而进入伏天以后,

这里几乎是点雨未落,此时恰逢工程在拆解塔刹,这时又有人出来摆划:“拆塔刹惹恼了上天……”。

试问,修塔真会有如此神奇吗?那么若大的非洲连续数年的干旱,何不建个塔来解决呢?更何需联合国来支援。巴林右旗也没必要兴修水利和搞什么人工增雨,只要是多修塔、修好塔,历来的“旱巴林”不就会自然地消失吗?把不下雨和维修大塔拉扯在一起,这纯粹是一种无稽的黠摆划。

索博日嘎苏木北依大兴安岭,林草丰茂,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又远离沙荒地,所以入春以来雨水较多,这是正常的现象。入伏以后,由于太阳出现了黑子,电视节目中报导在全国诸多地方出现了气候反常的现象,这也是另一种正常现象,这些与修不修塔毫无任何关系。

辽代修塔是为了崇佛,有人讲辽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辽朝从崇佛发展到了佞佛的地步。如今我们修塔是为了保护文物,是为了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

再不应借维修白塔之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赞颂,一会儿诅咒黠摆划。

#### 4、密藏日记

1991年8月14日(星期三)

旗委办公室往大塔工地和博物馆里打电话找我,说旗委布仁乌力吉书记想在大塔的什么地方,放点纪念性的东西。看来这是布书记看到大塔的塔顶已经维修完毕,本届的旗党政领导班子的负责人,没能像宁城县维修大塔时,那

届的领导班子负责人在塔顶里放了“宁城老窖”等不少的东  
西。

8月15日(星期四)

上午一上班,我到旗委宣传部面见了吴秀英部长,并与旗委办公室梁新建主任,一起商讨并拿出了个建议。

因为近年来在维修古塔时,有过往塔顶里放置东西的做法,国家文物局对此并不认可。1991年6月9日,国家文物局以罗哲文先生为首的专家们,来大塔工地考察时,已有明确的表态。如今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再没必要往里放东西。要放倒不如把塔上发现的文物再放进去。不过,如今旗委书记有了想法,我们还是要给予大力支持和落实。

下午,旗委宣传部的曹师傅出车,专程前往“罕山会议”去做汇报工作。当时旗里正在罕山林场举办五大班子(旗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旗人武部)领导人的读书会。同车前往的除司机曹师傅而外,有旗委宣传部部长吴秀英同志、旗委统战部部长斯楞同志、旗委办公室的小蔡同志和我。

当车到达大塔工地时,我在工地下车,其余人等继续向“罕山会议”驶去。一来工地上有我的住处,主要是便于我与汉君同志商讨如何落实密藏的措施与形式等等。

8月16日(星期五)

上午“罕山会议”来车接我前去,在会议中间临时休息时,大家统一了想法和认识,比如写文字材料入藏时,不写任何领导人和姓甚名谁,最后的落款,就写旗委和政府的全称。午饭后,会议派车把我送回工地。

下午我在工地上选好了一块新烧的大青砖,准备拿回

大板在其上墨书密藏记事的文字。此时,内蒙古考古所的孙建华同志,带领着发掘床金沟被盗辽墓的同志们,来到了工地。

8月17日(星期六)

上午,我们坐着旗委宣传部的京吉普返回大板。

下午,就在旗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起草密藏记事的文字稿,经布书记、旗政府常务副旗长郭占英同志和吴秀英部长等领导同志通过后,随即就到旗政府的翻译室,等待蒙文的译稿。

8月18日(星期日)

上午,我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用水砂纸研磨大砖,朝格巴图同志帮我研磨了一面。下午,在大砖的两面,分别用墨书写蒙文和汉文的密藏记事文字。

蒙文,由文化馆的阿达拉图同志书写。汉文,我用行楷体写就。

1991年8月19日(星期一)

上午上班后不久,旗委宣传部来电话,要我准备马上去大塔工地,并要求我通知“老格也要去”。老格就是时任旗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的格日勒同志,是旗委布书记的夫人。

出发时一共有两辆车,一是旗委的“三菱”越野车,由革命同志,有时又叫“海布斯格图”驾驶,一是宣传部的“212”。我只管包装和保护已写好文字的大砖。所有准备要密藏的纪念品,一律由布书记亲手打包清点和装在车上。此次同去大塔工地的人员,除两位司机外,有布书记、吴部长、小蔡、老格和我。

近11点左右,小车抵达了大塔工地。不久就开始了密藏工作。在布书记亲自动手从车里往外拿藏品的情况下,于11点45分左右,密藏工作圆满结束。

我当天下午,并没有随车返回大板,而是接着又住在工地。

### 5、小塔的故事

建在辽庆州释迦佛塔正面南门前的小塔,是一座用砖砌筑,外表抹以白灰,并将塔体全刷成白色的小塔。

小塔下建有台明,台明是直接就建筑在辽塔的一层台明之上。小塔台明东南西三个外露的直立面,是用不规则的块石,以砌筑“虎皮墙”手法筑就。台明的北侧不露,是紧贴在辽塔二层台明的直立面上。

小塔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的层位。

最下层的部分,为塔座也叫须弥座。塔座呈方形,但可见有下大上小有着变化的三层。塔座下层正南面的正中砌饰出一个饰有券顶面向内微凹的塔门。此门既不通透,也未设有门框、门槛与门扇,只是一象征性和起装饰性的塔门。塔座下层东西两面的正中,筑有可直通两侧,券顶式的塔门廊洞。据说过去在该门廊中,曾经装设有一转经桶,供礼佛者穿门而过时,虔诚向佛用手拨动。塔座的中间层,略细于下层,又由于其外表存在着有无雕饰的不同,所以似又可视的两层。下边层位为砖雕的仰莲台层,仰莲上仍为光素的塔座层。塔座的最上层,又略细于中间层。该层位在



打猎就是杀生害命,虽然你打猎时很勤苦,可说是从不怕风霜雪雨,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们家里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好转,这次又出现了三射银狐而不中的怪事。这是天的意,这是佛祖在做给你改过的一种征兆。你想想就你打猎的枪法和技术,不要说是一只没快跑的狐狸,就是飞跑着的一只小小的野兔,只要让你发现,都逃不过你的枪口,你细想这是为什么?要我说你不能再打猎了,如果说不好听的话,你再要继续打猎,不仅你家里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张、越困难,你们家里的人口与牲畜,也一定不会兴旺,我劝你三思。

牧民回到家里后,把老喇嘛的说教,从头到尾向妻子学说了一遍,两个都感到喇嘛说的有道理,于是定下来再次进庙向老喇嘛请教。

老喇嘛再见到这位牧民来找他时,就显得十分高兴的样子对牧民讲,庙里准备要做一件善事,就是要在大塔前修一座小塔,并说匠人都已经有头绪了,问牧民有什么想法。牧民当即表示要全力以赴地支持,并说把自己制的土枪也献给建塔工程,还建议能不能用枪的铁筒做成“好勒老”,也就是转经桶上的轴,以表示他听佛祖的话,从今以后永不再打猎。老喇嘛笑着点了点头。

此后,这位牧民不仅把枪献给了建塔工程,还真的把枪筒改做成了转经桶的轴。同时还向建塔工程捐献了变卖皮张的一些钱财,再后来,有了儿子以后,又把大儿子送进庙里当了喇嘛。

我们在做调查工作时,已知被调查者中就有与牧民猎

人非同一般的关系,正是这样的人并不情愿张扬牧民的姓名。是本意不想做贪天之功之事,还是另有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我们尊重被调查者的这种权利。在此只记志,被调查者中有一位是索博日嘎庙上的喇嘛,名叫帕布嘎扎布,而今年已越古稀,就是白塔子苏木琥硕芒哈村人。

这座覆钵式的喇嘛塔,应建于何时,遍查史志仅在1990年出版的《巴林右旗志》书中,见有记载“建于3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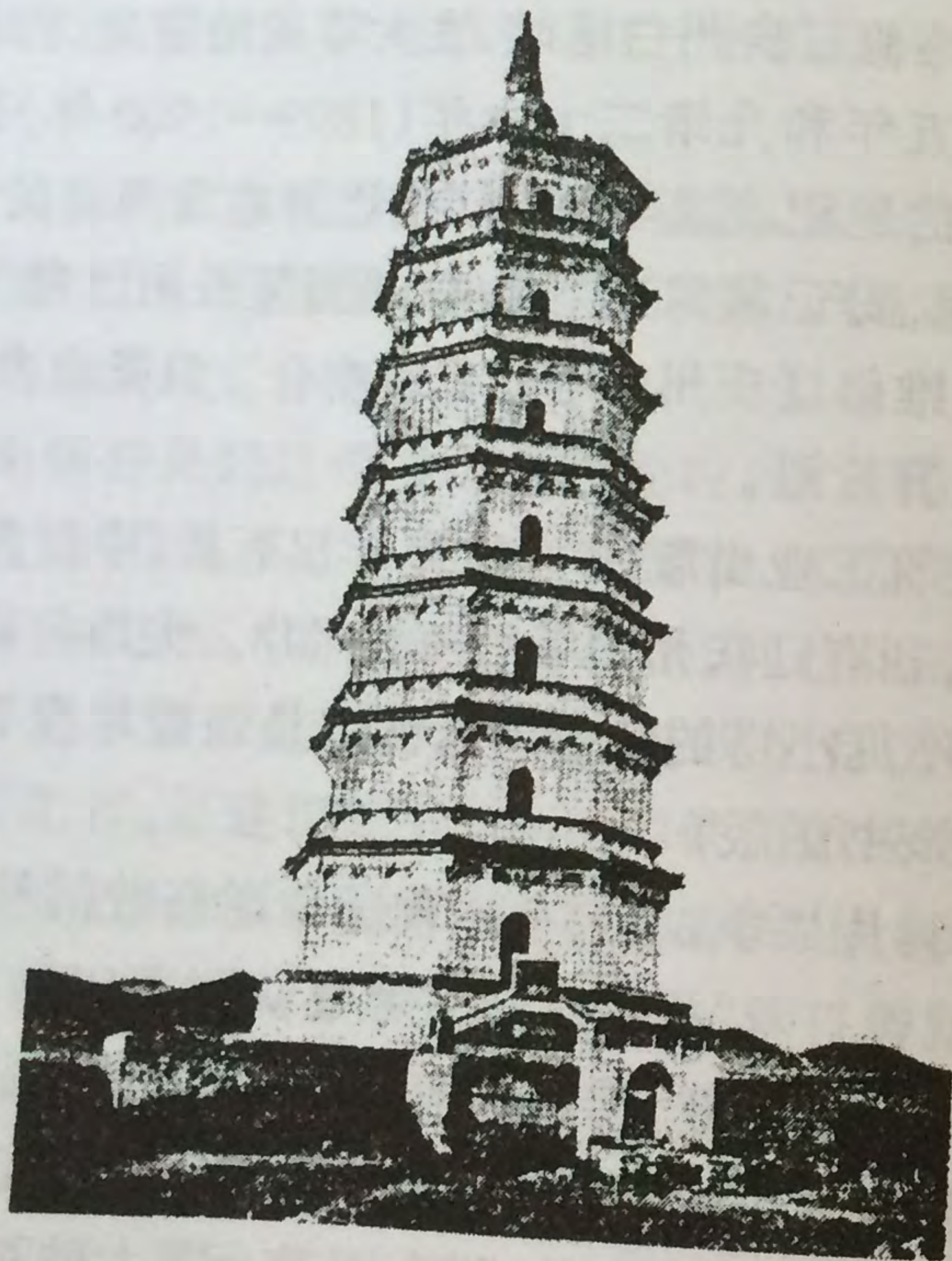
我们在维修辽庆州白塔时,在大塔的墙等处,曾发现有清光绪二十五年和光绪二十六年(1899—1900年)许多处朱书和墨书的题记。这与“文革”前巴林右旗尚存的钢板刻字油印的《旗志》记载的光绪年间,锡盟盟长阿巴嘎大王,曾耗白银万两维修辽庆州白塔的记载吻合。只是未发现有修建小塔的只言片语。

中国建筑业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刊有辽庆州白塔的一帧照片。大塔前有一些寺庙建筑,并不见小塔的踪影。遗憾的是该照片没有拍摄的年代。(附该书图版)

此外,鸦片战争以后,在清政府日渐衰败的情况之下,沙皇俄国就曾打着“旅行家”和“考察队”的名目,派出大量的人员窜入中国大陆,攫取了大量的文物与资料。其中在光绪十九年六月(1893年),波兹德涅耶夫到达辽庆州时的“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大塔南面有一宽大的石梯直通大塔,塔前喇嘛设有小庙。

从上述的一些记载与实际情况来推断,这座覆钵式的

喇嘛塔,应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和伪满州立国之前,即中华民国二十年(1932年)之间。《巴林右旗志》书中的记载无误,只是如果记载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感觉更为贴切。



《中国古代建筑史》书中庆州白塔图版

#### 6、三百件青铜器事件的调查始末

1989年4月17日(星期一)

早晨我刚一上班,旗文化局就来电话,要我不要忙着下乡去大塔工地,说市里来电话通知,内蒙来人要调查三百件青铜器事件,要我做好陪同调查的思想准备。

下午3点,在旗文化局于局长的办公室开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人员有:

陆思贤,内蒙古考古所副所长,为专家和此次事件调查的负责人。

青格勒,乌盟察右后旗文管所所长,为事件的揭发人与目击者。

宋国军,赤峰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为市文化局委派的陪同人员。

于瑞熙,旗文化局副局长兼党支部书记。

格日勒图,旗公安局刑警队队长。

韩仁信,巴林右旗博物馆馆长。

会议的主要内容为:介绍三百件青铜器事件的发现经过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派员下来调查的主要用意。

首先是青格勒所长介绍由来:1989年4月2日的下午6点许,他在北京市崇外办事时,有位呼盟的老乡对他讲:“你不是搞考古的吗,这里住着一位巴林右旗来的老同志,他带来不少的文物,你不去看看。”此时,恰逢这位老同志外出刚回来,他随即就跟着进了106房间。在房间里,他看到了有两件打制的石器、两件鎏金铁器,还有一包差不多有了70—80件的耳环。当时他就叫这位老同志写下了通讯地

址,并且还告诉老同志,这些文物不要再往外台了,谁也不要给,不要把它丢了。这位老同志讲,北京他有两个朋友,他是顺便拿来给他们看看,并说已买好了返回赤峰的火车票。

随后,青所长就到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并向内蒙文化厅拍了电报。他拍完电报后,再去 106 房间时老同志还在。

第二天他再去时,服务员讲老同志已经走了。该人名叫散布拉敖力布,60 多岁,黑脸方形,据说去北京是想要写点什么东西。

他回到后旗以后,1989 年 4 月 12 日接到了呼市的电报,13 日就同陆老师一起出来了。

其次是陆思贤先生讲了下来调查的来意。这件事,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和公安厅都做了汇报,小青同志讲有两包,约有三百多件。一种可能性是想卖点钱,另一种可能性是想倒卖,但不知是否已成案。内蒙的意思是让他拿出来奖励,基本上是铜价的几倍,并且进一步了解去北京的次数,进而获取信息掌握一些深层次的情况。

在会议的谈话中,内蒙来的同志基本上肯定的问题是:散布拉所拿的文物是青铜器,共为两包约为三百件,其中还有鎏金的铁刀。经再次订正,青所长确指包裹的大小均在 15 公分左右后,宋国军同志与我交换了一个看法,要我发言。我只是从包裹的大小,以及散布拉有可能拣到的器件去思考,提出了如下的提问:一个 15 公分大小的包裹,每个包裹中要有 150 件青铜器,这是些什么样的青铜器?这些东西,是不是辽代时期的车马和服装上的饰件?

此时,已到了下班时间,于局长讲:明天一上班还在这里接着开会,并向陆先生示意怎么样?陆先生表示同意后,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件事就由旗博物馆的老韩出面去了结吧。”于局长当即表态,散布拉同志由我们局里负责联系。三百件青铜器事件既然已惊动了国家文物局、自治区文化厅、公安厅以及赤峰市的有关部门,我们一定要认真调查和办理。

1989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

会议的地点与参加会议的人员均没变更。因昨晚局里已弄清散布拉同志仍在必图他自己的家里,所以会议做出两手准备:一是要散布拉带上东西,下午来大板,一是买明天的班车票去白塔子。

旗公安局局长已在白塔子下乡,公安局里就不再派人下去,文化局就指定由我代理,宋国军同志说市里普查任务太紧,明天也要返回赤峰。

上午 11 点 40 分时,散布拉从白塔子打来电话,说他下午来不了大板,“东西”没动全在家里放着,要来也要等到明天下午再说。

为了稳妥起见,决定由陆先生、青所长和我去白塔子。旗里已向苏木通知。

1989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

早晨 7 点乘班车,因买车票时早已没有坐号,我只好提前从大门进站,找到田德站长要了仅有的两个 0 号和安排了一个工具箱上的坐位。10 点 30 分班车抵达白塔子苏木政府所在地,当即到苏木政府报到并落实了住处。

经与苏木政府的有关领导苏木副书记乌兰巴特尔同志、苏木政府牧工商经理邵金才同志、苏木派出所所长王殿荣同志等商谈后决定,先由派出所的民警钱德良同志骑摩托车去接散布拉来苏木,结果是散布拉在家里与友人喝酒过量,未能接来。

午饭后3点,乘坐苏木政府的“212”吉普车,前往散布拉的住所必图村。乌兰巴特尔副书记和钱德良民警一同前往。

下午3点40分,到达必图村散布拉的住所。当时旗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马希同志也在屋里。马希同志讲,他是下乡整理民间艺人的材料,今天上午才来到这里。

散布拉热情地迎接来人上炕就坐后,说“我实在对不住,打搅大家,甚至从呼市来我这里。”紧接着他就把两包“东西”全拿了出来。

一包为辽代马具上的残损饰件。

一包为辽代人物头饰或是衣服上的残损饰件。

根本构不成是什么青铜器,更不见有鎏金的铁刀。

我当即请青所长确认,是不是这些东西?青所长讲“就是,就是”。

我又请陆先生鉴定,陆先生讲:“均是些辽代的东西,一种是带或缰绳上的残件,一种是头服上的残饰件。铁片片不是铁刀,是马镫残块。”

这时散布拉说,他还有东西。随即又拿出一块铜镜残块,一小块“如意头”状的白玉残块,六件新石器时期的柱状磨棒和在巴林右旗北部地区多见的一件石耜。

青格勒所长表态:“这些东西没见过,由老韩处理吧。”陆先生当即向青所长回敬了一句:“你管好你后旗的事行了,你还管人家的什么事。”

此时散布拉,又捧出了两个普通形的玻璃罐头瓶。瓶里装多半下清水,水里泡着不同颜色的些许细石器碎块,还有辽代的残碎围棋子以及少许的绿松石碎块,瓶口上用幻灯机上的凸透镜封盖。散布拉说:“前一个时期,家里来了两个深圳的朋友,他们从瓶里拿走两小块东西,说是给钱,至今还没消息。在没拿走这两块东西时,有时能见到里面好像有小鱼,拿走以后就不见了。”

散布拉同志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说唱好力宝的民间艺人,也曾是辽庆州白塔的护塔员。我以为此时的散布拉敷衍力布,是在尽情地用实物来炫耀自己家乡文化积淀之丰厚,是用艺术而夸张的手法在海侃神聊。

晚8点30分许,返回到苏木。

1989年4月20日(星期四)

从白塔子苏木乘班车返大板,车上非常挤,因为班车的终点与始发站不在这里,是在距此东北约16公里的巴根吐。下午4点30分左右,才回到大板。

安排好住宿后,又落实了明天陆、青二人返赤峰的班车票,其后又为陆思贤先生借了200元的旅差费。

1989年4月21日(星期五) 大风沙

早晨8点50分,送陆思贤先生与青格勒所长,登上班车起程后,我向旗文化局领导以及主管旗长昭日格图同志,做了详细的调查工作口头汇报。

至于赤峰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处的汇报工作,就由陆思贤先生去完成了。

### 7、塔顶神秘的烟云

辽庆州白塔的顶上,有时会出现一种神秘的烟云现象,这早有传闻,只是我未能亲眼目睹而已。据目睹者们讲述的内容,神秘程度略有不同,然而他们对烟云的出没特征、烟云在塔上的位置、烟云的颜色以及烟云的变幻与动向等情况的描述,先后数次的说法还是基本相一的。

塔是一种崇佛的建筑物,是佛的象征,这已令人敬畏。如果是建塔者,刻意要将塔再营建成为集人类智慧为一体的结晶,营建成为承载着人类文明史的砖木质的史书时,那塔就更加令人崇敬,更使人感到神秘难测了。

辽庆州白塔的营建,不但具有如上所述的特点,而且它还是营建在寥廓而湛兰的天穹之下和广袤如茵的草原之上,是在周边数百里的山野之间,唯有的一座宝塔。洁白如玉的宝塔高耸入云,似连天接地的擎天柱。等距如阶的平座塔门,上下排列,又似人间的天梯。由于宝塔的宏伟神奇,将这里的山河草野点缀的格外神奇和美丽。由于这里的草原如画似锦,又将宝塔衬托的更加神奇绝妙。

正因如此,不只是外地人来到此后,个个都会驻足对大塔认真观察。就是当地的广大群众,也因此而养成了一种习惯,凡是已步出户外者,只要是他自认为是在可以看到大塔视野之内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朝大塔回首仰望。

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有

着深刻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原本就是由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所以存在于民间的多元信仰,或者是有时又出现的某些幻想,这并非是空穴来风。这里有历史的承传,也有主观认识本来就落后于客观发展而碰撞的现实。

目击塔顶出现烟云现象的人们,其中多数人,事后传言这一现象就是佛祖在显圣。也有的人,说这是神仙在显灵。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上述人的看法,只是一时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感到有些迷茫。此外,也有人在推波助澜借题发挥,说什么塔里住着一一条大蛇,这条大蛇早已成精。这一现象与大蛇有关,要不塔心室里到了三伏天时,还能那么样的凉爽等等。当然蛇精一说,早已自消自灭。因为“文革”期间,当地的“造反派们”,钻上塔内将塔内珍藏的经文佛书等所有文物扔下来烧毁时,并没有发现蛇精。其后,还有极个别的盗宝者,在塔内自下而上立起木杆,数次钻入塔内,并且有过从塔内向外盗凿塔顶的行为,这里也没听说遇有蛇精的风言风语。当然还有我们近年来多年的修塔。

塔上出现烟云的现象的时间,大都在盛夏之季。当然并不是在每年的这个季节里,都有过出现。当地的老乡说这一烟云现象在塔上的出现,是来无踪去无影。有时是烟云出现后的一两天内,当地就要下雨。有时是当地下过雨后的一两天内,忽然出现了烟云现象。

塔上出现的烟云现象,只局限在塔顶之上。是自刹座往上直至刹顶,围绕着塔刹成为一个圆柱体的烟云云团。云团总是在不停地翻滚,有时又拧着劲的上下滚动。

为灰白色相掺,一会见灰一会发白,有时还似乎在闪现出一点微微光亮。

它既不同于从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只升不降,且徐缓地在空中飘浮,同时还是缭绕在村落之上,也不同于当地有时在将要下雨时,塔刹之上会有片片云彩,随风横向飞渡,且有去无回。

最近的一次,也是我记录有确切日期的,在塔上出现神秘烟云现象,是2002年6月5日。那时,我是在电话里接到旗博物馆新任馆长杨晓雷同志的通知,要我参加旗领导组织考察辽庆陵保护情况和庆州的外城内的西北角出现破坏遗址建设砖窑的事宜。不过我们仍然是晚了一步,我是在2002年6月6日,才抵达塔下。

当丽日晴空时,忽然发现在宝塔顶上出现了神秘的烟云现象,这并不是只在辽庆州白塔上才有的一种现象。以往在报刊上见有报导的信息,已有多处,其中辽宁省朝阳市塔顶出现烟云的报导,就是距离我们这里最近的一处。各地的专家们,对宝塔顶上出现烟云的神秘现象,认同为这是由于一种昆虫的集群行动所致。

这种昆虫的学名为“蚊蚋”,是一种体长约为2—3毫米,属双翅目,头体呈黑色的昆虫。我想,这与我们在有的时候偶尔能见到的,体型极似黑色的大蚂蚁,只是它们个个都生长着两对白色半透明的翅膀,又都不似蚂蚁,且只要是发现它们时,不说是铺天盖地,也多为成群结伙的飞舞在一起。

要说这种昆虫,为什么有时要在塔顶上飞来聚集,我确

实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是不是由于季节气候,由于塔顶上的气流环境,还是有什么气味等因由。不过我以为,这种昆虫在此出现这一现象,一定与它们的生存所需有关系。

由于这种昆虫的个体很小,不说是三五个为一组飞舞在空中时,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就是由三五十个成为一群,飞舞在高约70多米的塔顶上时,人们通过肉眼也很难看得见。只有集聚到成千上万只时,这时人们才开始发现。也正是由于这种昆虫是从少到多开始在塔顶上集聚时,人们看不见,所以就有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来无踪”的认识。等到人们发现这种昆虫集聚成云团后,这种昆虫又开始从多变少渐渐地飞散时,人们又开始出现看不见,所以就又有这一现象消失是“去无影”的认识。

昆虫要在空中某处或是一定高度逗留时,只有不停地舞动双翅才能实现。所以出现在塔顶上的神秘云团,为什么出现不停的上下滚动现象,这是因为昆虫飞舞所致。

神秘的云团中,为什么会出现灰色,这就是昆虫本影反映的效果。因为昆虫的体表为黑色。为什么有时又呈白色,这应是昆虫翅膀的影射或者是折射的结果。至于云团中,有时还出现一点微微的闪光现象,这是昆虫的翅膀,对阳光反射的结果。

人类通过营建佛塔这一特定的基本活动,好好地过了一把品味中华多元文化,回味无穷之瘾。昆虫们也没放过宏伟佛塔这一人赐良机,不时飞来塔顶相聚,好好地风光了一把。

## 8、几多该知道的答问

(一) 辽代时期,为信佛而出家修行的人,有不少名称,如“沙弥”、“沙门”、“比丘”、“僧人”、“大师”等等,为什么不是称为“喇嘛”?

这一问题,看似只是几个佛教中的名词俗语,其实这其中已涉及到佛教在中国的流传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仍要抓住重点,只讨论名词与称谓。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开始是在汉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地区流传和形成以及发展的,所用语言文字,多为汉族语系,所以历史上称这支佛教为中国的“汉传佛教”。到了唐朝以后,这支佛教在汉族地区,渐渐衰落。然而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不仅佛教流传不绝,而且形成了中国佛教中的又一支。因为这支佛教所用语言文字,均为藏族语系。并且形成的地域主要是在藏族聚居的地区。所以历史上称这支佛教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俗称喇嘛教。“喇嘛”一词是藏语的音译,意为“上师”,是对僧人的尊称。当然也可说,喇嘛是指有学问,能带领僧众修行,可为人师的僧人。后来,为了有别于汉传佛教,就将藏传佛教的僧人,统称为喇嘛。

辽代的佛教属于汉传佛教,如上所述不少出家修行人的名称,都是沿用的汉传佛教中的称谓。如“沙弥”,这是指汉传佛教中的小和尚,是指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未受具足戒者。“沙门”是指汉传佛教中,专指僧众的名称。“比丘”有时又译写“苾刍”等,是指在佛教中,已受过具足戒的出家的男性之僧。“僧人”,是指男性出家的教徒。其中对

佛教中的师长,有时又尊称为和尚。“大师”,是朝廷赐封给高僧的尊号。自唐朝开始,对通晓佛教教义的僧人,均赐封为大师。

(二) 在已刊布的《简报》等文字材料中,曾出现有两个不同名称的“三藏法师”,如“后秦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和“唐三藏法师玄奘”。还有的是在僧尼的名称前,又加上了一个词“赐紫”。此外,在个别的材料中还有什么“优婆塞”和“优婆夷”。这些又应如何理解。

上述问题,仍然是属于汉传佛教中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问题。我们还是按问题的先后,依次来加以探讨。

首先,“三藏”与“法师”。“三藏”是对佛教典籍的总称。这里的“三”是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的代词,因为佛教的典籍要包括有经、律、论三大类。这里的“藏”原意是盛放东西的竹筐,在此寓意为近似“全书”。“法师”,是用作为僧人礼貌上的尊称与大师拉近。只有通晓佛教“三藏”的僧人,才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者之一。出生在今新疆的库车一带,当时称为西域的龟兹,父籍为印度人。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时,被后秦王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到都城长安——如今的西安,进行译经。

玄奘,也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俗名唐僧,原籍为河南偃师一带人。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离开长安,赴印度学习佛教经典,到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开始译经。

其次,“赐紫”一词是佛教典故。中国古代的朝廷,赐臣

下衣服以朱紫为贵。唐代仿效此举,赐有功德之僧以紫色僧衣,表示荣贵和恩崇。

再次,当佛教盛行时,也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要出家到寺庙里受戒,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中。如果说真要是一心向佛,可成为不出家的“善男信女”。“优婆塞”一词是由梵语音译,就是指在家信佛的男性的名称。“优婆夷”一词,就是指在家信佛的女性的称谓。

(三) 1981年秋,发现于辽代的黑山前,也就是如今称做赛罕汗乌拉山前已残损的辽代为祭山而建立的碑石铭文中,已发现有“讲经尼”等字样。这应是表明在辽代的佛教中,也有“尼姑”之类的女僧。在庆州白塔发现的大批辽代佛教文物中,是否也有这方面的物证?

这一问题问的没错,虽然我们在1994年的《文物》第12期刊布的《简报》一文中,于“手抄写经”条目下披露了“妙因院赐紫苾刍尼”的发愿文;因简报文字所限,未能加以讨论。

辽代的佛教中,是有出家女,但其时的名称并不是直呼为“尼姑”。尼姑是后来才出现的,是对出家女的“俗称”。当时如果是单指出家女的名称时,要根据其年龄和受戒程度等的不同,又有各自的名称。如出家女的年龄在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只受过十戒者,就要称为“沙弥尼”。如果年龄已到二十岁以上,并且已受过“具足戒”者,就被称为“比丘尼”,有时又译写为“苾刍尼”。当然也称为“沙门尼”,或者称为“尼”。这里所引用的“具足戒”一词为佛教名词,《宗

教词典》中,做如下注释“梵文意译,别称‘十戒’,指佛教比丘和比丘尼的戒律。因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

在辽庆州白塔的天宫,所发现的佛教文物中确有辽代比丘尼使用的文物,虽然为数很少,然而十分的重要。

这件可认定是辽代的,又确实是比丘尼所使用的文物,是一卷佛经。这卷经书,有确凿而又无可取代的一些文字实录。

① 佛书中有明确的年代实录,即“应历十七年”。“应历”这一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辽代的穆宗朝,即辽代的第四位皇帝耶律璟即位后启用,除此而外,无论任何早晚的朝代,虽然也有过“应”字当头的年号,然而绝没有“应历”这一年号之名再次被启用的踪影。

从时间上来看,“应历十七年”为公元967年,也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建国后刚刚七年,即乾德五年。这卷经书,既是已知辽代的手抄本中存世年代最早的,也是至今已知唯一的一卷佛经。

② 佛书中有明确的比丘尼的名号与身份的实录,即“赐紫苾刍尼惠深”。此前我们已讨论过“苾刍尼”就是“比丘尼”。以往有关辽代的史志中,凡是可见比丘尼文字的记载,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这三个字,再不就是简略的只剩下“僧尼”,涵盖有男女佛徒在内的两个字。

而这卷佛经在卷尾处,所实录的比丘尼的名号为惠深,且身份又非比一般,是赐紫比丘尼。就这一重要的资料,不但填补了辽代史志中以往的阙如,而且为研究辽代僧尼的



课题,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③ 佛书中有明确的尼院名称和藏经印记的实录,即“妙因院”与“妙因藏记”。这一实录的文字并不多,但这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发现,是在有辽一代的寺院名录中发现的第一个迄今已知的唯一的有明确名称的尼院。至于这一妙因院应在什么地方,我仍是无从稽考也就无可奉告。

④ 这卷佛经为纸质卷轴装式的手抄本经书。佛经的名称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七十六”。因该佛经是散藏在大塔的天宫之中,所以发现时经书封口处的签条与丝绳均已不存。近封口处经卷的“佛经名签”也只残存有“密多经卷第七十六”数字;“名签”之下,还有一形体较小的真书“荒”字。

经卷总长约 7.6 米,卷宽约 0.28 米。木质卷轴呈赭褐色,卷轴的两头经书的上下卷端的边沿,显见有变色和发脆的现象。卷面对接用纸的幅长约为 0.52 米。经文为汉字行楷相参而书,用笔流畅自如,结构严谨端秀,实为所发现的手抄本写经中书法之上品。

经文在卷首处有“初分净道品第二十一之二”和“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的字样,此当为该经抄写时的底本出处,还有佛经的完整名称。

经文在卷尾处所书“应历十七年妙因院赐紫苾刍尼惠深愿以此书经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这一惠深的发愿文字,其书体与用笔略见稍异于经文。

经文在卷背上,有三处盖有浅红色“妙因藏记”的朱文印记。印迹宽约 2.6 厘米,高约 2.9 厘米。

(四) 史志中记载,辽代不但盛行佛教,而且也流行道教。这次的发现中有没有发现道教的文物?

要回答这一问题,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其一,塔本为佛教建筑,而章圣皇太后又特建释迦佛舍利塔,所以在塔刹中发现的文物,多为佛教的经文与造像和佛教的法器与信物,以及辽代皇家用以礼佛的一些用品与器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在如此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内,发现有道教文物。当然由于辽代社会是始终信奉多教,即儒、释、道和萨满教等。虽然在发现大批佛教文物中,未发现有任何一件单体的道教文物,但是悬挂在塔体外表的众多铜镜,在塔刹中发现的“凤衔珠银鍍金塔”上的“钟馗神”像等。此类现象或内容,都是崇拜道教的一种具体反映。

其二,这次在塔刹中没发现有辽代信奉道教的文物,但是在辽庆州古城址内,以往曾发现和出土过确属辽代的道教文物。

1958 年夏季,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原老所长李逸友研究员,在辽庆州古城址进行考察工作时,曾征集到出土于古城内刚刚不几天的一面铜镜。李先生后来在他撰写并于古城内刚刚不几天的一面铜镜。李先生后来在他撰写并已刊布的文章中认定:“此八卦文铜镜可能原非契丹地所铸,流入契丹境内时再加刻款。可见当时除信奉佛教外,尚有信仰道教者。”该铜镜为青铜质,外郭为八瓣菱花形,直径为 14.5 厘米。正面光素,背面在双勾凸线的花瓣纹内和一圈圆凸点的联珠纹之间,分别铸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汉字。在联珠纹圆圈之内围绕着镜纽满铸花草纹,其间还铸有一“何”字。此外在铜镜的边沿处,还篆刻有“弟来

□□□”五字。此铜镜入藏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  
(附:铜镜拓本)

1982年春,我下乡到索博日嘎公社,为落实看护古塔的工作事宜和人员工资时,当时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郑庆新同志,主动找到我,要向旗文物馆交献文物。旗文物馆创建于1981年初,是旗博物馆的前身。我是旗文物馆的馆长,其后为旗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和创始人。

郑庆新同志当时交献的文物共两小件。一件为带字的片状铜牌,一件为方形无纽白石质刻有朱文的石印。交献人讲,这两件文物是其岳父吴保城于1969年春,在古城内的北部放羊时,偶然在一个地方发现的。为对吴保城老乡聊表敬意,我用自己衣服兜里的钱买了一双军用黄胶鞋加以回赠。这两件文物,现藏于巴林右旗博物馆。

铜牌青铜质,重50克,通长8.5厘米,最宽处为3.3厘米,厚0.5厘米,整体为薄板状。周边呈圆唇,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下端为齐头,唯两角抹圆,顶端为圆弧状。在圆弧的中间部位,特铸有一圆形的内径为0.4厘米的穿孔。在穿孔的左右两侧,以有上部直至铜牌的边缘,均略见加厚,形成一个坚实无华的素面系纽。在系纽上端正中铜牌的两侧面上,均显见有微凹陷的竖向磨损的沟痕,此当为长期系挂所为。

铜牌的两面,均有边栏等饰纹。一面为模铸的边栏和阳文虎形道教符录,另一面为镌刻的边栏和阴文契丹大字咒语。

石印,为白色巴林石所制。形近似扁平,无纽。印面方

形,边长为7.2厘米。印文为朱文,且有外阔内窄的双重边栏,剔地深为0.2厘米。石印的四个侧面,均无边款等刻饰。印顶呈盃顶式,其上正中阴刻一汉文“上”字,明示印的使用方向,石印通高为2厘米,其中盃顶高为0.4厘米。

印文十分奇异,结构诡谲,这应与符咒有关,文字为契丹文的大字。石印在印文近中间的一个字的“圆圈”内,凿刻出与印顶直通的圆形穿孔,此当为系挂和携带方便之专用。

虽然铜牌和石印之上的契丹文大字,至今难以识读,我想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镌刻有契丹大字的只有道教才专用的符录铜牌和石印的发现,这是辽代社会信奉佛教的同时也崇信道教史实的金石之证。

附:铜牌拓本和石印印模图



1958年李逸友先生征集铜镜



1982年郑庆新同志交献文物

### 9、辽金钩沉访庆陵

近些年来，全国性的辽金史等学术活动，有许多次都来赤峰地区召开。学术活动，一般多采用拉练考察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我结识吴振强处长，是在一次永远令人不能忘怀的辽金史学术活动时，增进了认识。

现就这次学术活动的一些情况，将我当时收藏的记忆，摘记如下。

中国辽金史学会第四届年会，于1987年8月25日在赤峰市里召开，于1987年9月5日在市里闭会。

学术活动，分为两段。前一段为研讨交流阶段，时间为8月25日至8月29日。后一段为拉练考察阶段，其路线与日期为：8月30日，从赤峰到宁城，去辽中京考察并住在天义。8月31日，从宁城到大板，下午参观旗博物馆，住在大板。9月1日，赴辽庆州与庆陵考察，晚间仍住在大板。9月2日，从大板出发到林东，下午看博物馆，住林东。9月3日，在辽上京考察，并看“召庙”，仍住在林东。9月4日，从林东出发，返回赤峰。

以下，是我当时参加学会活动的一些杂录。

辽金钩沉哈达城，  
民族团结话古今。  
壮丽赤博览胜迹，  
拟辟基地有赤峰。

中国辽金史学会的第四届年会上，将赤峰和北京辟为辽金史研究基地。1987年8月29日晚于赤峰。

久慕宁城辽中京，

今日再睹倍感亲。  
大塔旁建博物馆，  
承传永志日向荣。

学会活动考察来了辽中京，中京博物馆的建设，已近尾声。虽说建筑形式与大塔有些不协调之感，但建馆宣传甚好。1987年8月30日晚，于宁城招待所。

大板出发向北行，  
庆州小憩访庆陵。  
重峦叠翠山川壮，  
泥水塞路望三陵。

1987年8月31日，参加学术活动的专家学者们，乘车来到潢水石桥处即巴林桥时，受到了巴林右旗各族人民的代表——旗党政领导们的热情欢迎，享受了献哈达和饮“下马酒”的礼遇。9月1日，专家学者们在观看了庆州白塔后，乘车直奔王坟沟时，这里前两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到处变成了沼泽。一辆大客车想冲过草滩时，结果车陷在了泥里，只好从附近的护林站找来檩材，让车轮骑压着檩材上，才将车开了出来。结果是车不能过人亦难行，大家只好站在庆陵区，近东南出口的山梁上，遥望三陵。1987年9月1日晚于大板。

金秋上浣访上京，  
松柏大楼遍林东。  
千载古都今尚在，  
今昔相映育后人。

1987年9月3日晚于林东。

暴雨发洪国道冲，  
行人受阻车不通。  
幸有驻军牵引拽，  
掌声笑声铺路平。

1987年9月3日晚，大雨滂沱又转为暴雨如注，虽然时间并不长就变为小雨，9月4日一早，已是万里无云。但是自左旗的关乃英格至右旗的巴彦他拉，约35公里的路段，遍地是泥滩和水坑。幸好参加学术活动的人员中，有赤峰某驻军的一位参谋处长吴振强同志，是他请调驻林东的炮兵，驾驶着部队专用的“牵引车”，一直将大轿车护送过了巴彦他拉后，参加学术活动的人员，才得以平安而如期地返回到赤峰。1987年9月4日晚于赤峰。

#### 10、遇雪新开坝

1991年的秋末冬初，维修大塔的工程项目，已接近尾声。时下正忙于对台明地面的铺砌和装设周边护栏等工作。

辽庆州与庆陵文管所也基本建成。文管所为一处仿古建筑、硬山式的房屋，和近正方形的院落。院落北端的正中，建有三间正房的附建在正房两侧的各为两间耳房。在西侧耳房前院落的西墙上，设有一随墙门，用以通达塔寺遗址。院落的的东西两端，各建有均衡对称的三间厢房。院落南墙的正中，建有一华美的垂花门。当时，只有屋顶尚未瓦瓦和室内尚未挂棚。

关于“地宫”是否发掘一事，这是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的

问题。我们施工指挥部,是以泰然自若的态度来对待。就是一心只想修好塔,似乎从未有过这回事。说实话,我确实是很认真地想过这一问题。其一,我做为当地的一位文博工作者,又是此次修塔工程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发掘地宫,这是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打开地宫看看,地宫中到底有些什么文物,有没有可释读契丹文的经书或辞书。其二,发掘地宫属于主动发掘,只要与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取得联系,事先办理好申请发掘报告,这绝非是一件不可行之事。然而,当我想到地宫并没有什么塌陷或者是已遭人为盗掘的任何迹象,发掘地宫不仅是要延长工期,而且如何确保大塔的安全也属丝毫马虎不得的问题。发现了珍稀文物固然很好,但是如何做到科学地加以保护好,这是一个严酷而必须直面的问题。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使我的头脑冷静了下来,所以是否发掘地宫一事,我也就采取了冷处理,不仅没与德新、张汉君二位指挥做过什么沟通,当然对外、对上,我也就缄口不言此事。

对辽庆州城址的地形地貌进行实测工作,其时也已正式展开。是由内蒙古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承担,组成了以孙德龙副教授为首的测绘小组,来此测绘。有关这一测绘的结果,《辽庆陵奉陵邑庆州城地形图测绘技术报告》,1992年4月已提交施工指挥部。为什么维修大塔的工程指挥部,能做出此种与维修工程项目并没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有些文不对题的意向。对此,个别的人持有理解不了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要是从单纯为古建而维修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有些文不对题或者是不可思议,如果要是从

维修辽庆州白塔的施工指挥班子的组成来看,这是文博工作者应尽应分的责任,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实这一意向,原来想如果有可能时,争取在维修大塔期间,把辽庆州城城址和辽庆陵陵区的地形地貌,请有关的单位和专家来此同我们一起搞一遍实测。为这一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立科学档案能提供一些资料和做一点工作。后来经过再三的权衡,认识到要想同时搞好这两地的实测工作,并非易事。其中尤以辽庆陵陵区,不仅林深草茂而且面积很大,单靠从工程期间挤出一点可支配的时间和挤出一点可利用的经费,来实现此意向,根本做不到。所以后来还是量体裁衣,只搞了城址的测绘工作。

这里的气候昼夜温差较大,就是在三伏天时,人们在一早一晚都须穿着毛衣毛裤,到了中午时间又要改换为单衣短褂,夜晚睡觉时,只有盖上棉被才能睡熟。

今年的秋末冬初,虽然这里还没下过一场大雪,但是自从过了“中秋节”以来,天气是一天要比一天冷,而且是干巴巴的冷。尤其是一过了“国庆节”,许多人都已穿上了棉衣棉裤。早晚时候已开始出现滴水成冰的现象。

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几乎是一直在陪伴着孙德龙老师等,为实测城址的工作而奔波。有时要跑到白塔子河对岸“呼热艾勒”的东山上,寻找“高程”。有时又跑到白塔子西南“黑山头村”里,去寻找“坐标”。大多数时间,是在城里帮着拽拽皮尺,协助着立立标杆或标尺等等。当然有时间时,我还是要在内城的北城门处和城内的北区皇家宫殿遗址的东侧以及东北侧转转,继续探寻这里的“叢涂

殿”的位置以及“左宗”应占的地位等等。不知是从哪一天起,先是我的下眼睑开始出现浮肿,后来脸部也慢慢地也膀了起来。汉君同志见我此时的身体状况,几次劝我快回大板去医院看看,也有指挥部的“212”车停在工地上,当时老德也在场,当然对这种现象,我心里有数,同时这已不是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时,如果是遇到冷或者是受点冻,一不合适时,以及劳累过度时,这一现象都有过出现。

当实测城址的野外作业即将结束时,最后一车用来铺砌台明的仿辽长条形水泥砖,也由承保制做到运输的单位旗搬运公司,高登武经理随车从大板运到塔下。高经理在工地办理完结算手续后,于下午6点30分左右要从工地返回大板。当时我定下来就坐这辆车回大板,汉君同志当即就安排青格勒同志,同我一道返回,好在道上有个照应。

从大塔到朝阳乡的小大川村,沿途行驶约35公里,大车跑了一个多小时,此时的天空已飘落起稀疏的雪花,挂在天上的星月渐渐无光。大约到了8点左右,大车已开始驶向新开坝上坡度很长的上山路,此时的新开坝已掩盖在白雪之下。当大车在绕着山坡开筑的沙石路上,还没爬行到从坝底至坝顶道路的一半时,车辆已开始在地上原地纺线。这时车上的四个人不约而同忙碌起来,有的在车下除雪,有的到靠山坡的道边捡来石块用以支垫车轮防止下滑,但是紧张归紧张,效果并不大好,半天大车往前没能挪多少。就在这时,一种奇异的降雪现象,也是我平生以来从未闻听的一种降雪形式不期而遇。此时,就在我们汽车所处的头顶

上,天空突然变得很低沉,而且是黑压压,灰蒙蒙。从天空中降下来的雪,并不是飘飘洒洒悠然而下,也不是纷纷扬扬杂乱而落,而是直上直下的从空中往下倾注或者叫做倾撒。当时汽车的灯光也打不远,在灯光下四周全是洁白的雪帐,连天接地一片茫然,我们好似被笼罩在悬挂着的雪帐之中。

这种降雪形式大约经过40多分钟后,山坡刮起了一股冷风,降雪开始变为雪花飞扬,但是再看脚下的积雪已足有25公分厚或是30公分之厚。

当时高经理与我商量,在这种车既上不去,又下敢下,什么时间能起动一时还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是否让青格勒陪我先行一步,到新开坝南面大约是3公里远的路面,就有一处土木建筑,供养路工人居住的处所,名叫“道班”,进屋里借借宿,取取暖,等到大车过到坝前的时候再加接送。看来当时的上策,只有如此,因为坝上雪大,山前什么样不清楚,这里常十里不同天的现象出现,为了稳妥起见,当时还商定,大车过坝后,要在道班旁的道上鸣笛三声,如见不到我俩的身影,那就说明我们早已走了,大车不必再等。

大约是晚间的10点左右,我俩以步当车开始向前跋涉。过到坝前是在约3公里多远的道西找到了“道班”,叫开门进屋里一看,屋里已住满了合衣而卧的人,不要说借宿,就是落脚的地方都很紧张,根本不可能在此取暖和借宿,只好时不我待地又接着向南,向乡政府所在地前进。

从大车所在地的坝上,到巴彦琥硕镇镇政府所在地,两地相距也就是19公里左右。我俩在夜幕下的雪地里跋涉了约8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左右,才得以到达。

看来是我年近花甲身体又属欠佳的人，影响到年轻人也跟着吃苦了。

刚迈进乡政府院的大门，就见到了乡党委书记李贵同志正在院里走动，随后又见到了镇长陈玉同志。他俩开始都不相信我们因遇奇雪而雪夜步行一事，后来见到我俩的鞋上和裤腿角上还都粘挂着泥土时才相信。然而在乡领导们安排的一顿热情和热呼的早饭过后，一夜的劳累已开始淡忘。

不久，又见到了旗畜牧局的武显宗局长在此下乡，他得知我是准备回大板看病等情况后，马上就叫来他的司机，用他的小车把我俩送回到大板。

遇雪新开坝，夜幕雪里行，确实是一次使人疲惫不堪，又令人终生难忘之事。然而这又是一次幸运之事。为人在世能身临其境地领略到如此奇异的雪景，这是天生地就的一次造化。

在这次夜幕下雪地里的跋涉，或许是因为天气寒冷，夜间静谧，空气新鲜之故，此时此刻的头脑中显得清冷了许多，也就玩味起了一些问题。

人生的岁月短暂，一生中的有为与无为有序可循且瑕不掩瑜，每个人只能是生存在他人中间，也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片段时间，要论及自己对他人的奉献时，就是再多再大，其实也还是非常有限。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他人，对自己的付出为无限。

在草原上，夜幕下的寒夜里，如果架起并点燃堆堆篝火时，寒夜就会变得温暖和明亮。如果是人造或者是天降一

场冰雪时，却无法驱赶走寒夜使草原变的温暖。

### 11、往事回眸扣仄平

这里所说的往事，并不是指流经时空隧道里如烟的往事，而是只限于上个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时，我在文博工作岗位上，经历的一些让人不能释怀的故事。现择要如下：

#### (一) 到位提案专款替换来源称谓

巴林右旗博物馆是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批准建立的，是自治区旗县级里的第一个博物馆。1985年8月15日初创时，是在旗文物馆的基础之上，仍利用十年浩劫后，满目疮痍的喇嘛庙——荟福寺，做为自身并不理想也很不安全的馆址，当时的博物馆除了要很好地利用古建，办好展览，强化宣传而外，还要认真做好征集、扩大馆藏和注重安全管理等工作。此外，就是要争取一些维修古建的费用，一来为保护幸存古建的安康，二来也为优化和美化馆舍和环境。

1986年春的一天，我与额老师谈论到荟福寺的凄凉状况时，我意欲请他再去呼市开会时，能为保护和抢救幸存古建荟福寺呈上一份提案。额老师很是爽快，当即我们就拟就了草稿。其时，额尔敦白音同志，是大板一中的老师，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1986年5月2日(星期五)，额老师特地将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提案批复“维修费人民币两万元”的复印件给我送来。我于5月3日上午，一上班就拿着“复印件”到旗文化局找道尔吉局长汇报。后遵照道局长的意见，一同到

主管文教卫生的旗长苏日他拉图旗长办公室做了汇报。苏旗长很高兴,并对额老师的举动大加赞赏,当时并没讨论专款经费如何使用等事宜。

1986年5月26日(星期一),我刚上班就接到旗政府办的电话通知,要我马上到苏旗长办公室,有要事商讨。当时在苏旗长办公室的人员,除苏旗长和政府办的秘书外,有文化局的局长道尔吉同志,有旗民委主任道德贵同志,当然我也在场。

苏旗长开门见山地讲:上礼拜道主任对我讲,民委为彩绘大庙弄到了两万元经费,当时因为我急着下乡,所以今天才和大家商谈这一问题。我的想法是韩馆长和道主任先辛苦一趟,到市民委看看这笔经费如何下拨和什么时候能下拨。旗里能有四万元专项经费,大庙的事就好办多了。

我俩于5月27日,乘班车上午就到达赤峰,住到了二所。下午一上班就去市民委,来到了汪主任的办公室。

道主任要我讲我俩来此的动议,汪主任似乎是工作忙得不可分身,顾不上马上答复我们的问题,此时,我换了一个话题,将随身带着的“复印件”拿出来,向汪主任请教。“您知道这一提案的专项经费,是通过什么渠道下拨。”此时的汪主任似乎才定下神来,催工作人员沏茶倒水,并亲自递烟。然后讲,这两万元就是政协提案的专款,只是我们想用来彩绘大庙。

## (二) 珍稀文物转藏于人民银行库房。

1988年4月24日上午,分管文教卫生的昭日格图旗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我等有关人员,下达了旗里做出

的决定。博物馆要在5月16日前,从大庙里完全搬出,荟福寺交由旗民委负责管理和维修。至此,旗博物馆事业,迈向了要另辟蹊径和必须再起炉灶的新起点,也走入了前进中的低谷。

好在1986年初,旗里为博物馆的改扩建一事,已在紧接着庙东,划出了一块与大庙南北等长而东临道路的用地。同年的9月前,我已用陈旧的青砖砌筑了院墙,并在东墙之上连筑了三间自我设计的砖混结构,仿古建筑式的门房。中间为可通行车辆的门洞之房,两边为门卫的住房。1987年上半年,又在此用地上的北端,建起了八间砖混结构,仿古建筑平房。当博物馆从寺庙中迁出来时,总算是有了立足这地。

博物馆何时才能走出低谷?此时的旗党政领导们都很关注,尤其是旗里的主要领导同志布仁乌力吉旗长,更是率先垂范。从新建馆舍的设计到立项,从筹措经费到开工和竣工,布旗长都要亲自叮嘱和过问。因而新建的2000平米的砖混结构主要为展厅和库管等用房,为二层楼阁式仿古建筑,南端与其西侧的1984年复建的荟福寺的山门平齐。自1989年5月破土动工,到1991年6月25日已正式启用,博物馆又迈上了新的层面。

当博物馆从寺庙里迁出来,面对没有展厅,开展不了展出等宣传工作时,当时仍有多项责无旁贷的重要工作,大家出同心同德知难而上。如:必须如期搞完全旗的文物普查工作,必须继续搞好辽庆州白塔的维修工程,必须全力以赴的搞好馆舍的建设,一定要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盗掘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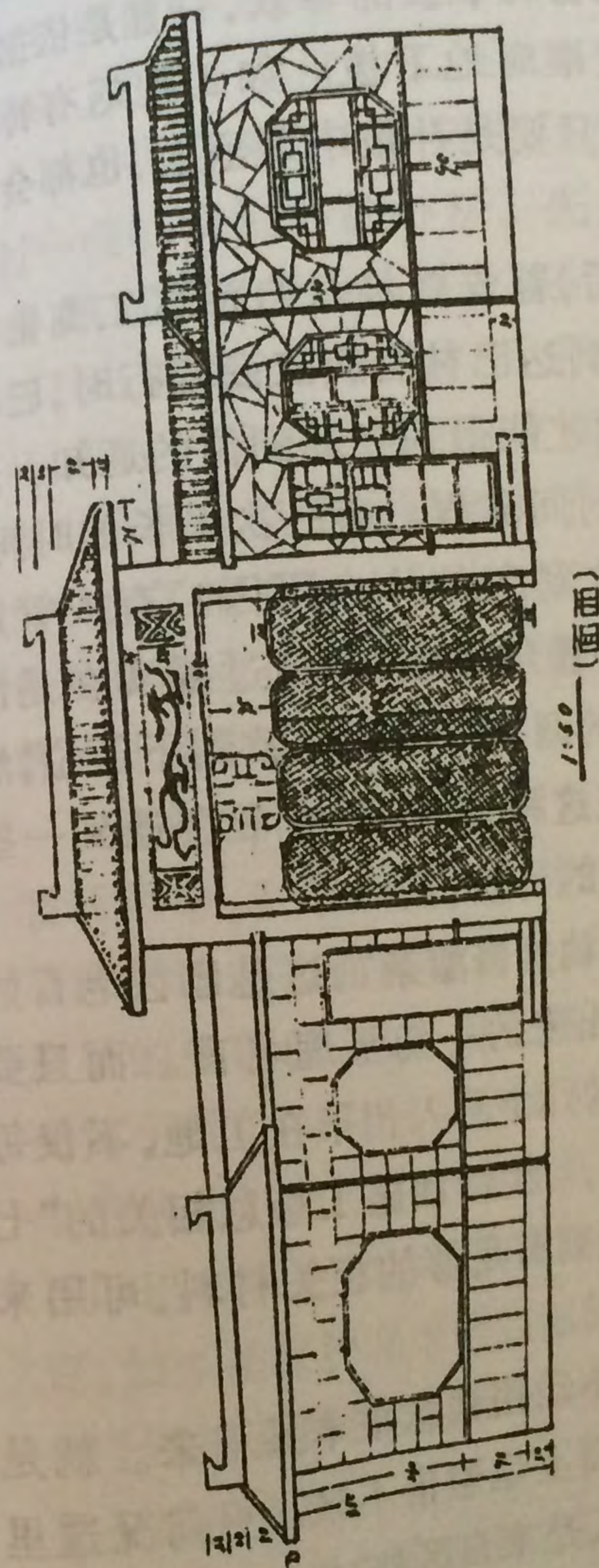


的犯罪之风等等。然而因为没有库房,许多件已为世人了解的珍稀文物,如“红山文化”的玉器等等,早已为一些怀有歹意的人垂涎三尺。如何才能做到确保这些珍稀文物的安全,那时做为—馆之长的我来说,博物馆工作已不再只是什么如履薄冰,比骨梗在喉还难,实有巢毁卵破临危之感。至此困厄之时,我真有些万般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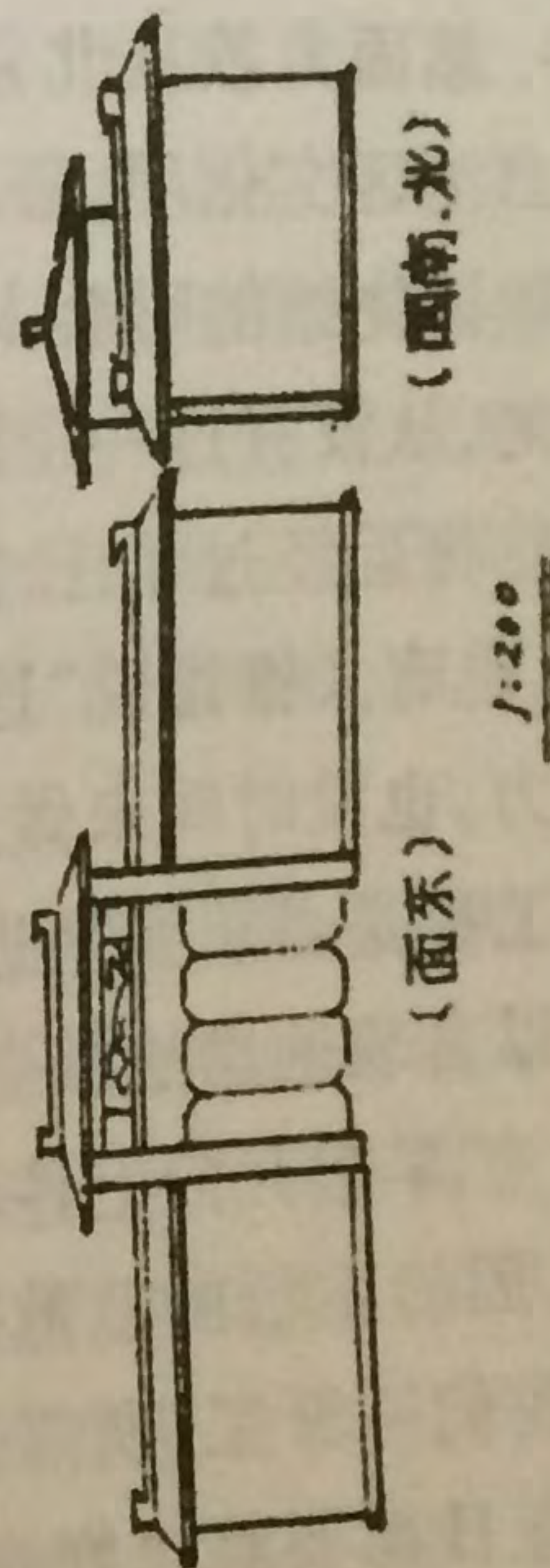
巴林右旗人民银行的任宗福行长,值此博物馆危难之时,不仅能理解珍稀文物的临危处境,而且同意了我的请求,将博物馆的珍稀文物,经双方有关的人员,共同过目、装箱、上锁和加封后,不动声色地转藏于人民银行的库房,一直到1991年春。

这一为关爱文物而帮助他人除难解困的行为及真情实感,是不该列入被尘封和被埋没的范畴之内。

附:博物馆改扩建用地上东门立面图。



博物馆改扩建用地上东门立面图 1986年9月14日绘



### (三) 保护文物工作的亲和力

上个世纪 1988 年至 1992 年,在维修辽庆州白塔工程的整个过程中,本来国家文物局下拨的专款,一直是依据工程项目的计划所需,分年度准时地下拨。如工程遇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追加拨款时只要是补报申请呈上,也都会及时地下拨。

然而专款从北京汇出后,首先要经过自治区工商银行和自治区文化厅,最后才能到达巴林右旗工商银行时,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财会人员此时才能得到专款到位的通知。这期间,从没有过一个固定的时间流程。有一次最长的时间,竟然将近经过了三个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人管窥说,也有人锥指说“这是体外循环所致”。不过我实在是没精力,也没时间来做这方面的调查。虽然专款到不了位,然而工程是必须如期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言表的尴尬或者是无助的苦恼。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已往老百姓们,因为生活的煎熬而体尝出来的一句至理名言。而只要是我们一开工,所需多工种的几十号人相聚在工地,不仅每天每日都要解决好吃饱吃好,与生活 and 施工息息相关的“七件”事,而且每天每日还要做到有足够的相关材料,可用来施工。

不要说所用建筑材料,不动用钱款根本买不来。就是几十号人的吃饭所需,从市面上也赊借不来。更何况这里维修古建的工人,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区外,如河北曲阳和山西原平,也有不少的是呼市人。这些人,有的是祖传的手艺

人,有的是多年在工地上实践而砺练出来的技工。他们既有熟练的技艺,也很讲诚信,施工中一贯严肃认真。如果是这些师傅们,到每年的工期暂停时,拿不到他当年应得的工钱时,试想下年度的工程谁来干?还怎么干。

当我们遇到工程要进行专款尚未到的坑坎时,我也想过一些临渴掘井的办法。先是向当地政府和财政部门求借,然而那时当地的财政,还只能算是“吃饭”的财政,根本挤不出来资金来帮助。后来又向社会、向企业来求助。还好,当时内蒙古巴林石工艺美术公司的总经理时景佳同志,在本公司也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坦诚地向我们伸出了清澈如水的友谊之手,向我们伸出了无任何商业色彩和商业行为的援助之手。我们施工指挥部,只要做到款到即还则可。

要问巴林石美术公司为什么能这样做。时总经理的一番话语中,似已点透。巴林石工艺美术公司,就是因为当地出产天赐之石而成立和闻名于世。还因为六千年前生息在这里的先民们,已经用天赐之石为美石、为玉料,琢饰出了炎黄子孙们一向崇拜的龙和凤的雏形兽形珮和鸟形珮,如今已成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的典型性文物。因而天赐之石即巴林石更加珍贵和遐迩闻名。平素讲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如今是保护和维修当地的辽代白塔,我们公司能遇上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真能为此而做点什么工作,这也应是天赐的良机。

在辽庆州白塔的维修工程竣工前后,时景佳总经理和旗美术公司的朋友们,对他们为维修大塔工程及时地帮助

维修指挥部排忧解难一事,从不张扬更不炫耀,一直是以一种平常之心,处之泰然。当做为一位当地参与维修工程,并坚持始终的工作人员我来说,一直感到有些事情很难理解。我们施工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直到大塔竣工后,连一句不褒不贬谢谢之类的中国话,都没当面对时景佳总经理,对旗美术公司的朋友们去讲,这样冷漠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和甚为偏颇。

1995年春,旗美术公司和时景佳总经理以及旗里的有关领导同志芒书记和那旗长要我协助改建和设计巴林奇石馆。当时虽然我自感身体很是不适,但因以往的感慨系之和在盛情之下,还是欣然受命。

奇石馆的选址,位在美术公司直对着的大道之北,是当时旗委大院东南角上,紧靠大街为南北向,可改建为单门独院,且为建起时间不久的一处仿古建筑硬山式居址,是旗里划拨给旗美术公司,专门用来建奇石馆而选定的地方。

馆址的四周,用砖墙围封,正门设在南墙的正中,且为硬山式单间门洞。由于正门与南墙的位置太逼近大街,甚至正门已跨至了人行道之上。所以这是改建过程中必须拆除的,也是首先要设计好的关键项目。拆除正门和南墙后,整个馆址已是颜面扫地,显现的极为败落。但是拆除后可用做修建的地块显见狭窄,已不足以用来修建门庭。然而奇石馆不能没有自己的门面建筑;同时又必须是在此地块上来设计和建筑。

院内靠北边有正房三间和跨建在正房两侧的耳房各两间。在正房前稍偏南一点的东院墙和西院墙上,对称地各

设有一随墙小门。小门稍偏南处,在院内的东西两侧,各建有厢房三间。这些建筑,虽然形似硬山式的古建,但是建筑结构与建筑物的用材,与清式的古建相比甚是大相径庭。比如最显露的地方,房顶上所施黛色筒瓦,根本不是瓦,全是用黄泥在仰瓦上做成泥垄条后,再在其上刷抹一层水泥后染色而成。此外,所有建筑物上的门窗设置,完全不见一点方菱花、步步锦等帘架花心,以及裙板和条环板等装饰。这些似是而非的劣迹斑斑的隐患和不伦不类的粗俗现象,也是要在改建和设计过程中彻底地清除和尽力加以补救。

设计奇石馆的门面建筑,有两个条件必须遵循:一是必须在南北很狭窄,东西为条形的地块上搞设计做文章。二是工程建筑必须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工。为此,首先要解决好门面建筑的外观问题,要给人以别具特色的鲜丽之感,再也见不到因门墙拆除后,建筑物的间距缩短,所产生的那种圯废之感。其次采用中国建筑中高雅的牌楼式的形式做为门面建筑,并且设计为仿汉白玉条石构筑的理念。这样既能迎合条形地块的条件和确保如期完工,也能使门面建筑显得雄浑挺拔,坚美华贵。从而映入观众眼帘的景象,是一处有艺术感的文化载体,并因此而油然地把感受导向高潮。

从开始搞设计到具体地实施过程中,旗美术公司安排协助我工作的同志们,工作十分肯干,态度负责热情。这对我顺利开展以及完成任务,极为重要。比如我在设计和绘制某种图纸前,一定要掌握有关地方和部位的一些准确数据。在实测工作中,凡是有要登高或涉险的地方时,潘险峰

同志都是争先去完成。在具体工作中,有时会遇有缺东少西不便开展工作的情况时,王振德同志总会是及时地跑来跑去,化解难题。当试做和制做牌楼柱头顶上的兽形玦和鸟形玦构件时,因当时工地上没有用松木加工成吊棚用的灰条木,此项工程面临停工待料的窘境时,当时王振德同志和个别工人师傅,知道我家有刚加工近两个月,准备用来吊自己家棚用的,近一立方米松木板条时,为了不误工期,在征得我同意后,就用小拖拉机运来工地借用。

在建设巴林奇石馆的日子里,加深了我与公司领导们和同志们的友情和相互间融洽与理解。不仅如此,还促使我对天赐之石——巴林石的产地、源流、过去、现在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就用我当时有感而发,并信手所写的四句话“亿载天石赐人间,意昌颡项始琢玩。耶律爱新接踵至,万家雕藏八零年。”做为本文的结语。

祝巴林奇石馆这朵文博苑中的奇葩,青春永驻,香满十方。

附:1995年手书影印件

亿载天石赐人间意  
意昌颡项始琢玩  
耶律爱新接踵至  
万家雕藏八零年

一九九五年四月  
建设巴林奇石馆  
王振德书

#### (四) 汽车用油为何只好从抗灾油中挤上一点

在吃饭要粮票、穿衣得布票,就是维修国家级的文物古建筑工程,需要木料和铜材等时,也都得要有国家和省级以上主管部门划定的指标和证件的那个计划经济时期,汽车用的燃油,就更加格外的紧要。

为便于施工,我们施工指挥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购置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和一辆京吉普“212”。由于大小车上,均标识了呼市文管处的名称。车上挂着的车牌均为呼市地区管理的牌号。所以每当冬春季节,在大塔不能施工期间,大小车在呼市地区行驶起来,很是方便。

然而每到大塔施工期间,虽然大小车辆多数时间里,均在塔下工地,只因车辆的“户口”并不在这里,所以无论是赤峰市还是巴林右旗,都根本没有挂着呼市地区的车牌,标明为呼市文管处的车辆的点滴燃油指标。在真正施工期间,为便于施工而购置的汽车使用起来很是不便。

为了解决这一窘况,我们也曾数次向赤峰市和巴林右旗的有关领导和石油公司直陈报告,申请用油,然而收效甚微。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当地的驻军,来解决燃眉之急。或者是直接雇用他人的汽车,来完成运输任务。

一次,因为施工中必须做到要用桐油来浸润木构件和部分大砖等构件的问题,所以于1989年7月13日,特向当时已由索博日嘎苏木的苏木达,迁升为巴林右旗一旗之长的那顺孟和旗长,申请解决派车去河南省安阳市,往回运三千公斤桐油的汽车用油一事。那旗长在签批这一申请时,讲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为了保护好文物古建,只好从

抗灾油中挤上一点。”

我这里回眸往事的目的,并不是只关注过去,而是为了前瞻,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向前看,就是要在阳光下,正道上勇往直前。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张衡有一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要人们能随时拿起镜子做自我检查,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或不被陷入危难的境地。

顾后瞻前,绝不是犹豫不前。

## 后 记

辽庆州白塔,为国家级重点文物“辽庆陵与奉陵邑辽庆州”保护单位内,唯一幸存地上的,辽代古塔建筑。辽庆州古城,不只是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辽代第六、七、八三位皇帝与后妃们的奉陵邑;还是有辽一代的捺钵制度下,夏秋捺钵,尤其是秋捺钵时,帝后们要常在此驻蹕的城郭。

辽庆州白塔的维修项目与工程,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把关和拨款,并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指定文博单位,呼市文物管理处和巴林右旗博物馆的有关人员,组成“施工指挥部”,具体完成项目和工程。这是国家文物局意在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维修古代建筑和保护文物古建人才的阳光举措。

辽庆州白塔,在辽庆州城里巍然不动地耸立至今,它恢宏华丽的风姿,玲秀超凡的品位,一直令世人赞不绝口。然而在整部的《辽史》中,并没有营建大塔的字记载。为什么在此处要建如此之塔?是什么样的人能在此处建塔?又是什么时候所建之塔?这些令人费解又使人迷惘的问题,历来为方家学者们不断探求,而又无从稽考的难题。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施工中,要认真对待和希望能得以释解的问题。

## 后 记

《辽史》中对于辽庆州古城的记述,也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不但没有记述古城的方圆与规制,只是有古城所在地的地形地貌的描述。然而这与庆州古城的地望的实际情况,既不相符,且十分的迥异。再者,《辽史》中记载庆州城的营建时,庆州城是营建在辽穆宗所建黑河州的废址之上。这一记载,虽然以往从未引起专家学者们的质疑。不过我多年来在庆州城址上调查,并未发现有黑河州的任何遗迹,也从未发现有任何叠压现象。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不知这又是为什么。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在塔刹中发现了“建塔碑”及碑刻铭文,因而尘封已久的辽庆州白塔神秘的盖头,已被掀了起来,秘密至此已被揭开。

维修辽庆州白塔的工程,于1992年8月6日正式告竣,以罗哲文先生为首的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组,再一次亲临施工现场,对工程项目的管理和工程的质量,给予了赞许和肯定。在此期间,8月2日—8月9日,第二届全国古塔研讨会,在赤峰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如罗哲文、郭旃、王世仁、杨鸿勋、郭黛姮、苏赫等等,均莅临塔下,对大塔和维修大塔工程的展览等,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处、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等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和政要们,以及新闻媒体的女士和先生们,也都赶赴现场,参加了大塔维修工程竣工的剪彩活动。特别是当地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他们为了大塔的重光,还特地举办了那达慕大会来庆祝。

关于《辽史》的编撰者们,对营建辽庆州城的自圆其说

的苦衷之作,因为是首先就将穆宗所建黑河州的地望,张冠李戴嫁接到了庆州城之上,所以只好顺水推舟,神话似地将庆州城营建在黑河州的废址之上。为了这一史载不实的问题,我于2002年的6月间,在旗政协崔义主席的关注下,为我派出专车,我再一次奔赴庆州城北约7公里的辽穆宗所建黑河州的废城址上,做了进一步的实测和考察工作。详见拙著《辽代城址探源》一书中的“石匠山古城”和拙文“石匠山古城址调查”。

由于笔者的学识所限,且撰稿期间身体一直欠佳,书中可能会有一些疏漏和差错的地方,还请指正。

本书得以出版面世,除得到了政协巴林右旗第七届委员会的关怀和鼎力资助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处对此也很关注。同时,还得到了巴林右旗博物馆等单位 and 同仁们的帮助。如书中所用的文物彩照,多为青格勒同志为我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 附录——参阅主要图书目录

- 《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 《魏书》——中华书局出版
- 《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辽海丛书》——辽沈书社出版
- 《契丹政治史稿》——陈述著
-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杨若薇著
- 《辽史丛考》——傅乐焕著
- 《苏秉琦考古学术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
- 《乌桓与鲜卑》——马长寿著
- 《东胡史》——林幹著
- 《匈奴史料汇编》——林幹著
- 《中国民族史》——吕思勉著
-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 《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 《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方立天著

- 《宗教文化丛书》——中国建筑出版社出版
- 《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 《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蒙古游牧记》——张穆著
-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 《赤峰史》——文物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学人文库/夏寒 主编.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2

ISBN 7-104-02061-6

I. 华... II. 韩... III. 辽.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573 号

巴林文史丛书

辽庆州白塔文物志略与纪闻(专辑)

韩仁信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装订 巴林右旗鑫源印刷厂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数 168 千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1-2500 册

ISBN 7-104-02601-6/Z·42

1-8 册(全套)定价:280.00 元